

中國風暴雨

著 娜安賈 德修白·美
譯 納 端 沛 以



行刊社版出益華

中 國 暴 風 雨

美·白·修·德 賈·安·娜

以·沛·端·納 譯

羣 益 出 版 社 刊 行

· 1949 ·

· 中國暴風雨 ·

刊行者：

著者 白修堯 賈安燾

譯者 以沛 編納

發行人 吉少甫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六月

華本定價 八 51140 元

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

羣益出版社

上海(○區)武昌路四七六號

有版權·滬1(0001—3000)

目 錄

史諾序·····	(一六)
致讀者·····	(一一二)
序 言·····	(一六)
苦難的中國和鬥爭的中國·····	(一三)
一 重慶——風雲際會的焦點·····	(一)
二 百分之八十的農民·····	(一九)
三 國民黨的抬頭·····	(三)
四 日本動手太遲了·····	(四)
五 外戰中的內戰·····	(七)
六 珍珠港事件以後·····	(八)
七 如此「訓政」政府·····	(九)
八 人民擁護蔣介石嗎？·····	(一〇)

一方面，美國的援助，祇是美國的援助加上了對日的勝利，才使歐洲的列強能够恢復它們對東方殖民地中的五萬萬褐色人種的廣泛的統治，對於這些人種，四大自由並不會適用到。

在我們想維持原狀，想維持一個顯然地已經成爲「活着的化石」的社會秩序的企圖中，最顯著的例子要算是作爲一個盟國的美國對於中國內政的橫加干涉了。在中國，我們以全力來支持一個與我們這次戰爭的軍事政治的目的毫不相符的政權——一個完全獨裁的政權；在它二十年的歷史中，人民連選擇一個地方上的官吏的權利都被剝奪；而這個政權，我們知道，在軍事上無能，在政治上腐敗，在道德上無從辯護。我們以武器，以金錢，以裝備來重新扶持起那些掌權的家族，而對於由非共產黨或是共產黨所組成的人民團體則從不給與絲毫具體的援助。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團體，曾經要求過對這次戰爭的勝利有重大貢獻的許多改革。可是在中國，正如在亞洲的其他各地一樣，一些反對份子，利用鬥爭本身所造成的環境，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力量，這完全是我們無法管束得到的事；他們從日本軍隊中奪獲大宗武器，得以組織起廣大的羣衆。而這一次，假如沒有美國的干涉，在中國的現狀也是絕對逃不過歷史的偉大的試驗的。

一部精湛的報告文學

這些就是「中國暴風雨」這本書所洩露出來的與一般報導迥然不同的事態真相；這本書是一部精湛的報告文學，也可以說是一部東亞戰爭史略。白修德和賈安娜是有能力的視察者，具有超過他們年

齡的成熟的政治修養；他們曾經目擊好多事件的發展，而以亞洲革命爲廣闊而複雜的背景，把這許多事件歸納，並列在一個焦點加以透視。他們的這本書不僅是一本評述戰爭的書；在他們的眼中，美國之擊敗日本不過是瀾漫在一塊整個的大陸上的正在繼續中的求解放戰爭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在這塊大陸上，人類「依然在想從他們的飢饉與受難的過去中掙脫出來。」

日本給我們的教訓

珍珠港事件的起源，可以回溯到日本反革命的勝利，作者認爲那反革命的對象也就是那目前瀾漫在亞洲的要求改變的同一的勢力。因爲民主的動力在那裏受到了鎮壓，日本的古老的封建勢力圈便得以動員一切新的生產工具來作侵略的戰爭。同樣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目前存在於中國，「而我們自己將來的安全則與我們對這些勢力的認識與理解有密切的關係。」美國在中國的許多統帥之中，祇有史迪威將軍懂得「要爭取勝利與和平唯有採取有效的手段來使人民的力量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一點，他認爲是亞洲戰爭的比較重要的意旨。

蔣介石悲劇的故事

蔣介石，視史迪威與中國共產黨爲比日本軍閥更危險的敵人，不能理解那創造出他自己的革命。在他的眼中，革命祇是一個必須予以粉碎的可怕與可怖的事物」。因此，中國戰爭的故事遂變成了「

「他所領導的人民本能地感覺到這次對日戰爭即是對那年代悠久的苦難底整個腐朽了的組織的戰爭。當蔣介石一方面想打日本，另一方面却又想保存那古舊的組織，他不僅無法打敗日本，甚至沒有力量來保持自己的權位。他的歷史性的仇人，共產黨，從八萬五千人的軍隊增長為百萬人的軍隊，從一百五十萬農民的統治者轉變成九千萬人民的主人。共產黨並不會使用什麼魔術；他們祇不過知道人民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

理解中國的道路

書中雖然也有如上的率直的判斷，但並沒有說教的條文，它提供給我們的是逐步增長的真理，與由許多不可吹破的事實鋪積起來的理解中國的道路。利用許多割切的經濟，社會、政治與軍事的事實，兩位作者告訴了我們珍珠港事件前後的中日戰爭，以及這戰爭是怎樣地在打，怎樣地不在打；告訴我們農民們怎樣地組成軍隊，供養軍隊，以及怎樣地成千成萬的死亡（他們大多數是死於飢饉與疏忽，而不是死於戰場）；告訴我們關於蔣介石以及掌握統治大權的宋氏，孔氏、陳氏三大家族和他們的黨羽們；告訴我們一些好人與壞人，以及我們在這兩種人羣中的影響；告訴我們為什麼美國最後終於在不安定的平衡之下，幫助保存那邪惡的榨取與人類墮落的壞制度，對於這個制度，中國人民以全力反抗正如他們反抗日本壓迫的重力。

拆穿了美國陰謀

對於許多讀者，「中國暴風雨」將描寫出關於史迪威事件與違反史迪威政策的赫爾利底悲喜劇的第一幅明晰與緊湊完整的畫面。在這本書中，同時也描述到，解釋到那一般人不大明瞭的時期，當赫爾利干涉中國東部的游擊隊，恢復蔣介石在那地區內的實際勢力，因此「使美國的陸軍與國民黨發生直接的連繫來共同對付共產黨，」這種局勢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海軍陸戰隊還極力地加以維護。關於這個決斷，兩位作者非常正確地特意提出那鐵的事實，「在千百萬中國人民的眼中，中國目前的內戰是由美國所造成的，」以及馬歇爾將軍的工作的「無可比喻的複雜性」，馬歇爾將軍之被派往中國是想清理那被不幸的赫爾利棄於破產的境地中的我們的對華政策。

根據他們自己的看法，白修德與賈安娜的結論是：假如我們不改正領我們走入今日窮途中的錯誤，馬歇爾的使命是無法完成的。簡略地，他們主張：（一）我們與蘇聯會商並且議定一個撤兵中國的共同政策；（二）放棄單獨調解的政策，擴大我們的努力使蘇聯也與我們合作，根據莫斯科會議宣言，要求中國獨立一個容納各黨派的，代表人民的，改組的政府；（三）在蔣介石停止軍事攻勢與採取結束他的獨裁政權的具體步驟以前，停止一切對蔣援助；（四）在代表人民的政府一旦替代了目前的政權以後，毫無吝惜地給中國以經濟上的援助。

我舉雙手推薦這本書

每月新書俱樂部之介紹這本「中國暴風雨」給它的百萬會員，實在可以說是做了一件值得誇揚的服務大眾的工作。這本書不僅在事實上是又正確，又可靠，依正當的次序與輕重比例來處理各個事件的一本歷史，並且是一本最值得一讀的戰爭書籍。兩位作者以成熟精練的技巧來處理這個故事，並且以如此老練，簡潔、平易而流利的文體來敘述它，以致讀來毫不費力，好像看一部電影一樣。雖然兩位作者在實習時期中曾經作過「時代」與「生活」雜誌的特派員，但是他們却終了懂得了怎樣好好地寫作。

由於作者具有優秀的洞察力，懂得怎麼樣去選擇重要的材料，這本書因之便具備了真正的寬度與深度，並且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廣闊的範圍。沒有一個字是浪費了的，現實與歷史的完整性，性格與因果的協調，事故對企圖的撞擊，以及內在的與外在的相互作用，都在熟練的組織觀念之下完成了。這是一本新型的戰時記者的書，有詳盡的歷史背景，正確的細節；尤其使讀者有清新之感的，便是作者在這空前顛覆的社會動力之前，自動地磨鍊了作者自己。

致讀者

本書是兩個人的產品，書中各章，差不多都是作者兩人最密切的合作的結果。有的時候，書中事件只有我們之中一個人在場觀察，在這種情形之下，有幾章里的少數第一人稱，是指白修德。

對於協助我們校讀，編訂和準備原稿出版事宜的許多人，我們謹致謝意。其中幫忙最多的，是J·倍爾頓，R·瑪科爾，M·賽丁，N·萍恩，C·懷德穆爾，G·懷德等諸君，他們在剔除本書的錯誤方面，出力甚大。自然，本書中依然容有錯誤之處，以及這裏發表的結論和意見，就都是作者的責任了。

我們又願對時代雜誌公司致謝，因為該公司答應我們摘引一部份材料和電訊，這些材料和電訊，是我們過去以該雜誌記者身份寄給他們的。當然，本書的意見和結論，是本書作者二人的意見和結論，並不反映着時代雜誌公司的政策或意見。合衆社允許我們引用其宣佈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第一號電訊，我們也表示感謝。

白修德，賈安娜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序言

這次大戰結束時，並沒有所謂最後的一槍，沒有背城的一戰，也沒有和戰之間分水嶺似的最後一天。散佈在地球之上的六個無線電台滴答作聲，把電力的火花，從首都傳到首都，傳入億萬個粗樸的家庭裏；和平是從空氣中走出來的，一霎那遍佈全球。東京灣內軍艦米蘇里號上的大典，是一個洩氣的頂點，是一個爲了尚未到來的和平以及尚未結束的戰爭，表演原始儀節的陳腐典禮。

在暗黑而無生氣的層雲籠罩之下，世界上最大的艦隊躺在世界上最大的廢墟中間。米蘇里號的一邊是美國兵艦「依奧華」號，另一邊是美國兵艦「南達科他」號。一面破碎的旗子，上有三十一顆星，掛在米蘇里號的一個砲塔上——這是將近一百年以前，海軍司令潘萊帶到同一海灣內的美國國旗。在主桅之上，飄動着美國今日的戰旗。甲板上擠集着美國天才的使徒——技術專家們。這里面有重轟炸的專家，有戰術轟炸的專家，有兩棲登陸戰的專家，有空運部隊的專家。這些人是殺人業中的藝術家，他們的技藝已給四年的戰爭訓練得盡善盡美。這戰艦本身，從前桅樓上的雷達網起，到底下許多灰色的厚甲許多仔細組合起來的秘密和神秘的合金止，都是美國一切技術的登峯造極的傑作。這是一幕美國的戲。有一個蘇聯人，帽上圍着紅帶子，還有一個塔斯社的新聞電影攝影員，努力在主要角色

之間匍匐來往，擷取他的鏡頭；有一個加拿大將軍潦糊塗了，簽字簽錯了地方；有一個衣服裁剪得很考究的中國將軍，他是在重慶消磨戰時的歲月的，他在重慶的一張大陸地圖上，調遣過疲倦的師旅。這些人也是技術專家，但由於穿美國卡嘍和白制服的人密密層層，他們被沉沒在人羣里了。太平洋上的勝利是一個嚴重的技術勝利，而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技術專家，威勢壓倒了其他各國。

日本人表顯了一點人情味。六個日本人，在鼓樂聲中走上米蘇里的舷側，但是爲了造作歷史以及便於人們記憶，只有兩個人出頭——梅津將軍和政治家重光葵。梅津穿着檢閱時的戎裝，所有的緞帶閃閃發光，他的眼睛黯然失色，但你可以看到他臉上的疤痕一會兒鼓起來，一會兒癱下去，顯得感情激動。重光葵頭戴絲質高帽，身穿正式晨裝，彷彿在參加婚禮或葬禮。他有一只木脚，他在甲板上跛行着；當他開始攀登上那簽訂和平的高甲板時，他緊握住繩子，以無限的痛苦和不安奮力向上。每一個人都以殘忍的滿足，注視着重光葵竭力走上扶梯；美國人誰都沒有伸出手來援助這殘廢的老人。

人們把重光葵和梅津領到前面，而在麥克阿瑟將軍很漂亮地說了幾個仔細選擇過的字眼以後，他們就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一個文件，這文件宣告了日本帝國的結束。於是，重光葵和梅津就都成爲技術人員了；如果誰要問他們爲什麼失敗，問他們爲什麼被迫簽字承認他們的世界的幻滅，他們就會提出一二十個十分有力的理由，而且列舉船隻，五金，槍砲，師團，盟友的數字，以及不合時機的決定等等來加以證明。他們所有的理由，專家們聽起來也許是入耳的。重光葵和梅津大約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他們會失敗，因爲他們所盤算的是那樣可怕地惡毒，而這惡果本身招來了失敗。他們簽了字之後，其

他各國陸海軍大將們一一在文件上簽名，而和平，假如那是和平的話，就此到來了。

這個勝利是美國的勝利。勝利之得來，是由於絕對優勢的五金和槍砲的重量，以及高超的技術，把日本完全擊破。可是，不論在米蘇里號上勝利之時也好，在勝利之前的挫敗中也好，在勝利以後日見起色的日子也好，並沒有任何徵象能夠說美國了解它在太平洋上作戰的意義。我們會因東方黑暗的威脅而退出東方；我們會經認識這威脅是惡毒到難以形容，而且我們已經造好了一架滾路機，把這威脅軌得無影無踪。但是我們從沒有明白這威脅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

美國的戰爭，已經盲目地切斷了人類史上最大的革命——亞洲革命——的行程。我們暫時在許多漲痛的頭中之一個頭上扎了一針，放了大量的血，解除了一點漲痛。可是基本的痛苦和內部的緊張依然存在，而且正在發展成爲新的危機。和平並沒有隨着勝利來到。在整個亞洲，人們繼續自相砍殺；他們今天繼續這樣做，而且將在今後很長時期內繼續這樣做。

亞洲有十萬萬人以上，疲倦於現有的世界；他們生活在太可怕的桎梏之中，他們除了鏽鏽之外，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他們被鉗制在這樣的無知和窮困之中，如果把他們的日常生活描寫下來，美國的讀者不會相信這是真的。在印度，人的平均最高壽命是二十七歲。中國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歲就死。亞洲每個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驚人的必然遭遇——飢餓，屈辱，和暴力。不論戰時或平時，荒年或豐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橫陳着人的屍體是太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廠門口收拾重工的屍首成爲例行公事。亞洲的鄉民被官吏和憲警敲打，鞭撻，虐待，侮辱，那是政府權威的

實質的一部份。這些人生活得十分勞苦；他們是靠最原始的方法，用筋肉和氣力，爬掘瘠瘦的田土，來維持生計的。如果天氣和他們作對，那就誰也無法把他們從餓死的境地裏救出來。不到一千年以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的；當時歐洲以一連串的血腥的戰爭，起來反抗舊制度，使舊制度一代一代地昇化成為如今我們的所謂文明。亞洲人現在也經歷着同樣的過程。

史書往往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成功的革命上。當巨大的人民羣衆從貧困之中迸裂出來，以流血和暴力來改善自己生活的時候，當代史家通常以驚惶和詈罵來迎接這事實。只有時間，才能使這種起義受到尊敬。在起義失敗，而表面上的穩定重新被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把這種穩定當作良好而值得稱道的東西。然而，在這穩定的下面，繼續着貧困，緊張，壓迫和對於革命流產的恐懼，而且在內部孕育着悲慘性質的暴力。人民的被壓抑的熱情，受到虛假的口號和辭句的誘騙，他們很容易地被引導入狂妄的冒險之中，來反對整個世界的和平。日本過去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對日戰爭，是對抗一個失敗了的革命之後果的戰爭。一百年以前，西方對中國和日本的衝擊，發動了革命的輪軸。幾代以來，一般通常認為日本已順利地轉入現代世界，而中國並沒有；那是錯誤的看法。在潘萊艦隊開入東京灣之後的十五年內，日本的革命失敗了。這革命被日本中世紀的封建的，頭腦反動的領袖們攔在手裏，革命的動力，則被扭曲而納入一九四一年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帝國的結構之中。這樣的帝國，是除了侵略世界之外，無法解決自己內部問題的，是註定要侵略的。日本的領袖們利用農村的隱秘的悲慘以及工人的組織性，把災禍帶給每一個人。而一百年以來中國一直

具有的混亂狀態却證明了：中國人民反抗自己古老的痛苦的革命浪潮是任何集團都無力加以控制和歪曲的。

日本對我們的戰爭，是一個一開頭就已經失敗的戰爭。他們的領導者，是一些對於政治只有十分粗鄙的了解的軍事專家；打敗他們的人，是一些比較高明的軍事專家，也不懂政治，但擁有日本無法比擬的鋼鐵和科學的寶藏。然而，打敗了日本，我們却並沒有締造和平。和在日本走入歧途的同一革命力量，仍在活動於亞洲別的地方。整個亞洲大陸上，人們依然在設法從他們過去的飢餓和痛苦之中把自己解放出來。

在整個亞洲大陸上，中國的求變之力，要比其他各國動作得更危險而具有爆炸性。亞洲的和平以及我們自己將來的安全，要看我們是否了解這些求變之力有多大，誰造成的，以及誰抑制了它。除了史迪威將軍之外，盟國將領們似乎誰都不明白這是東方戰爭的基本問題。史迪威沒有理論——可是他懂得，我們在這次大戰中作戰，同時也就是在規劃和平。他懂得，勝利與和平都有賴於把人民的力量如何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他的道理，全是實地經驗，在戰場上親身體味了中國的生活而得來的；美國政府並不支持他的意見，他被解除了指揮權；但是他的去職是一個標誌，這標誌要比他在戰場上打的一切勝仗都來得光榮。

這本書是中國戰爭的一部份的歷史；只有中國人能為自己的人民寫作真正的歷史。中國戰爭的故事，是蔣介石的悲劇的故事，他對於這次戰爭的誤解之深，和日本或盟國技術專家對勝利的誤解一樣。

蔣是革命的產兒，但是他現在除了把革命當作必須加以粉碎的可怕的東西而外，他不能了解什麼是革命。他曾經擁有一切讚許和光采——強大的盟國的支持，正義的象徵，以及抗戰初期全國人民全心的全力的熱誠的擁護。他所領導的人民，本能地覺得這次抗日戰爭是一個對抗久遠的痛苦之源的整個腐敗制度的戰爭。當蔣氏設法一面對日本打，一面保持舊制度的時候，他就不僅沒有能够打敗日本，而且無力維持自己的權威了。共產黨人，他從來的死對頭，却從一支八萬五千人的部隊生長成爲百萬大軍，從一百五十萬農民的治理者變成九千萬人的主人。中共並沒有施用魔術；他們明白人民所需要的變化，他們發動了這些變化。兩黨都說謊，欺詐，而且破壞協議；但共產黨有人民在一起，而且因爲和人民一起，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正義。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間，縱然美國的技术力量移來支持蔣介石了，美國成了他的後盾，也並不能使蔣氏重新獲得他在光輝的抗戰初年所曾經擁有過的權力。

附 錄

苦難的中國和鬥爭的中國

(A. Paley 依列派)

許多年來，全世界進步人士的目光都射向着中國。蘇聯人民也懷着深切的同情注視中國人民堅苦進行的偉大解放鬥爭。

美國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在他們兩人合著的「中國暴風雨」一書中，曾對中國最近十年來的大事作了一番扼要的敘述，他們特別注意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內戰。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是根據個人的直接印象和觀察而寫成的。作者的同情顯然是為自由而奮鬥的中國人民那邊。雖然他們還不能透澈地認識過去事件的意義，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消長，分析事件的經過，以及清楚認識鬥爭的前途，但他們是有良心的觀察者，因此公正地指出，國民黨是一個強盜集團，專事屠殺本國人民，把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而成了豪門。白修德和賈安娜懷着崇高的敬意一再提及中國

共產黨人和共產黨領袖，寫道：『他們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共產主義運動；對於他們，黨就是生命，他們把自己變成火炬，給農民照亮了前進的道路。』

農民的被提出來，不是偶然的。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西歐和美國落後得多，國內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所以強大，就因為這一運動正確地估計了國內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

白修德和賈安娜簡短地回顧了一下國民黨的歷史，指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孫逸仙所創造的國民黨，現在除了名稱以外，什麼都不留存了。今天，國民黨只是一面招牌，屈指可數的幾個統治者捐着它用公開掠奪國家民族的方法把無數的財富抓到自己的手中。書中敘述了蔣介石怎樣竊取政權，即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人也不放鬆對人民的榨取，它不以日寇，而以中國共產黨作為自己的最大敵人。同時該書讚揚了共產黨人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高貴品質和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共產黨領袖的組織工作和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忠誠。

國民黨政府無惡不作的結果，河南省在一九四三年發生了大飢荒，本書以許多

篇幅描寫這次災荒的慘象。河南是中國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但是國民黨政府絲毫不管農業的改進和人工灌溉的施行。結果招致了這次大旱災。但河南的鄰省陝西有過剩的糧食，却沒有人設法以這些剩餘糧食來救濟饑民。不但如此，還繼續向這些垂死的農民徵兵徵糧，而毫不放鬆！因為蔣介石及其爪牙早就把全國的財產據為己有了。稅收基本上都落入他們的腰包。人們餓得發狂，殺死自己的親人，把孩子拿來充饑。河南全省人口三千萬，死於這次大饑荒的達二三百萬人。

中國的解放區內，情形却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把農民當人看待……使他們能夠自由投票，選舉地方政府……使他們可以自己決定應納稅額……它給農民帶來了幫他們種田教他們讀書的軍隊和政府。」因此，作者說，人們一了解放區，『就彷彿從國民黨的地獄升到了天堂一樣。』

白修德和賈安娜在檢討了中國的局勢後，得到了一個不容置辯的結論：『我們應該回到我們的中立政策，這就必須停止干涉，撤退駐華美軍。』

目 錄

史諾序·····	(一六)
致讀者·····	(一一二)
序 言·····	(一六)
苦難的中國和鬥爭的中國·····	(一一三)
一 重慶——風雲際會的焦點·····	(一)
二 百分之八十的農民·····	(一九)
三 國民黨的抬頭·····	(三)
四 日本動手太遲了·····	(四)
五 外戰中的內戰·····	(七)
六 珍珠港事件以後·····	(八)
七 如此「訓政」政府·····	(九)
八 人民擁護蔣介石嗎？·····	(一〇)

九 注定遭殃的中國兵·····	(一三五)
十 史迪威的戰爭·····	(一四九)
十一 人吃人的河南災荒·····	(一七一)
十二 湘桂之役·····	(一八五)
十三 中國共產黨·····	(二〇三)
十四 史迪威事件內幕·····	(二一〇)
十五 延安的政治·····	(二二三)
十六 身如鎗銃的赫爾利大使·····	(二五一)
十七 一九四五——「諾言」的年代·····	(二六六)
十八 花言巧語的實質·····	(二七九)
十九 勝利與內戰齊來·····	(二九〇)
二〇 子夜的中國·····	(三〇九)
二一 美國想古中國幹嗎·····	(三二〇)
譯後記·····	(三三九)

第一章 重慶——風雲際會的焦點

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在各種地圖上都沒有特別標記的。註明是重慶的地方，是一座昏沉沉的山城，棲息在暗黑的崖石上，這崖石是在揚子江上的霧中升起來，直指天空；只要揚子江的水一天流入太平洋，這個江上的城就會存留一天。歷史上的重慶，是一個風雲際會之點，是一個具有誇張的地理意義的臨時宿營地，像慕尼黑和凡爾賽一樣。重慶是一個成千成萬人分享過的插曲，這些人，由於相信中國的偉大，由於具有守住國土對抗日本的巨大的熱情，曾經聚在重慶城邊。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慶聚會過一小下；他們現在都回了家。倫敦，巴黎，莫斯科和華盛頓依然是大都市，依然是號令和決策的中心；同樣的名字响亮的人依然住在裏面，同樣的朋友們依然在舊而熟悉的場所會面。可是重慶只是戰時之物，是一個風雲際會之點；重慶是死了，而它曾經照耀着全中國的偉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諾言，也隨之而死了。

歷史使重慶成爲戰時中國的首都，是因爲由於傳統，邏輯以及迫切的需要，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幾百年來，重慶之所以出名，由於它是內地最重要的省份中的最重要的城市。劃分華中和內地的狹窄的峽谷，幾乎把長江扼分爲二；重慶是這山峽以上的第一個大城堡，睨視着企圖溯江西進的人們。在

商業上和政治上，它稱霸於四川，而四川省則是華西的霸主。四川是一塊巨大的三角形的地方，其面積和人口，大過法國或英國。在中國歷史上，該省一向因四週高山的屏障，自成天地。該省冬天潮濕而寒冷，夏天則酷熱而鬱悶。中國一部份最豐富的礦藏和最肥沃的土地，是在該省的山中。糖，麥，稻，橘子，杜鵑花，罌粟，蔬菜等等，四川都能種，而且長得很好。中國有句俗語說：四川是天府之國。

四川的僻遠和自足，使自己遠離國內事件的主流。在故事和歷史之中，它是一塊深不可接的神秘的地方。實際上，四川倒是以它的落後性盡了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四川人通常是最後歸順新朝代的人。是北京最難管轄的人，是反抗外族統治的暴動的力量蓄積之處，是抵抗大災難的錨石。舉個例，一九一一年爆發的反滿共和革命，就是從四川開頭而延至華中的。這革命引起了世界的注意，釀成了大變化，而現代中國，就是在這大變化中生長出來的。然而這之後，四川在人們不知不覺時，走着自己的路走了二十五年；該省並未追求革命，却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在那裏，軍閥們的部隊，把疾病和恐怖從一個山谷帶到另一個山谷，使全省成爲荒蕪之地。當舊的政府制度衰亡的時候，軍閥們完全操縱了農民的生命，並且以史無先例的滑稽和野蠻，互相戰之不休。這些軍閥是有聲有色的人物；他們和許多小老婆一起住在高大的邸宅裏，作鴉片買賣來養胖自己，逼奪大批田產，並且從農民那裏勒索稅款，有時農民須預繳租稅五十年之多。用這種方法，他們變成了大田莊的貴族，充塞着財富和驕傲。

至一九三〇年中，有一個名叫劉湘的大軍閥，用蔣介石統一中國其餘部份的類似的辦法，以詭計和武力混合起來，使其他的軍閥們臣服於他。日本於一九三七年進攻的時候，四川是由劉湘將軍穩穩地控制着的一些半封建的聯盟結合起來的。在這個軍閥聯盟之中，長江兩岸的秘密會社生長得十分興旺；城市裏毒騰着鴉片氣息；霍亂，痢疾，梅毒和砂眼，腐蝕着人民的健康。工業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是原始的；該省五千萬人中，只有兩間所謂大學以及一所第一流的教會學校。中國西部的農民耕田的方法，像他們的父親或曾祖父一樣；他們的世界，至遠只到鄰近的市鎮爲止。日本進攻中國時，四川的軍閥們完全歸依蔣介石，但在他們的想法之中，這與其說是他們把自己的獨立性併入和臣服於別人的號令之下，不如說僅僅是他們自己和蔣氏之間結成抗日聯盟而已。在日軍進入內地之際，該省接納新的難民，把他們看成流亡者，而把重慶的新國都當作客人的政府。

中央政府把重慶接收下來作爲流亡之家，那地方甚至在中國人看來，也是天下少有的不愉快的地方。一年中有六個月、霧和雨籠罩着重慶，大街小巷都是爛泥漿。重慶是一片舌頭似的地方，伸展在長江和嘉陵江會合之處；江水在雨季高至六十至九十呎，每年都把江邊上密密層層的草屋一掃而光。重慶長大起來，對數千個農村的經濟有用處；它從鄉村裏購買米，肉和絲，以棉紗，布和煤油供給鄉村。它是一個農村性的都市，它的聲音和氣息，像一個巨大的封建時代的鄉村。古重慶的城牆從河流匯合之處起至山頂止，圍繞着這個半島，城市則從野草叢生的山脊伸展出去。據本地人說，城牆是在五百年以前建築起來的；城牆到今天還存在，九個城門，依然是交通要道。一九三九年重慶開始被炸

的時候，有一個城門依然每夜有守夜人闔柵。九個城門中，八個站在山崖上俯瞰大江，但有一個可以在平地上進去，那就是迪遠門。皇帝時代的古驛道，從通遠門出重慶，經山道而至成都，再上北方的高山到西安，再繼續迂迴曲折，到達北京。到華西的主要汽車路，如今在離通遠門一百碼之處刺破了城牆，但是乞丐依然叢集在矇矓的古舊的拱門旁邊，小販們則在老朽的石階旁售賣鞋帶和橘子。

戰前重慶的一切，差不多都在城牆以內。二十萬人擠塞在這個窄小的區域內。社會上的少數有錢人，軍閥，大銀行家和富裕的地主，則在市外數哩擁有私人的宮殿似的家宅。城牆彌漫着渾渾噩噩，不知時間的空氣。二十世紀之侵入，只不過抗戰以前十來年的事情。第一輛黃包車在一九二七年才出現，那在當時是一個奇蹟；兩條汽車路也是如此，電話於一九三一年來到，自來水是一九三二年。日夜供電制是一九三五年。第一艘輪船於本世紀之初溯長江而達重慶；這之後，跟着溯江而上的輪船只有很少幾艘。

重慶有千把條小巷子，從兩條大路上順着山坡放射出去；這些小巷曲折上下，都得靠數百年來草鞋腳踏得光溜溜的石級。四川本地人住在這些小巷子裏，已經住了幾百年；他們對於長江下游汲汲於世事的中國人，採取超然態度，而且加以懷疑。這些巷子小得厲害，有着黑暗的傾斜的陰影，在有霧的日子，就像灰濛濛之中的地道；有幾條巷子是這樣地狹窄，以致走路的人，可以用雨傘承受兩傍屋簷上滴下的水珠。苦力們担着水桶，踉踉蹌蹌走上泥濘的石級，把水担到自來水管到不了的小巷裏。傾倒污水和垃圾之處，也就是取用食水之處。夜裏，各家點燃着洋燈或蠟燭。人們病了，有些人利用

三家教會醫院，但更多的人請中醫，這些草藥醫生醫病用祖傳的方子，方子裏從麝香塊起至小孩的尿止，什麼都有。人們避免疾病的傳染，是把一只雄雞綁在死人的胸上，這樣來辟除惡鬼的。人們頭上纏着灰色的手巾，形狀像是回教徒的，其發源，是在紀念一個一千六百年以前死了的本地的英雄，但來源已不可考。女人們就在當街和隣居聊天的時候，給嬰孩喂奶；她們往往抱了孩子，讓孩子大小便在陽溝裏。

舊的街道上充滿着漂亮的古老的聲音——豬的悲鳴，孩子的啼哭，雞的尖叫，婦女的絮語，男人的吶喊，以及苦力從河邊貨船上把貨物搬上城腳時千古不滅的唱歌似的杭育杭育之聲。賣布客人担着貨物，一面走，一面有韻律地敲着一塊木頭，作為廣告。雜貨担販把貨物裝在一只小方簍子裏，背着走，大聲一件一件唸着他的貨物的名稱。晚上挑糞的人也自己有一套唱法。賣銅傢伙的也有一套——小鈴子，小刀，剔牙杖，挖耳器，統統掛在一根長杆子上搖來幌去。華舊為新的棉胎店裏，工人們敲打着根顫動的弦子，彷彿是低音提琴的伴奏，這弦子一會兒深入棉花中發出鼻音，一會兒響亮起來，一會兒又埋在棉花裏發出嗡嗡的駢聲。

一九三九年，這個古城之旁，生長了新的戰時首都。蔣介石之把重慶選為首都，因為在地理上，這地方對歷代征服者至關重要。華西所有的交通綫，是以重慶為中心而匯聚起來的。重慶有公路通東南，雲南，成都及北方。許多河流在湧入峽谷之前，都在重慶匯合。比起蔣所剩下的其他城市來，蔣

可以利用重慶在較短的時間內運送較多的軍需品和投軍到前綫去。不僅如此，重慶還有別的優點——它的有名的冬霧把城市包裹起來，一年六個月內可使日本的轟炸機難於轟炸，它的山崖，可以挖成世界上最堅固的防空洞。

從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三九年春，被日本人趕跑的政府人員，有的衣衫襤褸，有的是烏合之衆，有的貴族化，紛紛來到重慶。政府機關大批的搬來。他們有的坐公共汽車或小轎車，有的坐卡車或黃包車，有的坐船，有的步行。小販，店老板，小政客，都在長途跋涉之後定居該城。該城二十萬人口在幾個月之內長了一倍多；在一九三八年秋武漢陷落之後的六個月內，該城人口就接近一百萬人。舊城擠得快擠破了。大街小巷充滿着糊裏糊塗的欣喜氣象。這就好比美國肯脫基州山地的一個縣城，突然後招待全部最顯赫活躍的紐約人，德克薩斯人和加利福尼亞人一樣。

新的建築物像菌子一樣散佈開來。四川沒有鋼，因此把竹頭當成樑柱；釘子很少，竹條就用來綁住樑柱；木頭很少，就把竹頭劈開，編成牆壁。這之後，這東倒西歪的匣子似的東西，四壁塗上泥，上面把茅草或瓦片一蓋，就是房子了。在這些草屋裏，住着「自由中國」的信仰者。這些公務員們是可以回去和敵人合作，找到舒服的，但他們住在重慶，因為國家需要他們。城裏滿是新店舖和新招牌。每家店舖都標明其發源地：南京贛莊，漢口洗染公司，蘇州糖果店和上海修車廠等等，都有幾十家。難民口味各別，四川的飯館無法滿足，因此各種飯館，各家都標明了自己的特色，從海岸地區跟隨難民到內地來。在懶懶的、草草築成的棚屋內，你可以買得到福建味的魚羹，廣東點心，湖南辣子

鷄。北京烤鵝。在戰爭的當中幾年，在重慶奢侈的人多起來了，有的店裏可以吃到山珍海味，和皇帝時代一樣好——只要你出得起錢。中國各地的方言在重慶混合起來，變成一種奇怪而快樂的叫囂，喉音，懶洋洋，不連貫和粗魯的聲音。外國人以不入腔的中國國語問路，很可能問到一個廣東人，他的國語甚至比外國人更不行。政府機關的官員們發現，和有些同事筆談要比口談方便，四川的聽差很難懂得他們所說的話。

重慶沸騰了，漲大了。它溢出城牆，到達市郊以外，吞沒了稻田和荒野。政府給街道定下新的名字——民國路，民生路，中一中二二三路等——所有這些好聽的名字，出現在官方文件和請客帖子上。但黃包車夫不知道這些名字，你接到一個請客帖子時，立刻就譯成舊的四川話，使黃包車夫能够明白你是要到觀音巖，七星崗呢，還是陝西街白象街口。

難民和流亡者幾乎立刻認定重慶是一個可惡的地方，而他們認爲最壞的東西之一，是重慶人。和政府一起到長江上游的下江人，把四川人當作特別種類的次等脚色。重慶有錢的銀行家楊氏兄弟，是屬於使中國的財富成爲一家所有的有錢的貴族階層，那是真的。可是一般的四川人，頭纏繡帶的白布，說話是圓滑如啼聲，唱歌似的，態度是沒精打采，甚至和沿海最落後的人比起來，都似乎落後些，沿海的人至少是見過電車的。而另一方面，本地人却把下江人當作闖入者和外國人，應該加以處罰，榨取和譏笑；外江人來得多，物價高漲，這激怒了他們。重慶過去受西方影響很少；它留戀着舊習慣；結婚依然是由父母作主的，丈夫第一次遇見妻子，是在結婚的那一天。重慶不贊成下江女孩子唇上的口

紅；它不喜歡髮髻；青年男女在街上飯館裏一起吟飯，使它大為震驚。

新到的人也許會發現天氣比人更爲惡劣。重慶只有兩個季節，而兩季都壞。從初秋起至暮春止，霧和雨滴滴答答，籠罩全城；潮濕和寒冷統治着每一個家庭。大街上的泥有好幾寸厚，人們把滑溜溜的泥從寢室帶到辦公所裏，又帶回去。只有訪問極少數生着煤爐的現代化人家，才能逃掉潮濕的寒冷。一般擠擁不堪的逃難人家，縮在偷工減料的茅屋裏，只能在很費錢的炭鉢上煖煖自己的手指，要不然就早點上床。在夏天以前，各人都發抖；夏天一到，熱氣就來了，而太陽照得人發昏。全城覆蓋着塵土，塵土之厚，像冬天的爛泥一樣。空氣中依然留有濕氣，周身流汗，針刺似的熱，傷害着皮膚。走一點點路好像遠征一次，走長路則簡直是苦刑。成羣結隊的臭虫出來了，綠色的小虫在飲用的水裏游泳，四吋開闊的蜘蛛，在牆上爬行。有名的重慶蚊子也來了，美國人說，這些蚊子是三只一批地工作着的，兩只揭開帳子，第三只就嗡嗡進去咬人。肉腐爛了；水永遠是不够的；痢疾流行，躲也躲不掉的。

在濃霧之下以及酷熱之中，這戰爭的六年間展開了幾乎是荒唐的各種生活樣式。中國社會的所有各階層，在其各個發展階段，都混雜在一個城市里，這個城市的主要性格，是由誇張，瘋狂和妖媚三者以三個等份湊合起來的。政府宣佈燙頭髮是非法的，上海和香港女人們却偷偷的違禁燙髮；政府宣佈抽鴉片是非法的；本地船夫和脚夫却偷偷的違禁抽鴉片。富人的幾輛汽車在大街上狂叫着走，閃開成群的豬和破爛不堪的黃包車。天旱時節，許多人頭上插了綠葉，排成行列向神道求雨；古式的婚禮行列，領頭的是飾有紅布的花轎，很愉快地在號召人們紀念航空節的牌樓和標語橫幅之下走過。重慶城總是

充滿着一些漂浮的氣息，香的臭的都有。粟子攤在砂石裏放在炭火上炒，風一吹，帶來了草藥店裏微微的甜味。在夏天，陽溝裏的人的屎尿惡臭，和油裏煎着而加上香料的令人沉醉的食物香味混在一起。

外國人，流亡者和四川人有一樣東西是共有的，那就是陌生之感，海邊來的流亡者對時間和空間都感陌生。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撤退，每後退一步，他們就和不久以前剛脫離的民族古老傳統接近一步；他們到達重慶時，就進入了封建時代。重慶本地人對於時代是有陌生之感的；新的世界走到他們身上，他們不能了解。

重慶第一次遭大轟炸之夜，四川恰巧遇到月蝕。據中國的民間傳說，月蝕是由於天狗吞月。只有敲打銅鑼，才能把天狗嚇走，使它不致把月吞掉。五月三日空襲至五月四日空襲之間的夜裏，救月的銅鑼通宵在敲打，鑼聲響澈城中，和火聲及許多受難者的哀痛之聲混成一片。

使重慶成爲偉大，而把各種各樣參差不齊的男女鑄合成爲一個社會的是大轟炸。重慶是一個不設防城市。它的高射砲幾乎是無用的：在日本開始對該城大轟炸的時候，砲銃的來復綫因爲用得久，磨光了。該城沒有雷達，也沒有任何值得稱爲空軍的東西。該城的居民擁擠得可怕：房屋是引火的，救火器具和水源少得等於沒有。該城對付日本飛機的只有三件東西：城內崖石之間的大山洞，中國人的聰明很快地掌握住的近乎拼命的防空制度，以及人民的不屈不撓的意志。

轟炸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開始的。在一九三八年秋漢口陷落之後，日本人等了幾個月。他們向蔣

介石提出了議和的奴隸條件，蔣拒絕了。所有的大城市都在侵略者手中，七零八落的中國軍隊，無助地散佈在蒙古至廣東一綫的山嶺上。日本人覺得，中國的抵抗力已經破碎了，剩下的事，只是以火焰來懲罰依然頑強的中國政府，使它認識到失敗。這個任務，日本人交給空軍來做。當冬天的霧於四月底在重慶周圍退清的時候，日本飛機來了。新的時期以兩次空襲開始，第一次空襲剛過去，第二次接着就來。第一次空襲發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破壞很少，炸彈多半落在長江的水裏。第二天的第二次空襲才是一個大災難。轟炸機從北面的暮鴉之中飛出來，泰然自若地排着整齊的隊伍，翅膀接着翅膀，穿過舊城的市中心區。沒有效力的高射砲彈在殷紅的天上找尋彈道，爆成粉紅色，但永遠打不到，永遠打在轟炸機隊的後面。

炸彈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襲擊了重慶。看得見的東西，如屍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數十萬擠不進防空洞的人們，引起了恐怖。看不見的東西——迷信觀念，引起了更大的恐怖，對於隆隆而來的新式飛機所發生的迷信觀念，是無法解釋，而且無藥可醫的。日本的燃燒彈引起了十幾處小火頭，在兩個鐘頭之內，延展成許多火堆，永遠吞滅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後街，小巷以及轉灣抹角的衙堂裏，數千男女被火烤死，沒有辦法救。許多風格特殊的古廟，被火海一映，夜裏尤其顯得別緻。大火的一切混雜聲音，由於古城的沒落，更來得強烈——木頭在折裂，嘶叫，人在呼喊，木板和竹子搭成的陋屋在猛火之中熔化的時候，竹節斷斷續續地發出爆裂之聲。

潮水一樣的人，從那條由舊城通到郊外的主要街道上湧出去。恐怖的傳佈，是由於一種羣衆的無

言的現象——由於半明半暗中緊張的險，由於身體的擠軋，由於嬰孩的啼哭，由於婦人的悲泣，由於男人們坐在土堆和石塊上搖搖擺擺，而一聲不響。飛機是走了；人們在一個現代世界的玩意兒之前逃出來了，這是他們所能了解的最為可怕的東西。他們在驚慌的一霎那間，帶着奇奇怪怪的東西；有的人帶着活的雞，有的人帶着家用物品，褥子，茶壺，或親戚的屍體。這一大隊人很快地走入田野的黑暗中，雜亂的脚步在塵土之中翻滾，連綿不斷。有時轎子，黃包車，軍用卡車或漂亮的小轎車擠入人羣，人們就讓它們過去，讓完路，人的行列又合攏來，拖着疲憊的步子急速向前走。

開始的時候，重慶對炸彈並無答覆。拜神求雨的人們，雕塑矮胖的彌勒佛以及各種家神，而把神佛和日用必需品等量齊觀的人們，對於配有引擎的怪物從天上丟下死亡這樣的觀念，感到無法適應。如果日軍緊接着再來幾次同樣野蠻的空襲，重慶可能就此垮台。政府有幾天打算再向後撤，退到四川的內地去。一星期之內，街上不大人。馬路上散佈着瓦礫堆。可是日機竟沒有來。由於一些迄今尚未為人所知的理由，日機過了差不多一個月才恢復空襲，這時重慶已經喘過氣來了，雖然這之後的數星期內，還接連不斷地發生驚慌現象。街上蕩着的一個人如果虛驚一下，聽見了他幻想之中的空襲警報聲而奔跑起來，別的人就跟着跑，直至幾千人在恐怖之中爭入防空洞，其實數百哩之內並無敵機。到仲夏時，甚至這種虛驚也過去了，重慶這就安於忍耐，忍受了三個夏季的轟炸。人們懂得並且信託了兩樣東西：一樣是龐大的空襲警報制度，另一樣是防空洞。

警報制度是中國人的智力的紀念碑似的工作，這制度會由陳納德貢獻了幾點意見而稍加整飾，陳納德是美國的航空專家，在戰爭中一直是中國政府的高級航空顧問。警報制度的作用，是要把飛機何時來到，是偵察機還是轟炸機，以及可能到達重慶的時刻通知重慶。日軍的主要轟炸基地是在漢口。中國的情報在漢口注視着日機的出發，一看到，就打電話通知藏在市內的中國電台。這些電台就從漢口急電報至中國前綫的電台，差不多在敵機還沒有達到飛行高度的時候，重慶就知道敵機在途中了。中國沒有雷達來從空中測知來襲敵機的高度，方向和數目，但他們在自由中國的所有邊緣上，駐有兩人一組的觀察哨達數千個。

開始的時候，重慶施行一次警報制度，在敵機溯江越過四川省界時，發放一次警報；後來改良了很多。政府在市內山頂及山腰各處，設立絞架一樣的柱子。第一次警報響，柱子上升起一個巨大的紙燈籠；這意思是說敵機來襲，還有一小時路程。掛起兩個燈籠，就是說敵機近了；兩個燈籠突然降落，那就是說『進洞吧，敵機到了』。綠色的長燈籠是警報解除的記號。夜裏，燈籠點上火。人們並不浪費時間來施用半滅，暗，及全滅的燈火管制。日機如在五十哩之內，電力廠的總機軸就關了，全城就像死了一樣——電燈，無綫電，電話，機器，什麼都不動了。憲兵在空襲時如果看到窗戶裏有光，香煙頭的火，以及手電筒閃爍，他就乾脆開槍。

警報網的設計是以重慶的防空洞制度為基礎的。重慶城是建築在峻峭的山巖上面的。他們把崖石鑿開，挖成大小道路以及各種洞窟，有的山洞長達一哩半。挖防空洞變成了重慶城基本的行當之一。

整個冬天，石工們有韻律地揮槌鑿山，唱着歌；黑炸藥爆炸山石之聲，是市內經常的音響之一。鑿掘出來的石頭，用來鋪築新的道路。每個政府機關，都有一個近便的防空洞，各機關爭着要建造最大和最乾燥的防空洞。各機關每人都有一張入洞證，憑證才可以攜帶他的太太，小孩，母親，父親以及其他親戚們入洞。人們都信任自己的防空洞。在數年轟炸期間，掘得深的山洞至多只有兩三個坍塌，而由於掛燈及警報制度，在危險逼近之前入洞安居的時間，總是够的。

在這個制度之下，重慶造成了一種新的生活。比起過去任何時期來，你更必須在你工作的地方居住，突然的空襲使行動成爲不可能。各機關造起了宿舍；宿舍裏住大部份的職員以及職工家屬。訪客一進中央廣播電台的巍然的大門以後，就得弓了背在晾着的濕漉漉的衣服之間走過。堂皇的行政機關的門階上，孩子們在咕咕咕玩耍。一切東西，從機關的檔案起，至職員的衣服止，平日都包紮好好的，以便警報一響，飛速搬進防空洞。日常辦事以天氣爲準。需要走得遠的事情，留到陰天辦理。似乎要出大太陽的時候，人們在天亮之前就起身準備長征，以免空襲來時，趕不到防空洞。重慶官員們和公民們的羣衆反應是特別的；他們乾脆承認一個事實：在夏季的任何出太陽的日子，他們都可能給炸死。誰都口渴，誰都睡不好，誰都在塵灰之中走路，誰都蹲在山洞里。他們開始自傲了，他們也就開始稱讚在他們左右同受痛苦的考驗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穿西裝的中國人和穿藍布衫的中國人感覺彼此是同胞了。

政府的唯一資源就是它的人民，在沒有外界援助的孤立的時期，政府明白了要依靠人民，並且領

導他們。由於這樣，在重慶開初英勇的時期，領導方面是和被領導方面是一樣地具有高尚理想及自我犧牲的。當時重慶市長叫作吳國楨，是一個胖胖的受過美國訓練的知識份子。他在重慶轟炸時指導該城的生活，十分漂亮。他在空襲時在露天衝來衝去，以最高的個人勇氣指導直接的救護以及救火。他是委員長的親信之一，他的個人的榜樣，激勵了所有的人。敵機轟毀了一大片地方之後，他接着就弄出乾淨的新的街道來。吳國楨的名聲後來漸漸低落，因為他，甚至比別人更厲害地，屈服於戰爭將結束後統治了重慶的厭世和投機主義的空氣。

從五月初到九月底，當炎熱像鐵塊一樣澀在重慶頭上的時候，日機不費氣力地隨便磨折重慶。一九三九年它們專用夜襲，一九四〇年它們通常在白天來，一九四一年它們常常變花樣，日夜都來，使人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始終蜷縮在污臭而潮濕的洞里。水管炸斷了，電力系統破舊了，可是沒有材料來修理。店里差不多什麼東西都買不着；農民不大願意把食物運進這個死城。

重慶的傷疤彷彿是它榮譽的徽章。炸毀了的店鋪，燒平了的大片土地，新房子的竹和泥的齷齪，都是戰爭中的傷痕，而訪問重慶的客人，常被人帶去看這些東西，作為它英勇的證據。苦力挑水，要挑到離河邊數里之遠的地方。市內最好的旅館給客人洗澡，洗澡水是一吋泥，二吋水，而這還是最大的奢侈呢。有的屋子里裝有帶點現代化的廁所，廁所里有個盛水的木桶，可以把泥水沖掉髒東西。通常一個人一天的水量是一錫盆。你在早上捉了一下臭虫之後，可以從頭到腳揩一揩身，而中午和晚上，

你用的是同一盆水：最後，你把盥口水吐在盆內，然後在門口倒掉，有一種輕快之感。人們因為缺乏洗澡，滿身發出山羊氣，但誰都不介意；他們好幾星期穿著舊衣服不換，衣服上滿是泥漬或汗漬，就得看季節如何了。電話系統還剩餘的東西，是馬路上成堆的亂電綫。有時好幾天沒有電燈，因為電綫炸斷了修，修了又炸斷了。垃圾滿堆在陽溝里發臭；炸彈坑里的停滯的水孕育蚊蟲，瘧疾因此流行。痢疾越來越厲害；霍亂，麻疹以及一種討厭的腸胃寄生蟲亦然。最小的傷口都會腐爛而生根。在東倒西歪的房屋里居住的老鼠，依賴廢墟之中所能找到的東西生活，長得越來越肥而且討厭；有時，當你在晚上踱步的時，老鼠勇敢得可以磨集在你的腳邊。據報載，老鼠咬死過小床上的嬰孩。

從沿海一直跟隨政府來的人，發現自己陷入轟炸和通貨膨脹兩層夾板之中。他們對於食物、衣服、溫暖，無一不十分缺乏。一家人如果在陋屋之中找到一間房子里，就已經是運氣了。未婚的低級公務員擠塞在政府宿舍里，一小間起碼四個人；他們拿一條薄被當作褥子，這薄被只能使床上的鐵絲彈簧顯得軟一點而已。大部份的家庭和辦公廳是不生火的；公務員們白天穿著大衣抖索，晚上把大衣當被蓋。物價是每天每天的漲，薪金越來越跟不上物價。政府有鑒於此，每月發給公務員幾包米，並以平價發售最低限度需用的粗布，油，鹽和柴。這些基本的東西保障了生活；一月復一月，薪金的鈔票價值越來越低，直至整個月的薪水可以在一個晚上請客請掉。政客們有時公宴，就成爲人們愉快的機會了——可以多吃一點。

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來到重慶的人，誰都不打算在重慶逗留一兩年以上。時光流轉，這羣人就

變成中國歷史上各省風光的最大的雜燴。把太太留在上海和廣州的男人們，或則娶妾，或則讓太太過封鎖綫來聚會。孩子生出來了，父母們當掉帶來的最後的東西，購買奶粉和維他命丸子。從前把孩子們送到沿海較好的學校的家庭，如今眼看他們的孩子在寒冷的，過份擁擠的兔園似的地方受教育。孩子長大，說着圓滑如啼聲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發漲。鐵路和電車變成了山海經里的東西。和政府一起西遷的青年們，在通常情形下，應該是在沿海自己的圈子裡找到自己的對象，或者由父母安排門當戶對的婚姻；現在自然奪去了一切。北平籍的男孩子與四川女孩子結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兒嫁給了廣東人。這是很奇怪的姻緣。戰爭結束時，有一個可愛的廣東女郎，丈夫是上海人，丈夫暫時留渝，她則由政府機關送到上海，她說：『我丈夫給我一封給他母親的介紹信。我聽說她是舊式的人；我們彼此說話都不會懂的——我不會說她的方言。』

跟隨政府來到內地的千千萬萬人，要是留在沿海，吃日本人的飯，是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日本人及其傀儡政府給的薪水，要比重慶政府高兩三倍，家庭的舒適一應俱全；但是在轟炸期間，在中國獨力站着沒有盟國的時候，小公務員之中從沒有逃走之類的談論。意志薄弱的人和傀儡頭子汪精衛一起，在轟炸開始之前就逃掉了；其餘的人是打算留到底的。在內閣里，以及高級將領和大官之中，有些人有時和日本的和平試探眉來眼去，但低級公務員的虔誠，紀律和希望的基本信念，是堅如磐石的。

政府常常派員坐夜班飛機到英國的屬島香港公幹。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夜里飛越日本佔領地，

拂曉到達香港。你在傍晚時分離開骯髒醜陋的重慶，過六個鐘頭，就可以在空俯瞰香港，閃閃發光，好像黑暗之中的聖誕樹，它的柏油馬路和路燈，彷彿金光閃閃的緞帶，一直延伸到山頂上。到早上，你就安住在一家旅館里，有乾淨的毛巾，流不盡的水，電話一打，就有種種舒服的時候。重慶所缺少的東西香港都有——輪船從香港通到上海和天津，通到留在故土的家庭。但甚至在勝利似乎是神話，中國孤獨地站着的時候，飛到香港去的人們，總是回來和政府一起擔負起抗戰的担子。

回顧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許多年間的重慶，現在用這樣熱烈的字眼，似乎是奇怪的。在戰爭將近結束時，重慶變成了一個毫無忌憚的悲觀厭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貪污腐化的。可是早期的重慶，在轟炸之中的重慶，外國記者把它寫成爲比神話還奇妙的東西，告訴給全世界。這些和中國人居過一時的外國人給當地的精神感動而迷惑了。由於他們，偉大而動人的中國的幻影，散佈到世界的另一頭，而在太平洋戰爭加緊了新聞檢查和限制的時候，這幅圖畫是完全確定下來了，要說明此後的變化，已使這幅圖畫成爲虛妄，是很困難的。戰爭快結束時，新聞檢查取銷，美國人民開始看到了對中國政治比較真實的報導，而這些事實，和重慶初期的嚴重考驗時所產生出來的幻影大不相同，因此使外界不免覺得所謂重慶的精神一直是，連初期的重慶在內也是，宣傳家的謊話。但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間，重慶的脈膊里，跳動着戰時全民族的力量。因此，急促的旅客很容易造成一個錯誤，認爲重慶城本身是強有力的，力量是從它那兒產生而流注到鄉下。實情恰恰相反。中國的力量是在於農村，在

於千百萬農民的精力；農民的意志才使重慶感染了力量，光是重慶是沒有什麼的。對戰爭的真正的答覆，是在於遍佈在大陸上的星星似的鄉村。重慶過去的精神僅止於轟炸完結時，止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危險過去，這精神就死了。

這精神曾回來過一次，在重慶雜亂的山谷間飄忽了一下。那是對日勝利日之後，該城捲鋪蓋的時候。人們紛紛包裝行李和家用物件；千千萬萬人準備車船在勝利以後回家，沿着六年前流亡旅行同樣的路。

重慶最高的山的頂上，有一塊草地，可以眺望嘉陵江壯觀的山谷。你在山頂上可以看到河道的迂迴曲折，以及夜間盤繞重慶諸山的螺旋形的燈光。勝利以後幾天，天上照耀着滿月。如果你在月光明亮的期間爬上山頂，你會看到悲哀而動人的場面。山頂上到處散佈着三兩成羣的人，靜靜地坐着。他們一聲不響，俯視着注滿月光的山坳以及銀色的河流；他們是來向戰爭，向重慶，向這個風雲際會的焦點告別的。

第二章 百份之八十的農民

在這次戰爭中作戰的中國人，是生於中古時代，而死於二十世紀的農民。

重慶和它的政府的力量，來自鄉村。在鄉村裏，農民生死在古式的生活方式之中——西洋人在四五百年以前，在一個和目前差不多同樣可怕的暴力時代，就已經解除這種生活方式了。在我們民間的記憶之中，我們把當時回憶成爲浪漫時代；至於支撐封建時代光輝燦爛的野蠻東西，我們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

我們過去的文明，和中國目前的文明一樣，建築在對於平民的有效的奴役上面。平民給鎖在土地上，陷入一套社會的習俗之中，成爲迷信和疫癘的犧牲品，俯伏求取主人的憐憫。他在冬天發抖，荒年挨餓，並且常常在發育以前，由於日常生活的單純的辛苦而死去。在這個基礎之上，安坐着極其少數的有閑階層，他們從農民的勞力中取錢，而且把遠古相傳的知識和禮貌，保存給兒孫。這階層的人，從來沒有使自己的想像力稍稍擴大一點，把他們底下的辛勤的動物，當作和他們自己一樣地有着人類的尊嚴和感覺的人。西方世界曾經暴動起來反抗過這樣的制度，他們用許多殘忍的戰爭來反抗，這些戰爭的頂點就是法國大革命。我們崇拜法國革命，但我們却把我們當時的起義，看成可怕而可厭的

。雖然如此，全亞洲快要溶化的暴怒，正在沸騰着這樣的革命。而大變動的中心，就在中國的農村裏。

中國四萬餘萬人中，住在農村裏的有百分之八十。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差不多全靠田裏工作活命。關於中國的最重要的唯一事實，就是，中國是個農民之國，是一個日曬夜露的勞苦男女之國，這些人每天從黑早到夜晚在田裏工作，缺少土地而熱愛土地，其生命的一切意義，無不與土地有關。中國的大城市——由現代化的交通網互相聯系，並和西方聯系的——只在最近才因二十世紀的追壓而茁長起來，是一種贅疣。大城市的文化對中國是陌生的；城市里的居民是鄉下來的。他們的思想，依然受着摩天樓和工廠陰影下的鄉村的支配。

鄉村是一堆磚屋和茅棚。村子大的話，全村有一個泥和碎石的牆壁圍繞；小村落則包括十間或十幾間房子，擠在一堆，以資相互保護。在富足的村莊裏，磚屋的牆壁塗成白色，大家宅傍綠樹成蔭。至於貧窮的村莊——大多數村莊是貧窮的——就是一團東西斜的，風雨侵蝕了的黃色和棕色的屋子。沒有天花板，只有椽子做成的屋頂；沒有地板，只有敲結實了的泥地；窗是用油紙做的，容納光綫極微，以致屋子的內進永遠黑黝黝的。農民把穀子藏在家裏，把畜牲也在晚上放在家裏，把祖宗的神堂也供奉在家裏。白天，街上是沒有男人的——豬在打滾，雞在咕咕叫，孩子裸着下身在太陽裏奔跑，母親們則在門口袒露棕色的胸乳喂哺嬰孩。暮色蒼茫時，男人們從田裏回來，全中國各鄉村在同一時

間內繚繞着藍色的烟霧，那是在煮晚飯。同時，在日落時分，那烟霧從各家裏吹向天際。大一點的村子裏，在比較舒服而買得起燈油的人家，門口透出幾小時的黃光；但較小的村子，則當炊烟消隱在暗中，而夜色到來的時候，村子就睡了，一點光都沒有。

生孩子，耕地和下種時，村中男女聚在一起。男人、村莊和田地的統一是絕對而嚴謹的。所有的工作，從春天播稻種起，至晚春在水田裏揮秧，秋天用鐮刀收割止，都是用手來做的。和美國比起來，中國的農人並不在務農，而在作園藝。他，他的妻子和孩子們用手來一顆一顆地摘除雜草。他一年十二個月都囤積全家的尿糞；到春天，他用杓子從坑裏把臭氣觸鼻的綠黑色的糞汁一勺勺地舀出來，於是非常仔細地，一點也不浪費地，把這種氮氣澆在他的蔬菜和田畝上。收割期到來時，全家都出動到田裏去割稻。家裏的人帮他打穀，或則用打禾棒單調地敲打，或則監督畜牲拖一塊巨大的滾石，在打穀場上一圈又一圈地轉。所有的生命都是和土地聯系的；農民在土地上工作，靠土地吃飯，把自己的一切排洩物回給土地，最後自己也歸入土地。

中國農人和美國農人之間，存在着若干基本的不同點。中國農民的耕地是手帕似的小得一塊一塊的。中國農家，包括人口稀少的西北在內，平均每戶只有四英畝（一英畝約合六華畝）還不到的耕地；在華南和華西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內，平均每戶只有一英畝至二英畝半。甚至這樣微渺的小塊，位置也不得當，因為這是這邊一小條，那邊一小點的，農人耕地，必須東走一下，西走一下。一般的農民牲口很少。他不能省出寶貴的糧食來養豬和食用牛，也無法省出寶貴的草地來養乳牛。他可能有一

兩頭豬，可是這此豬，和鷄一樣，是用廚房裏剩下的食屑來餵養的。假使他還過得去，他可能有一頭黃牛或水牛來拉犁，可是大部份的農民家產之少，連一頭牛都買不起。

農民本人沒有受過教育。他不識字，而且充滿着迷信和古老的習慣，很難用白紙黑字來說動他。他眼界有限。在主要公路以外的地方，交通像一千年以前一樣不方便。他所接觸的以及和他談話的人，都住在離他的出生地一天的步行距離之內，那些人的思想也和他差不多。他的技術是原始的。他不大懂得選擇適當的種子，直至最近，他的政府在改良選種方面也沒有做過什麼事。他不懂如何和植物害虫鬥爭。他的鐮刀，粗陋的犁，打禾棒，以及碾穀石，都和他的祖先用過的東西相同。節儉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動。他揀取每一小屑的草，圍起來當柴燒。他在劃分田地的狹小田塍上種豆或種蔬菜，以免不損失每一方尺的可以長東西的土地。他用稻草編織帽子，藍子和草鞋。他把豬的膀胱吹成氣球，給小孩玩。他節省着每一小條繃線，每一小塊紙，每一小片破布。

最後而最重要的，是他脊骨都幹得斷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東西，竟是少得可憐。每畝生產量雖然還不壞——抵得上美國同樣大小土地生產量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如果算起人工來，算起工作時間來，算起食口及人數來，就少得十分可憐了。如果說美國一個農人用機器，牲口，好種子和闊農田所耕的地能生產十五磅穀子，則中國一個農人只能生產一磅。這就是說中國的農人經常在和飢餓作戰；他和他的家屬生活在飢餓的陰影裏。

人的規範是家庭。除了若干稀有的例子之外，我們再也不會懂得了：家庭是唯一的人格。家庭的共同力量，支撐着個人渡過不幸；家庭貧而無厭的要求，使一個人無法具有最微小的獨立性。

中國婦女經常在生孩子，可是嬰孩的死亡和疾病，削減着活人的數目。中國人愛自己的孩子；他們能力够得到，就對孩子拚命的縱容和姑息。最窮的農民都設法把嬰孩包裹在紅布之中，用父母的小心和愛情悶死他。一部份，這出之於所有一般父母的柔愛；一部份，這也是社會壓力的結果，因為在中國，孩子是老年保險的唯一形式。父母靠勞動來生活，直至筋肉耗竭時；他們一老，要沒有家屬照顧，就一定要餓死。沒有孩子是任何人的最大的悲劇。和一般人的設想相反，中國農民的家庭是不大的。家長制的家庭，一家之內住着祖父，祖母以及結了婚的子女，與其說是定規如此，不如說是少數現象；大多數的農家不够大，住不下這麼一羣人的。平均的家庭只有五個人。如果一個農人的田地，只够養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屬，他就只養得起一個兒子。他要有兩個兒子的話，他的田地就必須分為二，兩個兒子都不够吃。兒子有優先分得土地之權。只有兒子有繼承權：女兒從父親那裏分不到田地，必須嫁出去分他的丈夫的。因此農人把化在女兒身上的錢以及她吃掉的东西當作一種浪費，一種收獲極少的暫時的投資。

各地結婚時的快樂和禮節，大致相同，大部份也由田地決定的。嚴格的社會制度規定着男家要出多少多少禮，女家要出多少多少嫁粧。這些禮或則需用田地产的東西來買，或則就是田地本身，於是不寬裕的家庭攀親極難。結婚是由父母，而不是由愛人安排的，婚姻把男女兩家結成並不太近但是

有用的親戚，所以聯姻之際，得考慮兩家每一個人的情況。結婚給各個人以喜悅，但新娘在外。新娘的父親必須給點嫁粧，但他這就去掉了『賠錢貨』，而且也許能在將來得到一點好處。新郎得到了一點傢俱以及家庭之中某種程度的獨立性。婆婆呢，得到了一個女傭人，可以訓練她，指揮她，利用她，而且她會有一天替她生一個孫子。只有新娘是沒有什麼尊嚴和地位的。她在養出一個兒子來以前，不能算作家庭的一員；假如她的丈夫顯示愛情，就會給家裏斥為荒謬，直至他對她保持適當距離為止。

喪事引起悲戚和長期的尊重，各地一樣。辦理父親的喪事，是兒子的最高責任。他必須把漂亮的喪服和酒席供應親友。喪事也和土地有密切關係。收穫不好的年成死人，喪事可能緩辦；有時得押掉或賣掉田地來辦喪事。如果兩個兒子爭奪承繼權，那麼出得起辦喪事的錢的兒子就佔上風。死人並沒有離開土地；土地是他的長眠之所，是他靈魂的住宅。墳地除救急之外，不能出賣，因為祖宗和子孫都有一份的。

中國農氏的文化，以西方人所知的而言，極少爲人所知。農氏具有一些共同的迷信，如看風水，蓋房子的時候一定要風水先生來看一看，以便地方恰當，而且碰着好運道。誰都崇拜祖先，相信土地城隍之類，在他們的廟前燒香。全國各地都找得到看相卜卦的人，各地的婦女都和他們商量事情。大節日各地慶祝的情形不同，但其中最大者如新年，則各省過得都彷彿。新年是陰歷新年，好像我們的復活節，並不每年（譯按——這指的是陽歷年）在同一天。中國的新年是一個快活的節；各項帳目都在新年以前算清，各家都休息不做工，妻子們回到娘家去作客，大家都穿上新衣服，腦壳刮得精光雪

亮。這是一個完全休息和歡宴的季節。鄉民不大知道中央政府會下過命令，說是元旦應該是陽曆一月一日，而中國一向當作新年的日子，應該很古雅地叫作春節。

除了這些全國性的特點以外，每個地方都自傲於鄉土的特點——關於神聖的人，古怪的洞及河流湖泊等等的特別的迷信。編織在民族傳統之中的地方風習使各省都有特點，而使任何外地人，不論中國人或西洋人，走在鄉村的路上時，都成爲外國人。

使所有這些人聯結在一起的，與其說是他們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語言或共同的傳統，不如說是他們對貧困和愚昧的屈服，這種貧困和愚昧，在西洋是找不出例證的。這是骯髒的茅屋裏的生活，是泥地上人口擁擠的房子，是污穢和營養不良所生出來的疾病，是冬天的寒冷，是單調的食物。由於這種火滾油煎似的匱乏，由於僵僵插秧而屈折了的背脊，由於接連生養孩子而破碎了的腰骨，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拚命爭取生活，爬抓足夠的東西來在悲慘線以上求得生存。你可以在中國任何鄉村的街上看到整個悲劇。你可以看到將近結婚的成熟的女郎——雙頰如花朵，黑頭髮閃耀着健康、結實的身體充滿着生命力；你也可以看到比她們大十歲至十二歲的姊姊們，她們的眼睛疲倦了，她們的身體僵僵了，她們的胸脯和肚皮由于疲勞和生產小孩而鬆弛了——她們已經老了，因爲中國的生活已經耗竭了她們。

瀰漫着鄉村之間的悲哀，浸染着外國人覺得神妙莫測地美麗的兩個特色。其一是滲透在中國民族性裏面的近乎惡作劇的幽默感。任何奇事，不管多麼微小，都是開玩笑的機會。人們在街上或鄉村茶

館裏的聚會，總是蕩漾着嬉笑。他們具有廣泛而實際的開玩笑才能，使自誇者的故作謙虛，西裝的式樣，複雜的辭句玩弄，都成爲滑稽。甚至鄉村裏有些最實際的習慣，也被人們鄭重其事以幽默的說法來解釋——有個故事說，農民趕一羣鴨子上市場的時候，有權讓鴨子在田岸上拾吃掉在地上的穀粒，因爲鴨子撒糞能肥田，鴨糞是報酬。第二個特點是閑談，閑言閑語從這家茅屋走到那家茅屋，從低聲的舌頭走入傾聽的耳朵，如水銀瀉地。誰的吵架都不是私事，因爲全村一定加以辯論和評判；父親的凶暴，兒子的不孝，富地主新娶的小老婆，都是全村大事。而該死啊，假如比較開通的良善的主婦或閨女聽人勸告，做下一點不大慎重的事情，整個村子的閑言閑語簡直是滾水一樣地沸騰了。閑談包括人類的一切事情——從收穫和捐稅起，到對於戰爭，和平和世界大事的最落後歪曲的說法止。

這種生活本質，是在於情感的飢餓。大部份農民不識字，不能享用書籍和報紙。他們沒有電影，沒有無線電。他們的生活依靠謠言，幾乎隨便什麼東西，都可以用來填充他們的無聊所產生的巨大的真空。鄉村的市集是經濟組織，也是社會組織；在農閒時節，人們聚在貨攤旁邊閒談，看變戲法，聽說書人講故事。有時有江湖戲班過境表演古典戲；人們儘管對古式的台詞以及象徵性的動作一無所知，表演過後，總要談論批評好幾天。一發現任何稍稍異樣的人和事，農民一定叢集而來。汽車夫在鄉村裏修整機件，總是看客一大堆。帶了照像機的外國人，一定很快就會被愉快的擁擠的人羣包圍起來看，使他無法拍攝任何照片。

中國的鄉村生活不能完全用陰鬱的顏色來描畫，因爲自有它的非常美麗的方面。極目四望，漂亮

的峯頂，山脊和斜坡間滿是銀色的月亮似的一彎彎的稻田。美麗的草場上，有金黃的油菜花，掛着紅柿子的樹林，以及黃而高的麥田。大一點的鄉村裏，中國古的文采集中在富人家裏。建築形式之中，再沒有比中國的庭園更可愛的了。半門形的橋凌駕在小池之上，金魚則在池中游泳；星形的房屋由一套一套的月洞門隔開來，把安詳的內部世界分成許多寧靜的小島。這種人家保存着世界讚歎的古畫，繡花綢緞，漆器和瓷器，圖畫和雕刻。他們田地上的農民從沒有見過這些漂亮東西，偶一見之，也難於像用農民的血汗來享受這些東西的人們那樣地加以欣賞。

愚昧和勞動，還不過是中國農民肩上的重担的一部份；另一部份重担，是和他的思想及迷信一樣地古老的社會制度。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是由控制土地的人來決定的。這個問題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但竟完全沒有足夠的統計材料，這是中國目前社會情況奇突的一例。有些人估計——很粗的估計——中國農民之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半佃半自耕農，百分之三十是佃農和無地的雇農，百分之四十是自耕農。這個分析是非常驚人的。這裏加在佃農和小自耕農身上的壓迫，和美國農村中的壓迫大不相同。中國地主把佃租提高到無可再高的程度。好一點的田地，他們收取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區，如重慶，他們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權十分集中的縣份裏，大地主好像中古歐洲的貴族一樣，自己有武裝的家臣，有無情的收租管事，有農奴——即佃農。

小自耕農常常並不比佃農好過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稅，並且通常是在抽着。他必須負擔政

府的勒索，各種本地官吏的零星竊盜，以及駐在他的縣裏的軍官們的需求。路過他的地方的小兵們，都覺得可以隨便問他要豬要肉要吃的。有時農民需要貸款，而貸款在中國，可以把名義上擁有土地的農民降而爲替債主耕種的雇農。一筆借款——買種子，買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農民陷入高利貸的天羅地網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設法在鄉村中打破這個制度，貸款權依然在鄉村小押當和重利盤剝者的手裏，而重利盤剝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個人一給高利貸者掌握以後，就很少脫身的機會。小農通常吃虧之處，還有市場。他在收穫季節低價出售米穀，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從市場上買回來的米，却必須出高價錢。交通是這樣困難，道路是這樣稀少，以致每一地區都差不多與世隔絕。並沒有全國市場來規定價格，也沒有鐵路來使各地互通有無。

在任何鄉村裏，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個人。通常大鎮市上總有『小康』之家組成的一個嚴緊的社會圈子。他們的田地產業給他們以威嚴的氣概和文明的外表。當傳統主義者說起中國鄉村民主的時候，他們總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決定的。父老差不多總是有錢有地的人，或有錢有地之家的商業上的同盟者。中國少數的『博學之士』，即出得起錢受教育的人，也是這些人家出身；中國各級政府的人員，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來的。這些人由於對自己階層的忠實感，由於對自己所出身的有教養及有錢家庭的忠實感，從根起就有官僚主義。在鄉村裏，富有田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統一性顯而易見。政府指派保長和甲長負責收稅、徵兵和維持公共秩序，這些保甲長一定

差不多全是有錢人。

這些人家的所謂富有，絕對無法和美國作比。中國本部最大的地主所有的田，通常至多不過數百英畝。大市鎮上一個商人的總資本，很少超過美金五萬元的。可是在貧困和野蠻的鄉村背景下，這樣的財富是洋洋大觀了。所有的人都在和貧窮搏鬥，而中國的各種問題，都由他們的這種搏鬥產生的——因為窮人和自然搏鬥時，往往以自相搏鬥收場。只有接近農民的中國人，才能了解他可以用多少少量的米，收買另一個中國人，才能了解他利用同胞的忍耐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只有目睹作工的困苦萬狀的人才能欣賞懶惰的甜蜜性，所以市場上肥頭大耳的商人和高利貸者特別喜歡自己的滾熱而豐盛的肴饌，因為能够享有的人太少了。

農民要控訴統治他的寡頭政權，是決無效果的。他要控訴不法的捐稅，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蠻，必須向地方政府請願，而地方政府的組織，恰恰就是保護壓迫他的一羣人的組織。甚至在戰爭以前，對地方政府問題有興趣的少數研究者發表了幾個詳細的調查材料，說明這個制度如何發生作用，就已經使中國有良心的人為之驚駭；他們寫了幾本枯燥的小冊子，把這個地主制度痛罵一番。在有些地方，無力付出重利息的農民就由當地的警察捉去關在監牢裏；他們的家裏要不送飯送水的話，他們就會餓死而沒有人理會。在某些地主的田莊裏，農民被迫作無代價的工，作為他們封建義務的一部份。農民收穫時，一切政府人員或地主紛紛各自勒索一份。

中國整個歷史中，對於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的古舊的三位一體制，總是痛恨的。這個制度阻礙

中國的發展達五世紀之久。而在上一世紀，這制度更把中國農民束縛得空前地緊，因為西方用暴力和商業，壓迫這腐舊的機構。古時候，水旱飢荒戰爭往往造成土地的集中，因為其時農民被迫出售或抵押他的土地，以應付他迫切的需要。但是西方的商業壓迫，在中國造成了流動財產的新形式，而且把流動財產集中在比較少數的西洋工業和中國市場之間的買辦人的手裏。這種新的商業資產，和歷史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商業資產一樣，缺乏投資於工業的技術，勇氣，或正當的條件；它發現投資於土地最為安全而有利。特別是在上海和廣州之類城市的附近，新的財富產生之後，就傾瀉到鄉下去；土地的價值就飛漲起來，而農民就給他所莫明其妙的辦法粉碎了。在這些城市的左近地區，百份之八十的農民變成了空手的佃農。土地作為商業投機的重要性愈來愈大，使地主和他過去所有的個人義務分離。地主們於是居住在城市的舒適中，遠離鄉村，而以不斷增加的高價賣買土地；他們儘可能抽取最大的收入。在若干地區，按照古習慣，佃戶一向是有不屬於外人的耕種之權的；地主具有所謂「田底」的權利，但佃戶有「田面」的權利，即耕種土地的權利；任何地主，能出售農民的田面權，或剝奪其生活的手段。可是，當現代化的投機會買侵蝕了古舊的土地所有制之後，這種古怪的習慣是歸於烏有了。

在沿海地區，西洋商業的壓迫是直接而顯著的：在內地，就比較微妙而模糊。中國廣大的內地的農民，在農閒時候從事農村工業。田裏的工作告一段落時，農民就織製土布，藤籃，草帽和粗絲，到本地市集上賣掉，博取微利。他們從農村手工業中所得極少，但是他們的生存總是這樣的狹窄，以致

這點點收入對他們之中大部份人是性命交關的。西方的工業品開始傾入內地了，有的從外洋直接運去，有的經過前哨站上海。新的棉織物，亮晶晶的小巧東西，煤油，以及其他物品，都賣得非常便宜，而且質料也好，使農民的手工業品毫無競爭的希望。農人家裏缺乏電力，也缺乏力的其他來源，只有人類的力氣；不管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多麼便宜，和工廠裏做的東西比起來，不論在質料方面或價錢方面，都是無法競爭的。中國某些區域的家庭工業這就全部給消滅了，而農民這就無法利用餘閒，獲得補貼。而工業不僅沒有在內地建立起來，以吸收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反而集中在沿海，吸乾了不景氣的農村人口。這些人們求一日三餐，每天得在工廠裏工作十四小時左右。

一世代以來另一樁嚴重事情是國內的騷亂。把內地撕成一塊一塊的軍閥們，多半是精明而野蠻的人，他們要把他們所獲得的東西和地位固定起來：最好的方法是獲得土地。於是農民給打出田地，或被捐稅剝奪土地所有權。在華西成都附近的一個縣份裏，百份之七十的田地是屬於一個人的，他過去是軍閥。這些軍閥現在即使失掉了軍事地位，依然擁有勢力很大的經濟力量。

中國農民被投機家，軍閥和西洋的工商業弄得破產，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關係之中，漸漸被迫得氣都透不過來。縱然中國有着一些新的鐵路和工廠，縱然中央政府有着一點合乎人道的紙上的立法，有些學者認為，在現世界之中，只有中國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得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壞。

西洋和中國許多研究者，是通過古典文化來觀察中國的。他們通過這樣的媒介物來觀察，把中國

當作是「古雅」的，而且發現年深月久的蒼翠的銹痕，悠悠然籠罩在中國的鄉村和人民之上。田野中聖經時代的韻律，使中國的生活彷彿是一首牧歌，以神所指定的旋律，從這一季蕩漾到那一季，從播種時蕩漾到收穫時，從出生蕩漾到死亡。中國的知識份子爲了外國銷行而寫的關於其國家和人民的作品，總是強調這瀟灑之美，以及古哲學的明白純潔。這種圖畫是虛假而有毒的。在種田和農事的表面日常生活之下，求變的醞釀是在可怕地沸騰着，現在這種沸騰日益增漲，正在奔放到中國政治的主流中。當農民起來，在鄉下激起變亂的時候，那些變亂的野蠻性最先吃驚的人，就是把農民的生活幻想成十分可愛的人們。人民大眾如得到機會以原始的公道加之於壓迫他們的人，其如火似荼的粗野，是什麼都比不上的。搶掠和屠殺，火燄中的廟堂，以及泥濘的草鞋腳蹂躪錦緞的景象，是令人驚懼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論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別力。

中國的大問題，是在於是否能有什麼民主形式的政府，運用聰敏的法律，在農民把法律握在自己手裏而把鄉村燒成一片大火之前，用和平的手段來緩和這種緊張狀態。

第三章 國民黨的抬頭

由於鄉下的貧困，由於農村中日益增漲的緊張和壓力，中國內部產生了一種緊急狀態，要平靜下來，只有變——可能的話是和平的變，沒有其他路走，就只有暴力的變。在中國歷史上，這種革命壓力並不是新東西。曾經有好幾次，舊的制度成爲農民身上的太重的負擔。農民在那些場合，就用鮮血來染寫自己的土地的歷史，以拼了命的憤怒來掃蕩大地，甩開其時正在統治着的皇朝，建立了一個新秩序。中國的許多朝代，每一個都是由起義產生的。每個朝代開始的時候，頂上有大刀闊斧的政府，下面則有土地和封建義務的重新分配。而每個新朝代本身，終於又經歷日益擴大的分化，於是又令人不能忍受，而受苦和不满的人所醞釀的革命，又重新爆發起來。

今天的危機是和多年以前的危機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歷史上一般的起義，只在農民中產生一點薄弱的平等制度，而歷史要求今天的，却是須把中國社會提升到現代世界中的東西。另一個原因，是革命和改組的循環律，早就蕩然無存了。一百年以前，有一個過了時的反抗瀕死的滿清的革命，從南方起來幾乎掃蕩到北京。這是太平天國革命，是一個猛烈的運動，包含着基督教的初步概念。最後只因爲外國的軍事干涉，才把它壓服下來。當時，也像如今一樣，人們覺得中國的秩序和穩定，對世界

的和平至關重要，而只有粉碎中國農民的變亂，才能保證這和平。太平天國革命之被壓服，使中國約有六十年無從有根本的變革，而年復一年，變革的拖延所產生的壓力越來越大。最後，眼睛一睜開，中國就爆炸得四分五裂；好像一串炮竹，爆出一次起義，又生出一反動，暴力愈來愈大。從這混亂之中，出現兩個分明不同的集團，對於如何結束混亂的方法，這兩個集團各有其清晰而不同的見解。

滿清帝國於一九一一年倒台，使中國消失了表面上的不變和穩定之狀。不到五年之內，有些人從新學會了從政之道的第一課——國家是依靠武力的。那是軍閥時代，中國給分裂成爲一塊一塊流血而不快樂的地方。每個軍閥都有自己的軍隊，每一支軍隊都有自己的地區。大軍閥統治一些省份，他部下的將軍們統治省的一角，連長之類統治縣，城，鎮。二百名士兵就可以征服一個縣，抽取它的稅款，強姦它的女人，拉走它的兒子，吃它的穀稻吃得很胖。習慣於統治別人都走掉了，軍人接收一地，就驚異地發現自己就是政府，自己就是法律，自己印的紙張就是錢。心頭火起，他們自己之間就開仗。於是一下子你聯合他打我，一下子我聯合你打他。野心，賣友，和卑鄙的手段，這就成爲中國政治的金科玉律。而每一椿壞事的主犯，總把壞事情說得非常神聖，說是爲了中國的統一才這麼幹的。軍閥們留下來唯一遺產是對於武力的信念。蔣介石和共產黨人二十年來所保有的同樣的信念，是深信武力爲安全的唯一保證。

軍閥純粹是破壞的。在以前的時代，這樣的無政府時期也許要延長幾代，才能恢復起來。不過現在是二十世紀。列強從衰敗的滿清政府那兒勒索的租界，在中國沿海及內河各地都有。中國主要的河流行駛着外國人的輪船，那些輪船由掛着外國旗的砲艦保護着。外國人所有和經營的鐵路，從中國吸取利潤給外國投資者。中國的關稅是由外國人來規定和收取的；國家稅收之中最豐富的一項——鹽稅，也由外國人來管理。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對滿清以及其後的軍閥十分輕視。可是他們在廣大的中國之中，並不能生活在孤立的社會里。爲了自己，他們不得不創造或教導出一批中國人來派用場。這批人要能够在他們自己和他們打算搶劫的國家之間作橋樑。於是西洋商人創造了和他們相像的中國商人。中國的新式銀行發展起來了；老的銀行也學會了把複式簿記代替算盤珠。外國人所掌握的工廠、輪船、礦山和鐵路，需要一羣熟練的中國人來工作。他們的成功，使中國商人也開始舉辦同樣的事業，這也需要同樣的管理人和工程師。一種新的中國人這就開始出現了，這種人是可以歸化於現代世界的公民；中產階級是在這封建國家內發展起來了。

西洋思想的壓力，並不比西洋的軍隊和商業的壓力弱。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新式大學，教授新的科學和技術，創造了一種新式的學者和學生，他們不大自然想到詩經和千百年以前的古典詩書，倒是更關心亞當·斯密司，卡爾·馬克斯和亨利·喬治。在帝國主義列強加之於中國的輕視，野蠻和凌辱之下，熟習新的學問的人們，甚至比商人更痛苦。他們給予國內的不滿以光輝的知識上的領導。當時的怒潮彷彿是一場毫無紀律的大混亂，空言和泡沫大於實質。可是它的發生，是由於一個基本問題——中國

尚未成爲國家。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基本的解決方法——中國的內部統一和力量。

新的商人和受教育階層的政治工具，是大家知道的國民黨。早期國民黨的建築師和靈魂，是一個眼神憂鬱的名叫孫中山的夢想家。孫中山氏攻擊世界各問題的天真之處，現在常爲有知識者所嘲笑，但是替中國人民的一切複雜問題制定行動方案的，孫中山是第一人。這方案就好像西洋有什麼思想家竟想爲封建主義問題，爲文藝復興和改革，爲工業革命問題，以及目前的社會不安問題，擬定一個清清楚楚的解決方案。孫中山是廣東人，曾在夏威夷受教育。在清朝最後的十年間，他幾乎參加過每一次失敗了的反滿暴動，他曾以被追蹤的逃犯資格，居留過日本，美國和歐洲。口頭上擁護統一的電閥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曾經摘引孫中山的話來裝飾自己的野心；結果差不多每個人都出賣了他。中國的顛連困苦，孫中山的道理的火一樣雄辯，他流亡過的各國的西洋文明的例證，最後都綜合在他的著作三民主義中。

三民主義並不是一本完整的書，但是它在目前中國不論共產黨或國民黨之間的神怪性，使它成爲中國最主要的政治理論。這本書的孕育時間很長，直到孫中山逝世前不久，才印成書本。其時正當他快要使他的黨在自己的歷史上作最大的冒險的時候，他發表了幾次演講，把演講稿的紀錄本纂印成書。雖然，在付印之前，孫中山的思想是早就流傳於世了。孫中山的理論是以檢視中國開始的。爲什麼中國在國際上這樣屈辱？爲什麼中國人民這樣窮困？他的答覆是簡單的——因爲中國弱，無教育，而且分裂。爲解決這問題，他提出了三個主義。

第一是民族主義。中國必須把主權和統一爭取回來。必須把外國人逼出租界，必須使他們把滿清那裏掠奪來的東西吐出來。中國必須具有任何外國所有的一切力量和尊嚴，它必須有紀律，必須肅清軍閥。第二個主義是民權主義。中國必須是政府爲人民服務，並且對人民負責的國家。人民必須學會讀書寫字，以及投票選舉。必須樹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制度，人民的權威從鄉村一直上達至於全國的最高指揮機構。第三是民生主義。中國的基本工業必須社會化，政府應該單獨擔負起工業化和復興的廣大責任。和樹立現代化的上層經濟機構同時，下層的基础必須加強。農民的負擔必須減輕，田地應該屬於耕種者。

孫中山的主義立刻爲全國所接受。全部接受它的人不多，但是這主義中間，包含着一些幾乎使所有的有思想的中國人都大爲感動的東西。新的中產階級把它珍藏在心中。甚至驕傲的鄉村貴族，也可以在除掉軍閥及外國人必須滾蛋這兩個主要之點上跟着它走。孫中山流亡和失敗的期間，也就是他受教育的期間。他以夢想家和知識份子開始他的事業；可是，在滿清倒台之後的十年間，他和全中國的人一樣，學得明白了光是理論不足以改造國家。幾千幾萬人，也許幾百萬人，願意承認他的理論對，甚至加入他的黨。但是黨需要力量，需要武裝工具來實現它的意志。至一九二〇年初，歷史幫了孫氏的忙，給了他所需要的力量。首先，蘇聯人已獲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反封建的革命，並且對各地的革命都有興趣。他們不僅願意把政治顧問送到中國來幫助孫中山，而且願意把久戰沙場的軍人派來替他建立一支軍隊。其次，中國內部十年的戰亂中，如今已產生一些對於搶劫以外的事情更具興趣的青年

士兵和軍官，他們以國事爲目的，對國家本身有興趣，他們在爲自己的軍事技能尋找政治上的領導。

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得到地方軍閥的允許，在廣州設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這以前，他曾和其他的軍閥有過同樣的協議，那些軍閥是在爲實際上的專制找尋動聽的門面，因此每一次都出賣了他，當他打算實行超出於名義權力以外的事情時，就給踢出去。這一次是不同了。在一年之內，孫中山的新政府就成爲白熱化的革命運動的場所。他有兩個最引人注意的俄國顧問——鮑羅廷是政治上的師傅，加倫將軍是軍事顧問。共產黨人參加了這運動，而且成爲國民黨員。政治中心是一個訓練學校，訓練一大批熱烈的革命者，在其後數年內派到全中國各地去講述新的主義。真正的力量，却在於訓練革命軍官的黃埔軍校。這軍校訓練人們如何掌握武器，不是僅只爲了武力，而是以新中國的名義掌握武器。孫中山挑選了一個瘦長而眼睛冷靜的名叫蔣介石的青年浙江人來主持這個學校。

在我們這時代，蔣介石的完整的傳記不會出現。能够詳述他的性格的人們之中，許多人已經死了；其他的人要就是他的家臣奴僕，把他看成聖人，要就是他的死敵，只願他滅亡。在中國，要把蔣氏的爲人實況紀錄下來，久矣是十分危險的事，因此，除了官方的幾本崇拜偶像的傳記之外，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傳聞。

蔣氏在廣州就已經是革命的青年英雄。他使孫中山的俄國顧問和他十分合得來，以致他們在一九二三年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受六個月的訓練。當他回國主持黃埔軍校的時候，他從比較落魄的地位很快

的升到顯要之處。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的死，使他擁有無人能超越的權力。

至一九二六年春，國民黨的革命軍準備出發進行那有名的北伐，從廣州起至長江兩岸，把中國從軍閥手中收回來。蔣介石是總司令。這是一批雜色部隊，使用着各國製造的殘破武器，由俄國顧問作參贊，有幾支十分重要的部隊是由悔悟了的軍閥指揮的。在部隊出動之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治間諜在各地組織了農民和工人，並且替鄉下人準備了天亮的日子。在革命熱情的高潮之中，軍隊向北直掃，取下了漢口，漢口的工人是早就組織起來了的，在夏末開始了罷工。從漢口起，各軍向東沿長江而下，掃過南京，向上海進發。

革命軍的挺進，聽起來好像是上海的外國租界的喪鐘。內地傳出許多故事，說起暴動，流血，屠殺，說起使一切外國船隻和工廠停閉的罷工，說起中國軍人殺掉白種人，強姦白種婦女等等。怒潮到達上海，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共產黨在上海市內組織了工人暴動，而在三月二十一日，巨大的總罷工開始，除公共租界以外，全市關門。武裝了的工會，使他們自己的罷工成爲近代最大的暴動之一。他們奪取了警察局，政府房屋以及各工廠，取得這樣快，使蔣氏的國民黨部隊到達市郊之時，工人就已經完全掌握上海，而且把權力移交給革命政府。

勝利的頂點到來之後三星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聯盟完結了。這三星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神秘莫測的。一夜之間，上海流氓和秘密會社突然以擁護蔣氏的面目出現。而顛抖着的外國商人，很快地就通知別人說蔣氏確實是一個『明白道理』的領袖，而外國的武器和援助，這就供給了他。革命

軍是軟弱而動搖的；蔣氏自己的若干部隊感覺到一種迫近的危機，會和共產黨人有所接洽。而忽然之間，事先一句話的警告都沒有，蔣氏的代表，在秘密會社的打手幫助以及外國人的慫恿之下，轉身進攻工人，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槍斃了他們的領袖，並且用連續幾年的清黨，把共產黨人逼到地下去。

國民黨本身也給這次背盟行動嚇了一跳，於是分裂爲二，一派人跟從蔣介石，一派人屬於漢口的左翼。雖然，到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又撮合而成爲一個堅強的反共陣綫，並且獲得了穩定。於是該黨在外國人的眼睛裏完全得到尊重，而且被承認爲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該黨於是把權力所在地從廣州搬到長江流域。該黨所統轄的城市中，工業的輪子開始轉動。可是在鄉下，孫中山的農業改革計劃是小產了；古舊的制度再加上繼續的內戰以及商業上的投機，依然籠罩着農民。革命是流產了。

發生了什麼事呢？要了解大革命的悲劇，必須回叙廣州，說明一下蔣介石歷史上的敵人——中國共產黨。中共和國民黨一樣，也是由知識份子醞釀而產生的。它在中國歷史舞台上出現，要比國民黨遲，它以俄國革命爲模範，分析並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在外國人必須逐出，軍閥必須殲滅這兩點上，共產黨人是完全和孫中山及國民黨一致的。但他們更進一步。他們問：改造中國爲了誰呢？他們的答覆是：爲農民。

爲達到此目的，不僅必須實現國民黨的一切目標，而且得走下去，在每個村莊裏粉碎把農民束縛在中世紀時代的封建枷鎖。在城市裏，則工廠和作坊裏的新的產業工人，須成爲新世界的組成者。要

工業成爲中國之福而不成爲中國的新的災禍，必須首先把沿海廠主們的野蠻的剝削取消。共產黨早期和國民黨同盟的時候，也把牠們在各地的有紀律和熱狂信仰兩點特色一起帶來。中國共產黨初期在組織上是和莫斯科聯系的。派到孫中山那裏的第三國際代表團，完全掌握着該黨，而且根據莫斯科的嚴格訓令，要他們從屬於國民黨。中共派出去の間諜，在巨大的組織運動中作先鋒，替革命軍北伐的勝利奠下基礎。他們使軍閥的戰場變成浮沙；農會和工會幾乎在頃刻之間發展起來，羣衆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領導權。

蔣氏看到中共和他自己一樣，是冷酷無情的領導者。他把共產黨人看成俄國的間諜，擁有一些魔術似的方案，要把農村陷入社會大動亂中——他恨他們。在他和共產黨同盟的頭三年中，他在等待時機。他需要俄國的軍火和農民的支助，無法決裂。但是他行軍到了長江流域，就開始接觸中國新工業家和商場貴族的最上層。那些人對於罷工和工會的恐怖，並不輕於外國人。而農村改革的口號，威脅着要推翻農村商業和地主的整個制度。蔣氏忽然在上海商場上發現了援助他的新的基地，這基地之強大，足夠維持他的黨和他的軍隊；他有了那些人和他們的錢作靠山，再不想依賴蘇聯的帮助或農業改革了。蔣氏一打定主意，行動極快。在共產黨領袖們尚未風聞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前，該黨的頭給砸掉了，上海事變後一年之內，中共在全中國變成了非法組織。

此後顯現出來的新的中國，蔣介石是主要的建築師。有時，他在抑鬱之中，退出政府幾個月，以證

明只有他才能把政府中不同的份子湊在一起；他回任時，威信和實力總比以前更大。新的國民黨政府是一個獨裁政權。它把孫中山的言論牽強附會，說自己是人民的「監護人」，而人民則在「訓政」時期中。它的秘密警察無處不到。它的檢查制度，像一只密不通風的袋子一樣，罩在中國的報章雜誌及大學之上。它在任何地方都不舉行選舉，因為它認為加強自己就是加強中國，它是用命令來管理的。這個政府坐在一張四只脚的椅子上，那四只脚是：軍隊，官僚，城市裏的大商人和鄉村裏的貴族。

蔣介石最心愛的是軍隊。蔣氏招來了一批德國顧問，把他的軍隊鍛鍊成強有力的作戰工具。軍人們學會了鸞步以及德國步槍及大砲的使用方法。陸軍內部有一批近衛部隊，其中包括黃埔軍校的原有集團。軍校的青年學生多半已在早期的革命戰爭中死亡，但活着的人忠實於國民黨和蔣氏，並且把他當作新中國的象徵。後來許多級的學生入校之際，原來的黃埔生已經自上尉升成少校以至上校了。到抗日戰爭爆發時，黃埔畢業生當師長的約有四十人。此外蔣的周圍聚集了一批高級軍官，他們過去也同蔣一樣受過軍閥教育，他們是不屬於任何堅固的團體的，他們指揮過蔣氏所要打的許多戰役，但蔣氏給予他自己訓練出來的年輕人的情愛和信任，他們從沒有得到過。蔣氏的軍隊是中國空前最強的部隊。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他從沒有一年不進行內戰。他的力量的根據地是長江下游，他的四周都是些軍閥統制的省份。這些軍閥有時個別地，有時聯合起來對他的統治權挑戰，而他逐個逐個地不是收買過來，就是加以消滅。他漸漸把華中推廣到遠至三峽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直至日本進攻之時，黃河以南的全中國都承認他是主人。

在統一的過程中，蔣氏在南京所創立的新的官僚機構，其人數之多，幾乎跟軍隊不相上下。這以前，中國甚至從沒有最原始形式的現代政府。新政府有一個真正的財政部，一個真正的鐵道部，一個真正的實業部。該政府有一些農業研究所以及衛生局，雖然這些機關絕不能和西方的標準相比，已經是中國從沒有見過的最好的機關。中央銀行建立起來了，這銀行給中國帶來了一世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穩定的通貨。新的公路開通了，激勵着工商業。新的教科書出版了，新的科學發展了。在這些機關裏服務的學者，學生和工程師們，既不虔誠地信仰蔣氏，對於國民黨的獨裁也不感到快樂，但他們各人總算有了服務國家的第一個機會。他們是有能力的，而且一般講是純潔的人，他們的才幹，這是第一次得到了發揮。

其他兩根支柱是形成政府的社會基礎的兩個階級。其一，比較進步的，是沿海和大城市裏的商人。他們因為革命而發了財。他們把外國人對海關的管制放鬆了；現在他們以平等資格，和西洋的商人打交道。新政府的穩定的財政，合理的稅務機構，使他們開始享受西洋商人享受了幾十年的機會。政府在長江流域維持了法律和秩序，建築了新的鐵路。一陣繁榮的浪潮，把中國的商業和工業活動提升到新的高度；出入口貿易旺盛了；生產品增加了好幾倍。

在鄉下，國民黨依靠地主貴族。在法律書上，國民黨的確寫下了一些以前從沒有想到過的最進步的法令，以減輕農民的困苦——但這些法令祇是裝飾品，從來沒有實行過。政府探究遠古，恢復了一種似乎是簡單的制度。每一縣給分成許多單位，叫作保，每保包括數百家，又分成許多甲，每甲十

戶。每保每甲都有保甲長，其作用在傳遞國民黨心裏想建立的一切新的改革。在紙面上，這制度看起來是很好的。可是實際上，保甲長就是一向統治着農村的地主和貴族。農民從下面看上去看政府，看不出有什麼改變。他的捐稅同先前一樣；他的租佃和借款利息和往常一樣高；他要有所聲訴，衙門裏還是同樣的人，總是駁斥他的要求的。革命什麼都沒有帶給農民。而國民黨，國民革命的黨，如今在每個村莊裏都穩穩站定了，各地的黨組織的根，是在出身好和有錢人中間。

推動政府的靈魂是蔣介石本人。他可以安然把黨組織，行政和建設事務交給他的部屬去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尚未發揮出來的才幹，稍加指點，就可以指揮使中國現代化的技術上的事務。蔣氏本人就把自己的精力和興趣放在兩個大問題上，那就是共產黨問題和日本問題。

蔣介石和共產黨之間的反對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同盟，是在農民和土地這基本問題上破裂的。中共會設法——但太遲了——重分土地和改組鄉村裏的整個封建關係的制度，把起義推到預定的頂點。在和北伐同時到來的騷擾之中，農民會不止一次地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而且自己作判斷。你總不能一方面要求人們來推翻外國的帝國主義和貪污的軍閥，同時却寬恕直接打擊你的鄰居的鄉村裏的不義和壓迫。國民黨要把革命限制為實現幾個有限的目標，如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它答應在建立政府之後，照顧到佃租，利息和農民的其他問題。但是農民不願意等候。

蔣氏把共產黨人壓到地下，他切斷了他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聯系。可是他無法打破他們和激怒了

的農民之間的聯系。在長江以南，共產黨人發現革命的記憶，在鄉民的心中依然新鮮，他們的軍隊還就進而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蔣氏於是對華南的這個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不斷的戰爭。美國的借款堵住了他的政府，他的由德國裝備并訓練起來的軍隊，年復一年地緊縮其包圍共區的封鎖綫。也就是這樣的反共戰爭，使軍閥們和蔣氏結成聯盟，以資互相保護。反共的鬥爭是蠻野而殘酷的。在蔣氏統制的區域內，他的警察屠殺中共領袖，中共著名的領袖的家族也給掃滅，學生遭受監視和偵察，身邊如有共產主義的書籍，其罪至於處死。在中共區域裏，則地主吃虧最大，而窮人對富人的憎恨，毫無約束。

至一九三四年，反共的壓力變得太大了，共產黨人這就衝出蔣的封鎖綫，完成了大家知道的奇蹟似的長征。共產黨的男男女女，背着袋子，行李和檔案，從華南行軍到西北去重新立足。其主力三萬多人所走的迂迴曲折的道路，長達六千多英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長征是一個殘忍的考驗，感情的頂點。他們所忍受的痛苦以及他們所擁有的鋼鐵一樣的決心，是無法以言語形容的。長征所經過的鄉間，如今依然殘留着無數石碉堡，那是政府造起來包圍中共的。烈火一樣的戰鬥，在千百個村莊里使農家破碎。在華南和華中的若干縣份里，人們因為這次長征在鄉下造成的破壞，依然在憎恨中共。在此若干縣份里，則中共在貧農中造成的政治忠實性，歷許多年而不衰。中共在一九三五年底，終於把自己安頓在西北，在陝西延安以北的區域內。延安後來變成他們的主要基地。

中共到達延安之時，正當該黨歷史及該黨路線的轉捩點。他們已經成爲一個獨立的組織了，他們

和莫斯科之間只有名義上的聯系。蘇聯已經和蔣介石氏恢復友好關係，而使中共自己保衛自己。中共從他們的新的根據地發出了新的號召：中國人團結起來反抗日本！全中國頃刻之間響應了這號召，因為這號召觸到了情感的最深處。日本已在一九三一年奪去了東三省，繼續進迫，越過了長城，把鴉片大量傾銷入華北，窮凶極惡地破壞了國際友善的每一項標準。當時中國受到日軍空前的凌辱，日本彷彿除了全部掌握這個泱泱大國之外，再也不會滿意似的。

至於蔣，他是恨日本人的。但他覺得他的軍隊無法制止日軍的前進，覺得中國的工業無法和日本工業的現代化力量頑抗，覺得中國沒有統一。他打算先消滅共產黨，建立了統一，然後再來應付日本。共產黨的新口號却把他逼入無法忍受的景況下。中共的邏輯是誰也駁不倒的：敵國正在設法殺盡中國人，中國人爲什麼要自相殘殺呢？國民黨以耳語解釋道：它在等候抗日的時機。它說是時機一到，就會轉過頭來保衛中國。而同時，學生們却因爲反日遊行示威而給逮捕入獄。中國新聞記者和知識份子們看到這情形，表示驚駭。一天天過去，外來的民族滅亡的威脅愈來愈嚴重，在國內，則政府把資源不用在抗日方面，而用在剿共方面。

團結的呼聲漸漸侵入軍隊了。在北方，剿共的內戰雖然仍在被推動中，戰爭却弛緩下來，終於停頓了。蔣氏飛到西安去使內戰復活，一逕飛入一個圈套中，被扣了起來——扣他的不是共產黨人，而是由於希望對日本作戰而拒絕對共產黨作戰的軍閥。蔣氏被禁閉了兩星期，在這期間他親身會晤共產黨人，這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第一次。關於蔣氏被扣期間實際發生的事情以及他和共產黨人會面的情

形，從沒有人作過充份的記載，可是其結果竟像閃電一樣，內戰突然結束了。蔣承認中共有權在中央政府的鬆懈機構下管理他們自己在北方的地區。他們的軍隊須併入國民軍。他們應放棄其農村中的革命計劃。政府則應立即作民主改革。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出來的政綱，應成爲全國的法典。

消息傳到日本人耳中，好像半夜里的警報。自從中國的國民革命時起，日本一直担憂着兩個前途：一是中國團結，二是共產主義席捲中國。日本知道團結而復活的中國，最後會成爲亞洲的領袖。日本也懼怕共產主義。它自己的帝國以貧瘠多山的島嶼爲基礎，除了人力以外，各種物資都很稀少。它的武裝力量依靠平民和軍人的不用腦筋的服從；任何要使他們動動腦筋的制度，都是威脅日本的。因此，不管蔣或共產主義在中國得勝，都會使日本失敗。爲了使中國永遠軟弱，分裂和順從，日本的大陸部隊會經常從北方進迫，參與軍閥政治，用千千萬萬的特務人員來毒化中國。蔣氏和中共的新的妥協，表明如今中國不僅可能團結，而且團結的中國可能容忍並寬恕共產主義。不能錯過時機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之夜，在北平城外的蘆溝橋，日本駐軍實施戰鬥演習。有人開了一槍。日本就說他們遭受攻擊了——戰爭開始了。

第四章 日本動手太遲了

在三十年擾攘之中，中國人民獲得了一個痛苦、然而經久的教訓。捲掃全國的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最後產生了一些領袖，從歷史的眼光看起來，他們在自稱對國家負責。超出了敵對的兩黨耿耿於懷的一切仇恨，他們對中國的團結和命運，終於獲得了共同的信念。日本的一切計劃，都將在這個信念的磐石上粉碎。抗日戰爭的最初幾砲，壓平了中國內部的一切不滿，壓倒了口號，賣國陰謀，政黨私見。當全國轉過身來對付日本的威脅的時候，甚至革命本身在中國社會深處的微渺的工作，也暫停了一些時候。如果投降日本，中國什麼都沒有了，共產黨也完，國民黨也完，富人和窮人，都沒有任何尊嚴可言。

一九三七年日本在大陸上的行動，具有軍事和政治雙管齊下的計劃。過去五年來，他們已經一塊一塊地咬光了中國長城以外的地方，中國困在內戰中，只向國聯抗議。這一次，日本打算奪到長城以下黃河以北的五省。他們計劃取得了北方之後，勸蔣介石氏在其餘的地方作更遠大的讓步，並讓與特權。日本打算緊縮其經濟——軍事——政治的掌握，最後扼住全中國，並且把中國政府的地位降為下屬的殖民地政府。假如日本早五年動手，他們也許會成功的，但一九三七年是太遲了。

他們在北方的戰鬥，按照預定計劃而行進，幾乎分秒不爽。他們的部隊從北平和天津展開，攻向西北，穿過南口山峽，從南方衝出長城，然後再轉過身來從北方進入長城，打開富於煤鐵的山西省北部的諸關隘。他們沿津浦跨南下，數月之內到達了黃河沿岸。在華北抵抗日軍的，是很舊式和很新式的混合部隊。出乎一般人的意料，軍閥們對於日本的威嚇和諾言竟沒有屈服。反而寧願和中央政府並肩作戰。可是，他們的軍隊是叫化子隊。他們沒有軍事戰術的共同機關，沒有相互之間的信任，沒有現代化的組織。在日本的鋼鐵作先鋒的大軍之前，他們好像泥牆一樣倒塌。那是夏天，由坦克率領的日軍，幾乎隨心所欲地飛馳過華北的黃色平原。他們的空軍統治了天空，掃射中國公路上的微小的運動之物。日本在華北的軍事間諜十分高妙。戰爭的最初階段，好像在操場上演習，日軍完全按照原定計劃，切斷鐵路和公路，佔領了一個個目標。按照一切的計算，佔領了主要的鐵路站和公路站之後，戰爭應該結束了。因為這些城鎮是使日本煩惱的政治煽動的中心，這些城鎮是中國軍事上的鎖鑰。可是奇怪，日本人誰也說不出什麼緣故，戰爭竟繼續下去。步槍從鄉村里和山里打出子彈來。日軍擄掠各種東西；他們強姦北方的婦女，直至色慾都盡了；他們在他們以恐怖佔下來的地方，加上了火的烙印。縱然如此，有一支鬼計多端的抗戰力量正在他們左近成長着，突擊他們，使他們流血，這支力量似乎只靠泥土來維持生命的。這就是中國游擊區的抗戰力量。

游擊的中國是中共的稱霸之地。在蔣介石和中共的協議之下，蔣氏擔任陣地戰，中共擔任在敵人的後方發動游擊戰。以前的紅軍，如今改名為中央政府的第八路軍，於一九三七年秋從他們陝北小小

的不毛而多沙的根據地出發，開始了軍事史上最令人驚異的冒險之一。中共的軍事力量一九三七年是八萬五千人，到戰爭結束時達一百餘萬。中共在政治上統轄的人數則自一百五十萬人增至約九千萬人。在抗戰的最初幾個月，中共從萬山叢中發展開去。他們的師和正面部隊分解為旅，旅化為一個個的營和連，點點滴滴穿過日軍的陣綫，到達敵後的鄉間。在戰爭爆發以後四個月內，中共部隊已站立在大海之濱，離出發地七百哩，組織了敵人後方的新的戰爭。

日軍的烈火開闢了許多仇恨和恐怖之井，準備人家去汲取，而共產黨人就汲取了它們。軍閥部隊的兵士們在危險的公路上的日軍之前逃遁，逃到山裏；他們是一幫幫沒有組織的不法之徒——可是他們有槍。其中有許多人參加了中共抗戰的後備隊。別人丟掉或賣掉的武器，馬上用來武裝農民抗戰的根苗。北方大學生一向襲擊對日作戰，現在戰爭已經到來，而且其野蠻性遠超出他們在課堂中的想像之外，他們也要參加戰爭，他們拋棄了學校，通過封鎖綫，參加了抗戰。中共的領導是黃河以北整個抗戰運動的集合點，不論共產黨，國民黨或無黨派的人的每一點點精力和知識，都很快地貫串在一個社會改造的政綱之中，這樣來建立穩定的根據地，繼續作戰。中共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很好。早期有幾個戰役是配合作戰的模範。日軍在北方，只有在輝煌的忻口之役中，才遭到第一次頓挫。在忻口，政府守住一條長長的陣綫，中共軍則抄過日軍的交通綫，在日軍的後方把一整個師團打得七零八落。

戰爭在北方拖下去

日軍鎖斷了交通綫，供應綫，直至陣地戰成爲必遭失敗而且不可能進行的

事。至一九三八年初，紅軍廢棄了軍隊的一切標準組織，把各師編成一個變化多端的突擊隊的團，該

靠人民的支持。蔣介石的政府明白了中共力量的來源，感激游擊抗戰消耗敵人的實力，承認了這新的制度，並授權在黃河以北敵人後方的深處創立一個自治的游擊根據地。第一個游擊政府建立在距北平數天路程的冀西阜平縣，其時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該政府的官員包括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和無黨派人士，曾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和祝福。

日本人的算計在華北給游擊抗戰所推翻，在長江下游給推翻得甚至更澈底。中共在北方生根之前二個長時間內，日本參謀部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使上海三角洲瀰漫了火燄和鮮血的戰役上。這是一個蔣介石的戰役。

蔣氏以游移不決的態度注視着日本進入華北的初步行動。他在決定打仗和覺察中國的弱點二者之間徘徊躊躇了一個月。當他決心抵抗的時候，他打的辦法破壞了日本的圓滑的政治軍事的野心結構。日本希望北方打，南方談判。蔣氏却寧願在長江下游他的直轄地區內投下戰爭的骰子，這樣來以全民戰爭猛擊敵人，那些直轄地區最接近他自己內部的基地，他的最好的部隊已在基地中厲兵秣馬，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他把他的德國人訓練的陸軍之中最精銳的部隊投入戰鬥，抗擊上海的日本陸戰隊駐軍。在幾天之內，中國的肉和人把日軍壓入黃浦江邊上狹長的一小塊地區內。日本這就明白了他們所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孤立的華北事件，而是一個對付中華民族的戰爭，要打贏這次戰爭，必須把日本的資源完全動員。日本把海軍開出港口，空軍開出台灣待命，接着就以絕對優勢的鋼鐵，轟入密集的

中國軍隊中。上海這次大殺戮死人多少，直到今天還沒有確切的估計；在軍人的鮮血和勇氣吸收日本的排砲之際，中國人傷亡達數十萬。

當時也好，現在也好，蔣氏死守上海的決定，是整個戰爭中最令人聚訟紛紜的一段插曲。把中國人的肉來迎擊日本的鋼鐵，並無成功的希望；撤退倒也許可以解放中國陸軍中的若干精良部隊，以便後來在內地作戰，在內地，它們可以在比較差不多對等的條件下迎擊日軍。實際的考慮如此，但蔣氏拒絕遵從此種考慮。他認爲站在潮濕的壕溝之中的兵士不斷地走入屠場，是不折不撓的抗戰意志的具體化。

上海之戰在軍事上無益可言；在政治意義上，這是戰爭中的最大示威之一。此戰使西洋的最悲觀的中國通爲之吃驚，而且在歷史的紀錄中，毫無問題地證明了中國人民面對無望的劣勢時，能够表現多麼大的堅苦和英勇精神。上海的示威對國內甚至更有價值。戰爭的故事從人們嘴上傳到內地，燃着了愛國熱的火炬。此戰給予全國以動員的時間。日軍猛攻上海攻了兩個月。之後，在南邊用聰敏的包抄行動，拔掉了華軍陣綫的塞子，掃蕩了那陣綫，在極度的混亂之中直達南京。

蔣介石的首都南京陷落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後的許多星期內，日軍進行了歷史奇觀的奸淫，縱慾和恣意大屠殺。這個災難雖大，却並未打斷中國人的抵抗。中國的殘破部隊是這樣的四散奔走，七零八落，有些部隊甚至把部隊的駐地在報紙上登廣告，以便潰兵找回原部。當時如果日軍立即向內地進發，那麼他們也許不會遇到除山嶺以外更堅強的阻礙。可是他們竟等待了一下。他們覺得

中國首都之攻陷已經剝掉了中國抗戰的心臟，覺得蔣氏會願意講和。

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間的冬天，中國發生了奇蹟。政府所在地搬到了上游的漢口市，離海八百哩。而中國空前所未有的最完全的團結精神，在漢口存在了好幾個月。其時曾在武漢就過的人，從沒有能够精確地說明這武漢精神是怎麼回事。全中國都動了——人們從沿海漂流到內地，在這臨時首都聚成混亂的渦流。南方和西南的軍閥部隊開來參加戰爭。中共把他們的游擊隊加速開入支撐日軍陣綫的錯綜複雜的交通綫之內。在漢口，政府和中共人員在同一會議內開會，制定進行戰爭的共同計劃。政府授權在長江下游敵後創立第二支中共軍——新四軍；共產黨人參加着軍事委員會的會議。

中國作家，工程師和新聞記者的精華輻輳在漢口，搓合那磨損了的抗戰之繩。至一九三八年春，日軍重新進攻，以漢口為最後目標時，漢口已經凝成了新的軍隊和新的精神。一九三八年四月，日軍在台兒莊之戰中遭受了正面作戰的失敗，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這個挫折只是暫時的。日軍分兩路從北方和東方逼近漢口，同年的秋天奪得了漢口。差不多同時，登陸的日軍取下了南方大港廣州。於是日軍竟倚在他們的槍砲上，又休息了一下。

日本的戰略在紙上是很完善的。中國在地理上越來越簡單了。華西是崎嶇多山的地方。華東是沖積平原，稻田一望數哩，絕少山嶺的阻隔。華西和華東都由三條大河灌溉。這三條河從山裏流到平原，匯入太平洋。日軍如今控制了整個海岸以及全部工業中心。它也控制了三條大河的出口。在北方，它佔有北平天津一帶以及黃河的出口處。在華中，它自上海經南京至漢口，駐紮在長江兩岸。在華南，

它佔有廣州，獨霸西江。日本控制了這些城市，鐵路和河流，就覺得他們可以等候，等到一切經濟運輸機構的癱瘓使中國的抗戰停止。他們就等候了。他們又等下去，等了七年，直等到日軍在殘破的本島投降盟軍爲止。

日本在中國莽撞。他們爲什麼要莽撞，重慶政府比較精明的政治家之一吳鐵城氏後來作了極好的解釋，他說：「日本人自以爲知道中國過份地清楚。」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情報工作確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可是他們集中在分裂和縫隙上，集中在人物和私仇上，集中在槍砲和工廠上。他們對於每個省份，每個將軍，每支部隊的紀錄，包括着中國這樣多的惡行和劣跡，以致堆積起來的結論是盲目的。中國是一個國家這一事實，他們是難於明白的。他們看到了中國進行了十三年的革命，但只看到革命的渣滓，革命的流產，革命的內部緊張；他們並沒有測量革命的成果。和他們作戰的，遠不止一支聯軍；他們是對整個民族作戰。他們會注意到中國沿海工業的襁褓成長，並且在地圖上註明了新的鐵路。可是中國的實力並不在城市裏，而在人民的心裏。中國是原始的，其原始的程度，使它工業，鐵路和機器雖然破壞，却不能使它遭受像後來歐洲那樣的大災難。中國的根是在泥土裏。只要下雨出太陽，稻穀就會生長。日本海軍的任何封鎖，都無法隔離農民和土地。中國剛從混亂之中探出頭來，但是它依然十分接近混亂，所以它的日常生活中加上一點戰爭的破壞，是無所謂的。舉個例，假如中國必須把政府，工業，人民和軍隊搬到內地，它就做得到。日本打算粉碎的那機構之中，有一種巨大的彈性，你打它，它攔了，可是並沒有破。

一九三八年漫長的數月中，中國軍隊被迫緩緩退向內地之時，發現自己的路上擁塞着移動着的老百姓。冬天的這個喘息使千百萬人有時間來作自己的決定，而中國就在移動，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移民之一。令人詫異的，是中國任何作家或小說家都沒有把這個場面充份地記錄下來。大批批的衣衫襤褸的人民，通過公路和山脈向西移動，這景象是遊牧時代以後絕無僅有的，但是遷徙的有多少人，他們從那兒出發，重新定居在那裏，都並無記載。中國政府和報章雜誌只主要地記錄了對戰爭重要的事件如軍隊，官員，大學和工廠的遷移。

政府在戰爭爆發後，差不多立即就開始疏散工廠。這件事情整個放在經濟部長翁文灝博士的手裏，翁氏是中國最出色和可愛的人物之一，體格瑣小，是一個書獃子。他的額上有一個很深的裂痕，這使他特別吸引人。他臉上永遠掛着微笑。在其後的整個戰爭時期，他是內閣高級官員中從沒有被任何人指責爲貪污的寥寥可數的幾個人之一。他的出名的潔白無瑕使他上升到普通政治之上。中國戰時的工業發展是有偏向的，工業集中在沿海，集中在極少的幾個大城市裏。中國的私人資本絕大部份投在紡織工業和消費品上。政府投資居多的重工業，只是拖在整個經濟後面的小尾巴。鋼的產量從沒有超過每年十萬噸。北方戰爭的迅速以及上海戰爭的激烈，其勢差不多可以在頃刻之間耗盡所有的工業。政府現有的材料，指出撤退時遷移的工廠共約四百家，其設備約二十餘萬噸。和蘇聯後來的成就比較起來，這數字似乎算不得什麼。其重要性只有分析一下才能顯露。翁氏把中國差不多全部的紡織工廠和

消費品工廠放棄給敵人，集中力量把重工業和兵工廠移入內地。中國只救出不到百分之十的紡織機，救出了機器廠和重工業約百分之四十，但十一所破舊的兵工廠裏的東西，救出的達百分之八十。這就是說寧使中國在此後數年間衣不蔽體，務必儘可能滿足軍隊最低限度的需要。

工業遷移的初期階段毫無光榮可言。上海的疏散開始得很晚；工業家有點不大願意遷移自己的工廠；政府的決策也很遲緩。第一家走的是上海機器廠，那是國內最好的機器廠之一。該廠直至戰事開始二星期後，才從蘇州河出發遷移。機器裝在小船上，蓋上樹葉和樹枝以作掩護，船慢慢地撐到長江溯江而上，有空襲危險時，就躲在江邊的蘆葦裏。其他工廠跟着遷移，是日軍於十二月初把上海和長江的交通切斷以後的事。由於遷延過久，上海的撤退只搬出機器一萬四千噸，之後就給敵軍的推進阻絕了。

雖然如此，上海這一下却證明了事情是可以做的，至一九三八年春，華北和華中數十家搬得動的工廠就拆卸機器，包裝好之後轉運入內地。在民族的有機體繼續發生作用之時，做成了一樁很大的工程。中國最大的紡織廠之一的裕豐紡廠，從黃河跋涉長途而搬到四川，走了一千哩，而四川省又是一條鐵路都沒有的。該廠在二月間包裝好了自己的八千噸機器，整批由鐵路運至漢口。五月間，它告別了鐵路，用輪船溯江而上，走到三峽的口上。八月間，它重新包裝了一下，載上三百八十艘當地的駁船，上溯峯迴路轉的三峽而入四川。一百二十艘駁船在山峽裏沉掉了，但除了二十一艘之外，統統給船夫撈了起來，繼續前行。這一隊人馬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到達重慶，山地之間特別闢出一片地方準備

機器的來到，到春天，該公司已經忙於訓練羞澀的四川農婦來照料發鏽的紡錘了。

漢口至華西一路上都有各色各樣的機器。運到內地去的東西都得用手來搬。成百成千的苦力拖着鋼塊，最重者達二十噸。武漢抗戰的最後一星期內，疏散工作到了偉大的地步。漢口電力廠直到最後幾天還在發電，因為電是生活的必需品，可是要把它的十八噸重的大輪機留在漢口，是不可能的，因為退到四川，這個輪機就沒有辦法配。該廠於十一月初開始拆卸，但這個輪機直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才接上輪船，離日軍淮城只有兩天。搬運這種大機件，發生了小輪船沒有辦法應付的許多問題；開得進三峽的輪船上，所有的起重機沒有一架能够舉起十六噸以上的東西。中國人解決了這問題，把重機件放在浮橋上，使浮橋浮起，把浮橋用汽船拖，拖着穿過急流。

在四川重新安頓下來的新工業是十分簡陋的。鋼鐵廠的樑柱用竹桿搭成，煉鐵大爐用的煤，是一筐一筐挑去供應的。煉銅廠用着農民那裏收來的銅元，以最新式的電解法把銅元變成純銅，然後運入深在山洞之間的兵工廠。

中國大學的遷移，正和中國工廠的遷移同時進行。和工業一樣，中國的高等教育機關生長在三十年的混亂之中，而且也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裏，而且也是日本最怕的新中國的因素之一。中國現代歷史上每一個大轉捩點，都是由學生起事和知識份子的不滿作為標幟的。學生孕育了反對滿清的起義。學生的暴動和示威引起了一九一九年的全國怒吼，其時甚至貪污的軍閥都被迫拒絕了凡爾賽條約。一九二〇年後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其最重要的關鍵往往是學生暴動。最後，除了共產黨以外，學生及

其教授們是最熱心和喊得最響的抗日示威份子。

日本人特別嫌惡華北的北京、清華、燕京和南開四大學。他們特別把美國錢建造起來的清華挑出來加以特殊待遇。他們粉碎了該校的實驗室，把儀器書籍搬到日本，把學生的健身房當作馬廐。南開大學是差不多全部給破壞了。在中國知識份子文藝復興的北京大學的校舍裏，日本特務警察設立了偵訊總部，審問政治和軍事案件。

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夏季進攻之際，學生正在過暑假，不在學校裏。教育部就發出了一個號召，要他們到兩個集中地去報到。其一是北方的西安，其二是長江以南的長沙。兩個大學的學生在西安得令移到陝南去。他們乘車走盡了鐵路，就開始一百八十哩的長途跋涉，越過崎嶇的秦嶺山脈。學校的系主任們是這次行軍的參謀長，他們把男女一千五百人分成三組，五百人爲一組。每組前站有警衛隊，糧食隊和交通隊，後面有騾馬馱運米和麵餅，再跟着幾輛哮喘的卡車，在峻峭的公路上爬行。糧食隊到鄉村裏去購買能找到的一切新鮮菜蔬，以便在其他的學生到達之時，有足够的菜來開飯。他們所走的路，途經中國若干最原始的地區。地方當局把學生安置在農家或馬廐中。工科學生裝了收音機收聽晚上的廣播，到明天早上他們把新聞貼在壁上，使後到的學生可以看見。對於鄉村居民，看到當天新聞這是生平的第一遭。

日本向內地推進時，各大學相率遷移。有些學校是在日軍入駐以前幾天才撤退的。日軍自南方進入廣州時，中山大學的學生還在北郊撐着船，把圖書館裏的書運走。國立中央大學農科覺得幾頭育種

牛價值太大，棄之可惜，於是這些牛在一九三八年整個夏季，在距離日軍前鋒數星期路程之處，一路吃草一路走向內地，直至一九三九年夏天，才最後到達平靜的內地，安居下來，把快樂帶給瘦削的四川本地產的母牛。中國一百零八所高等教育機關中，有九十四所或則被迫西遷，或則完全關門。雖然，整個教育制度却在一九三九年秋重新建立起來了，流亡的大學裏入學的學生有四萬人，而戰前最後一學期大學生註冊者不過三萬二千人。

教育機關轉入內地，主要地聚集在三個中心地方。第一個在重慶附近，另一個在成都，第三個在雲南的首府昆明。這三個中心的機構和質地各有不同。重慶近郊的各大學在政府的嚴格統制之下，永遠感染着首都流行的空氣。成都各大學則避難在教會辦的華西協合大學的美麗的校舍裏，它們被安頓在比較寬敞的地方，在加拿大和美國教會的保護之下，保存着自己的學府尊嚴，差不多沒有被侵犯過，他們的學術地位在戰時一直是最高的。華北最重要的各大學，則跋涉至西南，戰時在昆明合成西南聯合大學。北方各大學戰前一直以光輝的知識生活和進步而輝煌的政治警覺著名的。到了昆明，他們就在塵灰裏站起來。學生們住着四人，六人和八人一間的房子，有些人住在老鼠喧囂而蛛網密佈的廢而不用戲院裏。他們吃着飯和蔬菜，總是不够吃。政府一向懷疑北方諸大學進步的政治見解，如今像老鷹一樣注視着這些流亡機關，把偵探網拉得一年比一年緊。開頭的時候沒有關係——各大學逃避了日本人，就十分高興。學生們的生活苦，他們也明白全中國都在受苦。歲月拖下去，教師挨餓了，通貨膨脹使收入成爲諷刺品，於是西南聯大開始在政治上重新振奮，到戰爭結束時，該校變成了中國

南方政治不滿的主要處所。

工廠和大學的遷移是一種奇觀。此外更有多少農民和城市居民給日本的侵略弄得漂流無依，誰都不知道——各人估計不同，約自三百萬人至二千五百萬人。農民在日軍之前逃走。黃河會決堤以阻止日軍，他們是逃避黃河泛濫的。有些農民在莫明其妙的恐怖下逃出來。跟隨工廠遷移的工人也許不超過一萬人，他們之來，是因爲要沒有他們的話，機器就沒有用處了。飯店老板，歌女，冒險家，帶着幾箱香煙或幾疋布的小商人，總共大約有數十萬人。這些小人物跟着有組織的大運動旅行，有的步行，有的坐舢板，駁船，火車和人力車。數萬人擠在上溯三峽的駁船裏，數十萬人在山道上列隊而行，好像成羣的螞蟻，不斷地向西翻山越嶺。死於疾病，日曬夜露以及餓斃道旁的人究竟有多少，沒有估計；他們的白骨，至今依然曝露在這條路上。

至一九三九年夏，中國的戰爭走入新的規範。大遷徙是過去了。救出來的少數工廠的輪子，在新的廠房裏轉動了。各大學生在規劃秋季的課程表。破碎的軍隊，駐定在山地裏。前綫現在是一條沿着華西山脚和各大河河谷山腰的綫。在北方，共產黨人開始深深地掘發農民的矇矓的自覺，愈掘愈深。他們和重慶之間的聯系被隔斷了。他們就形成了新的行政工具，並且一年年變得更聰明，更有力。在華中和華南，和中央政府關係漸鬆的勢力及軍閥開始坐大自肥，只有在重慶，由於炸彈從春落到秋，過去的精神還保存了幾年。

其時以及其後一些時候，中國並沒有了解自己已經走入絕路。其時日軍每發動一次新的戰役，總是大叫著這一回要直搗重慶，中國的軍隊則拼命招架。這些戰役規模很小，但很厲害，這是日本統帥部特別安排的新式的戰爭。這種新式戰爭的目的，在於經常使前綫在不平衡狀態中。日本新的師團和幹部到火綫上走一下子，就調到後備地區準備作將來的戰鬥。日軍在濱海自己的後方地區建立了新的工業，把中國經濟剩餘下來的部份聯結在日本整個經濟制度中。

外國的戰地記者在中國所寫的東西幾乎全屬荒唐，是由於這些東西以記者招待會和公報為基礎。我們用外面世界懂得的話，來描寫一個西洋人不會了解的戰爭。中國寫戰爭公報的人，都是些從沒有聞過火藥味，從沒有聽見過一聲憤怒的槍聲的糊塗人所寫的，他們儘是說着數千人的戰鬥，血戰，拚命的進攻和反攻。中國人發表這樣的公報發表了好幾年，開始的時候他們自己相信着日軍依然打算衝進山國，直撲內地，後來，連這些文字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話了，但他們依然牽強附會，把早期漂亮的修辭來形容前綫拖泥帶水的角逐。在中國戰場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的前綫，火綫和突破點等等，但人們寫起來，就有供應綫，戰鬥計劃和大包圍了。中國報紙本身並不相信所傳的日軍數千數萬進退維谷或陷入重圍，不過就這麼印了出來罷了。於是外國報人變得諷刺了。有時這些誇張之詞馬馬虎虎看過去都很難。美國陸軍情報處有一次發現日軍只有三萬人參加一次戰役，中國軍事發言人說有八萬人參加戰鬥，但公報正式發表敵軍此役死傷即達十二萬人。

日軍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發動的各次戰鬥，與其說是打仗，不如說是搶糧。他們沒有更大

的戰略目標，無非是使鄉村陷入恐怖，收括田野和市鎮，使前綫的中國部隊永遠不堪一擊，並且把新兵送上火綫訓練一番。戰役中多半是所謂「飯碗」戰役，因為多半發生在華中，那是中國的「飯碗」——產米很多。作戰時日軍集結了幾個師團，深入中國軍隊的前綫，把鄉村蹂躪了一通，然後回去。中國部隊的應付辦法是包圍，日軍突入之際向後撤退，然後在日軍側翼和後方摘掉日軍的供應站。中國人至多只能做到摘掉日軍的突出地帶，迫他們回到根據地去。要做得更多，就需要翁文灝搬了家的工廠裏所無法供給的相當數量的五金和配備。結果，所謂中國戰爭，就是長期消耗的僵持。

這個中國戰爭是在一條有彈性的無人地帶上作戰的，該地帶縱深約五十至一百哩，在中國中部一帶。在這荒涼的地帶內，中國人破壞了足資敵人在週期性的攻擊中利用的一切公路，橋樑，鐵路或渡口，中國軍隊所作的唯一防禦，就是使這一帶鄉下弄得不能動彈。日軍和華軍在這一地帶來往追逐了六年。農民餓死了，軍隊流了血，鄉村被燒成一片白地，小城市換主人多至六七次，然而六年之久，前綫一直穩定着，很少值得注意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典型戰役之一，於一九三九年夏在晉東南進行。山西是一個重要的省份。該省產煤極多，而且是長城—南鐵礦最富之處。它倚在黃河的路膊上，它的峻峭的山脈，掌握着華北平原。至一九三九年初，華軍在該省的陣地被迫入中條山的山坡間，中條山是在該省南部邊境，就在黃河北岸。中共八路軍的游擊區是在日本據點的後面，而且包圍着那些據點；正面是中央軍。

我（註）在一九三九年秋去看了這戰役。這是我訪問中國前綫軍隊的第一次。在其後的六年間，我一次又一次地去觀察相同的景象，那是一年比一年黯淡，一年比一年乏味。

我和一支中國的生力軍一起出發，自隴海鐵路盡頭處向北行軍。部隊申成長長的行列走過許多山，艱苦地走着，沒有紀律或一定的步伐。他們的草鞋足迹所過，使灰塵揚到膝蓋那樣高，山中許多哩外的人，可以由天空中盤旋的塵灰，斷定是一支軍隊在行軍。各部隊的指揮官騎在瘦骨伶仃的馬上領頭走。他的後面是步行的兵士，兵後面是輜重隊——做苦力的兵用扁担扛着彈藥箱；有的人擱着一袋袋的米；連部的廚房，其中包括一個兩個人挑的長滿了黑鍋灰的大鏟子，則跟在最後面。這支部隊有幾尊尙堪一用的小砲，馱在騾背上。當時，整個中國軍隊在二千哩長的前綫上，據說共有砲一千四百門左右。騾背上裝一門迫擊砲顯得重一點，但這一門砲要比一整隊步槍還要有力，還要重要。戰爭的後期用牲口來運輜重變成了稀罕的事，但那是一九三九年，同我一起的部隊是用牲口的——這個牲口輜重隊甚至比踉蹌步行的士兵們還要爬得慢。騾車上米袋和軍用品堆得很高。米袋之上，有一兩個兵伸直四肢躺在太陽里打瞌睡；趕車的人很漂亮地揮舞着長鞭子，揮過牲口的頭劈拍作聲，車輪因為沒有油，大聲吱吱地叫，不管這騾車怎樣在起伏不平的路上蹦跳，躺在米袋上的兵却總是睡着的。他們完全不慌不忙，因為已經進行了很長久的戰爭，會繼續經年累月地拖下去的。天一下雨，行軍就悽

（註）此後的『我』，都是指白修德。

慘了，兵士們一次又一次地全身濕透，他們的腳陷在爛泥里。

路上來往都有人。向前走的是不斷地行軍的人們的艱難的腳步，對面來的，則是戰場上丟棄下來無人照顧的士兵。病兵和傷兵通常自己步行到後方，用自己的腳。在前綫，頭上重傷和肚子上受傷就等於死，因為醫藥隊從不能把這些人及時搬到後方去醫治。可以走路，但顯然已在軍事上沒有用處的人們，則發給一張通行證自己回去。這些人是很可憐的，在山路上一撓一拐，靠在木杖上，扶着山石或樹木掙扎而行。在每個山坡脚下，你總可以遇見這種人，他們爬完了一座山之後在坐着休息，滯鈍的眼睛注視着前頭的又一個坡，又一重山。你極難得看到生病的或受傷的人用担架到後方。傷病兵的傷口和髒東西發出惡臭，蒼蠅雲集在他們周圍，甚至在他們的膿眼上或傷口上築巢不去。

我們坐擁礙的平底船過黃河，然後經由越來越少的山道到前綫去。他們緊緊追蹤向沁水山谷間撤退的日軍。那是秋天，正當收割玉蜀黍的季節，高粱也熟了。在你明白每一個村落里的憂愁和迷信有多大以前，中國的山景從外面看起來是很美麗的。山脊上望下去，你可以看到打穀場上的椴皮升騰如雲，農民正在打穀子。柿子又熟又紅，在稀薄的枝葉間閃閃有光，柿葉早就焦黃了。人們正在犁地準備冬天下麥種，地土的氣息是很好聞的。有的田里新穀子的薄薄的葉片使地土發綠，另一些田里，則棕紅色的高粱的耳朵，沉重地掛在長高的高粱桿上，我們騎馬經過時，擦過我們的頭。

日本人剛過去，他們在鄉下留下了到處焦黑的破壞的痕跡，有時馳馬走過許多燒光了的鄉村，走了一個整天，只見一堆堆的廢墟。有許多路面壞得這樣厲害，以致中國的山馬也沒有辦法走過橫貫在

路上的溝。你得下馬來自己找路，牽着馬走，要不然的話，就得騎馬登上荒蕪的山脊，走好幾個鐘頭，覓路而行。荒山野地之間，有時忽然站着一所孤立的茅屋，屋頂已經倒下了，木頭燒焦了，在無人地帶站立着，成爲荒涼的象徵。

鄉民講的故事，和我後來在日軍每次出擊之後聽到的故事是大同小異的。農民在日軍推進之前逃走了。他們要不自動地逃，政府也會下令強迫他們離開。他們帶走了一切東西，自傢具起至種籽止。他們把豬和牛牽到山里，把衣服細軟埋在地里，退到山上築草棚住，等候兩軍決勝。日軍開進去的，是無用的荒地，他們的行進曾受大水阻礙，到他們到達重要目標時，鬚髭已長了兩寸，泥土滿身，又疲倦，又憤怒。

我經過的有些區域里，給日軍捉到的每一個女人都曾被強姦，毫無例外。關於強姦的故事，其慘痛處是這樣相同，以致除非描述特別惡毒的辦法之外，這些故事變得單調了。有人會看見有些地方日本人和牝豬交媾。在鄉民來不及好好隱蔽的地方，日軍騎在馬上踐踏高粱地，逼得女人們露出頭來。日本軍官把小老婆從大城市里帶到前方，那原來都是中國人，俄國人，高麗人或日本人自己的老婆。兵士就得在鄉下找人享用了。日軍的車子壞在泥地里的時候，就叫農民來，把衣服脫得精光，加以鞭撻，要他們像野獸一樣拖車子。日軍常把馬和騾子在塵埃里打死。在公路和山上，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牲口的屍體在腐爛，騾馬的屍骨曝露在太陽里發白。被迫代替騾馬的中國農民，也受着同樣無情的鞭叱，直至倒下或發瘋爲止。

騎馬及步行上前綫，需時兩星期。從一個團部出發，我從山腳邊被領到一個蓋着高高的麥桿的山頭上。我和一個兵一起靜靜地快步而行，蜷伏在麥桿後面，然後爬到較舒服的地方。那個兵小心地分開麥桿，向山下指點。遠處有些白牆的房屋以及城牆的模糊的輪廓。他漫然指點着，小聲說：『這些是日軍』。我竭力注視。於是我注意到離我們不遠的田野里有什麼東西在動。我問：『這是什麼？』那軍士甚至並沒有轉過眼睛來順着我的指頭看。『這些是農民，』他說：『他們必須收割，你知道——現在是收穫季節。』日本人也懂得的；他們自己也是農民。除了突擊之時野蠻以外，他們對於在田野間工作的人也是中立的。

那一星期內，我在山西前綫旅行了三四十哩。後幾年我在其他許多省份里旅行了許多路。情形總是倒胃口的。在各地地方，除了工事里住着一羣人看守着發鏽的機關槍或洗擦舊步槍以外，我更看不到其他東西。華軍的前哨是二十或三十人一堆，用走路的傳令兵來和營部連絡，營和團及師之間則用電話傳達命令。日軍通常是兩三百人駐在鄉村里，有野戰輕砲保護。在數千里的山上，你都可以望下去望到日本人；在任何一點，華軍總要比日軍多五倍。可是日軍總有重機關槍和野砲的，華軍如接近日軍，在露天走一兩哩，就會給敵方的火力擊倒而自己這方面沒有辦法加以壓伏。

一九三九年時中國前綫一切平靜。此後漫長的五年內，由於同樣的原因，中國前綫也還是一切平靜。

第五章 外戰中的內戰

要把戰爭從平靜的晉南前綫帶到寬敞的太平洋上，需要兩年——這是混亂的兩年，在這兩年中，全世界看到了中國的深山里面接連地發生相互抵銷力量的行動，而不知道這些行動的內部意義或歷史上的重要性。中國的前綫到一九三九年是安全了。政府重新安定下來了。戰爭變成了生活的常軌。西遷後最初幾個月間，政府撇開了一些辦例行公事的機關，在這些機關之上建立了一個複雜的行政機構。至於中國進行戰爭的方法，神秘之處是很少的：

戰爭靠在農民肩上。貢獻糧食和人力這兩樣必需品的，是農民。政府把農民種出來的食糧養活軍隊，國民黨，兵工廠的工人，以及官僚。政府有了農民供給的人力，把徵發來的人送上前綫，用來開闢公路及搬運必需物品。最重要一切事情，不論軍事的或政治的，都推給農民去幹，他們穿着藍色的灰色的衫子，盡心竭力給抗戰供出原始的精力。軍隊的移動，美國空中堡壘機場的建築，運輸的組織，各問題都歸結到可以找到多少農民來動手，可以找到多少袋農民所生產的米來解救危局這兩點上。中國的一切籌算，都是以農民的生產力來彌補一切的。甚至軍火生產中也是如此，特別是中國製作爆炸物的氮化物資源，其關鍵所在也在農民，因為中國人是從農民身體的排洩物中取得氮化物的，他們

很細心地搜集着排洩物，用來調合作藥。

戰爭開始時，向農民征稅是收錢的，政府就用這錢來購買他的穀子。在通貨膨脹的重壓之下，貨幣制度於一九四一年起開始每况愈下，於是政府聽從一個美國經濟學家的勸告，改而徵收實物。爲徵收此種新稅，政府先把自己的需要直接算成米糧數目，然後指定每省應徵數，再由各省指派縣、各縣指派到村。每個村里的頭目總設法使最窮的農民負擔最大的一份。新的徵稅法唯一的好處，就是使作戰力和政治的本質在什麼地方，表現得非常清楚。農民把穀物繳給當地的官員，當地官員收到之後，掙掉一點，把所剩的繳給政府，於是政府把袋子漏着洞的一袋袋穀子發給所屬各機關。穀子是遠比鈔票值錢的東西。

這種新稅是戰爭迫使國民黨改變政策的象徵。國民黨自成人之日起，就依靠着沿海大資本家和鄉村貴族的聯合支持。日本的侵略掃蕩了沿海大資本家，商人和工業家，於是政府差不多完全倚靠貴族的政治上的支持。這一轉變在表面上並不明顯。真的，一九四〇年時對高級簡任官所作的一個調查，顯示其中百分之五十還是從下江兩個商業省份來的，這兩省一直是國民黨的主要支柱——百分之三十五是江蘇人，百分之十五是蔣委員長家鄉的浙江人。只有研究了政府沒有辦法做的事，研究了從政府一切的怠忽的罪惡中取得利益的是那些人，這一轉變才顯得確鑿無疑。舉個例，徵實的時候，小農出了雙倍的穀子，富人却逃過了租稅。政府對這事眼睛半開半閉，把徵實交給各地方官員去辦，只

要自己得到穀子，什麼話都不說。在公報和演講里，政府官員對於使通貨膨脹走到頂點的囤積家暴跳如雷，人們也都知道大囤積家是大地主；然而政府從沒有採取行動。政府倚靠着地主，地主倚靠着農民。要把農民的力量從年深月久的苦痛中解放出來，要把這些力量聚而抗日，是需要對於橫隔在重慶和糧田之間的地主，採取最嚴厲的行動的。地主中一部份人是從前的軍閥，現在依然擁有軍事力量，大部份人則是各地國民黨地方組織的基幹。政府覺得這機構太脆弱，如有任何基本的改革，它就活不了。

內政上的實力抵銷的辦法，不過是許多辦法中間的一個而已。軍事上也有實力抵銷的辦法。日本佔領中國的軍隊約十五或二十個師團，將近一百萬人。他們的軍隊駐紮在沿海一帶，鐵路綫一帶。以及大江兩岸。他們的各防區都以現代化的交通和其他的防區聯系起來。他們佔有了戰略中心地帶。在大陸的半圓形上，在他們陣地的邊緣上，是中國軍隊，約四百萬人，由於原始的道路和運輸工具的缺乏，被釘死在那裏。要把中國一個師從華北運到華中，也許需要一個月，而日本一個師團從北平運到漢口只消十天。這就是說，在機動的戰爭中，中國人在動手之前就已經輸了，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在危險地點安置足夠的兵力，以應付合乎常情的威脅。

那就必須守住四個地區：中國中心的長江三峽一帶，北方潼關附近的黃河彎曲處，西南雲南省的兩翼，以及東方的長沙及產米區。這四個危險區域，各有可靠的將領率領的大批華軍守護。其中三個由蔣個人的「中央」軍的可靠部隊掌管；只有長沙一帶的守將薛岳，一個性情暴躁的廣東人，戰前會

和蔣介石有點小嫌隙，是以特別高明的軍事能力而獲得指揮權的。各省和地方雜牌軍，則被分散在這四個重要地區之間的地方。重要的長江下游前線守將是願祝同，他是一個熱狂的反共將軍，把注意力放在中共的發展方面較多，放在日本發展方面較少。次要的戰區司令，多半由蔣氏的親信以外的地方軍閥担任。有一個時候，八九個戰區司令中有半數的人會在過去十五年內公開反過蔣，或親自對他作戰，或贊助過作戰。

各部隊在一九三九年進入新陣地。一九四〇、四一兩年間，他們忙於築壕保守。重慶離開得太遠，只有名義上的管制權，因此各軍就盤踞下來統治自己的區域，自己委任或黜退縣長及法官，自己收稅及制定法律。有的部隊覺得十分安全，所以叫兵丁參加私人的耕作，以補充口糧。重慶來的訓令或不理，或服從，視情形而定。中國軍隊並無真正中央補給制度，只是把錢交給各師師長，由他自己設法。中央政府的十分緊張的兵工廠，每月至多只能生產槍彈一千五百萬發，砲彈及迫擊砲彈數千發，平均每人每月只有槍彈四發。精明的指揮官不敢以這樣少的儲備物來計劃攻勢，於是攻擊精神漸漸腐蝕掉，彈藥給囤積起來，直至老朽不堪用。一九四三年有人看到一隊牛車把槍彈運到前方。彈盒上印着『一九三一年製』字樣。重慶太遠了，彈藥從兵工廠經繁忙的公路到北方戰綫上，要好幾個月。指揮官遇危急時，不能希望請求重慶急送軍需而有辦法——他得靠自己軍火庫裏存積的東西作戰。

另一件抵銷力量之事，存在於這個過渡期間的商業中。當西南的滇越鐵路被割斷的時候，全世界關切地注視着中國的封鎖。滇緬公路於是重要起來，成爲封鎖中唯一的出口的表誌。實際上，中國所

有的官員也都知道，當時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在中國供應問題中只是很微小的因素。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日本的封鎖是一個篩箕，而歷史上最大的走私組織就在這篩箕上鑽尋空隙。據估計，光是買賣汽油的走私者，就僱用着五十萬人，他們把汽油從海邊的船上偷運入西南邊境的山道中，轉而賣給中國政府。唯利是圖的日軍是和中國的投機家合作的。私人投資者把和汽油一樣多的布疋，輪胎，藥品以及其他緊要物品運售給政府，這並不是單方面的買賣：中國的錫、錫和鎊也從同樣的道路，運出去給敵人充實兵工廠。中日兩方對走私的事情都知道，中國政府人員積極參加着走私。中國液體燃料委員會給予走私進來的汽油以充份的運費和回佣，連由於敵人的行動而在路上損失的汽油，也不論多少償還全價。政府辦的中國航空公司通過廣州日軍的路綫，用賄賂收買高度揮發性的汽油，來維持這一條把中國聯結在一起的重要交通綫。中國共產黨人，則在敵軍所佔的城中，購買槍枝、手槍和汽油。

中國戰場是很奇怪的。重慶寄出去的中國郵件可以經常寄到日軍所佔的各大城市，那邊也能寄信回來。在越南邊境，中國軍官從河對面日本管制區裏的經紀人那兒買米養兵。重慶政府官員經常匯錢給上海和北平的家屬，並收到關於他們的產業被敵人如何佔用的報告。

在重慶，相持的局面，是由巨大的嘲諷和不快樂反映出來的。戰爭變成既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而是仿做演習着戰爭及和平的朦朧境界。實際上這境界中既沒有戰爭，也沒有和平。一切舊的緊張

又開始了，其中最大的，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緊張。雙方都並沒有就國共之間的聯盟，得出一個徹底的結論。這聯盟依靠着很脆弱的一個特定之點，即共同禦日，日軍攻擊一停，這聯盟就開始鬆散了。要創造聯盟的穩定有力的基礎，首先就必須改造中國的社會，而改造社會就是革命——兩黨却就在這一點上無法有一致的意見。

分歧的基本原因，是共產黨的擴大。中共的影響和武裝，逐月在敵人的後方發展。中共總部仍在陝北延安，可是至一九三九年初，陝北本區雖仍然最出名，但已變成中共許多控制區中的一小塊了。他們力量最大的地方，早已伸展到黃河以東，濱海區域以及長江下游。早期的紅軍在抗戰最初幾年間已經死光，新的八路軍是華北本地人，其指揮官多是戰前從沒有聽到過共產主義的青年中尉和上尉。延安和重慶一樣，高級會議中永遠是幾個老名字，但在中共作戰的戰場上，新的領導者不斷從草野裏崛起。中共在本質上依靠着周圍人民的援助。他們並無擁有數千萬和平農民的大後方；他們所控制的地方和日軍的交通線犬牙交錯，並且密佈着日本駐軍和碉堡。如果中共必須對這些日軍施行壓力的話，他們就永不能休息。他們也就永遠不休息。爲了保衛自己，他們不煽動，就要死，要就拼命使民衆擁護，要就不得民衆擁護而滅亡。

他們在日軍後方的鼓動和擴張，使他們和政府部隊不斷發生磨擦。日軍挺進時，政府曾在華北和華中都留下一些部隊。中共在新的社會基礎上組織鄉村抗日時，就一再和政府軍隊及官員發生衝突。由中共看來，這是一個全民戰爭，不容許有中立的人。政府戰前所委任的老村長以及中年縣長，却無

法適應猛烈的游擊戰爭。結果，能够轉變的人留著和人民一起，太老和太脆弱而無法轉變的人，就給游擊隊員在抗戰的理由之下撤換掉。同樣地，中共區域裏孤立的政府軍發現自己已被吸入中共方式的游擊戰中，他們要是不願意合作，就發生磨擦，而雙方於是罵對方不守信用，彼此攻擊。一年年拖下去，日軍後方的政府機構融解了，被吸收了，被中共控制下的完全新的抗戰機構代替了。

雙方第一次武裝衝突發生在一九三八年夏季。這之後，偏僻地方的政府軍和中共軍，各和自己的統帥部隔絕着，彼此作戰越來越經常。在政府統制區，政府人員把中共的擴大看成是一種疾病。由於政府不肯或不能像中共那樣一方面動員人民，一方面不致危及擁護自己的社會基礎，他們就覺得中共也應該停止組織人民。中共在政府統制區的幾個辦事處，受到了越來越嚴緊的監視。政府的熱狂份子，在湖南平江襲擊中共戰區在該地的聯絡處，屠殺了該處的辦事員，其他城市裏同樣的辦事處被封閉了。蔣介石氏的中國內部的中共活動慢慢地轉入地下，直至只剩下重慶和西安兩個公開辦事處，這兩個辦事處也受着監視。一九三九年秋，山西爆發了一師人大規模的戰鬥；這次衝突至一九四〇年春經談判講和後停止了，但更大規模的激烈衝突，跟着就在長江下游新四軍活動地區爆發。

到一九四〇年仲夏，顯然地，必須有一點協議，否則中國的團結就會粉碎。大問題極多。第一是得嚴格劃定中共的陝北區域，該地區兩黨的邊境兵士總在時斷時續地打仗。其次是軍需問題。政府會答應以餉銀和軍火供給中共的八路軍四萬五千人，又在一九三八年春答應供應新四軍一萬五千人的軍需，可是餉銀也好，軍火也好，來得很遲緩，而且來時附帶着許多條件。政府的諾言在紙上很好看，

但事實上，中共是在自己作戰，得到政府的幫助極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抗日的政府和中共部隊必須清楚地劃定界限，以使衝突減至最少限度。

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一個協議，解決了中共陝北區的劃界問題以及給養問題。可是，協議的關鍵所在，依然在於政府要求中共把八路軍部隊完全調到黃河以北，把新四軍部隊調到長江以北地區。

至一九四〇年底，發生了自此以後著名的新四軍事變——這是中國戰時政治中大轉捩點之一，是直至如今依然在喚起激烈憎恨的感情的標誌，是中國內戰的起因。無人能精確地知道政府軍在一九四一年正月初如何包圍並屠殺了新四軍總部四部隊。我們根據一切現有材料所能作的最不偏私的結論是：新四軍大部份部隊已於十二月底調到長江以北。他們在江南留着軍部，那包括該軍大部份的參謀人員，指揮部以及若干戰鬥部隊，總共約五千餘人。他們已奉命北調，政府規定了他們的行軍路線。中共方面說這條路線會把他們直接引入長江邊上日本駐軍的掌握中。他們請求改變路線，而他們在重慶的代表周恩來將軍，爲此事見了蔣委員長。委員長批准了改變路線，並且請周氏吃聖誕夜飯，這兩人爲和平和友誼而乾了杯；一切都解決了。之後，延安中共總部突然急電其重慶辦事處。新四軍被騙入了政府軍的包圍圈中，該軍軍部部隊被屠殺了。周比於是趕去見蔣委員長。他沒有能見到蔣，却得到一個保證，說是一切順利進行，政府正在下令給政府軍隊切勿阻擋新四軍的行軍。

誰說着謊？有人說蔣氏的親信瞞着他發動攻擊，待他知道後，他就說謊以掩蓋之，而且後來瞞過了還行動。國民黨說新四軍會攻擊政府軍，而政府軍把暴動者處以紀律。這種說法巧妙地掩

蓋了一個事實，那事實是新四軍當時部隊比國民黨的少得多，而且其中大部份是非戰鬥員和司令部人員。

於是重慶瀰漫着公開分裂及全面內戰的謠言。混亂過去，得知整個新四軍軍部已被消滅，參謀長被殺，軍長被拘入集中營，死者數千人，被俘者數千人。事變的本身已經够壞了，得勝了的政府軍却又用日本人一樣的野蠻來對付被俘的中共同胞。幾年之後，有一個大學教授講起了俘虜營中的可怕的經過，他不是共產黨員，只是在旅行中和新四軍一路走而被俘的。他說中共部隊里男女都有，女人是作政治工作，看護，及參謀人員的。政府軍強姦了這些中共女俘虜，她們被傳染了梅毒，有的自殺了。俘虜們給關在打仗的地方關了一年半，然後送到四百哩外的一個新集中營去。男女都被迫扛運政府軍的行李，生病或體弱挑不動，就挨打。有的人給棍斃，有的人給活埋了。當告訴我這故事的教授被釋放的時候，俘虜數千人中，還活着的只剩三百人。

新四軍事變在此後的一切國共關係中，劃下了一條感情的歇私底里的線。一切談判都停止了。各地的中共軍隊都給截斷了給養。政府最精銳的部隊所組成的封鎖綫，把中共的陝北基地封鎖得密不通風。開始的時候，這是一個中國對抗日本戰爭，如今是兩個中國——一個是國民黨的中國，一個是共產黨的中國——對抗日本的戰爭。這兩個抗日戰爭之外，同時無聲無息地進行着一個附帶性的戰爭——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之間的戰爭。

一九四一年秋訪問亞洲的人，就會覺得難於斷定中日兩國間鬥爭的結局。繼續不斷的通貨膨脹與

物價在競賽。中國軍隊失掉了機動性。日機隨興所至地轟炸着首都重慶。中國人之中的確存在着英雄主義，勇敢和信心——但也有同樣多的憎恨，懷疑和通敵行爲。中國人無法打勝，但他們不會投降。日本曾設法粉碎中國的軍隊，破壞它的經濟，鼓動其內部的不協調。他們得到了部份的成功，但整個而言是失敗的。中國依然被封鎖在一個蹣跚板似的平衡狀態中，日本帝國部隊無法推翻這個平衡。如果把這個鬥爭看成只和亞洲有關的鬥爭，這局面就無法令人了解了。漸漸地，事情變得很明顯，決勝之點的到來並不在中國本身。中國之戰是較大的世界戰爭的一部份，中國內部的問題及其痛苦是貫串在裏面的。民主國要是得勝，中國不會失敗，民主國如戰敗，中國就不會得勝。自然而然地，日本差不多同時得到同樣的結論。亞洲的戰爭是西方更大的戰爭的一部份。

日軍的領袖們了解荒唐的凡爾賽和國際聯盟並沒有改變了世界任何東西，也明白這是一個製造及破壞文明的時代，是一個國家要就偉大要就是滅亡的時代。從一九三一年起，日本人看穿了世界當時存在的混亂狀態，決定一有機會，即殘酷地進擊。日本的領袖們是些小人物，但他們有大計劃，在這些計劃中，中國被當作日本未來一切偉大的樞紐。在日本繼續向前在較大的未來世界中獲得偉大以前，必須解決中國問題——而解決的辦法必須合乎日本的口味，要使中國担任鞭撻之下的俘虜，拖拉日本征服者的戰車。

日本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停步考慮了一下。它已經從蒙古沙漠起至亞熱帶的珠江三角洲止，佔領了

中國一切重要的軍事目標，但中國依然在和它作戰。再要深入該國內地，就需要使出日本人的吃奶力氣。要中國降伏，必須把每一個日本兵，每一滴汽油，每一噸鋼鐵，都投資於駐守中國內地數年之久，直至中國屈服為止——如果中國會屈服的話。這樣做，在一九三九年，在許多日本人看來似乎是荒謬的。因為不管中國的結局如何，其時正在歐洲發展着的戰爭，其結局無論如何總會在今後數十年內牽連日本。因此日本等候着。一九四〇年春，英法軍在德軍之前崩潰，使東京每一個決策的機關里鐘鼓齊鳴。法國和荷蘭已被蹂躪而完蛋了；英國在死亡的門口；這些國家在南洋的屬地變成了孤兒。這情勢惹動了日本人，於是一九四〇年的帝國政策，就從大陸轉而為南洋的外交攻勢。

日本開始對這三個殖民強國提出要求，數月之間，一切都很順利。法國的官僚們在本國和殖民地里都沒有根基，同意封閉中國唯一的鐵路供應綫滇越鐵路，並且讓日軍駐紮到越南北部。英國被歐洲的敗仗弄得昏頭昏腦，同意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這樣關住了中國後門的最後通路。荷蘭則被牽入了日本的經濟合作的要求中，日本要求荷屬東印度的煤油，荷蘭人準備着招待一個日本代表團，討論煤油問題的詳細節目。一九四〇年仲夏時，日本似乎無往而不利——可是到了秋天，他們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外交攻勢已經像打濕了的爆竹那樣洩了氣。只有在越南，他們得到了所要的東西。英國人把滇緬公路重新開放，並拒絕再討論封鎖問題。在秋天，荷蘭人接待了日本去的煤油談判人，答應每年把不到二百萬噸的煤油買給日本——這數目只是荷印產油量的四分之一。日本人自一九四〇年冬至一九四一年春，這才消化了他們所獲得的教訓，得到了一個分析和解決辦法。他們對問題的分析是

準確的；解決的辦法却是一個大禍患。

日本有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在中國的尚未結束的戰爭，二是即將開始的南洋之役。大陸問題實在更其迫切，但南洋之役具有時間因素，那是要就馬上動手，要就永不動手的事情。這兩樁投機之間最好有一個爲期數年的間歇，不過歷史是不等人的。一九四一年初，日本這兩個事業都不像他初料那樣進行順利。日本已把這兩個問題考慮了幾個月；不必任何智慧也能得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即它的失敗之原因，并不在於戰場或談判席上，而是在於美利堅合衆國。

月復一月，美國漸漸成爲日本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對手。中國以憎恨之感注視着英國的封閉滇緬路，它覺得英國出賣了共同事業。對於法國在越南的行動，中國只有鄙視。似乎只有美國才能給中國以希望。美國把煤油和鋼鐵賣給日本，那是真的，但美國也漸漸在開始運援助品給中國。中國把將來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荷印也是這樣。荷蘭人只有幾架舊飛機和少數巡洋艦，不敢和日本的海軍及其久經戰陣的陸軍對敵，可是荷印得到了美國外交上的鼓勵，對付日本的外交壓力很是堅定。從日本人看來，美國的政策彷彿是破壞的陰謀。只要美國政府向中國或荷印說一句話一切都解決了；沒有這句話，日本就動不了。因此，日本的一九四一年計劃的基石，是在逼迫美國作決定，該年春，在華盛頓進行着談判。

日本人堅持其要求爲合理。他們說，他們所要求於荷印的，不過是礦源而已，他們很願意和美國分享。又說，他們在中國所要的無非是和平，而和平只有在日本控制下才能到來。日本所遇到的幻滅

似乎是公平的——日本並不在攻擊其他民族，日本自己正在受打擊，被破壞。「你們希望我們七千萬人幹什麼呢？」日本駐巴達維亞總領事在煤油談判之中問道，「要我們鎖在自己的多山的小島上麼？……我們必須要有煤油……假如你們不給我們，我們就自己拿……我們必須中國有和平——如果取得和平需要一百年的戰爭，我們就打一百年。我們在這上面冒着整個民族生命的危險……我們必須擴展……你們怕我們，因為你們冤屈了我們。」秘密地，日本打電報把計劃中的對美談判大綱，告訴它的駐歐使節，說「要用外交談判來結束對中國的鬥爭，要建立東亞共榮地帶，要保持我們的國家資源，以備將來。」

甚至正當初步談判之際，日本的和平之說也給軍隊的貪婪破壞無餘。日本的將軍們把部隊開入越南南部，作為進擊南洋的跳板。美國則以平時民主國家所罕有的急速反應，加以反擊，禁止煤油和鋼鐵運往日本本土。荷蘭和英國跟着美國的樣子做。美國的禁運煤油，使華盛頓的談判進入新階段。現在他們再不關心抽象的條件了；談判變成了戰爭原料問題。日本的一切決策都有了一個時間限制——它必須在煤油用盡之前取得美國的協議，它必須投降並變得無力，否則就必須在變得弱而不能行動之前進行攻擊。

日本人如今不能再一面進軍，一面同時談判。他們走入陷阱，他們就設法作一個反圈套。他們說，如果美國再能把油和鋼鐵賣給他們，他們就可以把越南南部的部隊撤到越南北部。但美國再不能出爾反爾了。又把煤油和鋼鐵賣給日本，就等於美國支助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美國的談判人員說得很清

楚。中國如不自由，則日美兩國之間無法恢復正常關係，日本要試儘嘗試，總不能發見一項同時佔有中國而綏靖美國的方案。

美國也有一張時間表。美國的計劃準備在 一九四二年春季行動——到那時美國一支志願空軍，包括驅逐機一隊，轟炸機一隊，並可能有魚雷機一隊，可以用中國旗從中國基地出發作戰；到那時荷印和馬來亞大約可以重新裝備好；到那時美國穿過太平洋的島嶼可以配備並設防停當；到那時菲律賓將增加美國飛機和美國戰鬥部隊。這一切完工之日，日本就會倒臺了，如中國人所說的像「甕中之蠶」了。日本人充份明白這一條絕路。到秋天，日本國內的辯論解決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東條英機將軍任內閣首相，這是現役軍人担任首相的第一人。東條是陸軍中的內幕人物，陸軍在日本決策的最後兩星期掌握了日本的舵。東條的計劃，是以熱烈的談判來保持華北，而重新獲得世界貿易的自由權，這樣來使日本繼續強大。如美國拒絕，則槍砲已經齊備。

至十一月中，日本駐各國的大使館接到一本準備緊急時使用的密碼。短波無線電廣播如兩次播出「東風雨」三字，就代表日美關係斷絕。十一月底，日本海軍已出動在海上，在北海通附近集合，並開向北太平洋；普通的密電太慢了，日本要外交人員用電話。至十二月初，軍隊已集中在越南南部，準備進軍南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美國數千家報紙和電台的自動電話機響了十二次，報告着一個新聞。疲倦的星期刊編輯們注視玻璃格板下的電鈕打出一個特急電。那是下午二時二十二分：

特急……：白宮說……：日軍進攻珍珠港……：

亞洲之戰，現在是美國的戰爭了。

第六章 珍珠港事件以後

美國接受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戰爭時，對戰爭毫無準備。英美的主要武裝，是白種人優於有色人種，或至少白種文化高於其他等等糊塗信念。國防準備還够不到裝裝樣子騙人的程度。在菲律賓，我們只有一個空軍的骨架——B17式機三十五架，那是早期殘破的飛行堡壘，火力不够，裝甲也不够，其中十七架在戰事發生的第一天就在地面上被炸毀；P35式機二十架，可用，但飛得慢，是瑞典政府的訂貨而被轉移到菲律賓來的；初期型式的P50機六十架；中型轟炸機一架也沒有；加上一些雜七雜八的A27式及P36式機，以及幾架每小時飛九十哩的觀測機。戰爭爆發後一星期內，這支空軍只剩下戰鬥機三十架，轟炸機一架都沒有了。我們的陸上部隊包括菲律賓斥候隊，那是很好的森林戰士；新自美國開到的國民警衛隊數千人；以及匆促訓練出來的菲律賓雜色後備隊，那是剛從菲島稻田及農家徵來的人。

其他盟國也很弱。荷印有三百架飛機，但其中大部份是陳舊不堪一用的。荷印有正規軍三萬人，其中六七千人是荷蘭人，其餘是土人。他們有步槍，機關槍，及幾尊舊砲，此外就沒有什麼了。補充兵四萬人很快徵召起來，但尚未訓練。馬來亞的英國人保衛自己之物只是森林，自己的驕傲，以及帝

國傳統。他們的空軍差不多完全是老朽過時的。他們在新加坡以美金約三萬萬元的巨款，建築了一個巨大的海軍根據地，可是它只準備應付海上來的攻擊；而日本人，當然，是從陸上來的。理論上，英國應該是南洋的主力——他們有澳軍一師團，英軍數千人以及大艦隊一支；但英國的指揮部是不够格而沒有決心的。

西方各盟國——英美荷——在心理上缺乏對日作戰的準備。除麥克阿瑟之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日作戰的指揮官們，都是些十分自高自大的盲目的人們。美國防守珍珠港的空軍將領之一，曾在日軍進攻之前五個月在一個集會上發表了一次奧妙的演說：「希特勒是我們真正的麻煩所在，」他說，「我們對付了德國人之後，就可以轉向日本小鬼說，『好，好，小弟弟，要乖一點』，他們就乖一點了。」

在白種戰士的神話之中，黑皮膚的人簡直就不是打仗的人。每個人都認為日本人都是近視眼不會打槍，認為他們的轟炸不正確，認為他們只會模倣，認為他們不會建造或維持真正的機器。你還記得一個故事，說起他們如何做造一只英國船，東拚一塊西湊一塊麼？不是有一個故事，說起他們用幼稚的計劃造船，船一離開船塢就翻掉麼？不是說日本飛機不好，第一架Dof式機一出廠就炸裂麼？日本零式機的一切詳情，軍事情報員早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就自重慶通知華盛頓，該機的機動性能，航距和引擎馬力，都有紀錄——可是給擱在檔案裏不問不聞。西洋諸國最精明的人注視着日本打中國達四年之久，而竟毫無印象。他們雖然不能懂得中國之戰，也不大費力氣去找尋簡略的軍事形勢以外的事實，

却大言不慚地有許多結論；他們說，中國之戰證明了日本在軍事上只是一個四等國，既沒有資源，也沒有從事現代化戰爭所必需的技術。

如果說在戰場上，盟國在軍事上和心理上缺乏對日作戰的準備，那麼，在爭取被攻之地的人民的信任的競賽中，它們準備得更不够。世界史上的一個時代正在結束中，但沒有人能及時了解；甚至在勝利以後，許多人還沒有懂得這一點。日本侵入南洋，是奴役下的亞洲的歷史的轉捩點。這是一個數萬萬人的革命的凶惡階段，其凶惡的程度，使戰爭本身差不多成爲不足道的小事。四百年以來，自阿爾芳索的大帆船於一五二一年穿過麻刺甲海峽，以及其後數十年聖哈維爾穿過該海峽以來，白種人的鐵釘鞋，蹂躪了亞洲皮膚黧黑的各民族的尊嚴和文化。軍事上趾高氣揚的白種人，搶掠了東方的財富，把信仰挑在槍尖上，硬塞進異教徒的臟腑。四百年以來，亞洲的民族仇恨漸漸累積起來反抗這制度，其內部壓力像一座火山。現在，一個皮膚黧黑的日本民族在白種的奴隸的眼前凌辱起白人來了。

菲律賓人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講起上帝如何製造世界上第一個人，眉目都塑完之後，就放在爐子上烤。可是他揭開爐蓋揭得晚了，這個人給燒黑了。不過，這是上帝所造的第一個人，他把生命吹入此人之後決定再做一個。他用同樣的材料做第二個人，同樣地小心塑造其形體，熱心地等待着，但他等得不耐煩，把爐子打開得太早，因此這人沒有烤熟，是一個生病似的，生麵團似的白人。上帝不滿意，而且責備自己第二次做錯。於是他造了第三個人，這一會他常在爐邊張張望望，把人形取出來的时候，烤得不多，也不太少；此人是溫和的金棕色人。上帝滿意了。

這個故事也可以是馬來或緬甸或印度尼西亞的故事，也可以是中國或日本的故事，也可以是任何棕皮膚或黃皮膚民族的故事。白種人之到來，已使這些民族帶有防衛性地自己警覺自己的膚色。日本兵工廠裏最凶的武器，就是故意提高人們膚色的自覺，強調白種人的優勢和霸權，強調有色人種的卑下和奴隸地位。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對南洋各帝國暴風雨似的進攻，彷彿是排山倒海而來的軍事力量的大檢閱。實際不然。那無非是消滅少數幾個白種人，那些白種人的腐敗的軍事機構，一方面承受其奴役下的民族的冷淡的憎恨，另一方面則被其中若干民族認為是十字軍的狂風暴雨般的起義一掃而光。

南洋之戰，除了菲律賓和美國人在巴丹半島及哥來吉多島上輝煌的抵抗以外，是一段恥辱和愚竇的故事。

日本人在歷史上對外國的戰爭中，從未有始有終打出什麼結果來。不管他們一切宣傳如何誇張，他們的對美戰爭也不能說是對付白種世界的戰爭已經打到底；當時不過是把白種人逐出亞洲而已。他們的第一拳打擊珍珠港，企圖爭取時間，擊破美國海軍，以進行南洋之戰。南洋有四個進攻點：北方的香港和馬尼刺，南方的馬來亞和荷印。

香港按照計劃而攻下，但菲律賓守住了。菲律賓的保衛戰，和南洋其他各戰役一樣，可以用政治來解釋。在一切奴隸民族中，只有菲律賓人和盟國並肩作戰。菲律賓人身受所有亞洲人都受着的許多凌辱，因而痛心疾首，那是真的。美國人的俱樂部不准他們加入。他們的薪水要比作同樣工作的白

種人來得低。他們之中甚至教育最高的人，也不喜歡白種人虛偽的謙虛之狀。他們的領袖們依然有着痛苦的記憶。奎松總統過去會和美國作戰四十年，到麥克阿瑟的父親手里才投降。然而美國會給菲律賓以學校和醫藥，而且答應在幾千年之內給他們獨立，他們也相信這諾言是誠實的；他們是走向自由的事業中的年輕夥伴。日本答應給他們的東西，絕不能跟他們已經有的東西相比，也比不上美國已經許下的諾言。

菲律賓人給日本宣傳所惑，或打算投機取巧，因而助敵者，爲數不多。有些第五縱隊在日機襲馬尼刺的夜里閃動火光，指引目標；有的第五縱隊狙擊企圖管制燈火的防空隊員，還有人給日軍以情報，替日軍當嚮導。可是絕大多數的菲律賓人忠於美國，像忠於他們自己的利益一樣。他們像小孩一樣信任着美國的力量。當呂宋的軍隊被壓縮入哥來吉多島和巴丹半島的時候，菲律賓人依然相信大批船隻正在開來，援助即將到來。雖然失敗一天比一天更顯得不可避免，他們的信心並不動搖。甚至在五月初，一切有組織抵抗終於崩潰，也不能使他們相信他們的利益和日本人一致。兩年半之後，他們依然如故的信任心迎接了回來的美軍。

盟軍的戰略在正月初把菲律賓丟在腦後，認爲已經不可救藥；這戰略集中注意力在守住馬來亞至荷印一綫。這一着是毫無希望的，因爲傾倒在這最後一綫上的一切東西，無非是倒入失望和沉滯的海中。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自泰國邊境進攻馬來亞。他們很快地穿過了英國人深信無法通過內萊木，向半島內西海岸掃蕩，然後滲過樹木和森林，進據新加坡。

日軍所用的被人認爲荒謬的技術，突然變得所向無敵。日軍的制服的確破壞了一切軍事成規，可是破爛的橡皮鞋和短褲更適合於森林戰，要比沉重的英國軍靴，頭盔，防毒面具以及其他種種配備好得多。日軍穿着各式各樣的破舊衣裳，這使他們很容易混在平民中間。他們沒有軍需隊，而且差不多沒有運輸隊。英軍坐着卡車，陷在泥裏，而日軍徵用了腳踏車，迅速地在別人不注意的小路上騎腳踏車進入戰鬥。日本的兵士裝帶着一瓶水，一個飯團，一點乾海菜，幾根鹹菜；在當地要是找不到吃的東西，他可以靠這點東西過活四天。英國人却要靠二十三種食物過活，其中大部份是罐頭食品，從英國人看來，敵人簡直是「聞一聞油味」就可以活命的。英軍有口徑很大的武器，瞄得準，打得遠，但熱帶茂盛的叢林之中，多半只能盲目射擊，因此瞄準和遠距離發射失掉作用；日軍則用小口徑武器，每人攜帶着自己的子彈。

第五縱隊在馬來亞幫助日軍很大。他們用巧妙的辦法，把指揮部或砲兵位置指示給敵機掃射。牛奶罐頭剝掉了外面的紙條，在太陽中閃爍有光，從空中看來，是一支直指目標的箭。香蕉樹葉面上是綠的，底下是黃的，他們把黃的一面翻上來作成標記，這在地面上更不引人注意。土人給日軍送食物，担任嚮導。日軍有了這樣的幫助，在七個星期之內從馬來亞北部到南部尖端挺進了四百五十哩，然後停了幾天，整頓一下，直撲新加坡。

英國人在戰前既未能使屬地人民有所準備，戰事一起，他們更完全和屬地人民隔離。日軍進攻開始時，檳榔嶼「純屬英國種」的英籍人士奉命撤退，但亞洲人都不准走，連英國人的歐亞混血的妻

子也不准走。這個命令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種種種族歧視的辦法，動搖了土人的士氣。英國也把中國人包括在次等民族之列。中國各界——共產黨，國民黨，銀行界，商界——的領袖五十人曾訪晤新加坡總督，要求作戰的武器。他們給拒絕了。中國人成羣結隊地去當救火員，担架隊員，救護車司機。他們形成了防空隊的骨幹。當馬來和印度工人逃跑之時，中國義勇隊每天早晨七點鐘集合，擔任需要他們做的一切工作。他們管理船塢，肅清被炸的建築物，掘戰壕，運軍需，但直至戰事將近結束時，他們才被允許作戰。中國義勇軍第一連只在該島陷落之前五天才得開赴前方。他們乘卡車出發時，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幾連人終於在匆促訓練之後，看到了戰鬥。其中有一連，派駐在該島西北角的沼澤地帶，其武裝是雜色槍枝，多半是獵槍，每人備有七顆子彈，他們並沒有防空壕。在大雨傾盆之中，他們設法掘了戰壕，戰壕里的水和地一樣高。六小時之後，日軍先用機關槍那樣密的排砲無情地轟擊，然後在該地區登陸。這些中國人給殺光了。

至二月底，馬來亞和新加坡陷落之後，日軍的注意力移向南北兩方——向緬甸和荷印。荷印在幾個星期之內陷落，該地土人的不穩並不積極，但土人對他們的主人之失敗無動於中，使真正的保衛戰成爲不可能。在緬甸，土著民族憤怒地反對白人，用他們所想得到的一切辦法放火，搶劫，幫助日軍。「註」數月以後，有一位棕色的高級官員，後來在英政府治下的一個重要人物，在澳洲寫下一篇文章，

「註」倍爾頓氏所作『跟隨史迪威撤退』一書（Jack Belden: Retreat with Stilwell）的第一章，是緬甸之戰的最好的記述，也可在是整個南洋之戰的最好的政治分析。

企圖解釋日軍的勝利爲什麼驚人地徹底。他的英文詞不達意，可是急於求人了解，因此他寫下七頁文章。該文名爲『戰爭及日本勝利之原因』。在最初三段內，他鋪敘了日本的經濟需要以及世界上的權力之爭，又議論了一下軍備和戰術。這之後的六頁半，他一項一項縷舉白人對有色人種的種種小侮辱。馬來蘇丹不准進入新加坡。馬來官員被迫須在柵前下車步行，但白人可以直衝而過。英國人必須被稱爲『先生』，但黃種人不許有此種尊稱。英國人因爲有着『只招待白人』字樣的牌子，不能和同事們共飲一杯咖啡。他結語道：『爭取持久和平的道路，是在於實現你們大西洋憲章所稱的人類自由平等的諾言。我所說的故事事雖細小，但大洋之形成，乃由於小滴水珠。』

到五月底，日軍已完成了所有的野心目標。他們強姦了白種人的帝國，北起香港，南至達爾文港附近，西面，則掃清了到達加爾各答的大門。西洋帝國主義皇冠上的寶石印度，只隔一重山而已。

一九四二年夏的印度，炎熱，多塵灰，在灼人的熱帶太陽之下，等候着領導。該國三萬萬五千萬居民，昏悶在炎熱之中，被內部的熱情和衝突煎灼着，只在自己的大痛苦以及對英國老爺的共同憎恨中聯合起來。歷史的一擊已經成熟了。在整個戰爭的過程中，聯合國的隊伍從沒有比一九四二年夏季那樣更近於失敗，在各個災難之點中，印度僅次於斯大林格勒。德軍其時已在伏爾加河邊，在埃及西部沙漠，離亞歷山大城只三十哩。德日軸心夥伴之間，只有一些動盪不穩的國家，一百年以來，那些國家一直是強大的帝國主義國之間對敵的棋子。這其中印度最關重要，如果印度把白種人趕走，則什

麼東西都無法阻止日德兩軍會師，而使戰爭延得極長，使戰爭的代價多費許多倍。

盟國理論上是爲了爭取自由而戰。印度農民大眾對自由却已急不及待，他們已感受到帝國主義制度在東方的崩潰。可是問題是十分奇妙複雜的。假如印度要自由，英國人就得走；假如英國人被趕走，日本人就會進來很容易取得勝利。取得光榮和勝利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必須儘可能最迅速地，最誠實地，最完整地給予印度以獨立，這樣來購買印度的友誼，以便勸說印度民衆像中國人一樣，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作戰。誰都不知道自緬甸的崩潰起至一九四二年八月的危機止這短短的幾個月內，是否有效地形成這樣的解決辦法。發生了的事情，是劇中每個角色都胡亂盲動地做他應做的戲，終於每個人的野心都立即失敗，或最後失敗。日本人做錯了，英國人做錯了，印度國民大會黨也做錯了。

日本人做錯，是因爲他們沒有在六月間危機明顯之時進攻。掃遍全印度的不安的浪潮，是日軍在別地方奇妙地擊敗大英帝國的結果。可是日本計劃作戰，首先考慮軍事戰鬥，把政治放在第二位。他們希望被奴役的民族의 仇恨成爲他們自己的新帝國的支柱，而不成爲自由的支柱。模倣歐洲時，日本把歐洲的弱點和優點一起模倣下來。它全部採用了白人帝國的建造者的盲目的種族主義——它認爲有些人人生來應統治別人，它自己就是天所指定作統治的民族。日本人野蠻的自高感覺及其對白種人的可怕的鄙夷，與其說是一種有條理的政治理論，不如說是一種情感。在這種情感中，也包括對於其他黃種人或棕色民族的鄙視，其鄙視的程度，和過去的統治者一樣大，甚或更大。日本人之所以力量強大，是由於亞洲生活的革命，可是他們不了解這一點。他們不了解印度內部的不滿，也就不會利用時

機給他們的優勢。假如他們集中手頭所剩的一切軍事政治力量，衝過印度邊境的山嶺，他們進入印度時，印度可能已革命成功而歡迎着他們呢。他們太過驕傲，對印度人估計過低，沒有準備利用印人起義的時機。

英國人的失着，驟看看不出來。一九四二年春，克里浦斯爵士自倫敦赴印，帶去了一個條件極多的獨立的諾言。在印度的炎熱之中疲倦而煩擾，他糊里糊塗把他的建議提了出來，他雖然本心想作一點必要的改革，可是給英政府的訓令束縛了。克里浦斯之行失敗以後，英印雙方都向前走入不可避免的衝突。處理夏季危機之權，這就落入印度的英國文官之手。英國官員的作爲，和人們所料想的不爽分毫：他們對付整個事情，對付沸騰的痛苦和渴求自由的熱烈情感，彷彿處理一件警察局的案子。他們用安靜、有禮和極端無情的苛刻，準備粉碎覺醒的大衆。有一個新德里的英國高級官員，讀了那引發起義的國民大會黨的決議案之後，第一個反應是說，「你知道麼，我覺得這是不合法的。」

可是不管其手段如何乏味，反叛的浪潮是起來了。要稱讚引起此種結局的英國官員，是很難的；然而要是他們失敗了，印度可能被拖入軸心國的軌道。英國的錯誤直到這之後很久才變得明顯。他們不用獨立爲禮品而爭取印度的友誼，反而鎮壓了這次反叛，這就種下了長期憎恨的根源。在我們這時代，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的結束是遲早之間的事。他們本可以在印度培養一種跟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相差不多的友誼聯合，可是計不出此，替自己招來了可能是永久而無法調協的衝突。

最後，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錯誤，和日本或英國一樣壞。這個團體是印度最老和最有力量的政治組

織；它領導印度人民對英政府進攻過兩次。它和中國國民黨初期相似，因為它是由於國恥的不滿，對自由的期望，反映農村困苦和條理不甚明晰的社會改革計劃而組成的混合品。和初期的國民黨一樣，有兩方面的人支持它——不快樂的人民大眾，以及供給領袖人才的受教育的中產階級。國民大會黨的內部包含着將來內戰的種子，這一點也和國民黨一樣。

國大黨和國民黨不同之點中最凸出的一點，在於國大黨避忌暴力。國民黨是從內戰及軍閥的騷擾之中成長起來的，它的領袖們只有在學會了如何以暴力影響政治決定時，這才取得政權。暴力或暴力的威脅，滲染着中國每一個有教育的人的政治思想。印度國民大會黨癱瘓了二十五年，因為該黨信託甘地的精神領導，相信他的轉變可不由暴力取得的說法。

一九四二年夏，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非暴力抵抗政策，錯過了數百年來取得印度自由的最大的機會。其時英國是軟弱的——軍隊散佈在帝國的遙遠角落，文官不快樂而士氣低落。敵人近在門口。千軍萬萬的印度人等候着國大黨領導機關的指示。該黨的傳號召他們走出店舖，田野和工廠，但不是去作戰，而是去抗議。該黨領導者號召他們出來以空手反抗機關槍和大砲，並且訓令他們不要還擊。許多同情印度獨立的朋友們對於國大黨在軸心國家威脅之際轉而反對英國人是否聰敏，覺得懷疑。但既然作了這個性命交關的決議，國大黨却無視於一個事實，即實施此決議，必須武力。消極抵抗的結果，只是無謂犧牲了許多人命之後，繼以失敗。

從六月到八月，國大黨整整待發。它向世界和印度提出來的問題，只是說只有印度人才有效力。

應付日本進攻的威脅，而印度在奴役制度的鍊鏹之中，不能有效地爲自己的國防而戰。起義的戰鬥口號是『離開印度』——要求英國給印度人民以完全獨立，以便他們組織自己的國防。差不多已被奉爲神聖的國大黨副領袖尼赫魯氏，曾爲印度的要求作過最出色的說詞。尼赫魯在參加運動被捕入獄之前五天，在一次說話中總結他對白人世界和亞洲的整個態度：

使我驚異的事情，是英國人完全不能按照新的世界形勢，按照現實主義來思想——這所謂現實主義是比軍事現實主義多一點的東西，是政治的，心理的，經濟的現實主義。

英國人，不論其爲何人，想起印度來，只把它當作英國的附屬品。他們的印度史是在他們佔領印度時開始的。一般歐洲人對亞洲的概念，無非把亞洲當作歐洲和美洲的附屬品——當作必須由西洋的良好工作來超度的一大群低級羣衆。

可是從世界眼光看來，歐洲的稱霸只是最近的事。英國人到這裏來的時候，印度的工業是和英國一樣先進的。印度在英國人到來以前，從沒有作過附屬國。我們吸收了我們的征服者，他們變成了我們的一部份。印度從沒有依賴過其他國家。現在權力的中樞在倫敦，却不在印度。

我看歐洲不論有何輝煌的成就，目前正在竭力自殺——我這樣想，我覺得歐洲文明中缺少着什麼重要的東西，有什麼毒物在毀嚼着它，使它每隔二十年帶一次戰爭來。我們得亞洲縱然落後，可是擁有確實的文化上的穩定——主要在中國和印度……

問題所在，正如它在戰爭開始時在我面前顯現的一樣，是在於如何把這個新亞洲和歐洲及美洲的進步力量聯結起來。我希望亞洲和對希特勒作戰的力量並肩作戰。把亞洲看成附屬品的話，這就做不到；必須在平等基礎上對待亞洲才行。

法國的陷落是這樣驚天動地，這樣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西方帝國主義機構的腐敗，以致我們以為歐洲人的眼睛終於睜開，看到了帝國的危險了。然而他們並沒有睜開眼睛。

之後很久，馬來亞和緬甸淪陷了——這無論如何是對於英國人的一個直接教訓，因為分崩離析的是他們的帝國。令人驚異的是，甚至這樣還沒有什麼效果……

過去以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而言，我們心裏批評政府，但並不使政府煩擾，並不想阻擾對抗軸心國的作戰努力。現在我們從新的觀點上來看問題了——如何保衛印度，使不至受侵犯……顯然地，除非我們告訴人民說他們在保衛自己的自由，他們是不會向這方向走的。

克里浦斯是在那個時候來的……但克里浦斯放在我們面前的圖畫，和現有的乏味圖畫非常相像，也不能使人民覺得他們正在保衛自己的自由，使他們熱烈起來。我們無法使這戰爭成爲一個人民的戰爭。

人們對於克里浦斯的訪印，緬甸的情況以及對待從緬甸撤退的成千成萬印度人的方法，反響很深很大。在印度的命運被人決定的時候，特別是在我們一切的思想，使我們深信英國當局沒有資格保衛印度的時候，我們不能旁觀。如果我們不同意克里浦斯的建議，難道我們就靜靜地坐著

看我們自己的民族崩潰麼？

我們得到了結論，爲糾正計，我們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不讓局面越弄越糟，以致親日的情緒抬頭。

在這樣的領導之下，國大黨進行動作。八月八日，國大黨在孟買舉行的全體大會批准並通過了一些決議，號召全國完全不合作，直至英國人退出爲止。政府在數小時之內就進行反擊。它行使其合法的緊急權力，用新聞檢查鉗住了新聞界。黎明時，甘地，尼赫魯和國大黨的其他高級人員就在孟買被捕了。警察把認爲危險的各地領袖一概找出來加以逮捕。

到明天，全印度沸騰了。領袖人物之被捕，斬掉了這個運動的頭，非暴力的哲學，閹割了這運動。這運動虛無主義式地沸騰到街上去。英國貴族這一回所受的威脅，要比一八五七年大暴動以後任何一次都大。他們嚴格檢查發到外面去的電報，以阻止敵人或英美民衆獲悉這個危險。政府是在爲生存而戰。在首都德里，示威者集合起來，唸着『印克拉勃·秦大巴德』的口號，聚起金色和紅色的大旗來游行。英軍在大街上開槍制止他們。郊外槍聲響澈雲霄，房屋着火，暴民拆倒牆壁，把磚塊擲向軍警。迫擊炮隊出動了，機關槍也架起來監視各街道。政府正式承認會殺死暴動者四十人；據印度人說，被殺人數當數倍於此數。在三天之內，孟買紡織工廠百分之六十關了門，該城被殺者有三十人。一星期之內，幾乎生產着印度全部的鋼的達達工廠也因另一次罷工而關門。亂事如燎原之火，從德

里和孟買出發，燃遍勒克腦，堪浦爾以及恆河上下游。英國人很快地把軍隊集中在大城市里，以壓服火燄的中心。可是到這時候，起義已像癌腫一樣地遍佈農村，幾百個孤立的行動在鄉村中間燃燒着。加爾各答和德里之間的鐵路交通給截斷了一星期；暴民拆掉鐵軌，割斷電話和電報綫。英國人的緊張達於極度。他們甚至把皇家空軍調出來，在地面部隊不能深入之處掃射拆裂鐵軌的游擊隊員。

這起義除了大城市之外，缺乏聯絡和指揮。農民的反應與其說是理性的，不如說是本能的；雖然他們的領袖排斥暴力和死亡，他們自己已覺得這是一個戰爭。他們的攻擊集中在鐵路，橋樑和警察局。他們在發現自己能責罰人的地方，其暴怒是毫無慈悲的。有些警長被暴民用手撕成碎片，還有些人給活埋。軍隊長官出來如沒有人保護，而給他們發現時，也被殺死。有些沒有聯絡的暴動者佔取了整個縣份，並且堅守大片地方，郵件和警察都鑽不進去。國民大會黨對於自己的人员利用武器以及指導人民的力量方面，都沒有準備。該黨只要求以不流血的革命來取得政權，毫不用權力政治來考慮問題。於是沒有計劃的叛亂中心就給英國人逐個擊破。至九月中旬，在印度人數千被殺之後，危機是過去了，帝國的掌握又堅定起來了，如果日本人要入侵印度，就得打仗了，就沒有法子利用革命動力的泉源了。英國人贏了這個賭局，因為出事情的時候日軍並沒有侵略印度，却寧可把自己的力量，徒勞地化在中太平洋上。

由於印度反叛的粉碎，亞洲大陸上的戰爭縮小成爲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日美戰爭是實力的無情比賽，却在遠處進行，日美戰爭規模儘管大，政治意義却小得很，因爲在這個戰爭中，日本一開頭

就註定要失敗的。中日之間的戰爭，形式上很差，其唯一的重要性，是在於這是亞洲兩個獨立民族之間的戰爭。英美在對日作戰最初幾個月內沒有能在自己的力量之上裝一點道德的標準；印度國大黨可能獲得它所尋求的道德上的領導權，却給壓伏了。只有蔣介石的政府還在對亞洲揭示着新世界的希望。

第七章 如此「訓政」政府

中國自稱有一個政府——這「政府」的獲取政權，從來不靠選舉投票，但官員們和宣傳家們喜歡這個合法字眼。他們用國民黨的特別的國家理論來彌補事實和言辭之間的遙遠距離。這個理論也並不兌現，只不過很有趣而已。這理論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在堅持着。根據這理論，中國不必有一個人人民的政府，而只要有一個國民黨監護人民的政府就行。孫中山氏把該黨的責任分爲三期。第一期爲軍政時期，是該黨保衛人民，反對國外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的時期。第二期爲訓政時期，在這時期中，該黨教導人民怎樣管理國家。第三就可能是憲政時期，其時其他黨派也准許活動，而國民黨在選舉中和各黨競爭。

在戰爭時，只有國民黨掌理政府；國民黨就是政府。該黨任命並訓令一切政府官員。該黨控制着國民軍。軍隊里所有高級軍官全須入黨，士兵百分之九十也至少名義上是黨員，每個部隊中都一定有政訓人員。由於政府和黨是一樣東西，軍隊也就是黨軍。國民黨掌握着新出檢查。黨的工作費用是由政府開支的。黨的各部門靠人民的稅款過活。而由於其他各黨都被認爲不合法，批評國民黨就是違犯了國法。

蔣介石的噱頭，就在於他似乎想把訓政和憲政兩個時期同時完成。爲了作戰，他就從人民那裏徵兵及抽取錢款及米糧；爲了做這些事，他利用了古舊而壓迫性的保甲制度。這制度是把農民放在嚴重的管制之下的。而爲了和共產黨作戰，他得加強新聞檢查和秘密警察。同時，他很高興民主詞句和口頭禪。他說起投票和憲法的迫切需要，他答應給農民以更多的自由，但他所做的，往往是限制了他們現有的很少很少的自由。他自己的諾言和行爲總是矛盾的。他的政府有兩個面孔：一個朝着農民，保留着中國封建主義的一切古舊的不民主的特點，另一個面孔扮出來向外面看，對着中國的盟邦，這個面孔是用西洋人眼里中意的東西扮出來的，上面有着訓政，人身保護法，以及民主。

在紙上，這政府是很合邏輯的。中國有一個行政院，管理民政事宜，推行法令，擬訂預算，任命官員，宣戰，締結條約。行政院下面的十一個部長，從西洋人眼光看起來好像是內閣；宣傳部不屬於戰時內閣，而是直接向國民黨負責的。此外有個立法院，外表上有點像國會的樣子，却既不能制定政策，也不能否決議案，其存在的效用，只是用橡皮圖章在法案上蓋蓋印。此外有司法院，管理法庭。中國在三個一般熟悉的政府機關以外加了一個考試院，銓叙各種人員的資格，自律師起至看護婦止。又加了一個監察院，有審查、彈劾和稽核之權。五院之上有個國府會議，除了各院院長都得由該會委員擔任之外，該會的權責是十分含糊的。更高一層則爲國防最高委員會，行使着『最高權力』。而頂尖上則爲擁有戰時『緊急處置權』的蔣介石。

你要死釘着這樣的邏輯，一定會發瘋。美國人習慣於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政府，他們從中國自己

宣稱的各節上來設法了解中國。新到中國的人，力求明瞭實情，努力了幾星期而毫無效果，往往攤開雙手，宣稱中國並無政府，只有一團糟的混亂或軍閥的聯盟，或宣稱全體中國人都是滿清的遺民，或宣稱這一切全然是法西斯主義。所有這些單純的解釋都是錯的。了解中國的最容易的辦法，是首先要決定所謂政府只是國民黨的掩護體，國民黨的政治和派別才是決策的主要決定因素，而黨的後面，是人類最老的統治形式——個人專制主義。

該黨指定一個黨代表全體大會，代表大會選出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委會又選出一個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政府內部無法找到的一切黨內論爭，決定和權力，都在這個中常會之內進行。黨的中常會每兩星期在重慶開會一次，發命令給政府的最高機關國防最高委員會，然後國防最高委員會把命令遞交政府各有關機關。五院院長是由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中執會任命國府委員；中執會控制國防最高委員會；如果中國要選一個新的總統，這總統也是由國民黨中執會選任的。

國民黨的組織仿做着俄國共產黨。在每個縣里，每個部隊里，都有黨部。鄉村中的黨部，則通常握在當地官員和農村貴族的手里，他們才有足夠的閑工夫，或教育，或金錢，來從事政治。各地黨部由縣而省，成金字塔形，省黨部則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基礎，代表大會定兩年舉行一次。國民黨員在中國人民中佔極少數。黨員的義務如下：

所有黨員均須嚴格遵守下列各項紀律：（一）服從黨章及主義，（二）准許自由討論黨的任

何問題，但一經決議，必須絕對服從，（三）保守黨的秘密，（四）不准在黨外人士之前攻擊黨員或黨組織，（五）不得參加任何其他政黨，（六）不得組織派系。〔註〕

上述規則，忠實的黨員多少遵守着前五項。至於第六項，則國民黨實際上有很多派系——有的是保守的，有的是自由主義的，有的只有一個名義。該黨像美國民主黨一樣，是一個龐雜的政治混合物。

黨內最堅固的一派和政府內最有權勢的力量，是名爲C. C. 派的右翼集團。C. C. 是反動的；它反對外國；它離蔣委員長最近；可是它也是國民黨內唯一的從根組織起來的集團。它的領袖有兩人，一是陳立夫，一是陳立夫的哥哥陳果夫。陳果夫生着肺病，在整個戰爭期間，他是委員長侍從室的人事處長，各種文件及尋求委員長青眼的人們，都得先通過他。C. C. 的真正老板却是他的弟弟陳立夫。陳立夫戰前曾任國民黨組織部長五年，組織得很有成績。在黨內真正需要投票解決的任何競爭場合，C. C. 派能够操縱議程，左右問題，並且使自己的候選人衝出來獲得絕大多數的票數。其他各派的力量或則從軍隊里產生，或則由於其領袖們在首都得到寵眷的個人關係。C. C. 派却不然，十年以來，它一直能够使代表們的選票擁護它的要求。選票和黨內多數，還不過是C. C. 派買賣中精良貨色的一部份，此外

〔註〕見重慶中央宣傳部的「中國手冊」第三十二頁

，它還擁有蔣介石的寵愛，擁有蔣氏絕大部份的眷顧，統制着全國的思想，報紙和學校，管理着一個只對黨組織負責的獨立的秘密警察系統。

C. C. 操縱着國民黨大多數的政策和選票，因此也控制了委任下級政府官員之權。它担任着反對自由主義及共產黨運動的急先鋒。在這些事情中，它以委員長親信代表資格行事。但委員長也有自己的一套，他甚至在黨內也採取合縱連橫的做法，使C. C. 不致於得到絕對的控制權。在某幾省內，省縣黨部完全由當地的軍閥主持；有幾個省份內，國民黨很有一些地方色彩。但黨部人員大多數是當地的官僚和鄉村貴族，這些人都是堅決的C. C. 份子。

從極右派的C. C. 向左看過去，第二派的人是軍人集團。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軍人的意見總是批評性質的。如果軍人的意見是統一的，國民黨內部吃黨飯的人也許會倒台。可是軍人分爲兩派，一派是曾任軍政部長十四年的何應欽的軍人官僚集團，另一派則爲青年熱烈的黃埔派。

黃埔派包括蔣介石二十年前在廣州創立的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是一批新式的戰士；蔣的較老的朋友是新國家的建築師，他們則是棟樑。黃埔畢業生在早期的反軍閥內戰及反共內戰中死了不少人。活下來的人，是一個團結緊密集團。時光流轉，他們升了官。在抗戰開始時，整個中國軍隊中的一小部份約四十個師是由黃埔派的人指揮的，到抗戰末年，黃埔派指揮之下的軍隊，達全國軍隊三分之一。一般人承認黃埔派有兩個代言人：一是胡宗南，他是有名的黃埔第一期畢業生；一是陳誠，他是黃埔的青年教官，於一九四四年繼何應欽氏任軍政部長。

何應欽手下的人，由於一向資格老，地位高，是國民黨軍方最有影響的人。但是黃埔派有熱力，有緊密的團結，掌握着將來的前途，投票擁護着自己的主張。這兩派之間，政治上沒有多大差別。兩派都是權力主義者，都相信暴力的聲音可以決定政治。不過黃埔派主張政府應該比較有效率，主張清除壓在作戰努力之上的爛木頭，而何氏的黨羽就只希望維持現狀，維持一切的糊塗和貪污。

在陳立夫不當國民黨組織部長之時暫時代替他的人中，有一個德國留學生名叫朱家驊博士。朱氏痛恨着C. C.。他把黨中能幹和進步的份子聚集在他周圍。朱家驊派不像其他各派那樣有清晰的標誌。它並無明顯的主張。它是右派，但不是極右派。朱氏利用着自己一小派人來聯絡各方，把自己的力量押在主張提高效率一方面的秤盤上。

可稱中間派而接近美國標準的，是政學系。這一派人多半曾在日本或美國受教育，懂得現代商業的方法，要求中國更有效率，希望中國工業發達，並希望中國建立有益於國家的工業。他們主張法治和有秩序的政治，主張建立一個保守而具有流綫型現代化形式的國家。他們之中包括中國某些最能幹的專家，了解應做而未做之事。政學系的主力，是從上海和華北的大資本家之間集合起來的。戰爭掃蕩了這些資本家，也就把政學系力量的泉源剝奪了。由於該系人物的思想明確，不神秘，現代化，由於該系許多領袖能說英語，美國人覺得理解他們要比理解中國其他的人來得容易。蔣介石因為不得不和美國親近，自然而然地漸漸把許多重要職位交給政學系。他們作官時表顯得很能幹而有自制力，他

們夢想着一旦握得政權以及効力的機會時，他們能達到的效率應如何巨大。

國民黨內甚至也有自由主義派。這個左派的領袖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孫氏因爲自己的父親是革命之父，並不懼怕迫害。而且，有着中國幾乎獨一無二的機會，他能够說出他所想到的事情。集中營和苦刑從來輪不到他。他用西洋的方法來思想行事。他要求西洋式的改革。不過他是個學者。他大約是重慶讀書最多的人——是一個絲質的人，不是鋼質的人。他的智力以令人驚異的輝煌，閃爍在中國政治舞台之上，但是他既無力量，又無氣魄來和控制着國民黨的頑固人物對抗。雖然他不會和國民黨決裂，他却具有在內部反對它的勇氣，他公開聲言反對壓迫和貪污，他說了人民所敢說而不敢說的話。孫氏是立法院長，那是一個比較顯赫而比較不重要的恰如其分的位置。他明白黨內進行着什麼事，他利用着自己的地位來促成民主和人權宣言。擁護他的人很多，可是他在黨內的票數極少。蔣介石常一連好幾個月拒絕見他。

蔣委員長以總裁資格統治着整個國民黨。黨員之中獨立不羈而和他的意志不同的人，至多百分之十。少數幾個真正不滿的人聚在孫科周圍追求革命的若干理想；此外有少數人喧嘩地爭鬥，無非在設法邀取蔣的注意。委員長十分注意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這中間感覺少數人的批評，然後在內部會議中和各派領袖一起決定改動內閣或發表政策聲明。有時他丟開了訓政之類的神話，乾脆踏進會場，在黨的常務委員會里宣佈他的意志，然後接受該會恭順的贊同。當C. C. 派似將失勢的時候，委員長竭力迴

護它。當美國的批評太凶的時候，他就給一點甜頭給政學系中一兩個人望頤好的人物，表示他信任政學系。

要恰當地觀察黨的機構，只消看看委員長的私宅。在私宅里，許多秘書在數千名訪客中挑精揀肥，在數千封公文中選擇需由委員長自己處理的報告。接近蔣的耳朵就是接近最高的政治威權。只有他的私室里才能發現迅速的決定，只有他的指令，才能使行政不循腐朽的常軌。即使在紙上，委員長也幾乎具有無限的權力。理論上，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訓令他；事實上，他在訓令中執會，而他也具有合法權力，可以否決中執會的任何決議。他對政府的掌握也是合法的：戰時國家最高機關是國防最高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工作集中在十一個委員的手里，這十一個委員是他所指定的，而他是主席，而該委員會只有在主席召集之時，才能開會。

政府竭力否認這是獨裁政治，可是按照它自己的說法，它的最高機關是這樣的：

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按照組織法，有緊急處置權。主席在處理黨政軍事務之際，不必依照普通手續。主席得視情勢需要，頒佈有關此等事務之法令。但在一般情形下，主席在行使此等權力時，須與常務委員會先行商酌之。「註」

中國政府的最大的麻煩，是在於決策和行政之間有一道很寬的溝分隔着，這條溝的大小，和橫隔

「註」見一九四四年「中國手冊」第五十頁。

在委員長及其發抖的部下官員之間的溝一樣大。高級政策是由委員長支配的，行政則由少數幾個人担任，這幾個人爲委員長所信託，但權力有限，而且行事決不致於逾越自己的有限的權力。

蔣氏把自己的政府分成三方面——軍隊，黨和民政。每方面他付託一個毫無問題忠於他的人管。甚至那三個人之間，也有許多微妙的相互傾軋和牽制情事，這使一切重要的決定，都得交回給他管。然而這個三人執政團的權力即使有這些限制，他們在最近五年來還是委員長一人以下中國最有權勢的人。何應欽掌管軍隊；陳立夫掌管着黨；孔祥熙掌管着民政。這三個人都是圓滑可愛的人物，懂得怎樣逢迎蔣委員長的嚴厲乖僻的性格，以取得個人的利益。孔氏已遠離中年，陳立夫則爲中年人，但所有這三個人都和蔣氏有二十年左右的同袍之誼。

在一個戰爭中的國家內，軍隊是最重要的事務，故何應欽大約是蔣氏三親信中權力最大的人。何氏年近六十，是一個矮胖結實的人，臉圓圓的，永遠很有禮貌，眼鏡後面的眼睛竟彷彿小學教員似的。他的實力的來源，首先是由於他担任着蔣氏的軍事代表之職，其次由於他親自在軍隊中佈置下的政治機構。何氏生長在落後的貴州省，有一個謠言說他是全貴州最有錢的軍閥之一。他曾和蔣委員長差不多時候在日本士官學校求學。和蔣一樣，他離開日本，參加了一九一一年反對滿清的起義。他的真正前程的開始，是在他被任爲國民黨的黃埔軍校教務長之時，這之後，他一直追隨着蔣氏，如影隨形。至一九二七年，他成爲國民軍的參謀總長，一直担任着這個職位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止。

他在軍事委員會九彎八曲的灰色辦公廳裏指導戰爭。他是一個書桌軍官，種種文件川流不息地使他的屬下眼目暈眩。他從抗日戰爭爆發時起至史迪威事件止，兼任着軍政部長和參謀總長。糊塗的指揮以及戰場上中國軍隊的漸漸腐爛掉，除了蔣介石之外，他大約要比別的任何人更應負責。重慶有一時公開談論着團長缺一名，市價若干。中國兵士的挨餓，徵兵的暴戾殘殺，軍餉呈報表裏面的滿是死人名字，一般人都認爲是貪污的自然結果，而直接歸咎於軍政部的各機關。

在軍隊內部，何氏却遠不是公認的領袖。反對他的是戰時長得羽毛豐滿的黃埔派。由於控制着軍需品和軍餉，何氏可以籠罩這一個部隊，苛待另一個部隊，而使依賴他的人漸漸盡忠於他。可是三分之二的部隊是黃埔人物指揮的，他們多半看不起何氏。黃埔派領袖之一是胡宗南將軍。他年紀在四十五左右，指揮着封鎖中共的軍隊以及駐防在受着日軍威脅的黃河渡口上的軍隊。胡氏也許是軍隊一切年齡較輕的人中最得委員長喜愛的人，有人認爲他是蔣氏的繼承人。他像何應欽一樣瘋狂地反共，却嫌惡何氏，並且在戰時不准何氏干涉他個人所管的戰區。甚至錢款，軍需和人事問題，胡宗南也都直接聽命於委員長。他的部隊軍餉比中國任何其他部隊都充足。

黃埔派另一個領袖陳誠，也是陸軍中何應欽的對敵。陳誠大概是美國最喜歡的中國軍官。他是一個瘦子，身材只有五尺多一點點，他的頭髮在一年年地灰白。他在戰爭初期高高在上，很得蔣委員長

的寵信，其時也和中共能合得來，但漸漸地退爲微末的前線指揮官。他在戰爭中期的任務爲保衛長江三峽。一九四三年，美國人把他調升起來，成爲中美共同訓練計劃的指揮官以及怒江前線部隊的指揮

官。陳誠升任此職，激怒了何應欽，何氏看到他的對手由於美國的供應品和裝備之助，變成了軍隊中最重要的物。何氏一怒之下，使訓練計劃遭受了破壞，使怒江前線補充兵到得非常緩慢，使參謀總部發餉給陳誠指揮下的部隊時十分慳吝。直至何氏逼迫陳誠下了台，換了一個比較馴順的軍官來主持美國訓練計劃，這計劃才算一帆風順。

何應欽也好，胡宗南也好，陳誠也好，都對委員長恭必敬。他們在戰略上意見很難得一致，但這三人委員長都喜歡。委員長一個一個地輪流加以撫慰排解，雖然，他總讓他的參謀總長何應欽保持最高的威信。每天出入於委員長辦公室的是何氏；最高計劃和各地視察，也是何氏的責任。甚至何氏周圍掀起了浪潮，部隊的腐化和無效率變得顯而易見，而美國人迫使陳誠上台代替何氏擔任軍政部長之時，何氏依然是參謀總長和軍隊裏的最高人物。

上述三巨頭之中，國民黨的組織家和國民黨C.C.派的領袖陳立夫，輕而易舉地成爲最出風頭的人。他有一張精緻漂亮的臉，眼光如火，頭髮光滑而作銀白色。他柔嫩得像一塊古老的象牙。他是一個無情的，怒火如狂的人——有紀律，無慈悲，不貪污；他反對外國人，他是一個神秘的民族主義者。他沒有個人財產，也沒有人罵過他貪污。蔣委員長和陳氏的關係淵源很久。蔣在上海貧窮時節的第一個恩人，是强有力的愛國家陳其美。陳立夫是陳其美的侄子，由於上述淵源，陳立夫幾乎是委員長的貼身衛士。一九二七年大舉北伐時，陳立夫是蔣的私人秘書，後來蔣指派他爲國民黨組織部長，以清除

黨內一切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色彩的份子。

陳立夫會用情感豐富的辭令來解釋他自己的立場。從他看來，中國最大的危險是共產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是外國對中國思想的一種侵略。他是國民黨內偉大的理論家，他的作品是半生半熟，一半理知，一半神秘的大塊文章。美國人是不可能懂得這些作品的。他以剷除不合於中國古傳統的一切東西，作為自己的大業。他認為西方的工業可以移植到中國的古社會中，而不必擾亂中國年深月久的禮儀和習俗。他像日本人一樣看西方，覺得西方是一種劣等文明，具有現代社會中很有用處的若干野蠻的詭計。他的態度，和西洋旅行家觀察澳洲森林人揮擲飛鏢或非洲人投放毒箭時的態度相同——認為這些是應該研究的有效辦法，但是傳殖這些東西的文化則并無可學之處。另一方面，陳立夫以抒情的情調，歎賞着中國過去的偉大，並且用詩的詞句來解釋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不同。他說，美國人不得不發現新的真理來建國，但中國人只消向後工作，去重新發現舊的真理就行了。他對人們罵他是反動派深痛惡絕，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十字軍，正在設法把中國從共產主義中救出來。國民黨集中營內受苦受難的人們的狂叫之聲以及他的秘密警察加在自由主義者身上的恐怖行動，都不能擾亂他的清睡。

由此可見，只通過傳統的古典主義來看自己國家的一切中國人，可以陳立夫為代表。中國的古典著作把最基本的重心，放在社會的秩序和安定上。統治者必須聰明，而人民必須服從。古哲學家們已為每一個人，制定生活的位置，誰都不能逃脫這位置。各階級之間的關係是有規定的，政府的作用，就在於使每個人按照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作事處世。古典著作依然是拖在中國思想後面的重擔。縱然現

代教育到處風行，中國成千成萬的半通不通的公民，依然把古老的繁文縟節當作社會的準繩，很像美國本源教派以聖經爲個人生活的準繩一樣。陳立夫很能象徵這個相信中國過去的基本信念。中國古典主義的保存者鄉村貴族中，除了陳立夫之外——此外也許除了蔣介石本人之外——再沒有產生什麼人物，擁有強烈的確信，足以抵制現代世界的侵入的。陳立夫和其他大部份神秘主義者不同，具有兩個實際用處極大的條件。一方面，他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受過結實的技術教育，他曾在該校學作鑛工程師。另一方面，他手頭掌握着一個野蠻的工具——秘密警察。他是個兩重性的人。他以人和神仙的語氣說話，他是一個中國古文的能手，他是個精緻的書法家。可是他也能夠捲起袖管，和中國政治上最厲害的角色面對面坐着討價還價。

作爲中國戰時的教育部長，陳氏可以隨便塑造中國人的心。許多大學曾在長途跋涉遷入內地時寫下了學術上的史詩和冒險史；但是這之後，以知識方面而言，是每况愈下的。學生和教授都餓着肚子。通貨膨脹使講師變成乞丐。中國青年的精華已在抗戰初年投身於戰爭；在北方，他們參加共產黨，在華中，他們成爲國民黨的官吏。繼他們而作學生的是一批雜亂無章的人。按照法律，中學生和大學生都得免除兵役。學者比軍人更有面子，也更需要。於是入學人數驟然增多。學生之中有些人，也許大部份人，是愛國的。可是政府教育他們很少，也不大替他們找事情做。陳立夫吹牛皮說他會使學生的興趣從文科轉到工科。戰前中國大學生讀文科者將近佔百分之七十，在陳立夫的領導下，減到百分之五十左右。這個教育重點的轉變，中國各地都沒有什麼爭論，一個作戰中的國家自然需要工

程師比教授多。但陳氏並不以此爲滿足。他在政治知識的科目如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上面建立了一種恐怖統治。大學裏禁止討論政治。學生偵探着自己的先生。學校教職員彼此互相偵探着，猜疑着。

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一般批評政府的學生人數之多，使國民黨吃驚，國民黨於是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作爲該黨的初級組織。青年團踏進了學校。它的經費是政府供給的。一年之內，團員有五萬人。教授們哭泣着學校給毀了，因爲青年團團員功課不及格，不可留級。這青年團的思想和表面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它喊叫着崇拜領袖。它舉行夏令營，在夏令營內，精壯的青年男女操演着，吼叫着德國化的「萬歲」，捏緊拳頭致敬禮。在學校裏，青年團威脅自由主義者和過激份子，要他們不出聲，要他們明白青年團後面是有政府全力支持着的。

陳立夫說他主張學術自由，但和他意見不同的教授們一天天瘦下去，挨着餓。他們講話十分小心；他們的教室是危險的。中國最出名的經濟學家是馬寅初教授，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曾在耶魯大學畢業，有一時教過蔣委員長經濟學。馬教授在學校裏講授了通貨膨脹的道理，這個題目越來越使人發生異乎尋常的興趣，而且不可避免地觸及政府。有一天晚上，馬教授被邀至蔣委員長處吃飯。他踏進了派去接他的汽車之後，前座兩個衛兵遣了一聲對不住，說他是被逮捕了。他在集中營裏和警察看管下過了兩年。但陳立夫堅持說，這不算破壞學術自由，因爲馬教授名義上是個國民黨員，他曾公開批評黨的政策，這破壞了黨的紀律，因此他應受實罰。

陳立夫領導教育部，好像帶領一支軍隊。國立大學裏反對他的教授們倒了霉，設法和他一致的人則風雲得意。陳氏建立了劃一思想的軌道，這和現代中國教育的整個精神是完全不符的。政府已經審完了一切課程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成爲初中至大學的思想的標準。戰前的教科書舊了，給新的教科書代替了，於是中國四方各處的學生，開始呆記着相同的字句。陳立夫覺得遲早之間，全中國都會研讀同一套的思想規程，學習同一套的禮儀，而這一套一套，都追隨着他自己的想法。陳立夫的知識上的偏見，和他的美國黨棍子一樣的組織天才同時並進。他設法使自己的人担任重要職位之後，一定弄得他們服服貼貼，經常用自己指揮的秘密警察檢查他們的忠實性。

在戰爭的中間幾年，陳立夫跳得極高。他的檢查制度使新聞界，戲劇界和文學界在他的指令之下輾轉呻吟。由於戰爭的真相和虛話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檢查官們爲免除政府的煩惱，就把真相壓制不給發表，而創造了一個神乎其神的中國。一個C. C.所指派的宣傳部長會頒發一個正式指令，命令一切作家應該避免現實主義和悲觀主義，應該寫作愉快歡欣的事情。有一張長長的表，列舉了禁止發表文字公開討論的許多題目，其中包括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問題，中蘇關係，動亂中的新疆，對美國或英國的批評，政府的貪污，前綫部隊的痛苦，對農民的迫害等。分析稅項，批評政府財政政策，發表預算或通貨發行數字是禁止的。批評政府任何人員的爲人，家庭及行爲，是禁止的。甚至談談物價之上漲，也是禁止的！

蔣介石左右的三執政之第三人，是孔祥熙博士。孔氏是蔣委員長的大姨子的丈夫。他担任着中國的內閣總理，直至蔣的小舅子宋子文於一九四四年繼任他為止。他是個圓團團的人，面部柔軟，拖着 一個多肉的下巴，這使漫畫家非常高興。他是孔夫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子孫，這是一樁光榮的事。他在約六十五年以前生在山西一個開銀號的家庭裏，曾在山西教書，留學美國，在耶魯大學得到學位，回國變成了革命家。他在參加政治之前，搜了一大筆資本，担任美孚油公司的山西代理人。他的高升，開始於和中國獨一無二的宋家結親之時。宋家的小女兒就是蔣介石夫人，二女兒是已故的孫中山的夫人，大女兒就是孔祥熙夫人，大兒子是宋子文。孔夫人大概的宋家最精明的人。在她的絕非溫和的慫恿之下，她的丈夫變成了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孔祥熙於一九三〇年被任爲實業部長，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銀行總裁，戰爭開始時任內閣總理兼財政部長。他成爲委員長的代表，處理着高妙的所謂政府的機構。

戰爭的歲月對孔氏並不太仁慈。他們家人在香港或美國玩耍的時候，他獨自住在轟炸之下的重慶邸宅裏。他染了瘧疾，得了脾臟病，這使他的個人生活十分苦惱。他是一個和氣的人，他不喜歡吵架或危機，他幾乎能够以一個微笑或一個如泣如訴的故事，撫慰任何事情。他是美國實業員作高壓力的鬥爭時所喜愛的目標。他的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被人喜愛，而和他相熟的人覺得他這樣可愛，以致叫他作爹爹。他是中國青年會的偉大的贊助人。如果作青年會工作，他也許早已獲得了他的飢渴的靈魂所渴望的愛情。不幸地，對於爹爹，權力政治和青年會的規範絕不相同；孔夫子也幫不了忙，而在爲

國家的事業辛勤服務了七年之後，爹爹終於取得了中國第二最壞的名譽。中國人是具有世界上最尖刻的幽默感的人，喜歡當堂出采的事情。他們這位內閣總理的懼內的性格，他毫無定見地主持着的瀟灑了貪污和游移空氣的內閣，他的周圍卑躬屈節的諂媚份子所組成的親信集團，都象徵着老百姓眼裏看到的國內一切荒謬的腐化。

對孔的批評，在重慶成爲戶內流行的遊戲達五年之久。這些批評既針對個人，也有政治作用。孔氏對於個人各方面的事情非常敏感。有一次他問一個美國人人民怎樣說他，那美國人回答進，「是，人們多半說你被拍馬屁的人欺弄，說你一家人貪污得可怕。」孔氏想了一下說道，「不過拍馬屁拍得誠實與否，我是明白的。」對於孔氏其家人的個人批評常常走到遠離真相的荒唐地步。孔的一個朋友說，這些謠言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不是真的，但「百分之十其實比謠言還要壞」。

孔的兒子孔令侃，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就被任爲中央信託局局長，那是政府的主要購買機關。這個年輕人不論在天資方面或訓練方面，都不配作這樣的事情，而他的行爲是無法無天的。

孔府的女性方面並不更好。孔的小女兒（Jeanette kung）是出奇地傲慢的。當美國政府用一架C-54式機把蔣夫人和孔二小姐送回中國的時候，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到達中國後，只剩下回程的汽油。

孔二小姐下令給美國地面人員把飛機翼裏的油箱倒乾，因爲她自己要這點汽油；美國陸軍人員自然拒絕，她就大怒。當孔的大女兒（Rosamund kung）飛到美國去結婚的時候，她父親徵用了一架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替她運嫁粧。孔夫人直至珍珠港事變時止，一直住在香

港；這之後，她在重慶稍稍逗留了一下，就在一九四三年飛到美國去和蔣夫人一起住。一直留在外國。她是個對於金錢感覺極強的女人。和她在上海紗布市場中的秘密活動一樣，她另一樁財政活動是普通的商業航空員。但是她的大買賣如操縱外匯等，是商業史上大事件，不過這其中包含着的巧妙事實，只有這位財政部長太太自己明白了。孔府一家人的行爲，使慘痛中的民族啼笑皆非。孔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不喜歡毒刑，集中營和暴力，而在外交事務上，他主張親近西方民主國家。使陳立夫成爲如此危險的罪惡性格，他一點也沒有；可是中國人民看到他是一張滑稽的諷刺畫，和他們從事戰爭所爭取的東西成爲強烈的對比，因此他們恨他。

對孔的政治上的批評，同樣地尖銳。蔣委員長是行政院長，政府的最高領袖。理論上，他的副手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但事實上，軍隊和黨隨自己的高興作事，而孔位置不高，不過是推在前台出場而已。行政院即內閣，每星期在重慶開會一次。該院甚至在例行公事方面，都很少實際的權力。委員長餘剩下來的權力，屬於國防最高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常會。各部部长遵從其上級各會議的領導，自己幹自己的，孔管不着。舉個例，孔氏就不能控制當時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外交方面的一切事情，或由宋子文和委員長商酌決定，或由委員長和他的廚房內開商酌決定。孔無法對行政院中的軍政部長行使權力。他也不能和教育部長陳立夫爭辯。他甚至無法指揮省政府，各省的主席都是委員長親自依照各地的權力和政治平衡的原則指定的。

有時，民衆批評的一陣勇敢的浪潮或美國不贊成的壓力，會偶然地逼得內閣稍加改組。那期間孔

氏就一點權力也沒有了，改組內閣的是蔣委員長。而委員長改組內閣的方法，和美國孩子玩音樂椅的遊戲一樣：琴聲一響，各人換坐別人的椅子。委員長的遊戲的獨特之處，是在於椅子的數目總是一樣，遊戲的人數也總是一樣，每個人都不會很久沒有位置。委員長相信的人極少，這極少的人總是單調地輪流担任着各種職務。如果一個部長因特別醜惡之事而被迫離開內閣，他通常就變成其他機關的秘書長之類，過一時又會重新出現，担任另一部的部長。外人是很難插足的。

孔氏心腸很好。他頒發良好的命令減輕災荒省份的賦稅，並指撥大筆款項以應臨時緊急的需要，但是他一簽發了命令，就覺得萬事大吉，他的許多好主意這就流產死在重慶。他的主要職務是以金錢供給政府和軍隊。他是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央信託局董事長，後來又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要使中國站在多少堅實的基礎上，就需要蔣介石來決定的基本政治措施。要壓倒囤積穀子的地主，要建立累進稅制，都需要有力的社會領導，那恰恰就是國民黨所壓制的東西。中國人對於稅款的典型態度，反映在政府通訊社下列一則新聞里：『海外部長張道藩氏封翁最近病故，遺產約十五萬元，張氏爲民表率，已自動繳納遺產稅。』

孔氏無法觸動政府和人民相遇的重要關鍵——鄉村征實稅。收稅員一大羣，共約三十萬人，通常是地方上委任的。政府的威信，就依靠這些收稅員剝削榨取的能力。孔氏另尋了一條容易的路子：印鈔票。中國的通貨發行額自一九三七年的十五萬萬元增加至一九四六年的一萬萬萬元。物價隨着通貨上升，至對日勝利時，物價比戰前高了一千五百倍。人民爲了通貨膨脹罵孔，經濟學家們私底下嚴厲斥

責他。他却不過聳聳肩頭，不憂不急，信任着他的印刷師傅。只要他能够生產足夠的錢款，蔣、何和陳都會高興他的。他用嚴格統制外匯的辦法，維持了美金一元等於中國國幣二十元的空架子的匯率。這個匯率和實際無關，在他當政之時，黑市匯率高至六百對一，後來又上升至三千對一。孔氏堅持說，只要官定匯率維持着，就沒有通貨膨脹。「如果有人願意用兩萬元買一自來水筆，那是他們的事情，那不是通貨膨脹，」他有一次說，「他們發了瘋，如此而已。」

孔氏固執着維持官價二十對一的匯率，並不是沒有狡猾成份在內。美國陸軍建築房屋和基地時，須用中國國幣支付，他們不能在黑市中以四百、六百或八百對一的匯率來購買中國幣，而須以官價二十對一支付。中國物價飛騰，故美國政府凡有所建樹，其價格也跟着飛騰，直至最後建築一個空軍基地需費美金四千萬元，造一個竹頭的廁所要美金一萬元以上。中國政府以自己的名義存在紐約的美金於是越積越多，而美軍購物時收到的錢越來越少。在美國陸軍拒絕繼續按照這協定行事的時候，中國財政部已積聚了美金數萬萬元。在嚴格的商業意義上講，孔氏爲他的政府做了漂亮的一手，可是長期看來，這是一樁圖眼前利益貪小失大的事情。駐在中國的一個美國士兵都知道這個敲竹槓的匯率，都覺得美國受了最無恥粗魯的欺詐。我們的兵士對巨大的開支覺得憤恨，而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帶回美國的憤恨之感，在政治上價值之高，決不是中國在紐約所存的金元可以償付的。

孔氏需要幾個好人來做點事情，但是財政上的混亂，使政府中有效率的人員覺得自己在泥沼中跋涉。孔氏挑了蔣廷黻博士，中國最光輝的人物之一，作他的預算局長。蔣氏奮勉從事，審查着彼此鈔

鬧着的各部會送去的預算。他給CC罵爲粉紅色，被外人罵爲孔的人；而當壓力加諸孔氏，各種開銷往往不得不乖乖地拿出來。蔣廷黻起草了國家預算，那是大家知道的秘密，但任何人都不得公開發表。在這預算之外，蔣委員長有一筆『特別開支』的個人預算，據說，那數目和國家預算差不多大。委員長常常簽發高至數萬萬元的大支票，送給他的寵臣，政府銀行於是就得以正式預算的同樣的鈔票支付之。至於蔣廷黻自己的預算局，甚至一位闊人到委員長那里取得了兩倍於該局原來的經費，蔣廷黻還是做不成什麼事情。政府低級官員的官俸遠落在通貨膨脹之後，這使他們別無他法，要就是挨餓，要就是貪污。薪俸通常是用額外津貼來支撐的，這筆錢要在國家預算以外設法。額外津貼使官員能够生活，使他們的工作比較誠實，但也使他們更其依賴頂頭上司的喜怒，那些頂頭上司也得諂媚自己的上司，一直諂媚到蔣委員長止。

在蔣廷黻之外，有兩個潔白無比的能幹人，站在緊要的位置上。一是翁文灝博士，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一是俞大維將軍，軍需局長。翁氏管理着一批沿海救出來的工廠——煉銅廠，煉鋼廠，電廠等。俞氏指導着兵工廠，以槍砲子彈供給中國的部隊作戰。俞氏得到的錢極少，不足以購買翁文灝的材料以生產軍火。而翁文灝要不破產，也不能降低出售材料的價格，因爲他的錢款也太少。因此，煉鋼廠的機器只有百分之二十轉動，製造軍火的器械躺在防空洞里不動，而前線士兵因爲缺乏軍需品，對孔祥熙以下的人誰都咒罵。

當經濟危機使生產只好停止的時候，在一個嚴肅的會議席上，孔祥熙認真地建議叫軍需局長在兵

工廠里生產香煙製造機，把香煙製造機賣掉可得大利，然後用來製造軍火！這政府就是這種樣子的。

第八章 人民擁護蔣介石嗎？

任何觀察家都可以看到，這幾年戰爭對蔣介石是够仁慈的。他臉上的紋路沒改動過。永遠是白淨的，永遠是裹身在一副嚴謹的甲冑里，彷彿恐防大家細察的好奇心侵犯他的人格，所以要保存得穩穩當當似的。在很多羣衆集會的場合，他都只講幾句短截的，用高亢的浙江口音尖聲發放出來的話。沒有人見過他爲可愛的人羣中閃爍着的感情而激動過；也沒有人見過他在起伏的歡呼聲中，除却徐徐微笑，或頻頻點頭以外，會有其他的動作。

只有在感情震動得最厲害的時刻，他才會在公衆面前把自制的鐵幕稍稍揭開，讓人們看出其中的真面目。一九四五年八月，蔣安靜地坐在重慶的一家擁擠的無線電台里，等着向中國的人民宣佈戰爭已經結束。他像他向來那樣，非常專注地裝扮過。頭修得乾乾淨淨，沒一根細毛可以洩露秘密，證明他的頭髮在轉灰色。他的卡嘰上衣毫無污蹟，也不加什麼修飾，緊緊地一直扣到喉頭，腰束着一條珉勃朗式皮帶；自來水筆則夾在口袋上。室內很熱，二十多個人都溜汗了；只有委員長像覺着涼快。他略爲動動他的玳瑁邊眼鏡，斜睨一下放在他面前桌上的紅花，再慢慢地轉過來對着麥可風，用他清朗而高亢的聲音對人民說，勝利已經贏得了。他講話的當兒，屋外的播音機便把消息傳出來：羣衆認得

那輛引人注目的汽車，開始集中在石屋的外邊。他可以聽到微弱的歡呼的聲音。

蔣在十分鐘內便講完了。然後，突然地，他的頭垂低；濃黑的眼下，眼皮因睡眠不足而顯得腫；瘦削的身體的各部肌肉，也因極度枯竭鬆弛下來。一剎那間，他的穩靜的外貌像給什麼刺了一下，疲勞與力乏在勝利的時刻突圍而出，把真人畢露。但這種心境一來便又溜走了。於是他便步出廣播室；經過人羣時微笑着不時點頭，然後迅速趕回家中。看着他通過群眾下樓梯到汽車上去的人，沒一個能知道他是剛在民族敵人失敗後，便在同一晚要發動全部機構的齒輪，使國家重新陷入內戰泥沼的人。

蔣個人的自制，是使人明瞭他那複雜而含蓄的性格的最重要的一條線索。這性格是由一種暴烈的，風雨飄搖的生命來的，而且，正如他的權力的貪慾，他的無情的計謀，他的無比的頑固一樣，已經不只成爲一種個人的特質——而是一種國家政治中的力量。蔣的性格反映出中國歷史上最騷亂的二十年，它同時又歪曲了它們。

約六十年前，蔣介石生於一個浙江小農的家庭，那家人是屬於村里統治的一羣的。那時候，中國正進入一個史無先例的混亂而多災多難的時期。他的童年是很不愉快的。他五十歲生辰時那樣寫道：「余九歲喪父親……當時我家淒慘情況，非筆墨所能形容。余家孤立無勢，即爲他人諸多侮辱及虐待……若非余慈母艱苦支撐，家中即不免完全破產。自余九歲迄廿五歲，十七年之久，余母無一日不料理家中煩瑣之事。」

在蔣的童年時代的中國，政府外國勢力的加緊壓迫，每次都作讓步。蔣看到了民族的危難，大爲感動，乃立志做一個軍人。他在日本受了短期的教育，回國後，參加中國第一間在保定設立的軍校的入學試。他考得很好，取錄了，並且在一年之內，成爲校內的一名卓越的生員。他是保定軍校一九〇七年選送到日本受訓中幾個人中的一個。在日本，他不久便以士官學校學生資格被選拔到一個日本野戰砲兵團去服務。他不喜歡日本，後來他對當時在那里的工作大加譴責。但是他可喜歡軍隊生活的。有一次，他對一羣不大願參加他的軍隊的中國學生說：「當我年青的時候，我決定要去當兵。我一直相信，參加軍隊是人生的最高的經驗，也是革命行動的最高的形式。現在我所有的經驗、學問、精神和人格，都是從軍事訓練和經驗得來的。」

他在日本的時候，像其他有思想的學生一樣，受孫中山的新的強大的中國的啓示所激動。一九一一年，他回國參加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這第一共和國後來證明只是一種笑柄，他就跑到上海去；他在那里到底幹什麼，是一件衆議紛紜的事，因爲官方的傳記都急急忙忙地略過了他這段時期的生活。雖然，人們知道有一個革命家叫陳其美的幫助他，這個人是陳氏兄弟的叔父。一九一五年，蔣參加了另一次奪取上海附近的江南製造局的苦迭打。事後同志們——這些人現在仍然是他的親信——都逃亡出國，只有蔣隱居上海某處的陰暗的下層社會里。其時他的生活忙碌，艱苦，面臨着危險，飢餓和人們的遺棄；後來他又當了短期的小書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工作。那時候上海的下層社會是衆所共知的青幫天下，青幫控制着全市買賣鴉片、營娼和勒索諸業。它起源於城市裏，幾世紀以來一

他們去發不義之財，私運鴉片煙也好，乾脆的雙重稅制也好，只要他們肯履行他抽新丁來補充軍隊，和徵穀來完糧的要求便得了。蔣和這樣的敵人作戰多年了，他懂得怎樣去操縱他們。

一九四四年，人們對蔣的批評顯然傳染到重慶來了。甚至那些把蔣看成是中國的活的化身，是潰敗流沙中的岩石的人，也認爲這位『老先生』不無過失——認爲他也像其他的領袖一樣，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一種愈來愈厲害的反蔣的情緒是：中國比蔣更重要，而蔣本人却是癱瘓的中心點。有這種看法的人相信，蔣的政治平衡法和委任術損害了中國的元氣，因爲他不能平衡腐化、反覆、和勒索，來獲得力量。力只有在人民中才能產生，而蔣的聯盟却是把他繫在和壓迫人民的人一起。蔣如是他憤怒的藥瓶全倒在這群黨內和黨外的沒有組織的批評家身上。不論你多腐化，他都和你處得來，只被尊重他像他尊重他自己那樣；誰若不肯接受他以自己等於中國這公式，便會被目爲無賴漢，便要耍你索出來，交給他的秘密警察用恐怖手段對付。有些恨蔣比愛中國的心更強的人，投降了日本人；其餘的要到外省去找一個隱蔽之所，幹私人的事，或者轉到單調的官僚政治的低層去。無論如何，除掉很運氣的幾個以外，其餘的人全得當心他們說的每一句話。

有權利說話的幾個，有些是國民革命中極有聲名的人。慈和的孫夫人，國民黨首創者的未亡人，說話有鋼鐵般的勇氣。她從不公開攻擊蔣，但她也從不隱瞞她對國家現存的腐敗和分裂的情況表示痛心。她依然保留着昔日國民黨賴以得勢的所有的革命意識，她悄悄地支持困危中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團體。孫科博士呢，他要講什麼話從來不猶豫，對蔣當面講也好，在公共場合講也好；蔣可以從外國

的觀念。他是在一個叛逆和暴烈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在他之前的同時代的軍閥幾乎對所有的人類禮法的標準都破壞過；他們除了權力外什麼法律都不遵守，而蔣在這種玩弄權力的把戲上，又比他們都高明。暴亂的幼年教會了他對戰敗者不稍存憐惜之心，而征服者只要他的部屬無損，便會永遠做征服者。當一九二六年他從廣州動身北伐，準備去攫取長江流域時，他已經熟悉了所有的收買人和殺人的藝術。

從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成功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之間，整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中，蔣介石的這個脆弱而帶深思的面容在中國的生活里變得愈來愈大，愈有意義了。蔣是很狡黠的——只有一個狡黠的人才能從暴徒出身，做到一個願意和能夠和日本帝國爭戰的領袖，而在這上面建立起他的權力來。他懂得怎樣向上海的商業世界吸取金錢和實物的支助；他同時又會使中國幾個最不壞的學者參加到他的政府中來。當他騎上革命的浪顛戰勝軍閥時，便已獲得了權力，浪潮退却了，但蔣又把他的勝利在新的基礎上鞏固起來。他仍然講到國民革命，但事實上包容人民意志的一個革命却避開他了。蔣並不依賴廣大的農民對他的感情，他是依賴軍隊和它的槍枝的。

對日戰爭使蔣介石幾乎成了半個神。戰爭爆發後短期內，他是被目為全中國反抗侵略和爭取自由的意志的具體象徵。又一次，如像他在大革命的時候一樣，他就等於中國——執行着中國的意志，不容譴責、批評、甚或勸告。

用美國人的標準來衡量，蔣的生活是儉樸的。他早餐的時候只吃新鮮水果，烤麵包和牛奶。在外

交場合下，他的廚子便給他燒幾樣中國的珍珠，但是在家裏和蔣夫人在一道的時候，委員長只吃很簡單的食品。他不大運動，却愛在鄉間散步，散步時由一隊衛士在周圍保衛。他常常背痛，那是他在西安事變時得來的，之外，他的假牙也不時打擾他。中日戰爭期間，他鑲的那假牙是華西的一個加拿大傳教士給他安上去的；它使他覺得不大舒服，在家裏走動時便把它脫下來。有一次，他只好取消了所有在公共場合露面的機會，因為假牙正在修理。除却這些不重要的刺激外，他的身體是健康的。他常常都像端整而有信心；與人談話時，只有他的腳神經質地顫着；不斷地從喉頭發出「好，好」之聲，顯示出那時常在他心內騷動着的神經的緊張。

作為領導全國抗戰的領袖，他還是苛刻而無情的，雖然他裝得很神聖的樣子，並且成爲一個虔誠和實行教規的美以美派教徒。他說的話，有如清教徒般的懇摯，而他的兇暴却正是舊約中的耶和華。他每天都讀聖經，對於罪惡，他像試驗過它，並發覺它不如虔誠那樣有好報應，而向它緊張地蹙起額來。他不抽煙，很少喝酒。美國官員在正式的宴會上看見過他恢復從前的老樣子，非常熟練地倒起酒來，但在中國人中間，他却是個苦行者。中井領袖毛澤東到重慶會商停止內戰時，蔣舉杯勸酒給他，但只把酒杯碰碰嘴唇。

蔣是清廉的。但是中國人指出，一個要什麼東西便有什麼東西的人，是可以誠實得起來的。政府供給他一筆無限制的預算，一大批汽車，無論到那裏他都住最好的房子。美國人送給他一架私家飛機。在重慶他的總部範圍內，他有一所大房子；長江的對岸，還有一所宏麗的邸宅，他常常坐私有的小

汽船到那邊。戰爭的後期，他在重慶郊外另一邊蓋了好些別墅，稱之爲自己的「山洞」，把其餘的拿來招待外賓。這些房舍，根據美國的標準來說雖是平平而已，但以四川而論，它便是宏麗的了。其中甚至有銘瓷磚的浴室。在某一招待外賓的別墅——後來赫爾利去拜訪過的——工人把進門大路直鋪到浴室的門前，這使得他們大爲驚愕。

現在，統治着中國的蔣是高於所有的平民的。有一種謠言使他非常激怒，這是他早二十年前也不願意聽的一種謠言。重慶曾經傳播過一個故事，說是蔣夫人不在家時，委員長和一位姓陳的女護士同居了，她是給他燒家鄉菜的。這故事是沒什麼根據的，可把蔣氣壞了：他召集了他的閣員，外國使節，和兩個記者來，當着蔣夫人的面前宣稱他是信仰基督教的，他只愛他的太太，他完全否認那謠言的真實性。即使在軍事大潰敗的最危難的那個月中，這次花園懺悔依然是重慶人談話的頭等資料。委員長關謠的半官方的抄本如果你要的話，也能從政府那裏得到。

新生活運動是蔣把他個人成熟了的信仰和愛好加諸人民身上的一種更自動的方法。新生活運動反對奢侈、抽煙、喝酒、跳舞、鬚髮、賭博、在街上吐痰等。警察常常要人家遵守這些規律，他們不讓路人在街上抽煙，告訴人不要把菓子皮丟到陰溝裏。這類突發的虔敬不久便成爲過去：，在高級官場中，它被看做是蔣個人的弱點。雖然蔣夫人很喜歡抽煙，但委員長却最反對西式的浪費。重慶是直到一九四三年才舉行舞會的，因爲那時美國駐軍那麼多，以致禁例無法再實行。中國人在不是陪着外國人的場合，仍不得跳舞；有一次一家私人的房子因跳舞被搜查，最後的一個美國兵離去後，客人都被抓

起來。

沒人曉得蔣介石在對日戰爭中究竟把持着多少個職位。有一次他的秘書說他至少身兼八十二職；那秘書以為從別處可以得到一個完全的表格，但他從不會編好一個。宣傳部做過一個，但是不完全，其中說到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海陸空軍大元帥；中國戰場最高統帥；國府委員會主席；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中央計劃委員會主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主席；新生活運動社的領導人；憲政促進委員會主席；中央訓練團團長；革命先烈遺族學校校長；全國滑翔協會的主席等。（註）

（註）此外，他還同時兼任着航空委員會委員長，中央政治學校校長，中央軍官學校校長，中央警官學校校長，空軍幼年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四行聯合總辦事處處長，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委員，中國航空協會主席，全國精神總動員委員會主席，中國空軍學校校長，國立中央大學名譽校長，中央青年幹部訓練團團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中國紅十字會名譽主席，中國童子軍協會名譽會長，中央憲兵學校校長，騎兵學校校長，砲兵學校校長，工兵學校校長，軍需學校校長，機械化部隊學校校長，通訊兵學校校長，西北特別武裝聯合學校分校校長，特別武裝幹部訓練團團長，幹部特別訓練班主任，中央幹部訓練團團長，西北游擊幹部訓練團團長，西南游擊幹部團團長，輜重學校校長，兵工技術學校校長，軍醫學校校長，獸醫學校校長，測量學校校長，憲兵訓練學校校長等職。曾有多次，他兼任過行政院長和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等職。

首先，蔣介石以爲他自己是個高明的軍事領袖。但雖則他是領導全國作戰的軍事領袖，他可不是個戰略家。一九四四年魏德邁將軍來華時，發覺中國士兵泰半處於飢餓狀態中——不是營養不良，而是實在的飢餓，而蔣氏守也好，攻也好，都沒有有效的全盤計劃，不禁大爲震驚。對於估計日軍或在日軍攻勢未到達之前事先移動部隊去防守，蔣部是不很行的；他總是在戰場已開闢後才派遣部隊跋涉千里到前線去，這就不能完全說是因爲日軍有機動的方便了。美國的官員在總結他的戰略時那麼說，「對聲東擊西這種戰略，他還是個乳兒呢。」

蔣又以爲他自己是個好軍人，但他真正的天才却是在政治方面。自古相傳的討價還價的技藝，沒有人及得上他。他是平衡勢力的大頭目，他把中國統一，並保持着它的統一。如果他的士兵肚餓，那正好，因爲這樣他才能出價錢，使那些不可靠的將官效忠於他，他們是以士兵的死亡來獲利的。如果他送上戰場的士兵在沒聽到槍炮聲之前便死去，也是一種使或者會向他挑釁的司令官的力量減削的好方法。

蔣是個政客，應用勢力比應用觀念要多得多。中國的任何觀念，只要和他的不同，便被他視同仇敵。無論在黨內或在政府內，他堅持着人人都要完全無條件地效忠於他，儘管你誠實，有經驗和能
力你不能缺乏這一資格。又因爲忠心包含着投合的意思，蔣便成了個聖人。照中國的傳統看法，學者是最受尊敬的，而在中國人眼中，大統治者便是個最偉大的老師。蔣的公共演說開始有點像教員管教他的學生一樣；他三翻四覆地說，「要忠心；努力學習；努力工作；愛你的國家。」每一國家大事都

是他決定的，於是他慢慢相信起自己的學問和判斷來，以爲自己比他。何一個下屬的人都強。

通貨膨脹成爲中國的最大問題時，有一位政府的高級官員譏諷地說，『中國的困難是在於委員長一點也不懂得經濟學，他的財政部大臣也是一樣。』但奇怪的是委員長却寫了一本經濟學的書。那是一本空虛而又含糊的書，充滿了無知的理論，連他自己的御用學者都要受不住；在政府里頭的較聰明的人，便大着胆子把這小冊子收回來，不讓它散播出去。由於禁售，反而使得它成爲收藏家上乘的資料。一九四二年的秋天和一九四三年年初，委員長在他的鄉間邸宅化了好些時間來潤飾他的傑作『中國之命運』。那本書大部分是他一個私人秘書寫的，可是其中的意思和最後的註釋倒是他自己的。這是一本無所不知的教本，包括了中國人的人類學、民族的歷史、和它未來的復興。他的顧問先生們看到他對現代中國歷史的解釋非常驚訝，因爲那是惡意地、不分皂白地排外的。他把民國初建立的軍閥橫行、賣淫、私運軍火、抽鴉片、盜匪載道以及一切殘暴的混亂，一起歸咎到外國人身上；他甚至爲外國傳教士和他們所創設的大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悲嘆。這本書在沒有『撤回修改』之前，已售出約五十萬本，關於修改，『撤回修改』可能是蔣夫人堅持使然的。同樣地，即使因爲新聞檢查使任何外國記者都不能獲准從書裏引用他的話語，它也成了蒐集家的好材料。

政府、軍隊和黨都成了他自己的私有領地，蔣的好奇心和狂想於是也降到了最低的水平。有時候他大聲詈罵，有時候他處罰人家，又有時候他教訓人家；再繁瑣的小事他也有興緻去作決定。他去看完了重慶出產的戰時唯一大影片，范士白的驚人作品譯成中文的『日本間諜』試映後，立即把片子送

回電影公司，他個人的訓示是要片中多加插國民黨的事蹟的鏡頭。宣傳部長有一次穿了長衫去謁見他；蔣說宣傳部長太年青，不該穿舊式的長衫，也該穿西服才對。蔣決定誰該去美國，誰不該去；又決定官辦的新聞學校畢業的學生誰該取得學位到外國留學。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埋怨伙食不好，委員長便跑去那兒和他們共餐一次；他說伙食已經不壞了。

他的部隊在曼德里北部作戰的時候，他致電給史迪威將軍說，「我聽說曼德里區西瓜很多。中國兵喜歡吃西瓜。你看是否可以讓他們每連每天吃一個。」他向前線的將軍發命令，硬要他們辦些無關緊要的瑣事，毫不顧及中國交通的極端困難。每天他讀重慶的報紙，記下一些使他高興或使他不快的小東西來。史迪威將軍被送走的時候，委員長要人把所有外國記者的通訊都譯成中文，由他個人來加以檢查——全無遺漏。他的命令有時寫在小紙條上發出；有時發出後他又忘記了，以致互相矛盾。比方他初時寫的是：「本年各省政府徵實工作務先辦妥，」但不久另一個命令又來了，那是：「續征新兵爲本年各省政府之首要工作。」

在外國人看來，他外表的謹慎證明他的穩重，這是一種在一個瘋狂的社會裏的相當有理性的品質。但是有時候，蔣也會從他那無表情的鎮定一變而爲盛怒，他會摔茶杯，捶桌子，尖聲地叫喊，像一條兇猛無比的毒蛇。要是他碰到一個稀有的不甘在他面前示弱的人物如宋子文的話，結果必定是很富有戲劇性的。一九三五年，蔣宋會激烈地爭論過關於中共的問題，結果是宋在以後的若干年都不得干政。一九三八年，英國大使卡爾爵士設法使他倆會談；這一次和前幾次一樣，亦以爭吵結束。一九四

四年初，蔣再遇到宋，後者失勢的放逐又被延長下去。一九四四年夏天，蔣正在鄉間散步，看見一個官長領着用繩索網在一起的壯丁走過，大爲震怒，他痛打那官長，要非有個衛士去把人救過來，便不得了。於是，他也想起中國抽丁的可怖，立即召見了主管的將軍，一點也不留情地鞭打他；第二年的春天，那位將軍明正了典刑。

受過西方訓練的高級官員們都曉得委員長不是一個能幹的行政官。在私人談話中，他們承認他的許多錯誤，但常拿他這些地方和他的唯一的大優點來比較——這優點是他要繼續作戰到日本被擊潰爲止；其他的人或許失望了，疲了，但他就是中國，他是從來不逡巡的。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保持着中國政治上的平衡，安排得很好，同時依然繼續抗戰。他打發他的軍隊去一齊打敵人，好讓他們不來打他；軍閥們都給他那些機巧的委任方法撫定下來了；不喜歡的人也支持他，因爲他被世界公認爲外國對華貸款和供應的正當的承受人。他利用地主對他的忠心，來控制鄉民的無比的不幸，他答應實行改革，來避免美國的壓力。

一九四〇年夏，士氣降到最低點。一切都不如意。日本人日夜來轟炸，晴朗的天色，帶來敵人的飛機，也晒乾了田裏的稻，帶來飢荒。日軍當時在越南；美國政策還猶疑未定；英國人則宣佈封鎖漢緬路。蔣大聲叫出來了：「你們打算盤吧！你們算算我們有多少軍隊，有多少發彈藥，有多少加侖汽油，但是我可不在乎。十七年前我開始的時候才有軍校的二千學生。那時美法英日都反對我，共產黨也比今日更強大。我沒有錢，但是我向北打敗了軍閥。我統一了全國。現在，我有三百萬人馬，半個

中國，而英美又是我的朋友。讓他們來吧，要是他們把我趕到西藏，五年後我婆回來，並且再征服全中國。」在蔣看來，這是他的戰爭，他的敵人和他的責任。他並不是回顧三年前開始的對日戰爭，而是回顧他個人發蹟以來的十七年。中國，就像從前廣州那小小的軍校一樣，他看做是自己私人的。

對於唯一的一羣他不能控制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他的感受也是個人性質的。只有中共有組織，能不服從他。他們有自己的地區，自己的軍隊，蔣的勢力把不住他們。他們公然反抗他，所以，在他心目中，中共不忠於中國，他恨他們。一九四一年他說過：「你以為這些年我不讓日本人擴張是最重要的嗎……我告訴你，不讓共產黨擴大是更重要的呢。日本人只是皮毛的病；而共產黨却是心腹之患。他們說願意支持我，但暗地裏他們要把我傾覆。」他的戰爭是個人的戰爭。對中共，他記得清清楚楚，就像他在中共長征時最後一次看到他們一樣。他會命令他的機師幾小時地駕駛追隨那漫長的蜿蜒的道路，那中共的長征將士飛越過的小嶺道路，好使他能下望監視着他們。

要說出什麼時候人們對蔣的領導的忠誠開始崩潰，是很困難的，但重慶的軍閥和各地的農民幾乎是同時生離心傾向，這點却無疑問。一九四三年年底，各戰地司令長官的總部里公開表示對他的不滿，其中好些會和蔣在過去的内戰中交過鋒，這次肯服膺他的領導，也不過因為日本人的威脅更大而已。在西南，兩廣的將軍們對蔣時有不平之鳴，並且毫不隱藏他們的憤怒，讓它傳出他們自己營盤外去。當他從前是另一個戰士時他們已認得他：在他們看來，他不是個神，而是個該幫他們找錢和接濟他們的同夥。對西北、四川、雲南新疆的獨立軍閥，蔣是用名譽爵位作酬報來籠絡住他們的；他聽任

直是中國盛行的秘密結社的一種。這樣的一種團體在西洋是沒有類似的；它在這個大而亂的都市的貧苦下層中植了根，看到合適時便打發它的打手，用暴力來保護它的顧客。這種有組織的勢力，甚至比警察還有力量。他們是激烈的暴徒呢，還是毫不客氣的盜匪，是常常不易辨別的，他們在這兩個世界中隨便走來走去。沒有傳記家能準確地將尋出蔣和青幫的關係到底到了一種什麼程度；但每個有見聞的中國人都不會否認他們之間確有關係，中國革命的歷史也不能不記載下，每次上海有危機發生，青幫總是支持蔣的。

從上海的霧裏走出來之後，蔣介石便大踏步向前，在廣州投身到白熱的中國的國家政治裏來，時爲一九二四年夏。他到底又怎樣以他從前那種毫無分文，依靠上海旅館老板而生活的身份，達到這樣優越的地位，這點人們也不清楚。短期內，他在一個福建的軍閥底下做事。他在上海的朋友把他薦給孫中山，孫先生便在一九二三年派他到莫斯科去學蘇聯的軍事技術。蔣回國後到廣州，對蘇聯極不信任，但却狡黠地欣賞起一黨國家的辦法來。當日的廣州正充滿新的力和新的觀念。國民黨的領袖爭論着，頹頹着。密謀消釋後，他們重又在政治上聯合起來。留廣州的兩年中，蔣從來不會在一次爭鬧中輸過。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他發動了反對黨內左翼分子的，他的第一次成功的武裝突擊；那真是件合時的傑作。孫中山死後，他襲取了黨領袖的職位。

往後二十年，中國和蔣本人都變了，但是他在國民黨內的優越地位從來不會受過任何嚴重的威脅。他現在唯一的熱望已變爲，而且依然是一種凌駕一切的權力貪慾。他所有的政治都圍繞着他的權力

和本國的新聞中把它的控訴檢出來不准登，但他止不住他說話。宋子文也是太胆子大，太突出了，簡直就嚇不住；要他不說話，除非又把他接回來當權。

一九四四年連農民對蔣介石政府也有表示了。在每個村子裏，他的相片高掛在政府的辦公廳牆上，他的名字依舊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象徵，但對於在農民中執行他自己意志的人，大家都感到憎惡而且恨之入骨。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已有農民暴動滲入省城的消息傳來。這些消息——半是謠傳的，半是真實的——從每個角落傳來，從遠離中共影響的區域傳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鄉村，上百上千的鄉村中，散播着不滿。貴州、甘肅、福建、湖北都有民變。四川的鄉下，則有暴動——憤怒的，組織散漫的，無法平息的暴動。蔣活在一個日益暴烈的國度里；這一類的壞消息使他狂亂了。他的脾氣那麼不定，以致手下的人只敢挑好消息和媚言向他報告了。新聞界是死寂的，鄉間的茶室也掛着牌子：「莫談國事。」

這個個人政府的所有的怪誕的成分中，最不調和的一種或許便是蔣對他自己職務的評價。蔣真正地相信他是引中國走向民主之道的；稱他為獨裁者不免叫他大為生氣。有一次，中共在重慶的首席代表周恩來告訴他說，只有在民主政府成立後，中共才會交出他們的部隊。蔣說：「你難道能說我不民主嗎？」

第九章 注定遭殃的中國兵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派魯登道夫將軍去視察奧國統帥部，他的簡潔的報告後來成爲歷史上有名的佳話：『我們是在和死屍聯盟』。

珍珠港事變後幾個月之內，在亞洲的美國陸軍對於中國盟軍，也差不多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結論。多年的僵持局面，已使中國軍隊成爲軟弱的、軍心不振的、沒有組織的一大批人，被敵人鄙視，被它自己的人民視爲外人，被它的政府忽視，被它的盟軍嘲笑。誰也不會懷疑中國士兵的勇敢，但中國軍隊本身却並沒有運動力，並沒有實力，並沒有領導。

簡明地列一些數字，要比寫幾本大書，更能說明中國軍隊的狀況。一九三八年，當日軍初步攻勢結束之際，華軍共有四百萬人。這之後的六年間，中國政府每年徵兵一百五十萬人；至一九四四年，軍隊的名單上至少應有一千二百萬人，但當時只剩四百萬人了，就是四百萬人，也還是客氣的說法。其餘八百萬人那裏去了呢？誰也無法確知。這其間僵持的數年中，戰死和受傷的也許有一百萬人。其餘七百萬人就乾脆無影無蹤了。他們失蹤了，因爲有些人由於疾病和飢餓而死亡，有些人個別的開小差回了家，或大批的投降了敵人。

中國有徵兵制，徵兵的方法是最簡單和最無情的。中國的徵兵毫無編號，體格檢查或合法免役等辦法。重慶政府決定要多少人之後，就指令每省應出人數；各省再指令各縣各鄉，於是就開始徵召。在某些區域內，徵兵比較誠實點，但整個而言，辦理徵兵之貪污腐化，不可以言語形容。有錢的人是絕對不必參戰的；各地官員以劃一的公開的價格，把免役證賣給有錢人。任何農民，只要湊得出錢，就可以賄賂避免兵役。最後被抓住當兵的人，往往是最最無法離家的人。一區內壯丁拉光之後，就逼走過路人，或從有組織的壯丁販子裏購買壯丁以充數。徵兵過程中，壯丁有的被殺掉的有的給打傷；有時他們在到達營地以前就餓死了。中國軍隊里的士兵從沒有假期，從不回家，極難得收到家信。進入軍隊，通常就是一種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徵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受訓之後還活着的壯丁到達前綫軍中，其境遇比被徵時也好不了多少，因為中國軍隊是在戰場上漸漸餓死的。如果運氣好，官長誠實，而且一切都按照規程辦理的話，中國士兵所吃的是米飯和蔬菜。他的口糧照規定是二十四兩米一天，但是十分不足的。米以外的食品，偶而有些青豆蘿蔔之類。更偶然在鄉下購買或強搶些肉吃，吃肉的機會是極少的。美國兵看到中國兵挑着死狗的時候，總是嘲笑他們；美國兵遺失了一只小貓就咒罵。中國兵偷狗，是因爲挨着餓，而美國人養的肥貓一星期所吃的肉，要比中國兵士一個月內見到的肉還多。

一些部隊後慢的行軍途中，總在山嶺道上留下許多爛爛的屍首。疾病或衰弱程度不同的士兵，必

須繼續和他們的部隊一起奮力向前，因為他們只有在自己的連隊里才能得到食物。倘若他們掉了隊，就得在跌倒的地面上躺下，直至死去。中國士兵塞在肚子裏的是碾光了的白米飯，有時什麼菜都沒有，只有白米飯吃。米碾去穀殼的時候，丟掉了許多維他命，因此軍隊患着西洋教科書上所有的一切維他命不足而引起的疾病，有些病教科書上都還沒有呢。中國軍隊中的醫藥是原始的。中國約四萬五千人中有醫生一人，美國約八百人中就有醫生一人。在抗日戰爭以前的三十年間，在中國政府註冊的醫生只有一萬人，這中間有許多人是不過是醫匠，其學識等於藥房夥計。這些「合格」醫生中，在日軍侵入後有一半留在沿海地區，另一半是原在內地以及移到內地的人。自由中國的醫生，差不多全部都在私人掛牌執業，或參加政府衛生機關或民間醫院。中國軍隊三百師中，有能力的外科醫生大約還不到五百人——假如平均分配，一師不過一個多一點。實際上，就是這少數的好醫生也還是集中在基地醫院和後方收容所內，而前線整師人都沒有一個够格的醫生。

軍中服務的醫生薪俸低得驚人，他們所得的報酬，要比私人執業或民間醫院的報酬低十來倍；他們工作時，藥品和器械極少；軍中痛苦的驚心觸目，無非耗竭了他們的感情，滅殺了他們自己的心理健康。寧願留在軍中的醫生們，享有着單純的高貴和尊嚴的生活。他們想出權宜之計的應急方法，丟開了亮晶晶的實驗室裏所受的一切訓練，集中精力設法使不治之症有些小的進步。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弄得精疲力竭，儘速離開了軍伍。總的結果，就使中國一般管理裏傷站和師部醫院的人，要是在美國的話，連藥房都不願雇他們賣蘇打水的。他們對於生理學和衛生的概念並不比村農爲多，他們之所

以滲入軍醫處，是因爲管理醫院和藥材是貪污的肥缺之一。

軍中病症千奇百怪，最多的是由於挨餓而起的病。由於他們的體格被惡劣的食物、失眠以及多年的前線生活所腐蝕，浮遊着的任何傳染病都極容易侵染中國士兵。軍中有結核病的人大約要佔百分之十。軍隊宿處的擠迫，營養不良，以及許多人用筷子伸進同一菜碗的習慣，都使得採取預防步驟幾乎成爲不可能。緬甸之戰時，中國集結部隊，有一支部隊從廣東前線開到貴陽，在貴陽經過體格檢查後，被派到緬北前線去。一般猜測這是一支精良的部隊，因爲它還有戰鬥力，可以重上前線。但是在五百英里的行軍途中，這支部隊死了百分之三十的人，留下來的「健康者」，經一個美國醫生檢驗，發現其中有肺癆病的佔百分之十五。

痢疾、瘧疾和疥瘡是次要的災禍。痢疾於一九三九年開始在中國軍隊中日益流行。一九三八年中國軍隊內痢疾共三千宗；一九四〇年，實質上前線人員和武裝兵士人數仍舊，但痢疾達一萬五千宗——增加了五倍。這一萬五千宗中，下半年佔一萬宗，理由是簡單而直截的：三年來營養不足而消損軍隊的抵抗力，到這時突然顯而易見了。中國士兵平時蓄積的體力已降得這樣低，當痢疾襲擊，而他數日內無法獲取營養的時候，他的生命就會像蠟燭一樣消逝。名單上說他死於痢疾，事實上他死於飢餓。中國醫院裏無法處理來就診的全部病人——這種管理惡劣的機關，是恐怖的、黑暗的，堆聚死屍的所在。在美軍接收以前，怒江附近有一所醫院，劃出一間水泥地板的特別房間作爲痢疾病房；病人痲屎就躺在地上，由醫院勤務員用水桶沖掉，沖出去的屎，由附近的豬狼吞虎嚥地吃掉。病人每天可以

看到死人被抬出去，埋在醫院牆外的山邊。

瘧疾在戰前流行於華南。黃河的汎濫，戰爭開初兩年間軍隊的調動，以及難民的動盪，使瘧疾傳播到極北之處，而使蚊虫所帶的寄生物，摧殘整個中國。夏盡秋來的時候，士兵們在廣西帶着瘧菌而死去，爛掉。在山西的山嶺裏，士兵們在深秋由於瘧疾而發着抖。受瘧疾之害最深的部隊，是駐在怒江山峽間的部隊。爲了保衛昆明及其高原，使日軍不能沿滇緬路攻上去，怒江前線自一九四二年起就不得不守。

怒江峽谷是橫貫雲南西境的黑疤疤。怒江嘔吐似地從極高之處湧入底下五千呎之處，滙成很淺的河流。羅氏基金委員會認爲該區是全世界三個最壞的瘧區之一。惡毒凶猛的瘧疾，掃蕩着怒江峽谷裏人煙稀少的豐沃的草地。一九四三年春，華軍三個師衝到怒江峽谷裏，阻擋自緬甸入境的日軍。其中一師人開到江邊時有七千人，三星期後，能够站起來打仗的只剩四千人。有名的八十八師有一營人一個月之內患瘧疾者，五百人中佔二百六十人。重慶統帥部得知此種情況，態度是出奇地冷淡。只有當時不爲重慶所喜愛的平民宋子文氏有一點勇氣把這事提起委員長的注意。在美軍在該區內負起醫藥事權之前，部隊沒有蚊帳。庫房裏存着九千萬粒奎寧丸，但中國軍部堅持要囤積起來以防可能的「緊急用場」。美國人抱怨中國部隊有昏睡病。但美軍夜裏睡覺是有蚊帳的，中國士兵許多人蹲在驅蚊的煙火旁邊直到天亮，直到帶着瘧菌的蚊虫在太陽底下消失——到那時候，中國兵才休息。

據估計，中國軍隊裏有一半的人，生着維他命不足和骯髒所引起的疥瘡。疥瘡嚴重者不僅手上，

腿上和身上癢痛，而且腫脹的臉上也極癢而流着膿汁。軍隊冷天發給棉制服，士兵從秋到春日夜穿着一套棉制服，沒有替換。中國軍隊宿營時並無熱水澡可洗，也不發給肥皂。

腳氣病是又一種維他命缺乏的病症。你可以把大拇指深深地捺入生腳氣病的中國兵的腫漲的腿裏，十分鐘之後，這個拇指印痕還是很清楚的。拿些人來作試驗品，打了維他命B針，這病竟可以霍然而愈，但整個而言，軍隊裏並沒有維他命。腿上長的疥潰爛着；當士兵們穿着草鞋跋涉長途的時候，瘡口裏的髒膿從踝骨上一滴滴地流下來，和路上的灰塵和蒼蠅黏合起來。

雖然軍隊中主要的災難是結核病，痢疾，瘧疾和維他命缺乏症，其他許多疾病也十分猖獗。傷寒，感冒，重復性的熱病以及蛔虫等，都致人於死地。只有性病是顯着地稀少。這一部份由於中國軍隊缺乏嫖妓女的錢和精力，一部份也由於缺乏機會，那可能是因為中國的道德和西洋軍隊的道德不同。

中國的醫藥方面，正和其他一切東西一樣，受到供應不足的障礙。每月數千噸藥，就可以抑止中國軍隊中的疾病，但直至戰爭最後時期，外國來的藥品每月只有十四噸，加上美國所訓練的特別部隊的若干藥品。中國自己製造者預防霍亂的疫苗，軍醫居然能使霍亂在部隊裏不致猖獗。如果在戰爭最後數年間亞洲的霍亂病支配了中國的話，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傷兵所受的待遇，自然和病兵一樣壞。戰場上倒下的士兵，要一直躺着，等候担架兵——每連兩人——來發現他。担架兵翻山越嶺地把他抬到師部所在地，要費一整天工夫。在師部，要是他幸氣好，可能在穀倉或廟宇裏找到一個略懂醫藥的人。此人可能把他受傷後一直破裂着的血管紮住，或者把

竹頭做成的夾板，把他在担架上搖幌了老半天的打斷了的肢體夾起來，然後再往後送。假如他那時還活着，人們就把他抬着，通過隔離中國整個前線的荒僻地帶。到達交通方便的地帶，他可能搭上一輛卡車，在四天至一星期之後，這才第一次見到一個够格的醫生。結果是易於斷言的。肚子或頭部受傷就一定死；傷口稍染細菌，就生壞疽。

批評華軍對病號傷兵的待遇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把一切慘狀，全部歸咎於冷淡的忽視，也不公平的。有着極少數的心腸細直的人，例如軍醫署的羅李却（譯音）醫生以及紅十字會的林可勝醫生，他們會為援助傷兵而奮鬥，各戰區的報告到來時，他們自己也感到痛苦。但他們什麼都不能做。他們一方面被這無知和封建的國家的殘酷現實所包圍，另一方面被貪污所包圍，并且缺乏在上者的支助。

在過着中世紀生活的軍隊中，無法教授基本的衛生常識。兵士們終生都看草藥醫生，衛生對於他們是神秘的，他們相信着符咒和古老的方子。醫藥人員要求兵士只喝開水，但他們口一渴，就喝稻田裏的污水。醫藥人員要求隔離病號，但前線兵士都從同一個罐子裏夾東西吃。醫藥人員設法使每人都有一個急救包，其中包含綑帶之類，但領到急救包的人却把紗布藥棉用來擰拭槍筒。

合格的技術人員或有訓練的人員是找不到的。在戰時，中國的醫科學校並未準備造就質量上合乎軍隊需要的醫生。這些學校每年只能教好四五百個學生，而這些學生，由於實驗工具之有限，教科書之缺乏以及和西洋的研究工作毫無接觸，人們不能希望他們是真正良好的醫生。能够找到的藥品和救護車遠落在需要之後。華軍的戰略，需要整個前線成為糜爛地帶，這樣來使日軍被迫和中國步兵站在

同樣的地位上，步行作戰。前綫地帶沒有公路，傷兵得由其他的兵士或農民抬到後方。即使有公路，救護車也很少。歐洲美軍救護車五輛一天所載入院傷兵的數目，在中國就要二千名担架人員才能應付得了。

中國陸軍並無真正的軍事傳統。總司令蔣介石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一期，該校創辦迄今不過四十年，該校之設立，是滿清守舊官僚對現代戰爭的第一次讓步——這是中國二千年軍事史上擺脫太古戰法的第一次。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中國陸軍是是雜湊品。參謀本部人員所受的訓練是不同的；參謀本部是一個中年人胡亂湊合起來的團體，其中人員數十年來曾經互相作戰和憎恨過。它是以人事關係和各省政治緊張情況為基礎而發布命令的，有時自己也覺得命令下去未必有人服從。配置軍隊時，它不僅想到軍需供應和敵軍情況，而且也考慮到國內的反叛和自己內部的安全。政府一直把最的精良部隊二十個師抽在抗日戰爭之外，以封鎖北方的共產黨人。

華軍內部的貪污，好像心臟裏生了癌，四肢百骸都受感染。戰爭將近結束時，差不多每一師每一軍都是受個別待遇的。每個師長領到一筆錢後，就隨意撥一點出來作為軍醫、餉銀、菜蔬以及作戰意外事項的開支。在通貨膨脹日益厲害的時候，軍官們也許覺得比起國內任何集團來，自己站在貪污的最好戰略地位上。譬如，一個師長領到了一萬人的餉銀和軍需品，應該層層發放給他的部下。但花名冊上有一萬人的餉銀，實際上也許只有九千人——或七千，或五千人！花名冊上的兵力和實際兵

力的邊數，就可以衡量一個指揮官塞入腰包內的錢究有幾何。不僅如此，他給活着的兵士吃得愈少，他的利潤愈多。揩油之弊，在中國軍隊裏不脛而走。薪餉表是虛報的。米賬是虛報的。這弊病弄得這樣彰明昭著，以致將軍們認爲貪污是自己的權利。每師應有一萬人左右，但很少有一個師在六千人以上——而且光是補充病兵死兵，也得經常徵調新兵入伍。至一九四三年，有些部隊每師官兵少至二千人。

中國軍官們對待士兵好像對待畜牲。在官長的奇癖怪想之下，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殺掉，責罰的方法中包括割掉耳朵和鞭笞。訓練班裏的美軍人員抱着嫌惡之感，常可看到士兵被罰以赤裸的膝蓋，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場上，兩手反綁着，晒在炙人的太陽下，直至昏倒爲止。士兵不僅是軍官的私人僕役，也是軍官太太和家屬的私人僕役。事實上，士兵如獲得機會成爲軍官太太的僕人，就交了好運了：他可以在不知不覺之中脫掉制服，換上白色的僕役短衫，又變成一個平民。部隊行軍時若經過其中很多士兵的家鄉地區，是很危險的，因爲那些人這就會走入山中，一去不返。有一支八百人的部隊從華北的甘肅出發，行軍到昆明去入美軍辦的訓練班，在路上有兩百人病死，三百人開了小差。另有一師人從華北向南行軍——也許是快樂的，也許是不快樂的，要看各人的觀點如何而定——經過四川。該師大多數士兵原來是從四川徵出來的。該師出發時七千人，到達目的地時只有三千人，因爲整排整連的人失蹤回家了。

對於中國若干高級軍官，最客氣的說法，也得說他們是不夠格的。他們除了偷竊部下的食物和錢

款，漠視他們的疾病，殘酷地毆打違背紀律的人以外，自己也是很壞的領導者。軍官的參謀工作是沒有效率的。他們報告上級的，不是實際情況，而是上級所樂於知道的事情。在重慶，總部把這些報告認爲是事實，根據這些報告而作決定；於是錯誤重重，自上至下釀成大錯。還在日軍手裏的城鎮，報告上說已經收復了；戰場上每一退却，總把敵軍的損失過度誇張，直到有一時期，按照重慶的估計，日軍是早已全部消滅乾淨了。中國陸軍的軍事原則是一團混亂的東西，官階的徽章是日本式的，鵝步是德國式的，空軍戰術是蘇聯式的，後方勤務是中國式的，後來又急忙忙加上了美國式的技術。中國人甚至歸功於中世紀，以解釋他們所做的若干事情。譬如，在一個宿營地，有一位美國獸醫設法勸說中國人在夜裏不要把牲口的鼻子綁在柱上，而讓它們躺下休息，中國人解釋道，在忽必烈時代，約耶蘇降生後一二五〇年左右，習慣是讓駝着東西的牲口夜裏躺下的，但當時有一晚，許多牲口躺着睡熟了，山上掉下一大塊大雪，這些牲口就都埋在下面壓死了。從這忽必烈的時代之後，中國軍隊一直在夜裏把馬頭繫在很高的地方。

中國陸軍是一支步兵隊。訓練班的美國軍官天天教以美國本國的分散以及向敵軍前進時須肚子貼在地上的理論。怒江之戰開始時，這些美國軍官站在瞭望哨裏，看到中國軍官們令兵士站得腰背筆直地去對付山上日軍的據點，非常驚駭。從某些中國指揮官看起來，拿破侖式的衝鋒還是很好的原則。在戰場上見到過中國兵士的人，誰也不會懷疑到他們的勇敢，但指揮官這樣無益地浪費他們的勇敢，

使守禦者爲之傷心。中國保守秘密的觀念也是同樣地薄弱。注意間諜和洩漏情報專宜的國家警察機關

是極其龐大的。但各地都有日本奸細活躍。有一個戰區司令長官承認，他曾經拜訪過和他對敵的日軍司令官，因為那司令官是他留日時期的老同學。許多個別的人來往於重慶官員和南京日偽政府的官員之間。例如，當B29空中堡壘還是最高秘密，而華西正在計劃建造基地之際，消息早就漏入當時還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日本佔領區濱海某城有個營造商，聽朋友說美國人要造巨大的基地以轟炸日本，就從日本方面一路旅行到中國方面，到達正在建造基地的華西。他承造了一個基地，工程完畢之後，又帶着他的知識和利潤，回到日軍佔領區。

在所有這些之外，中國軍隊還有許多缺乏效率之處，值得批評，但更值得憐憫。一切壞事情，惡事情，一部份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當時的被圍狀態，也由於美國政策更應負責的若干缺點。現代世界中，那一國都沒有像滇緬路割斷後的中國那樣被封鎖過。該路截斷後，中國能夠開行的卡車約一萬五千輛；過了三年，只剩下五千輛光景。這是悲劇。這就是說，軍隊無法從一個前綫調到另一前綫以應付威脅；各戰區的司令官變成了當地的君主，依靠着自己的資源，而不依靠中央政府的供給。

整個作戰力量是在癱瘓狀態中。有人在一九四三年夏研究了一個月，發現中國最忙的一條公路上所走的車輛，平均每天只有一二三輛。這個數字包括來程和回程的吉普車，卡車，公共汽車，商車和軍車。據同樣的調查，重慶通出去的三條大動脈似的公路之中的一條，平均每天來程和回程車輛總共祇六十輛。中國軍人的想法反映着這種一般情況。中國的將軍們不願作戰了，除非上面加以無法忍受的逼迫，他們是不願化費彈藥或汽油的。他們情願等着等着，直等到別的什麼人替他們取得勝利的時

候爲止。

在高級軍官中，甚至也有幾個人是結實而勇敢的——如衛立煌，他的度量 and 忍耐最後贏得了怒江前綫的勝利；陳誠，在担任軍政部的時候，終於開始清掃重慶臭氣冲天的馬廄；李宗仁，是嚴厲的，棕色的廣西將領；孫立人，在史迪威領導下在緬甸學好了他的本行。散佈在整個綿長的戰綫上，也有若干團長和師長出人頭地，好像站立在泥沼似的中國陸軍之中的誠實的孤島。爲了保護自己的部下，他們身受苦痛和怨恨之深，是任何外國人所吃不消的。這些指揮官中，有的人和部下士兵一同挨餓，一同步行行軍，一同死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可是這樣的人爲數極少，好的混在壞的裏面，總結果還是醜惡一團。

這支軍隊，居然擋住了日軍六年，這是它的奇事之中最值得注意的事。要它在作戰中取得真正的勝利，未免是奢望。它最大的勝利，是在於活着，站住，耐得住它自己的政府和社會互解的壓力。許多人受不了這壓力；數十萬人投降了日本，附和傀儡汪精衛；更有千千萬萬的人參加了中共或投降了中共。遍佈華軍內部的殘酷和痛苦，不僅使高級軍官和參謀人員墮落，也使一般士兵變壞。士兵被看成餓着求飯吃的狗，他所受待遇如此，就設法從比他更弱的人——農民那兒盡量攫取東西，這樣來解決自己內心的不滿。

一九四三年，有一位年輕的中國記者奉派至鄂西，對「鄂西大捷」作一報告。中國報紙上是把這次「大捷」吹成爲可和斯大林格勒之役相等的勝利的。他在此役結束很久之後寫下一篇通訊，這篇文

章未得刊出，是幻想破滅和失望的範本。這位記者並未發現勝利，却發現此役華軍損失了七萬至八萬人，敵軍損失了三千至四千人。更驚人的，是他發現人民是冷淡的。他的通訊說：

在政治上，爲什麼農民成爲我們的敵人呢？因爲我們自己把他們推到敵軍方面去。在敵軍到達灤縣和津市之前，形勢危急時，當地駐軍下令人民疏散，每家只准留下一人。兩天以後，又有一道命令叫老百姓全體撤退，一個人也不准留，如有違背，以漢奸論罪。老百姓走了之後，（中國）駐軍就在全城搶掠，把搶到的東西搬走。年紀太老不能離家的以及不願離家的人，全給殺掉。有時連房子也一起燒掉。我到津市的時候，駐軍搶來的老百姓的衣服仍在市上出售。我和老百姓談過話。開頭，他們什麼都不肯告訴我。後來我提起重慶，說我是來視察的，他們就左顧右盼，看到沒有人在旁邊，其中一個人就把四個指頭放在桌上，然後再把手翻轉來。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要說的是（中國）四十四軍把全城搶光了。他低聲對我說，駐軍曾經強姦，搶劫，放火，殺人。老百姓知道軍隊搶光了該城後，就想回家，但軍隊不准他們過去，要過去必須出錢。每人得繳獻五百元至一千元。八十七軍也是如此。

在前綫旅行的時候，許多人告訴我，他們覺得敵軍到來時不會有什麼擾亂。這使我很詫異。老百姓從什麼地方得到這種消息，是值得加以調查的。事實上，敵進軍佔時，並未擾民。他們在任何地方過路，都只要求茶水。於是大家都說敵軍比國軍好了。他們說起國軍時，覺得自己是第三者，彷彿那不是他們自己的軍隊。敵軍撤退時，却大規模地燒殺，使他們懊悔都來不及了。

敵人對中國人民，是異常奸猾詭譎的。

第十章 史迪威的戰爭

美國政府於一九四二年春設立中緬印戰區中。緬印統帥部是神話似的東西；美國人常說，你得有一個魔術球和一本『愛麗思漫遊奇境記』才能，懂得它。中緬印戰區的瘋狂和不愉快的怪誕之事，是連好萊塢的老闆都不敢攝成電影的。這里印度王公，舞女、軍閥、吃人生番、森林、沙漠、酒徒、間諜——什麼都有。美國飛行員會坐着 P 49 式驅逐機去掃射敵軍的大象。中國的蓋世太保會在我們自己的總部里查出一個漂亮的日本女間諜。日本間諜會在加爾各答大街上刺殺了一個美國情報官員。中國軍閥們會引導美國軍官去享受鴉片的樂趣；美國工程師們會用鴉片來診治病倒了的象，也用鴉片作工資來償付當地工人，豹和老虎咬死過美國兵。中國狂叫着需要飛機的時候，停在印度的 B 17 式飛機的放氣管內，鳥兒築了窠。印度王公宮殿內的銀地板上，人們跳着現代舞。美國間諜翻過喜馬拉雅山的小道，到拉薩去，爲了獲得西藏的友誼，和達賴喇嘛談判。美國海軍在蒙古沙漠的邊緣上，訓練了一支騎兵；美海軍也把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技術，教給了中國可怕的特務人員。美國專家們教給中國一切東西，自洋芋的種法起，至人工傳種的最新方法止。

中緬印區的政治，是算術，人事，共產主義、獨裁專制主義、貪污、帝國主義、廢話和悲慘的無

法可施的荒誕的混合品。美國政策在世界任何地方，從沒有遭逢過這樣奇妙地湊在一起的許多角色。這中間包括甘地和尼赫魯，英國皇室蒙巴頓爵士，劣等詩人和沙漠戰士魏菲爾爵士，中國軍隊總司令蔣介石及其柔嫩的太太蔣夫人；次一等的人物，則有雲南省主席獨眼龍龍雲以及漂亮的黑眼睛的中共周恩來將軍等。美國人對付這些人時，也同樣地花樣百出，而且不免感染到了同樣的陰謀和傾軋之風。這是一個分裂而不愉快的統帥部。

中緬印戰區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要使中國繼續作戰，使它在對日最後一戰時，成爲砧板，而能護盟軍之鏗，把敵軍打得粉碎。該戰區的職務是要供應中國的軍需，重新訓練，重新裝備，重新整編中國的部隊，而且送他們去再和日本作戰，被派從事此項工作的美軍，約有二十五萬人；會化掉幾十萬萬金元；曾損失數千生命。這是一個緊要的任務。和美國作戰努力的其他方面比起來，人們對於這戰區的功勞認識較不清楚，所給的榮譽較少，支助較少，鼓勵較少。

在美國軍事優先的表上，中緬印戰區的優先權和加勒比海島的優先權相等。中緬印戰區，任務重大，但只有很少一點點工具來執行這任務。美國兵以直率的政治現實性，了解自己是在一個守勢戰鬥里爲人作嫁；除了第十四航空隊極少幾個戰鬥人員是例外，他們自己爲自己的戰略和戰爭而打着仗；一般美軍只覺得自己是政治上的附屬物。在軍事方面，中緬印戰區不能和歐洲和太平洋上的偉大戰爭相比，這是真的；該戰區的重要性，首先是政治的，是在於西洋文明這是第一回來到亞洲，作爲盟邦而和亞洲人爲了共同的目標而並肩作戰。如果奉派作此項工作的美國人的努力，已開始了偉大的十字

軍運動，把美國自由，民主和工作效率的理想，介紹到亞洲混亂的政治中間，那麼，他們所遭受的痛苦和不愉快，也就不是白費的了。但是，高高在上的人們，拉住了負責指揮官的手腳，使他無法應付這個局面。

政治上的責任，正像同樣多的軍事責任一樣，被放在一個人的肩膀上，人們希望這個人用一條鞋帶造成奇蹟。史迪威將軍不是平庸的軍人。他是西點軍校畢業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助功卓著，在二次大戰之間的時期，他成爲美國陸軍中步兵戰術的偉大專家之一。他的職務，使他往來於中美兩國之間達二十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被派赴北平學習中國語言，他中國話終於說得很流利，而且成爲中國軍事的專家。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爆發時，他在華北當美國武官，他親自考察了這戰爭的初期情況，直至一九三九年相持局面爲止。所有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史迪威具有職業軍人中另一個希有的品質——遠見。他能够在戰鬥的爛泥和污穢中抬起眼睛，瞭望着天邊。他知道戰爭是什麼回事。他所接到的字句粗率而浮泛的命令，要他把中國軍隊重新訓練，這很容易被解釋爲單調的例行公事，大可不必煩心，而取得榮譽和快樂。然而，史迪威不僅從指令之中看到了自己的責任，而且從全美國人民的觀點上看到了自己的責任：要全心全力地，民主地作戰，絕不容忍貪污腐化，口是心非或虛偽巧妙的外交詞令。

史迪威部下的交際宣傳處人員的工作都很壞。他們認爲這個老頭兒是一個痛快而可愛的人物，要使美國人明白，只要把他的綽號「醋老頭兒」宣揚一下就够了。他們說他是一個暴躁的哲學家，一個

具有刻薄的美國機智的人，第一流的戰士。他們幾乎把他的精神之中的溫暖和慈愛完全掩過不談。史迪威性格的主要點，是在於他瞭解每一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他並不是從複雜的意識形態方面來瞭解生活，而是從美國自由主義的基本之處來了解生活的。他對於中國農民兵士的了解，要比中國軍官深刻得多。他認為只有把兵士像一個人那樣看待時，他才能像一個人那樣戰鬥。他對於中國農民兵士的愛情是無限的。他曾經目睹中國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毫無救藥的早期戰鬥，終於信任中國人的勇敢和堅毅，是勝利的樞機。同時，美國軍官中，對於中國軍隊多年的貪污和腐化所造成的一團糟的情形，誰都沒有比他了解得更清楚。

中國軍隊已經退化成為爛漿似的一羣人，他的整個計劃是要使這支部隊能在平等的條件下對付日軍，並且加以摧毀。史迪威在中國所受的教育，開始於珍珠港事變二十年以前他最初的在華任務之中。一步一步的，他起先把中國軍人作為個別人物而研究，起先注意着把個別人物組織在一個戰鬥單位裏的問題，隨後，他明白，要軍事上有所變化，必須急劇他改革中國政治和行政的中心。在他就任中緬印戰區司令之後不久，他了解，不論美國答應的援助也好，紙面上的脆弱的改革文章也好，加強個別部隊也好，得到個別戰役的勝利也好，都不能使中國重新獲得生命。現代化的軍隊，只能存生於現代化的國家內，而他認為，只有美國的政策積極地在重慶贊助民主和效率，才能產生這樣現代化的國家。當史迪威事件由於這樣的信念而被形成之時，許多人對待史迪威好像他是中國民國的敵人似的；然而而在緬甸的美國兵，知道這樣看法是非常錯誤的。他們對史迪威的不滿，是由於一個完全不同的

理由——因為他們覺得他是一個「溫柔的愛人」，覺得他在叢林之中愛他部下的中國部隊，要比愛他自己的美軍來得多。

在中緬印戰區內，史迪威是最偉大和最能激勵人心的人物。他的誠實好像一塊石頭；他在戰鬥中的勇敢和澈底，是完整而毫無問題的；他的單純，諷刺着希望他在扮演一個角色的浮華的人們的氣氛。但是，史迪威也有他的缺點——他的缺點是從他的美德之中跳出來的。他對於偽君子和表裏不一的人的輕蔑，在外交場合中總不善於掩飾。他對於低微的人，是單純而客氣的，但他尖利的舌頭，却像沙皮紙一樣，把倨傲的人的神經過敏的痛處，擦得體無完膚。他對待蔣介石氏好像對待其他軍人一樣——有充份的禮貌和尊敬，但並沒有繁文縟禮或鞠躬之類——他們兩人的性格於是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史迪威被他部下的忠誠，是盡人皆知的。他自己是一個光輝的戰鬥軍人，他的戰鬥副手也是第一流的；可是他不喜歡紙上文章。做他的參謀工作的人們，因此對他十分粗暴。他把年老，可靠而久已沒有用處的軍人留在部隊裏，這些人成了一種障礙。中緬印戰區從喀拉蚩延展到西安，這中間的距離，好像聖地亞哥到紐約那麼長，在這樣廣大而複雜的一個戰區中，良好的行政工作，是必要的。史迪威辦公室裏某些參謀人員的馬馬虎虎的工作，使他經常受到批評。

有一次一個美國軍官嘲笑道：『要解釋緬中印戰區的情形，即便說明一些比較簡單工作關係吧，』

你也得需要一張三度空間的組織系統表，配上電線以及五種顏色不同的緞帶。」史迪威將軍帶着三頂帽子，他是中緬印戰區的總司令；由於這樣，他對華盛頓陸軍部負責，並且指揮中緬印戰區內一切美軍。可是在中國，他也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參謀長；在這個職務上，史迪威是對蔣負責的。在印度，他是一九四三年夏設立的東南亞盟軍總部的副司令；這樣，他也直接處在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爵士之下。中國戰區和東南亞戰區的分界線是不大清楚的。美國斯特拉梅耶少將是史迪威部下的空軍軍官；他指揮着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以及在中國的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的），但他同時也對蒙巴頓爵士負責，因為他是東南亞統帥部的戰略空軍司令官。

在中國，當然，蔣介石有他自己的參謀長——何應欽。何應欽是中國軍隊的參謀長，而史迪威應該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在印度，蒙巴頓爵士只是東南亞的指揮官，他的指揮區域包括錫蘭及尚未克復的地區；實際上，他以印度為根據地，從印度抽取力量，並且在印度配置他的部隊——可是他在印度沒有指揮權。印度是由英印軍總司令奧欽來克爵士獨立指揮的。中緬印戰區被在緬日軍的鑲子割裂為二。空運部隊就在這鑲子上面飛行，形成了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分離的區域之間的樞紐。這個空運部隊和史迪威，蔣介石和蒙巴頓毫無關係，是由華盛頓指揮的；這個部隊自己以為屬於國際性的指揮部，戰區司令部不能干涉。在一九四四年，B 29空中堡壘的第二十轟炸機隊進入了中緬印戰區，這一個轟炸隊是一個巨大的豬似的組織，消耗着大量的物品和汽油；這支部隊除了華盛頓的亞諾德將軍之外，不受任何人管轄。假如以上所說還不够明白的話，那是由於戰場上誰都沒有十分明白過。

這許多份子，誰都不會和諧地湊合在一起。史迪威要做的事只有一樁，就是戰鬥。這是戰爭——而他不自願錯過打擊敵人的任何時間和機會，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也不管他手頭有多少東西。對日軍作戰是史迪威固執着的觀念。緬甸的重新收復以及中國封鎖線的破滅，佔據了他的所有思想和精力。但是英國人，中國人以及美軍之中的若干人，都反對在緬甸進攻。

主要的反對者是英國人。印度是他們整個帝國系統的基石，英國在亞洲之戰的目標，第一是保持在印度的統治權，第二是收復被日軍強奪去的殖民地。英國人看來，中國似乎是各方面都很遙遠的地方。由於對日作戰主要是美國的責任，他們覺得對日戰略也該讓美國處理；如果美國的政治和軍事計劃需要打破中國的封鎖線，英國人覺得不同意似乎無禮，可是他們只不過同意而已，並沒有給予充份的合作。

英國在印度有很大的資源。他們有一支英印軍，估計達一百萬人，還有皇家空軍的很大部隊，以及比中國大得不可比擬的工業組織。然而，印度政府多半的精力並沒有放在從事戰爭方面，却用來維持英國的統治。印度可以省出來從事反對軸心國的戰爭的軍事力量，已經調去對德作戰，因為在歐洲，印度軍不至於受危險思想的感染。印度的英國人，正像中國的蔣介石一樣，把大部份的力量放在後面維持內部的穩定。對於真正相信他們是在從事反抗軸心的真正偉大戰爭的英國軍隊，軍官以及印度的某些官員而言，這個斷語也許似乎太兇。在某些方面，印度政府和美國陸軍的合作是值得稱贊的。不過英國人在那裏面工作的殖民地制度，更確實地，是他們整個教養，使得他們不可能忠誠合作。

史迪威需要英國的幫助，來利用印度，作爲他衝入緬甸叢林的根據地。然而，緬甸和馬來亞的事變，一直使英國人處在恐懼的狀態中。邱吉爾覺得緬甸是不適宜於白人的地方——瘴疾太厲害，天氣太使人疲倦。英國人不懂只有一隊中國衛兵以及幾師印度部隊的史迪威，何以能够在日軍如此輕易地勝利的區域內，希望獲得進展。在他們人力物力沒有絕對優勢的時候，他們不願意在一個失掉了的殖民地內開始任何戰鬥，而史迪威希望在兵力相當或較少時進行戰鬥。史迪威和英國統帥部爭辯了兩年之久，他要設法刺激他們行動起來，而雙方的脾氣開到了決裂的程度。

在政治上，英國的利益也和中美兩國的利益背道而馳。英國希望收復緬甸的不是東方的中國人，也不是局外的美國人。他們要緬甸重新作他們的殖民地。爲了重建他們的威信，緬甸須由英軍拿着過去撤退時帶着的旗子重新佔領，是至關重要的了。史迪威的政治顧問們以及他的戰區里的戰時情報局很願意在他計劃收復的地區內提高爲自由而戰的呼聲；他們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他們很不愉快，因爲他們不能使美國在亞洲的作戰動機弄得清楚和清潔。宣傳如果以自由觀念——這次戰爭其實原來是假定爭取自由的——爲基礎，則將直接打擊英國的利益。英國人是在作兩個不同的戰爭。在歐洲，他們揭示人類的自由和消滅納粹奴隸制度的一切光榮；在亞洲，則主張保持現狀，保持帝國，保持殖民主義。

中國人何以反對史迪威計劃，是不容易分析的，因爲理論上，中國人希望把日本的封鎖線粉碎，越快越好；他們確乎願意在緬甸作戰——但不希望自己所化的代價太高。如果他們只消簽訂了文件和

同意了盟邦的決定，就能够看到封鎖線打通，他們是雙手贊成的。但當實現戰略時需要具體的工作利有力的合作，就另有枝節了。蔣十分願意讓史迪威帶着隔絕在印度的中國部隊隨便幹什麼；這些部隊反正是由外國供養及裝備的。至於要中國自己實行那個戰略，那就要有自下而上的改革——而改革就會威脅到中國軍閥政治的微妙的平衡。中國人認爲美國加入戰爭已經註定了日本的厄運。正如有一個美國的促狹鬼所說，「美國的珍珠港事變日，就是中國的停戰日」。中國人覺得他們只要等待，可以等到敵軍在美國的實力之前崩潰。

反對史迪威計劃的第三方面，是美軍內部。可以作爲代表的，是一個和史迪威同樣地爽利，同樣地抱有決心，同樣地很受人稱讚也很爲人痛恨的人。此人就是陳納德，一個很特別的航空員。陳納德完全地、毫無保留地主張空軍高於一切。由於他一再毫不遲疑地表露這樣的信念，他被迫離開了美國陸軍，於一九三六年來到中國。他注意觀察並分析了日本空軍對中國和蘇聯空軍早期作戰的情況。一九四一年，他把幾架二流的 P-51 機帶到亞洲，並且從美國帶來一批不守紀律的，勇敢善戰的海陸軍飛行人員，組織了「美國志願隊」。他把這個志願隊鍛鍊成空戰史上最奇特的戰鬥部隊之一，名爲飛虎隊。日軍攻襲珍珠港的時候，他已有戰鬥準備。在整個太平洋上其他盟國空軍在日本零式機之前望風披靡的時候，陳納德的部下天天毫無慈悲地把空中的日本人順利擊退。中緬印戰區成立後，陳納德又穿上了制服，成爲准將，負責指揮中國空中戰術部隊，該隊後來變成第十四航空隊。

陳納德認爲日軍能够，並且一定可以被空軍所擊敗。他並不把中國看成地面部隊對日作戰的基

地，而看成爲空襲日本心臟地帶和海上交通綫的巨大的空軍踏脚石。他希望他的美國空軍在華東安設基地，從沿海地區出動空襲敵軍的船隻和港口。他覺緬甸的戰鬥是浪費時間；假如他能切斷日本的海洋交通綫，日本在緬甸的駐軍就會由於飢餓而衰頹下去。從陳納德看來，滇緬路打通固然不壞，但依然是奢侈之舉；美國所有的供應品和努力，應該集中在空運物資入中國這一偉大的任務上，空運的物資首先應給十四航空隊，其剩餘者，則交給中國人，讓他們隨便使用。陳納德相信，一旦有了足够的空軍，他可以使華東的日軍無法進攻他的基地，因爲第十四航空隊可以作爲疲憊的中國步兵的砲隊和得力的掩護隊。

另一方面，史迪威認爲空軍是從屬於整個戰略的。他堅持說，中國要沒有強大的陸軍，在華東設立空襲日本的空軍基地是守不住的。只有經過滇緬路運入供應品，把中國部隊裝備起來，中國部隊才會強大。因此，滇緬路應該有最高的優先權——這是阻遏日軍對我們空軍攻擊的先決條件。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失和動搖了駐華全體美軍。你要就是史迪威的人，要就是陳納德的人；要對兩個人同樣地友善，就等於走繩索一樣地難辦。這兩個人都活躍和潑辣的戰士。兩個人的部下都不好，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反目狀態，就欣欣然以許多閑言閑語，助長這兩個指揮官對彼此的惡感。在本戰區所有高級人員中，只有『梅利爾突擊隊』的梅利爾少將會設法彌補這個罅隙。

當時在中國一切互相衝突的意見，戰略和野心的焦點，是『駝峯』。要確切地明白中國這跑馬場上任何賭徒的快樂或不快樂程度，你就得去探悉他最近從駝峯那邊收到了多少噸東西。飛越駝峯的不

可思議的航空綫，在兩年半之間一直是中國和美國以及其他盟邦接觸的唯一路徑。所謂駝峯，就是自阿薩密至雲南高原的喜馬拉雅山的支脈。一九四二年春天起，運輸機開始飛越駝峯，每月載貨八十噸；到戰爭結束時，每月達八萬噸。這中間駝峯會使人們發瘋，殺掉他們，使他們因熱帶的害病而一蹶不振，把他們送回美國，過渡衰弱的餘生。美軍中有的人把它叫作「天上的地獄」。這確實是世界上最危險，可怕和野蠻的空中運輸。沒有武裝的運輸機，要在二萬呎高度上不管日本空軍，熱帶的雨季以及西藏的冰雪如何，通過五百哩毫無人跡的山嶺和叢莽地帶。「駝峯」指揮部有幾個月內損失的人和飛機，要比直接作戰而由它供應的十四航空隊所損失的還多。一九四三年以前，它會使四個指揮官相繼下台，之後，終於有一位哈定准將來指揮這個空運司令部，他的傑出的意志能够處決各種問題。

駝峯是中國一切政治的鎖鑰。史迪威，陳納德以及中國政府激烈地爭辯着運到的東西應該如何分配的問題。在封鎖的大部份時間內，載運量平均每月不到五千噸。直至哈定於一九四三年秋天接任時，載運量才開始上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超過了一萬噸，至一九四四年到達每月二萬噸。在戰爭的數學內，甚至每月一萬噸也算不了什麼，第八航空隊從英國大舉出襲德國兩次所消耗的東西，要比整整一個月運入中國的東西多。駝峯物品的這三個競爭者——史迪威，陳納德和中國政府——彷彿是在圍城之內被困而挨着餓的人們。運入的全部供應品都還不够三人中任何一個人的需要；分成三份，就僅僅只是苟延殘喘的口糧了。這三個人一次又一次地向華盛頓呼籲，反對他們的上級，部下或同僚的不公平；供應品分配的爭吵，甚至上達白宮。陳納德需要物資越多越好，他要供應華中的前進基地，他

的部下正在殲滅着日本的船艦。史迪威需要物資越多越好，他要供應地上部隊，以重開滇緬路，使中國軍隊恢復生命力。中國政府也需要物資，以使它的兵工廠以及民間經濟在最低限度的效率之下繼續工作。

美國政府會一再答應飛越駝峯噸數加多，以應付中國的需要。但是駝峯航空人員儘管如何緊張，他們死得儘管如何英勇，都從沒有能够使山那邊的被圍駐軍滿足。作爲整個戰區的總司令，史迪威担负着分配供應品的最後責任，誰的要求不能滿足時，誰就咒罵他——從要求着啤酒和婦女服務隊的普通士兵起，直至要求銅和卡車的中國參謀本部止，都咒罵他。

亞洲戰略原來是在珍珠港事變後一星期內，從羅斯福——邱吉爾白宮會議裏頭產生出來的。當時盟國打算守住新加坡荷印一線，並且經由滇緬路把供應品送入中國，使恢復作戰。一九四二年春東南亞盟軍整個陣綫的崩潰，並沒有改變過這個大陸基本戰略，僅只推延了它。後來日軍切斷了滇緬路，於是在援華計劃開始實施之前，必須把該路重行打開。

當蔣介石獲得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部總司令這一個尊貴的銜頭時，他要求來一個美國人當他的參謀長。美國把當時在加里福尼亞州指揮着一個軍團的史迪威將軍挑出來，送到亞洲担任蔣的參謀長，並指揮中緬印戰區內的一切美國部隊。緬甸之役中史迪威身陷重圍，步行行軍走到了印度。他在

滇緬路中，想到了其後兩年的計劃，他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把這計劃增訂完成。

第一步是要訓練從緬甸逃到印度的中國殘餘部隊。日軍在中國側翼安設了緬甸前綫的藩籬。這些部隊應該成爲刺破藩籬的先鋒，在緬甸北部離開日軍供應基地最遠的一點上進攻。在昆明，在中國內部，應爲中國人設立另一個訓練班，由美國人教授基本的技術，並組織一支中國部隊，從國內打到緬甸去。這兩支部隊應以鉗形態勢進攻，一支從阿薩密北部的雷多出發，另一支從華西的怒江出發；兩支部隊會合時，中國的封鎖綫就衝破了。這兩個行動是要配合起來，符合於一個長期計劃的。訓練中國人的第三個中心，應在桂林設立。這個訓練班不像其他兩個那樣生產精美的果實，因爲它缺少器械和人員，但它可把美國的方法教授給東綫上大批的步兵，這三支部隊以X，Y，Z，（X-ray, Yo-ke, Zebra）爲代表名詞，這三個字後來在中印緬戰區中變得非常有名。

這些部隊是史迪威計劃的基礎。他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開始訓練在印部隊。在拉姆加，在印度中部炎熱多塵的平原上，到秋天成立了一個訓練學校。美國人把現代化的理論教給中國軍官，並且要他們做砲兵和步兵的實習；他們把通訊工作和獸醫工作教給中國士兵。在印度，中國的軍隊第一次要吃多少東西就有多少，得到的餉銀是硬幣，而且得到鞋子，衣服，醫藥看護，甚至維他命丸。昆明的訓練學校於一九四三年初開學，該校的經費沒有那樣寬裕，該校人員的伙食沒有那麼好，大砲和若干種重要武器也無從獲得供應。桂林的學校直至一九四三年年底才開幕，該校不過匆匆忙忙地把美國的作戰方法，教給中國軍官而已。

總戰略的進度是很簡單的。當緬甸出發的X部隊和中國出發的Y部隊會合，打通了公路之後，這

兩支部隊在Z部隊的輔助之下，應向華東的海岸進發。在那邊，他們可以和太平洋上過來打開一個海港的美國海軍會合。於是美國和中國之間通過太平洋的直接交通綫就可以重新建立起來，而日本帝國將被切分爲兩半。各盟國雖然都同意此役的一般計劃，對於如何推進這計劃的一節，却從來沒有一致的意見。史迪威希望拿手頭任何部隊儘快地，儘可能熱切而專心地作戰。他要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在緬甸進攻；英國人逼得他放棄了這個計劃。他在一九四三年春又要進攻，又被壓倒了。他不倦地要求打破日軍對中國的封鎖綫，最後，在一九四三年，他得到了聯合參謀部的認可，該部同意開始作收復緬甸的真正努力。根據開羅會議的計劃，英軍應在緬甸南部海岸登陸，華軍應以Y部隊渡怒江挺進，而史迪威應率領X部隊穿過北緬的叢林，到達公路的會合處。開羅會議之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間盟國舉行了德黑蘭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斯大林和美國人堅持英美全軍出動渡過英吉利海峽。這不得不推翻了開羅決議。要歐洲渡海作戰成功，英國就省不出登艇來到緬甸作戰。因此，史迪威奉派回到中國通知蔣說，擬議中的英軍在緬甸南登陸之舉是取消了。

蔣氏雖然在開羅提供了諾言，却是一向對緬甸戰事並不十分熱心的。現在蔣就說話了，他說如果英軍不登陸，中國就不在怒江前綫發動攻勢。但關於在印度建立起來的三個師應該如何處置一節，他讓史迪威全權辦理——史迪威要打就打，要不打就不打，要前進，自定進攻目標或停止進攻，都可隨意處理。至於史迪威，如今深信在德里和重慶爭辯或請求都不會再有什麼結果，就決定自己單獨進行緬甸之戰，他就飛到了緬北。一九四四年正月間，他從緬北發動了史詩性的二百哩叢莽地帶的攻勢，

直攻到密支那爲止。

這個戰役比之於世界上任何原始性和恐怖的戰爭，毫無遜色。敵人，叢林或疾病，都是毫無慈悲的。在沼澤間的雨水和炎熱之下，中國兵，美國「梅里爾突擊隊」，卡欽族的巡邏隊以及英國的騎兵撲殺日寇或被日寇撲殺，達五個月之久。史迪威穿了骯髒的卡嘰服，噴着香烟，載着一頂低到眉心里的舊式軍帽，幾乎永遠站在聽得見槍砲之聲的地方。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下旬起至一九四四年五月間止，他除了極少幾天在德里或重慶處理必要的公文以外，始終留在叢林里。至四月間，當這一戰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而將近勝利時，蔣介石就答應發動渡過怒江的攻勢，以補充緬甸的攻勢。

有的人覺得史迪威應坐在司令部的書桌旁，他的恰當位置應該是在高級的外交圈子以及他的廣大的戰區內錯綜複雜的行政工作中。但史迪威的想法不同。緬甸必須打一仗，而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人打；沒有第二個人具備着他那樣的信念，意志或精力，足以迫使未經考驗的中國師團通過叢林，去擊敗老於行伍的日軍。從他看來，要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能打仗並且能够打敗日軍，整個戰區中再沒有比這塊地方更要緊了——那一項作戰努力都沒有粉碎封鎖綫那麼重要。

在國中戰爭史上，緬甸之役是傑出的一戰。這是中國軍隊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攻勢作戰的唯一勝利。

一般駐華美軍對於陸軍上層間關於政策的鬥爭所知甚少，關心得更少。他們吃得壞，睡在臭氣撲滅而老鼠猖獗的中國招待所里。他們得和炎熱，泥垢和疾病奮鬥。誰都不會化工夫去跟他們解釋我們

爲什麼而戰。他們所知道的一切，都並不超出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他們痛恨這個。他們把美國政府叫作『朱姆大叔』（註一），把蔣介石叫作『姜克爾傑克』（註二），把孫中山叫作『孫散志山姆』（註三），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叫作『歪頭雜種』，在日常談話中縮名爲『斯洛貝』（註四）。

所有美軍進入中國的第一站，是雲南的省會昆明。在戰前，昆明甚至比重慶還落後。該城的大街是窄狹的，小巷是污穢的；該城是全國鴉片烟商的強固據點之一。直至戰爭開始時，該城的娼妓被圍在一條街上，這條街是兩頭鎖住的；有錢人家則購置少女爲奴隸、操作家事。這個省份是由一位奇怪的人物統治的，他名叫龍雲，他是國民政府的最疏遠和動搖的支持者之一。龍不喜歡蔣介石，而他在該省內的權力如此強大，以致蔣在對日勝利之前，不敢攻擊他。在勝利之後兩個月內，蔣委員長却發動了一個勇猛的襲擊，佔領了龍的省會，而且把體面掃地的龍雲帶到重慶。

戰爭把二十世紀的兩種份子，投進這個中世紀的污水池中：那是來避難的若干最好的大學以及全國最精明的金融和商業投機家。這兩種份子都受到省主席的庇護，在避難的大學方面，那是因爲校中的

註一：『朱姆』——笨蛋。

註二：『姜克爾』——下疳。『傑克』——人名，即「張三，李四」之意。

註三：『孫散志』——日落。『山姆』——人名，「孫散志山姆」乃仿「孫逸仙」之音而取。

註四：『斯洛貝』——歪斜，蠟虫。

自由主義教授們，形成了一個反對蔣氏獨裁政權的有節制，然而頗爲喧嘩爲反蔣陣線。在投機家方面，是因爲他們完全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黑市投機，天天增加着他所統治的城市的財富。在美軍開始侵入昆明時，妓女是從她們的兩頭鎖住的街上解放出來了，吸鴉片成爲地下活動，該城獲得了莊嚴的外表。

美國人到達該城時，通常在城南一個大飛機場降落。這個機場成爲世界上最忙的機場之一，達兩三年之久。該場處理着駝峯運輸線的大部份工作，中國民間航空線的全部工作，中國航空公司的貨運，郵件，以及十四航空隊的戰鬥工作。這是一塊愉快的地方，緊靠着南邊一個長形而碧綠的湖，湖在一個叫做老禿山（譯意）的高聳着的險峻的崖石下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軍，來到中國看到的風景，第一是老禿山，離開的時候往後望望，最後也是老禿山。你躺在跑道旁邊的草地上，眺望天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看到各種飛機，從C 54和B 24式起，至L 5和L 4式爲止，混在擁擠不堪的半空中。除了雨季大雨完全停航外，這個機場從沒有一刻鐘沒有飛機馬達的吼叫。

距機場數哩之內，散佈着供給美軍人員之用的十五個招待所，每個招待所有五幢至十幢房屋，駐華美軍七萬人中，大約有一半人曾經在昆明招待所裏住過較長或較短的時期。這些招待所，是由中國政府經營的，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特別的供應部，專門招呼並供養美國人。按照中國標準，這些招待所是雅緻的模範，是暖和的，是乾燥的，而且中國人認爲食物是超等的。中國作最大的努力，把他們認爲美國人喜歡的雞蛋，雞，猪肉和蔬菜供給美國人。從宿舍裏的大部份中國侍僕和守衛房屋的中國

兵看起來，甚至美國人桌上的湯汁，都可以給皇帝吃的。可是一般美軍用不滿的眼色看着他們的食宿情形。一間房子要擠上六個至八個人，睡在雙屋牀上；鋼盔，防毒面具，軍用袋等等，在這個小房間的灰塵和混亂之中翻滾着。膳堂裏的髒東西，油膩，以及一般的醜態使美國人爲之作嘔，可是這些膳堂要比中國軍隊自己的任何膳堂清潔；在膳堂吃飯的美國人，在他留華時期，差不多都害過腹瀉和痢疾之類。在兵營中，美軍大叫着和咒罵着，把自己的氣怒發洩在中國勤務兵的身上，最後有一處美國司令部鄭重地貼出了一張告示：『在任何情形之下，美軍人員不得毆打，腳踢或虐待中國人員，蓋本司令部之政策並不如此也』。

在戰前，昆明一向是名勝之區。該城海拔六千呎，大半年中天氣愉快而晴朗，而醉人的太陽和天空，似乎永遠可以引起一種快活的頭眩。美軍白天工作，通常在天黑以後才看到這城市。美國兵每星期總有一兩次須入城內尋找酒，女人和娛樂，或儘可能覓得派司常常進城，一進城，中國的小販和導遊者就把他敲得精光。飯店裏水牛肉的牛排賣五塊美金一客；威士忌酒黑市是美金五百餘元一瓶。幸運的軍官們能够交一些會講英文的大學女生，看護和紅十字會的女孩子。普通兵士們，似乎誰都打算親身體驗一下軍官們所說關於中國婦女的事不是真的，却不得不嫖妓女，有的人滿足於妓女，有的人不滿足。於是性病百分率奇高。駐昆美軍的娛樂中，包括看電影，賭錢和醉酒。電影往往是舊片子，而且很壞。他們賭起撲克來，賭注有時高至數千數萬元。空軍中有人湊起了一些機件，造成一些小小的蒸溜器，從黃糖之中蒸出惡劣的酒精來，但是大部份人老是喝着中國的茅台，白乾，黃酒和蕃薯酒。

的酒。美軍在珍貴的駝峯運輸機內，無法騰出噸位來載運啤酒，燒酒和一般飲料。戰地服務的劇隊，也非常之少，而且路途遙遠，名演員很少到中國來。名演員到來時，除了頗得歡迎的例外如佛根保——奧勃倫劇團等，演員們對於觀眾總不免感到醜惡而想咒罵。

如果昆明的生活是粗暴的話，那末漸漸在全中國設立起來的數十個前哨，生活更爲惡劣。Y和Z部隊裏面的美軍人員，分成官兵四五人的小組，分佈在整個南方前線。這些人和中國戰地的團部、師或軍部住在一起。美軍每一個小組包括一個電台，一輛吉普車，幾個士兵，一兩個軍官，以及幾箱乾糧；每組有一個中國譯員，並且通常地有一個中國廚子。他們生活在沒有人跡的農家屋子內，寺院內，稻田中，以及森林的吊床上。他們和中國人一起，在塵土中跋涉，爬過泥濘難行的山間小路，拍打蚊虫，學着吃米飯和喜歡米飯，彼此之間變得互相憎恨，或互相憐愛。其中有些人終於了解在一起的中國人，並且對他們懷着真正的愛情；大部份人却並不。

空軍人員在戰場上要比在昆明生活得好得多。陳納德主張分層負責，給他們的部下以自由權。他把華中戰事付托給美國最年輕的將軍之一，此人名叫汝遜，只有二十九歲；他把希爾上校派在他的部隊裏，作爲他的代表，此人也只二十九歲。他把攻勢交托給這兩個年輕人，都是頗有成績的戰鬥飛行員，他們使十四航空隊前進部隊的威名，叫敵人聽了求饒。從他們的華東基地出發，他們擊沉了日本船艦五十萬噸以上，並且把長江以南的日本空軍趕出天空之外。

前進部隊的司令部在桂林，這是東方最可愛和最被人忽略的城市。和昆明一樣，該城也有一批中

國自由主義者住在該省軍閥的庇護之下，刺戟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對有知識的美軍，該城總有高尙的談話；對於比較粗鄙的美軍，則有女人。桂林擠塞着各種各樣的漂亮傢伙，胖的，瘦的，高大的，嬌小的，結實的，各式俱全。在日本進佔之後，香港的有名妓女，逃到了內地的本鄉，其中大部份人到了桂林，重操舊業；她們穿着絲織衣服，有着象牙似的身體，對自己的藝術有着完全的熱誠。該城有兩個妓女區，一個是在橋東，因性病率太高，美國人員不准去，另一個區域，就是大街本身，大街上每天夜裏擠滿着少女，直至深夜二三點鐘，都還有着尖聲呼喊，咕咕咕咕，大笑，和歡樂的交響樂，在這個荒誕不經的城市裏，什麼地方都沒有廉恥之感。旅館充滿了等候美軍的女人；她們以誠實的熱情，來喜歡美國人；她們學會了美國土話，和美國解剖學上的名詞，而且以銀笛一樣的聲音，講着一切粗話，這使得粗話的骯髒之處大爲減色。自然，日本間諜們越來越澈底地滲入了娼妓之中。而美國反間諜人員要在十四航空隊這個主要的戰鬥基地內，阻止情報的洩漏，感到暴躁而無力。

幾乎所有的美國兵和大部份的軍官，都有着一個固執的想法，那就是輕視和不喜歡中國。美軍多在空軍，軍需處或訓練班內服務。他們極難得看到在前線的中國兵。曾經目睹過中國部隊毫無援助地開去對敵作戰，而且死在步行中的美國人，不超過幾百。他們之中，很少人知道和關心中國農民如何生活，他們只看到中國政府貪污的官吏，和黑市場的投機家。他們認爲中國人全都是貪污，沒有效率，和靠不住的。他們看到黑市場上堆滿着帶有美國陸軍標識的貨品，他們知道這些貨品可能是美國人冒

生命的危險，飛越峽運進來，而被違法地放入商場的。他們完全缺乏辨別力，認為中國人民是和中國政府一樣的。他們看到了中國農民和農民兵士的污穢齷齪和無知之處，這並沒有激起他們的同情和憐憫，却激起了憎厭之感。美軍住在寂寞和無知的荒原上，離家一萬五千哩；他們把所有的痛苦，都歸咎於四週的中國人：

烟霧騰騰的謠言之海淹沒着美軍官兵。他們把每一次轉告時誇大到十二分的故事，互相傳告。他們真的相信中國人把幾千架飛機藏在山裏頭，雖然中國空軍只有幾百架破舊和無用的飛機，由於缺乏零件而躺在地上。他們相信中國把幾百萬桶作戰的汽油，囤積在北方對付共產黨。他們認真相信給中國政府的一切東西，都給它賣給商業投機家了。每個美軍都認識幾個他所喜歡的中國人；美軍大部份人喜歡中國小孩子；他們喜歡和勤務兵開玩笑；軍官們享有着他們在文明的中國家庭中所找到的誠實的友誼。可是，每個人都把他所認識的幾個中國人作為例外，以不屈不撓的熱心和言辭咒罵着他所看輕的中國人。這種感情是深刻入骨的。在一九四四年大撤退，十四航空隊在華中的所有基地在日軍的攻勢前紛紛失陷的時候，有一個軍官說，「上帝，在我走開之前，我真想殺掉個把『懶虫』」。

美國人的這種未受教育的態度，是這個具有許多悲劇的國家中最大的悲劇。沒有一個人曾經設法把戰爭解釋給美國兵聽，教訓他們中國人如何、和為什麼是和他們同樣的人。高級的外交使得人們無法給美國兵說，中國人民是比他們更其嫌惡貪污的，因為貪污對他們的影響比較深。最後，也沒有一個人曾經設法把很好的中國人民和很壞的中國政府加以區別。在緬甸之戰結束時，有一晚有人請一些

新聞記者向一羣美國傷病兵講話，那是在密支那的醫院裏。這一席話差不多談了兩個鐘頭。談完之後，有一個傷兵從廳背後走出來時說：「你知道，說中國人好的，這是我第一回聽到呢。」

中國暴風雨

著者 美·白修德賈安娜

譯者 以沛 端納

出版者 風雨書屋

印刷者 大千印刷公司

馬寶道六十四號

經售者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第十一章 人吃人的河南災荒

饑荒和水災是中國的憂愁之源。從洪荒的時候起，中國的編年史，一直以動人心弦，固執而無可奈何的語調，記載着這些重複發生的災難。中國歷史家在他們的史書上，一向以皇帝們應付和控制此種悲劇性的緊急事變的能力，來評價過去偉大的朝代。在對日作戰的最後幾年間，這樣的一個災荒蹂躪了北方，而且考驗了蔣介石的政府。河南大災荒故事滾入重慶，好像隨風飄入的柳絮。你抓到一點事實，這些事實就分化為一片片的閒話：「我聽見一個河南來的人說……」『我看到一封洛陽來的信……』「在西安，他們說……」。可是沒有確訊——僅不過是大災難以前中國言語中的不詳語調，那彷彿是大風暴以前的黑暗。一九四三年二月，大公報，重慶的獨立報紙，對於河南人民在中國歷史上最慘的一次災荒中所遭受的幾乎無法忍受的痛苦，登載了第一篇真相的報告。政府報之以勒令停刊三天。

大公報的勒令停刊，對外國記者發生了芒刺一樣的影響。我決定到河南去，倫敦泰晤士報福爾曼君也在同時作了相同的決定。在飛機把我們從重慶多霧的飛機場升出去之後五天，在一個非常寒冷的華北的黎明，我們到達了西安至河南鐵路線的殘肢上。鐵路盡頭，幾十家飯館擠集着，每家都發出油

炸食物的撲鼻的香氣，風箱炭火中吹出的綠色的火焰，不時輕叩着夜的黑暗。

黎明來得很慢，好像一個暗黑的舞台慢慢地亮起來似的。農民們露宿在車站旁邊幾里之內，正在等候下一輛火車把他們帶到西邊，帶向食物。他們之中大部份人來時所坐的火車，曾經在黑暗中被子軍的砲彈偷襲過。敵軍，有蓋火車和破舊的客車塞滿着人們；有些人靠在一起，緊張地坐在車頂上。在凍結的寒冷中，火車衝過危險地帶時，緊抓着車頂的手指變得麻木；弱一點的人，就倒在火車鋼輪子下面，那天下午，當我們走着他們來時的路途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們粉碎而流血的肢體，躺在路軌旁邊。不過大部份的農民，是用自己的力量步行，坐騾車，推小車來到這裏的。這個車站是河南省的大出口，是北方的日軍和南方的群山之間一個窄狹的噴泉，難民們在這裏聚集着，直至他們可以繼續走向西方的救濟機關為止。

人羣裏瀰漫着厲害的臭氣，乾了的汗，小便以及人類共同的臭味，侵染了早晨。農民們在寒冷中索索發抖，他們灰色和藍色的破衣裳，在朔風之中飄搖着。偶而皺紋滿面的婦女身上所穿的汗斑點點的嫁時衣裳的殘餘的紅色，破壞了一般顏色的單調；嚎哭着的嬰孩，有時引起了人們對於他惡臭的猩紅色的袍裙的注意。人們的呼吸，匯成發着水蒸氣的煙霧；鼻子流着清水；在萎縮的臉孔上，眼睛似乎是黑暗的傷口。腳是用破布包的，他們的頭上則圍着褪色的骯髒的手巾。

再過去五十里，並無經常的火車交通。這一段路軌是好好的，手搖車可以在白天以高速率走過，可是敵軍的大砲控制着這條路。在北邊，在黃河北岸，日軍佔領着山峯；在南邊，陝南有名的華山山

脈銜齒形的高鋒，聳入雲霄。這中間的一塊地方，像打穀場一樣平坦，有鐵路通過，那塊地方從東西西約三十或四十里，一片灰色的沒有太陽的雲幕，使它的荒涼難以言語形容。一球球長串珍珠似的人，通過着這個平原。這無窮無盡的行列，出現在地平線那邊，蜿蜒在田間的小路上，靜靜地走入灰色的遠方。中國的人群通常是咕咕地愉快的，像水銀一樣地流動，有或起或止的笑聲和咒罵聲。可是悲愁和霜雪已經把這些人們凍結成爲緘口無言的一羣。他們提起了這一只脚，又提起另一只，機械地沒有思想，像牲口一樣，他們步履艱難地走入遠方。在遠古時期，原始的人類也許就這樣地從寒冷和飢餓的史前土地上，遷移到食物和溫暖的土地上的。

滿佈在路上的一小群一小群的人，重複着同樣的事情。每小時內有數十次，若干父親推着小車子過去，母親在前面用一根繩拉着車子，坐在零亂物件上的孩子，有的時候不响，有的時候哭；有時女人橫坐在騾子上，手裏抱着小孩，好像不快活的天使一樣，而父親則在後面用一根棍子趕着騾子。老太婆用小脚跌跌撞撞一起走，有時顛脚跌倒，沒有一個人攙她起來。有的老太婆由兒子用強壯的肩頭背着走，把煤一樣烏黑的眼睛諦視着敵意的天空。年輕人單獨走着，步子較快，把所有的家當用包袱包起抗在肩頭上。路邊簡陋的墳塚，說明了衰弱的人曾在這裡倒下；有的時候一家幾口人都站着，在沉默的困窘之中，注視着一個屍體。小孩子像老人一樣撐着柺棍；有的小孩子背着的包袱像他自己一樣大；更有些孩子似乎是夢遊病者，他們不看任何東西的眼睛，彷彿已有一千年的痛苦了。在所有這些人的後面，寒冷的風從災荒之區吹過來，揚起塵土，把他們追逐到黃色的平原那邊。逃荒已經繼續

了好幾個星期，還將繼續許多星期。

五小時之後，我們到了經常通火車的地方。鐵路當局已爲我們準備了一輛專車，把我們送到河南的省會洛陽，上午我們就到了洛陽，洛陽天主教會的主教，是一個好心腸的美國人梅根，他得到各方報告，對這次饑荒，要比北方別的任何人知道的更多。梅根很客氣的招待我們，給我們熱的東西吃，並且在兩天以後，陪我們乘馬出發。我們的目的地是鄭州，有三天路——一天坐卡車，之後兩天騎馬。

路上每一個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飯店開着，供給錢袋還是滿滿的人們。有一次，我們在這樣的飯館裡叫了一餐飯，可是味道香濃的食物，我們食而無味。飢餓的人們，站在爐子旁邊，以發抖的貪饞，聞嗅食物的香味；他們的眼睛跟蹤着人們每一口熱氣蒸騰的飯，從嘴到碗，從碗到嘴。我們走到街上時，小孩子跟着我們叫「可憐，可憐！」假如我們從衣袋裏拿出些花生或乾棗之類，聚在旁邊的小乞丐們，就從我們的指頭上搶走。他們淚痕滿面的，烏黑的，在寒冷之中顯於絕望的臉色，使我們感到慚愧。中國孩子健康時是美麗的；健康時他們的頭髮有漂亮的自然油澤的光彩，他們的眼睛像杏仁一樣閃動。可是這些瘦得不像樣的人，應該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滿着濃水的窟窿；營養不足使他們的頭髮乾枯；飢餓弄得他們的肚子鼓脹起來；天氣吹裂了他們的皮。他們的聲音已經退化爲只管要

求食物的哀啼。

小村莊比市鎮更壞。那靜寂是嚇人的。人們逃避飢荒的無意識的殘酷，彷彿是一支野蠻的軍隊追逐他們。村莊空洞得發出回聲；街道是沒有人管的糞土堆，門和窗戶是釘上了，無人居住的房屋把最

小的聲音擴得很大。村子裏隱蔽的地方，一個嬰孩的哭聲，要比我們的馬蹄聲還大。兩個孤獨的女人，在一條鬼魅出沒的街上吵架，她們尖利的聲音要比鄉村出會時的喧嘩還响。

路上有死屍。有個還不到十七歲的女孩子，瘦削而美麗，躺在潮濕的泥地上。她的嘴唇有死的綠色，她的眼睛睜開着，雨落在上面。人們削着樹皮，在路旁舂碎作食物；小販出售樹葉子，一塊錢一把。掘着墳塚的狗，把人的屍首翻了出來。鬼一樣的人們，在池塘的死水裡撇取水上的青苔來吃，我們策馬馳行，設法在第三天的晚上到達鄭州。薄暮降臨時，開始降着輕飄飄和粉末一樣的雪。有一次我們的馬在一塊田地顛腳，急劇地避開兩個人，他們夜裏緊緊地靠在一起躺着，在悲涼之中哭得很响。我們進入鄭州城時，雪已經下得能把我們的馬蹄聲包裹起來了。

我們早晨醒來的時候，鄭州城是一個自色的荒塚，居民好像灰黯的游魂。死統治着鄭州。因為飢荒集中在那裏。在戰前該城有居民十二萬人，現在已不到四萬。該城會被日軍轟炸，砲擊和佔領，因此一切前綫城市半被破壞的氣息。瓦礫堆在溝渠上，大房子沒有屋頂，向天空張開口。大雪披在瓦礫和廢墟之上，彷彿是一件使任何聲音死滅的外套。我們站在大街的口中，極目眺望荒涼的道路——什麼都看不到。偶然有個把人，穿着風吹抖動的破衣，在一家門口蹣跚出現。注意到我們的人，就把我們圍起來，推開雙手祈求着，他們叫喊：「可憐，可憐！」直至我們的耳柔發聾為止。

災荒的迅速和死亡使我們迷惑。一個人在一條小街上推着小車子，車上載了一個無力的人。這衰弱的軀體，穿着藍色的破衣，裸露的腳上都是瘡。這軀體顫動着，好像是活的，但輕微地動蕩着的

頭，只不過反應路上的崎嶇。他是死。另外一些人躺在溝裏；我們把一兩個人搖一搖，看他們是否確已死掉，其中有一個人微微動了一動，我們把一張大票子放在他的手中。他麻木的手指握着這票子，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反射動作；他的手指慢慢的張開了，票子在他的攤開的手掌上抖動。另外一個人躺在那裏呻吟，我們搖動他，想設法使他起來。於是我們求旁邊一個女人幫助，要她一起把這個人搬到難民所去，這女人衣衫襤褸，緊抱着一個嬰孩。我們爲加強請求計，給她一張票子，當她伸手的時候，孩子跌下來跌在雪裡，而且很可憐地哭泣了。我們終於把這三個人都送到難民所，陪着我們的天主教神父說，『至少要讓她們像人一樣地死去』。

耶穌教和天主教牧師們共同管理着美國的救濟費，老百姓的故事是從他們那裏聽來的。強壯的人逃得比較早；所有目前留在這裏的人，是老的，弱的，以及極少數幾個住着看管明春可以長成的麥子的人們。老百姓削掉榆樹皮，把他碾碎當作食物吃。有的人把新麥連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裡，人們把花生殼搗碎來吃。路上可以看到難民們把泥土塞到嘴裏，來填滿他們的肚子，教會醫院裏住滿着可怕的腸胃病的病人，那病原是他們吃的髒東西。

耶穌教教士們的信，記載了這災荒的初期情形，其時遷徙正在秋天開始。飢餓的農民們和他們的女人及小孩，曾經聚眾強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們能够帶得動的任何東西。他們衝入麥田，搶走了田裡的穀物。有時飢餓燒掉了人類最基本的感情。一對瘋狂了的夫婦，會把他們的六個孩子綁在樹上，這樣他們離家去找食物，使孩子們不能跟着他們。有一個母親帶着一個嬰孩和兩個較大的孩子，出來

長途跋涉找食物，非常疲倦了，母親叫兩個較大的孩子往前走，到下一個村子裡找食物。孩子們回來時，母親死了。那嬰孩還在吮吸着死去的奶。在一陣慌亂之中，兩個小孩子的父母把孩子們殺死，不願聽他們嚷着要東西吃的聲音。有的家就把所有的東西完全賣掉，換一頓最後的飽飯吃，然後自殺。武裝的攻襲和劫掠，在鄉間好像傳染病一樣。教會人員盡力揀取路上的棄兒，可是他們必需偷偷地做，因為教會照呼挨餓的孩子的消息如果傳出去，丟在他們門前的孤兒，就會多得使他們無法可施。

到春天，當我們到來的時候，比較激烈而擾亂的份子，已經逃到有糧食的西方。留下來的人只是毫無暴力地在絕望之中消蝕着。如今教會的報告說起了更壞的事情——吃人。一位醫生告訴我們，有個婦人賣着她的孩子時被捕，她並不困惱，因為她堅持說這孩子在她開始賣的以前已經死掉了。另一個女人在割掉她死了的丈夫的腿的時候被捕，這也被認爲正當，理由是那男人已經死掉了。在山區裡，有更惡劣的故事。說人們在偏僻的路上抓難民，把他們殺掉，吃他們的肉。這其中有多少不過是可怕的傳聞，有多少是事實，我們無法判斷。可是我們聽到同樣的故事太多了，故事發生的地區也十分廣大，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河南，人類吃着人類。

河南是一個豐饒的省份，在戰爭以前，該省維持了居民約三千萬，他們竭力耕種肥沃的黃土，土地和人口的比例，被壓到了馬爾薩斯的極限。主要的收穫物是春天的麥子，農民在晚秋下種，五月中收割；他們次要的穀物是小米和玉蜀黍，這是在麥子收到之後馬上下種的，其收穫期是在秋天。在一

九四〇和四一年，收成不好，弄得青黃不接。一九四二年春，麥子由於缺乏雨水而沒有長。政府照常徵實，把春天的麥子收去；在這一季中，這就是說幾乎把全部的麥子收去了。省當局愉快地向人民保證說，雨是一定會下來的，他們讓農民剩下一些小麥和玉蜀黍來填充飢餓的肚子，可是雨沒有下。在一九四二年整個夏天，天氣老是密雲不雨，谷物在禾稈上枯萎了，到秋天，該省是糟窮了。

西洋的人有廣大的現代化交通機構，還有世界經濟足資依賴，數十年來已經忘掉了災荒是什麼意義。可是在東方，千百萬人們依然依靠着他們步行一天所及的地方所能出產的東西作為食料，飢荒依然是對於生命的一個重複出現的威脅。應付飢荒只有兩個辦法，這兩個辦法都很簡單，但是都需要重大的決心和迅速的執行。一個辦法是把大量穀物儘快地運到受災地區；另一個辦法是把大量人民儘快地運出受災地區。預見災荒並不需要很大的智慧：假如沒有雨，就沒有收穫，假如沒有穀物長出來，人就會死掉。

中國政府却未能預見災荒，災荒來了之後，又未能及時動作。早在十月間，災情的報告已經到了重慶。十一月間，政府派了兩個視察員到河南去，他們旅行了兩條主要的汽車路，回來說危機嚴重，必須立刻做點事情。政府為應付此事，撥了兩萬萬元紙幣作救濟金，並且訓令省當局減輕賦稅。重慶的銀行把成捆的紙幣裝在卡車上，叫一隊卡車運紙幣到災區去，却並沒有運糧食。要把很多的穀物從華中經過破碎而山嶺重重的交通綫運到華北和河南，確實是沒有希望的。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陝西省，陝西存糧是很充足的。為了避免災禍，強有力的政府就應該下令陝西把糧食立刻運到鄰省河南。可是

爲了河南而強迫陝西，就會破壞政府所認爲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勢力均衡。穀物也可以從湖北運到河南，但湖北的戰區司令不准。

河南賑款到得很慢。在我們三月間到河南時，指撥的款項二萬萬元中只有八千萬解到了省政府。甚至這一筆錢也處理得很壞。政府官員們把此款留在省銀行裏生利息，而喧鬧地討論着作何用途。在某些地區，當錢款分發到挨餓的村莊裏的時候，當地官員收到此款後，扣掉了農民所欠的稅款；甚至國家銀行都尅扣賑款。中央政府發出的賑款都是票面國幣一百元的票子——因爲一斤麥子只消十六至十八元，那票面並不大。可是當地囤積者拒絕人們以大票購糧，農民要買糧食吃，必須把百元票兌成五元和十元票。這就得不到國家銀行去兌換，國家銀行却大打折扣，大票子換小票子要抽取百分之十七。河南人民所要的是糧食。直至三月爲止，政府供應了大米一萬袋，雜糧二萬袋。平均起來，秋天起一直在挨餓的一千萬人，每人差不多只有一斤。

賑濟工作的特點是愚蠢和沒有效率。但可怕的悲劇，更由於各地官員的行動而複雜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農民是在死亡中。他們正死在大路上，死在山裏，死在火車站旁邊，死在自己的泥屋裏，死在田野間。農民必須付的錢稅並不多；基本的賦稅是徵實，徵取他所收的穀物之一部份。縱然重慶有了好聽的減輕賦稅的決議，軍事和地方當局却以夢想得到的一切辦法來勒索賦稅。各縣政府要求農民繳付的穀物，要比他田裏實際出產的穀物還多。而且征實雷厲風行，吃着榆樹皮和乾樹葉的農民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袋穀種繳給稅局。餓得走路都不容易的農民，還必須繳馬料給軍隊，這些馬料

要比他們寒在自己嘴裏的髒東西營養得多。繳不出東西的農民就被逼得無可路走；他們賣掉牲口，傢俱，以及土地，得錢買穀以交納稅項。最可怕的風氣，是土地投機的颶風。西安和鄭州來的商人，政府小官員，軍官以及依然有糧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罪惡性的低價收買農民祖宗傳下來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脫售同時進行着，和飢荒的激烈性成正比。

按照我們美國的標準，中國政府的官員們生活並不奢侈，不過他們的餐桌上蒸騰着酸頭和野雞肉類的熱氣。國民黨黨務機關的最下級的僱員，每天從稅款之中抽取麥子約四磅。在我們回到重慶講這事時，什麼都給否認了。聰明的人們告訴我們，一般外國人在中國通常是如何地輕信，甚至河南省的主席，在我們訪問他的舒服的辦公廳的時候，也說我們誇張了事實。他說：「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征收的，決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收稅時實際上的野蠻和侮辱是傷心慘目的，但和收稅同時進行的貪污更壞。徵收穀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稅是他們薪水的補貼，是一種搶劫的特權。每個月在稅款分配之後，高級軍官們就把多餘的穀物分了，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泡入私囊。這種不法抽得的穀物，實際上是到達市場穀物的唯一來源，而控制穀物的囤積居奇者，把價格抬得天一樣高。甚至用美國錢工作的美國救濟當局，也被迫請求軍官們購買他們囤積的糧食，再分配給農民，那些糧食原就是從那些農民之中勒索來的。出賣穀物的軍官們，決不爲了人道而稍作讓步；按照當時的濶價以及河南災荒中的價格，能在美國購買六十斗麥子的救濟款項，在中國只能買一斗。

這些事實並不是從報章上收集得來，而是從農民嘴上收集得來的。我們曾經設法跟某些老百姓談話，有一天晚上，當我們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群中年人來訪問我們，說他們代表著當地社會。他們起草了一個條陳以及一個報告書，希望我們帶到重慶去。他們給了我們兩份。這報告書說，全縣十五萬人中，十一萬人已什麼東西都沒有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約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從饑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品爲麵皮一萬斤。我們和這群人的領袖談了一下。他有地嗎？是的，二十畝。他收穫多少穀物呢？每畝十五斤。抽稅要抽多少？每畝十三斤。

指揮官和一些軍官及兵士注意地聽着。那指揮官是一個將軍，他忽然暴怒起來，把那個人叫到旁邊，我們聽到他用很响的耳語叱責這農民。於是這農民回到我們這邊來，說他剛才說錯了，抽的稅其實每畝不過五斤。那將軍要求我們把這些農民剛才給我們的書面報告退回給他們；我們退回了一份，但將軍堅持必須把另一份也退回。我們相對默然，在昏暗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那老人在發抖。我們明白，待我們走後，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會歸在他身上，而且我們自己也害怕；我們交回了報告書。

這之後，我們儘可能在沒有任何官員在場時和老百姓談話。在任何地方，同樣的話語重覆着同樣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飢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征稅，我們是能够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我們會和某區的一個軍官談話。他奉令本年度征收穀物四十萬斤，但是該區的總收穫量只有三十五萬斤。他從什麼地方找其餘的五萬斤呢？在一個寂寥的鄉村裏，我們看到有一個人正在吃一種蕎麥麵，樹葉和樹皮的混合物。他自己的地上去年收麥五百斤，政府都給征去了，還

說不够，于是他賣掉了自己的耕牛和驢子，以彌補不足。

在馬背上旅行了兩個星期，我們每天和農民及小官員談話。我們旅行中所下的雪滋潤了土地，下一季的春麥似乎長得很高而青蔥。麥子以兩個月後就有食物的諾言嘲笑着農民。有一個老人說，『不錯，很好，但誰知道到吃的時候我們是否還活着呢！』

我身邊還留着一張菜單，那是我們離開以前的一夜，鄭州的政府長官們宴請我們的酒席的菜名。他們請我們吃了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此外還有炸春捲，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兒餅，餅上灑滿了白糖。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我們以我們認為最可靠的訪問和數字為基礎，粗粗地估計了一下。河南三千萬人民中，逃出了該省的人大約有兩三百萬，死於飢餓和疾病的也有兩三百萬。這是中國戰爭中最大的災難之一，世界上最大的災荒之一。我們帶了憤怒的心回到重慶。首都溫和的恬靜依然未減。賦稅在名義上是減輕了，不管農民所証明的事實是相反的。死人麼？那是撒謊。野狗掘土墳麼？那是我們虛構的想像。我們知道，在河南農民的心底裏，有一種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們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農民的忠誠化為烏有。可是重慶誰也不相信我們。直到一年後日軍在這全部的插曲內，最後加上歷史性的一幕。

一九四四年春，日軍決定掃蕩河南省，以準備南方更大的躍進。中國在河南省的戰區司令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蔣鼎文。蔣鼎文當河南的司令官已經當了許多年。他上任後第一樁事情就是變

一道護城壕，來加強他的總部所在地洛陽城；他認為最好的戰畧就是這樣。他也逮捕了他能在該戰區內找到的每一個共產黨員以及有共黨嫌疑的人。他在該省內最著名之處，是他叫部下官兵威嚇民政官吏的幹才。他曾叱罵河南省主席，使他在惶恐之下和他合作製定一個計劃，該計劃剝奪了農民手上最後的穀物。河南戰區真正的指揮官是蔣氏名義上的副手湯恩伯將軍。湯恩伯在軍隊方面和勢力方面，都比他的上司高得多。湯恩伯是黃埔系的領袖之一，是委員長的寵將。他是一個比較快活的人，瀟灑，有幽默感，精力充沛，曾竭力在不影響軍隊的範圍內緩和災荒的慘狀。但由于他在河南的顯赫威權，農民和一般平民認定痛苦的製造者是他而不是蔣鼎文。他們譏刺道，「河南有兩害：黃河和湯恩伯」。湯恩伯和蔣鼎文指揮着五十萬軍隊。

日本人進攻時所用兵力，約六萬人。他們在四月中旬出擊，像利刃切牛油一樣割斷了華軍的防綫。日軍進攻時，湯恩伯沒有在司令部里；他一直沒有能夠回去指揮戰事。日軍以五百人為一隊，佔領了華軍幾千幾萬人守着的山隘和路口——某司令部的人員在敵軍掩殺到面前時，正在太陽下打籃球。在災荒之時蹂躪農民的軍隊，由于多年的怠惰，本身也士氣低落和有病。他們訓練不佳，槍炮笨拙，彈藥缺乏。在攻擊之下，他們四散逃跑了。中國的統帥部瓦解了，它已無法控制局面。中國第十二軍和第十三軍在逃跑時互相廝殺。在戰區中心洛陽，司令部里瀰漫着驚慌。河南軍隊手上有軍用卡車七百至八百輛，殘破之程度不等。其中一百輛用來馳運援軍，以支撐崩碎的前綫；其餘的卡車都被軍官們用來搬運私人財產。這些軍官都是帶了太太，孩子和親戚們上任的。如今他們的行李，傢俱和財

物裝在軍用卡車上，衝到安全的後方西安。軍官們爲了補充軍運和自己的用途，開始征用農民的牛。河南是種麥子的地方，農民主要資本就是耕牛。軍方徵用耕牛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農民等候這個時機已經等了很久。他們身受很久的災荒以及無情的軍方勒索之苦，已經受得太夠了。現在他們回過頭來，把獵槍，小刀和鐵耙武裝了自己。他們開始解除個別士兵的武裝，後來把整連整連的人繳械。如果華軍能支持三個月，那才真的不可思議了。當鄉村處在武裝暴動的狀態之下時，抗戰是一無希望的。在三個星期之內，日軍奪得了全部目的物；平漢路落入日軍之手，三十萬中國大軍停止存在了。

第十二章 湘桂之役

新聞檢查的任何辦法，都無法阻止河南崩潰的消息滲入重慶——戰爭開始以來，中國老百姓翻過過身來對自己的同胞作戰，這是第一回。前線有成千成萬的賣國賊投降了日軍，淪陷區裏有數千百萬的中國人消極地或積極地爲日軍服務；可是無組織的農民在國軍和敵人作戰的時候，變得血脈冰冷而對自己的國軍作戰，那是空前未有的事情。重慶沸騰着新聞，沒人理他的宋子文，住在他郊外的邸宅裏，忿怒地叫嚷着沒日到來的預言；孫科痛罵整個政府；共產黨人則難於隱藏其對政府的鄙視。甚至在諂媚的朝廷中和外界絕緣的蔣介石，也感染到一種危險之感。但是，在重慶尙未來得及咀嚼河南屈辱的教訓的時候，日軍又行動起來，發動了六年中最大的戰役。

中國東部的海岸綫恰如半圓形，那直徑是長江，中心城市是漢口。從武漢起，有一條鐵路像箭一樣直指南方，分割沿海的平原和內地的高原及重慶。日軍打算沿這條鐵路南下，把中國斬成兩半。現在事實過去了，我們可以把日軍此次攻勢作爲沒落命運的最後的掙扎。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前途似乎還有多年堅苦的戰鬥。攻勢中日軍力量之大之多，似乎表示日本帝國的實力毫無漏洞；這個攻勢似乎是可以挫敗一切戰畧的一種努力。日軍確乎打算在這次夏季攻勢中獲取許許多多東西。

第一，他們打算掃蕩大陸上的美國空軍。十四航空隊的前進基地一向是破壞日本海上商業的美國戰鬥機和轟炸機的巢穴。美機出擊海上，已經消滅或擊傷敵船一百萬噸——佔日本戰前商船的五分之一。日軍就要攻取遍佈在鐵路沿線和公路沿綫的這些空軍基地。日軍如能消滅十四航空隊的直接威脅，也就能消滅B 29空中堡壘較大的長期的威脅。B 29式機從華西深處出發的襲擊，已使日軍嘗到了災難的滋味。美軍正在華中計劃加長十四航空隊前進基地的跑道，以謀降落巨大的空中堡壘。從這些擴大的基地出發，B 29將可能更其深入，破壞其心臟地帶。日軍不知道正在他們計劃進攻華中基地之際，美國計劃者已經弄停當了塞班島出擊，使轟炸機更接近本州的計劃。

第二，日軍要挫敗美國的陸上戰畧。史迪威其時進攻很順利，快要衝破緬甸的封鎖綫，史迪威想從華中衝到海邊，在一九四五年內策應美國海軍，把日本帝國分割爲二。日本沿鐵路從北到南打開一道橫亘大陸的走廓，希望使史迪威即將到達的華西山區，不至於和尼米茲打算登陸的海岸發生接觸。

第三，攻擊的成功，也有非常巨大的宣傳價值。至少在地圖上，日軍就有一條橫亘大陸的交通綫，從北方大陸的滿洲起，一直通到華中及越南，和新加坡及南洋發生直接接觸。以目前所得的材料而論，不可能認爲日軍參謀部當時如此之笨，竟打算把這次攻勢目標放開發南洋上；日本缺乏車輛和汽車來利用這條路。在日軍打通此路後一年間，日軍從未利用這新的走廓來把一噸橡皮、汽油或錫運送回國，供應它挨餓的工業。可是在一九四四年，日本宣傳家們對於他們通到南方的不可攻克的走廓大吹而特吹。

日軍最後一個考慮，與其說是穩重的預計，不如說是一種希望。那就是要在東方把中國的兵力消滅得這樣徹底，把蔣的軍隊弄得永遠無力。這個目標日軍幾乎差一點就要成功。

在河南戰役急遽結束之後兩星期內，日軍已準備定當，開始了五百哩的長征，從漢口沿鐵道及湘江出發，直下桂林及柳州，那是他們的主要目標。日軍是打擊着美國在亞洲本土上的主要利益，可是美國人除了注視戰局，並且希望奇蹟出現以外，毫無辦法保護自己的基地。

華中的保衛責任，是在薛岳將軍手上，此人對於自己「長沙之虎」的綽號，頗為欣喜。湘江流向南方，他的省會長沙是湘江峽谷的眼險。長沙是鐵路的鎖鑰，中國產米最豐富的地區的鎖鑰，防衛滿佈着美軍機場的峽谷地帶的鎖鑰。薛岳是一個猛烈的戰士；他喜歡美國人；他讚美十四航空隊，他把保衛十四航空隊一事引為自傲。他的好名譽來自以前的三次戰役，每一次他都擊退了日軍對長沙的攻擊。這個威名爲中國人和美國人重視，日軍却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一九四四年大變之後，這威名就消滅了。

薛岳是一個火辣辣的矮小的廣東人，他是湖南省主席，該省老百姓痛恨他的一大群廣東朋友，他據說有十一個軍，他直接指揮下的人可能有二十萬人。東邊另一個戰區余漢謀將軍也是廣東人，有四個軍，共約十萬人。南邊在越南邊境上，是另一個廣東人張發奎將軍，統轄約五萬人。薛岳不喜歡而且不信任中央政府，中央也不信任他。雖然他在早年公開反對過蔣介石，他在一九三七年服從了全歐

的抗日事業，以非凡的英勇戰鬥着。至一九四四年春，六年的僵持却吞掉了他早期的熱誠。他有保衛美國基地的責任，他在報紙上看到美國供應品極其豐富，但他一點不收到。他覺得受人忽視和欺侮，他的態度傳給了他東南兩方面的其他廣東將領。

一九四四年五月底，日軍從長江邊的基地推進，渡過汨羅江向南攻擊長沙。他們準備此次進攻達數星期之久。十四航空隊偵察機有報告說，雖然前綫以北的公路在白天並無任何移動的東西，在夜間，日軍卡車頂上黃色的燈光却照耀達數里。前進部隊的戰鬥機和轟炸機打擊日軍的集中，襲擊河流、渡口和集結點。驅逐機的機師一天出竄三四次，飛得精疲力竭；他們回到基地，只是拿點咖啡和冷三文治吃吃，吃完馬上又飛回去打擊敵軍，敵軍只在夜間行動，白天是消融在鄉村中的。

薛岳和日軍之間，有一塊各國所無的最荒涼的無人地帶。以前攻擊長沙時，日軍總分幾路進攻，每一次薛岳總把他的正面部隊後撤，佈置到日軍的側翼去，從後面切斷他們，逼迫他們撤退。有一次，在一九四一年，日軍已滲入長沙，後來還是被逼退出，被驅回原來的陣地。這次日軍來時，帶着以前所沒有過的實力和決心。薛岳用老法子來保衛這個城市，用的是同樣的戰術和同樣的部隊，但是比上起一次得到光榮的時候來，他的部隊已經老了三年，武器已經舊了三年，兵士也已經餓了三年了。

爲了保衛長沙，薛岳把自己戰區內所有的砲兵，幾乎完全集中在一處——總共是不多不少五十尊老朽的大砲——並且把它們佈置在巍巍山的觸目的山頂上。駐防城內的，是有名的第四軍，該軍光榮的革命傳統曾獲得了一「鐵軍」的別名；第四軍只有一萬二千人，日軍的進擊部隊據估計有二萬四千

人，薛岳完成了這些配備之後，就把他的總部向南後撤約一百哩。他希望把日軍驅過長沙，由他們進城時用大炮從嶽麓山加以捶擊，從後面包圍其兩翼，逼迫他們後退。

中國軍隊每一級指揮部裡的特點——口角和內部爭鬥，這就立刻表現出來了。嶽麓山上的炮兵指揮官因為炮兵無人掩護，要求第四軍派幾團人去。第四軍的軍長拒絕了，於是戰區參謀長加以干涉，命令第四軍派步兵供給炮兵；第四軍軍長依然拒絕，說這要薛岳本人的手令才行，而打到薛岳處的電話無法打通。日軍進來了，他們把沒有步兵掩護的炮兵殲滅，然後掃滅了沒有炮兵掩護的第四軍的步兵。第四軍活着逃跑者只有四千人，該軍軍長由於用軍卡軍疏散私人的貨物和細軟，也由於城市失守時逃走，就在蔣介石的命令下被捕槍決了。

這一戰於是變成大混亂。人民並沒有像河南那樣起來反對軍隊，但該省政治中也有許多劣點，使日本間諜在該省逍遙自在。日本派了中國便衣隊，穿了農民的衣服，二三百人一隊，滲透入山中，偵察軍隊的佈防情形，襲擊小村莊，並且放火。有時便衣隊個別的混在難民群中；他們偵知了一個鄉村的秘密和工事之後，就在夜裏用燈光作暗號，放了火，等待他們的同伴從山上直掃而下。日本間諜們帶着手榴彈和手槍；他們奉命找到任何中國軍官及美國人士，即加以殺戮。在湖南作戰的部隊多半是河南人和廣東人，他們的方言是和本地人不同的；中國軍隊於是把一切不能證明自己身份的平民槍斃掉，當他們越來越神經質的時候，他們就開始隨意槍斃嫌疑者，鄉村在動蕩中。成千成萬的人在逃亡。難民和第五縱隊無法區別。軍隊似乎是在浮沙上作戰。

於是重慶加以干涉，這之後兩個月之久，前線任何地方沒有真正的指揮部。何應欽的參謀本部，薛岳，張發奎和自崇禧都有互相衝突的意見：前線指揮官們不信任重慶；重慶不信任前線的指揮部。當軍隊退入峽谷的時候，薛岳企圖在山谷的狹窄之處集中兩個軍，在一個名為失亭的據點上建立堅強的陣線。重慶不贊成；於是兩方面妥協了一下，把一個軍向南撤退，另一個軍留着站住。留在後面的這個軍既無力量抵抗，又無時間逃遁，被打得所餘無幾。許多星期以來，委員長在對於這位廣東指揮官的不歡喜和不信任，以及支持前線的迫切的國家需要之間找到了平衡；當委員長最後決定從北方封鎖中共的地方派一個軍步行到南方來援助薛岳的時候，已經太晚了。委員長叫薛岳向西撤退，退到四川和貴州的山腰里，這就能使薛岳無法獨立控制湖南的米糧，而把他完全拉回中央政府的軍需系統中。薛岳說，他不願渡過湘江，而以數量不夠的船隻在敵人的火網之下從東向西撤退。因此他退到湖南南部，這樣就擴大了西邊華軍主力和他自己根據地之間的縫隙。日軍繼續推進着。

六月間，余漢謀奉命帶六十二軍援救薛岳。該軍沿鐵路北上至衡陽，於六月中旬到達。薛岳要把六十二軍和自己的第十軍一起合守衡陽，使衡陽成爲堅強的據點。衡陽是一個鐵路中心，有一條鐵路到廣州，另一條鐵路到桂林。重慶和薛岳這回又不對頭了。重慶下令第十軍應該單獨守衡陽，而六十二軍應向西南方撤退。這好比艾森豪威爾在比利時之戰中必須和馬歇爾對前綫任何一個行動辯駁數星期。重慶充滿着猶疑的空氣。當參謀部人員辯論着戰略以及和薛岳爭吵的時候，蔣介石正在考慮美國的改革要求，並且在他有名的國會上宣佈他對蔣夫人的忠誠。至六月底，湘南這個灰色的沒有生

氣的產米城市衡陽給完全包圍了，第十軍陷入重圍。炎夏的熱氣籠罩着湖南。富綠色的田野間閃爍着熱浪的光芒的時候，瘴疾和痢疾流行起了。十四航空隊用手頭一切的力量刺入日軍的供應線，它消耗了它的飛行員，飛機，地上機械師；它的軍官們形容枯槁。士兵們眼睛陷入深淵。

整個華中都驚慌萬狀了。桂林愉快的漂亮姑娘們打起鋪蓋準備走。夜總會廳上貼了佈告：「再見，朋友們，一路順風」，藍都咖啡館也貼着這樣的佈告，下面署名是「安娜和葉逢妮」。難民湧入鐵路線，帶着自己的小孩鋪蓋和行李，塞進車箱。他們爬到火車的頂上，叢集在火車頭上，在篷車桿上鋪了木板，睡在木板上。美軍官兵混雜在這次大遷徙中。在大雨滂沱中，有一個美國軍官在難民的火車頂上幫助一個中國女人生下一個小孩，把蘇化尼里米特的碎粉給母子兩個人吃，直至兩人脫離了危險期為止。

在衡陽，第十軍神奇地站住了。它的地方越縮越小，它的陣地是絕望的，可是它以拼命的勇敢戰鬥着，令人回想到上海之戰的光景。於是重慶的寒暑表又突然上昇了。軍事發言人說日軍已經擋住。報紙狂喜地吹捧着第十軍一萬五千苦戰的戰士的光榮的戰蹟。中國參謀部把戰事的間歇狀態解釋為日本野心的終局。他們宣佈已發動大攻勢，要把日軍趕回原來的陣綫，六十二軍奉命回衡陽作戰，這是薛岳原來的主意。重慶久已等待着這樣的時機來作最後的號召，報上大為張揚——每天克復着許多小據點；將軍們宣佈華軍已和被圍部隊取得聯系。在前綫，在離開重慶很遠的地方，那反攻的面貌却是完全不同的。最高統帥部在表冊上有數百萬軍隊，可是在應該戰鬥之處還是不到十萬人。其中有一軍人，即六十二軍，曾向出擊陣地前進；該軍派了一師人，向敵人所佔的據點推進；該師長從自己三團

人之中派出了兩團——中國的反攻不過如此而已。

我和六十二軍一起向日本的包圍圈進發，和我一起的是路透社的格蘭巴路。鐵路盡頭到前線的距離約三十哩。我們在黎明時進入軍隊的行列，但無雲的天空已經灼人了。我們極目四望，山上山下都是行軍的人。他們步行穿過稻田，掙扎着每一步；他們汗流夾背，排成雙行，匍匐走過每一道溝和毀壞了的橋樑。三人之中有一人有一枝步槍。其餘的人搬運着軍需品，電話線，米袋和機關槍的零件。在沒有笑容的兵士之間，穿着藍衣服的農夫苦力，拖着疲憊的腳步；他們是準備補充搬運工作的。整個部隊裏沒有一輛汽車，也沒有卡車；大炮一尊也沒有；極難得有馱滿東西的牲口，有時有一只中國小馬，出現在行進中的軍隊的頭上；馬是預備給團長以上的軍官乘坐的。兵士們走得很靜，帶着中國士兵的奇怪的憤怒，他們除了旅途終點的災難以外，並不希望遭逢別的東西，並沒有人有劇烈的痛苦，每個人無非把幾十年來的忿怒在路上延長一天而已。他們強壯而棕色，但是很瘦。他們的襪是老舊的，他們的草綠色制服是襤褸的，每個人腰上掛了兩個手榴彈，每人頸子裡圍着一個藍布的長袋，袋裡塞了米，那是前綫上唯一的口糧。那長袋好像意大利臘腸一樣。他們的腳在草鞋子上破爛而腫脹。他們頸上蓋了樹葉編成的鳥巢似的東西，以遮避日光，並且，據說，也有掩護的作用。他們汗流如雨，灰塵在他們的左右揚起。炎熱緊纏纏住個田野，稻田裏升起令人眩暈的閃閃有光的波浪。

在路上，我們遇見一群群的農民，他們是被民政官員強徵來爲軍隊服務的。部隊指揮官在這些站

頭上徵用挑運行李的人，正像其他軍隊裏的卡車在加油站上加注汽油一樣。和軍隊一起行軍的農民們，要做到精疲力竭為止，於是換班，軍隊給他們一點米，又把他們送還服務站。在夜裏，部隊從前線回來縫哩，躲在毫無人跡的鄉村裏，稍作休息。兵士們把農民們留在家裡的豬或蔬菜拿來吃，他們把農民屋子裡的木板，門和板壁折下來做牀；他們把木桶，柵欄和木槓劈掉生火，以作煮水煮飯之用。

一天早晨三點三十分，攻擊開始了。日軍駐守在衡陽以南的高山上，六十二軍的部隊開到高山對面的比較低的山背上。進攻的一師有兩尊法國式的七五炮，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東西。還有九尊迫擊炮。該師有七五砲的砲彈二百發，所以用起砲彈來好像一個守財奴數金洋鏰。從三時三十分到晌午時為止，華軍爬上日軍陣地的山坡，他們的步槍和刺刀打算把敵軍打走或刺走，但晌午時候日軍還是在那里。格蘭巴路和我在下午攀上了中國陣地最高處觀戰。中國迫擊砲間歇地在日軍所守的山頭上噓噓叫着；機關槍和步槍在夏日的炎熱中，間隔很久才熱鬧一次；整個前線上沒有一個人移動。

我們等了三天，看到了反攻的進行。然後我們向後轉回家了。我們知道我們可看到的就是攻勢，再不會有更多的東西了，肉和血所能够的事，中國士兵正在做。他們步行上山，死在太陽裏，但他們沒有掩護，沒有空軍大炮，沒有指導。他們的命運是註定了的。

日軍在衡陽附近停了一個多月，他們不過是在整編部隊。中央政府把其他的疲乏了的軍隊，一軍又一軍派到包圍線上，設法衝進去。事實上中國軍隊共十萬人光景曾設法衝入敵軍二萬五千人的防線。重慶限制了戰地指揮官的一切行動；重慶決定了戰鬥應在何時，如何以及何時發生。將軍總是

零散散開到，作微弱的攻擊。華軍數量上的優勢，從沒有被用來作一次作集中的衝擊；新到的隊伍，只不過用來補充經常的死傷而已。

八月底，在夏末比較涼快的時候，日軍恢復了主動。在五天的戰鬥中，六十二軍完全消滅了。日軍向南進擊，通過山林，到達全縣的關隘，那是北方進入廣西的具有戰略性的各口。有一支援軍第九十三軍，把守着這個谷口。該軍是從北方開來，參加華中戰鬥的。部隊在路上挨着餓，他們到達廣西後，就洗劫了柳州火車站旁邊的許多米倉。紀律恢復以後，他們匆忙地跳上火車，向北進入陣地。他們有日本造的老式的炮，他們疲倦了，他們從沒有跟美國空軍合作過，他們是怕飛機的；他們並沒有建造壕溝和掩護體的材料，他們並不了解地形，人民和敵軍的位置。他們分散駐紮在谷口上。指揮官並不知道自己的側翼在那裡，不知道和友軍相隔多遠，也不知道敵軍是在那一處村莊。他向跟着他的美軍聯絡組保證說，他一定堅守陣地到最後一人，決不後退一步。美軍聯絡人員得到保證後就去睡覺了。他們夜裡被行軍的脚步聲吵醒，他們發現九十三軍正向南移，未發一槍一彈而放棄了這個谷口。

這次戰役中這類意外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委員長下令槍斃了九十三軍軍長；他下令槍斃桂平的指揮官；他下令槍斃其他的一些軍官。但是中國軍隊的士氣早已十分低落，決不是軍法從事所能重新建立起來的。全縣附近谷口的失守，就是保衛華中戰役的結束。挺進中的日軍和美軍主要基地桂林之間，相隔不過六十五哩平坦的地方。在日軍於九月中旬突破谷口後的女日，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將軍

飛到桂林作一次迅速的觀察，史迪威下令前進空軍部隊指揮官改選，要他把桂林附近美機場的所有跑

道和建築物都炸壞，只除了一條轟炸機跑道是例外，這條跑道要用到最後一分鐘，要用來把美國槍炮和彈藥運給張發奎，張發奎如今指揮着這一帶了。

最後九天的桂林然是荒唐的。中國軍隊已經分崩離析了。有一支一萬四千人的部隊，可用的步槍只有二千支。其他前線開來馳援的後備隊散佈各地，毫無組織的分散在五百哩的區域內。其中有些部隊是疲憊了，有些缺乏經驗，但所有的部隊都沒有領袖。有些部隊有中國的老式槍枝，有俄國槍，有些戰前日本的砲。所有的部隊彈藥都不够。但日軍是強大的；日軍精力充足，有機動力，有騎馬的，有步行的，有坐在卡車和俘獲得來的火車上的。到處都有第五縱隊，而不安定的囁囁私語，以及對第五縱隊的恐懼，要比第五縱隊還壞。每個兵士都覺得有漢奸像影子一樣釘着他。在桂林初期疏散的前一天，兩個美軍在近郊的機場內準備破壞，被山中一些平民裝束的人開槍射擊；中國軍隊捉住了這些暴徒，把他們就地槍決了。

在桂林，中國人準備着末日。平民的疏散已經完成了；最後一批逃難者正在撤離郊外。連內地的山道之一，經過美國在良台（譯音）的空軍主要根據地；難民們沿着山道走繞過飛機場的邊緣時，抬頭看到飛機還在天空中出出進進，作戰鬥和疎散的飛行。有一個人躺在路旁死掉，人們把稻草蓋在他身上，繼續前行。一個女人把她一只走壞了的流血的不成形的腳包紮起來，一撓一撓地繼續走。一個農夫走過，把自己的孩子挑在籃里；那孩子咯咯地笑着。

成千成萬難民擠塞着火車站。各方面都騰起紅色和橙黃色的火燄，火光下可以到懸掛在城里天空中的一團團黑烟，沉重的夜的空氣中，充滿了月台上一堆堆七橫八豎籬着的人們的臭氣。嬰孩們在黑暗中啼叫，母親們咒罵着，老人們咕嚕着。在車廂里，人堆得密不通風。有的人已經擠在車子里好多天。他們不敢離開自己的地方，因為怕一下車無法上車。他們無法動彈欠一欠身，緊擠在那里。他們身上的臭氣、汗氣和飢餓的呼吸混成一大團，飄浮在車場上。桂林的火車修理廠和機器是整個自由中國最好的，鐵路當局必須決定如何利用剩餘的車輛來疏散——決定還是裝難民呢，還是裝自己廠里的機器，還是裝美國供應品。這三者都一定會有一部份裝不了留下來的。

城中寂靜。房子釘起了，店舖是空的。中央酒家在這星期之初把自己特別的「頂好」牌威士忌酒減價，從五百元減成六百元。過了一天，又減了一百元，最後一天乾脆送給依然留在城裡的任何美國人喝，之後，該店釘上了大門。熙都，巴刺蒙，紅梅，湖濱，樂群以及其他一切作樂場所都關門了。老百姓臨走的時候，把號召抗戰的紅紙黑字愛國標語黏在門板上。兵士們在空凋的街道上構築障礙物和壕溝，以備將來之用；他們偷製了空無人居的店舖，把上品的食物和酒儲在營房裡。我在北門看到的最後五個士兵，剛吃完了十七瓶酒而在歡呼作樂。空軍基地中的美國人並無混亂或驚慌。破壞基地的技術已經成爲正當了；事先一切都有計劃。在後方雲南高原上，空運司令部好多天以前就準備好運輸機來運軍用品。從印度飛入昆明或桂林的每一噸炸彈，汽油，零件和修理器械，在路上所化的汽油就得三噸。現在的撤退，使飛越駝峯的一半工作成爲徒勞了。

一切人員不得不集中起來，使空戰繼續，沒有一個鐘頭的耽擱，使飛行員能從桂林出發作最後的襲擊，在薄暮時分向南飛行，獲悉下一天應該襲擊的是什麼地方，以便到明天又在後方的基地出發繼續揮擊敵軍，沒有一分鐘遲誤。轟炸機師和飛機一同走，戰鬥機師負責把自己的人運走。各中隊的副官們都沒法定下足夠的卡車或運輸機位，以運走留在後面的地勤人員。空運司令部的運輸機在機場上排着隊，一行十架，把它們從前運來的貨物和人員運走。一些一千磅重的炸彈送到機場來了，導火管拔掉，空槽裡填以麵團似的C化合物（炸藥）。人們在吉普車頭上的燈的鬼影幢幢的照耀下工作，把雷管捆起投在裝滿了炸藥的筐子中。依然在作破壞工作的美軍，幹起事來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在遠處微弱火光的照耀下，其中兩個人正在討論炸藥。一個人說，「C化合物可以吃的」，說着把軟綿綿的一塊C化合物遞給站在他旁邊的人。另一個人說，「你也可以吃炸藥，你要肚子餓的話，滋味是很好的」。又有一個人說，「行，不過假如你炸藥吃得太多，不妨再喝幾瓶酒，那麼你明早晨就飄飄然了」。有人神經質地咕咕笑着。於是寂靜，附近其他幾個兵在談話，作為寂靜的點綴，空氣中飄蕩過來的話聲，似乎和其他一切東西一樣地不是真實的：「除了我的老頭兒之外，我家裏誰都不打鼾——噯，老弟，他真的常常打鼾呢」。

在桂林的最後一夜，必須把五百五十所草屋和營房炸掉。這些草屋和營房藏在基地周圍的山中。破壞人員在每一所房子裏放了一桶汽油，通常放在木箱上。一個軍官下了命令；一個兵帶了卡賓槍站在門口，另一個人把電筒照亮那汽油桶，於是卡賓槍响了。打了兩三下。兵士等了一會兒，等汽油從

那洞穿的桶裡流出來，汽油煙霧充滿各房間。然後他再開一槍，煙霧一下子就着火了。有的草屋頂在火焰中一跳就跳好幾尺高，火就像奔騰的水一樣流遍各個房間，火頭閃爍着金色和白色的光芒，每個火頭上都蓋着油煙。草房頂上着火的時候，火焰以令人難以相信的速度，從正樁蔓延到屋簷，火光融融中，山上的青草像白天一樣的鮮明。房子一所一所地燒着，直至整個山谷裏好像有一枝非常巨大的軍隊在點燃營火。從其他的倉庫那邊，我們聽到炸藥的轟轟聲以及遠處炸彈聲。有些營房裏有彈藥，那是不注意的人們留下的步槍彈和手槍彈，這些彈藥噼拍噼拍好像玉蜀黍的爆裂，一個營房有一批照明彈直衝雲霄，在山林之上劃出一個白色和紅色的拱門。

翌晨，兩架飛機離開了最後的跑道，一架是運貨機，另一架是汶遜個八的另25機。我在那天早上和汶遜一起飛出。他把P-25機升空以後，又轉回頭來到機場上空，肩着翅膀似的煙霧，表示那是我們的營房從前所在之處；美國在中國這個最大的機場上，還留着一條跑道，這條跑道是要在最後時機利用，來把軍需品運給張發奎部下的被圍士兵的。其他跑道都有黑色的地穴，好像沒有眼睛的眼窩一樣難看。

「我要寫一本書描寫這個戰役，」汶遜說：「書名是『火中撤退記』。」

在下一個星期，日軍推進到桂林二十五哩以內。這之後，他們沒有立即進攻，停留了五個星期修理部隊，並整頓他們延展太長的供給線。這彷彿是戰爭舞台上的前台主任忽然叫戰場上的活動暫停一

下，使觀衆以全部注意力來看首都的局面。一個危機正在重慶發展，後來美國人簡單地把它叫做史迪威危機。這危機的因素是很複雜混亂的；個性尖銳的人物彼此詈罵，競爭着的黨派相互斥責，人民對於政府的批評，不論在中國或外國，這些因素都以雷電交作的強度增長着。十月十八日這危機以史迪威的解職而告一段落。日軍差不多立即展開最後攻擊，向桂林和柳州之間的地帶推進，那地帶是自由中國和沿海的最後的聯系點。

桂林柳州兩城附近，都是中國軍的殘餘部隊，這邊有幾千，那邊有幾千，每一塊小地方都是號稱爲一個軍，這些部隊在幾個月以前還是很緊湊的。日軍自由在地割裂了華軍疲倦而毫無組織的零星部隊，政府由於懼怕武裝民衆，就在一九三九年解散了廣西的民團；如今又拼命設法要他們重新集合起來保衛自己的鄉土，但既沒有武器發給他們，又沒有熱心的領袖領導他們。華中尙得民衆擁護的幾個將軍是委員長的舊敵，在最危急的時候，委員長還不肯起用他們。十四航空隊猛攻日軍部隊，替衰憊的華軍造成一個憤怒的天幕。但地上師部過於疲勞，無法加以利用。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只相隔幾天，至十一月中旬，整個防綫放棄了。一軍軍的人失蹤了，消散在山中，無法站住。重慶衛戍部隊的一軍人馳援駐守了有名的南丹山隘，這山隘是分開貴州高原和廣西低溼的稻田的地方。該軍進入山峽，奉命死守。部隊進入陣地時得到兩天的糧食，他們的迫擊砲每發發得砲彈二十發。他們此外沒有其他任何食物及彈藥的接濟，在寒冷逼人的天氣下打了九天。他們的敵發隊搜索山區，找尋穀物和家畜，可是山區是荒瘠不毛的。部隊打完了彈藥，肚子飢餓，就潰退了。

日軍就湧入山峽，自柳州挺進一百二十哩，直指貴陽和政府交通綫的心臟地帶。

重慶驚慌了。魏德邁那時已經到了中國，打算守住並加強華中。他在重慶的最初數星期內，戰鬥報告告訴他桂林和柳州最後要被放棄。中國政府若干官員判美國大使館打聽有無他們的家屬撤離中國的可能，有的官員則在出售衣服及貴重東西。誰都不知道前綫發生着什麼事——防綫是被撕破了，盜匪在日軍行進的路旁數十哩內劫掠着村莊，日本騎兵每天出現在越來越向北的地方。

十一月下旬，寒流自北方滾下來穿過貴州高原。我駕車進入貴陽。看到了戰役後期的情形，五路哩的公路好像冰帶一樣纏在山嶺間。電話線蓋着冰雪，無力地下垂，有時壓斷了，埋在雪裏。躺在百邊的難民的屍首，因為凍結而沒有腐爛；死得日子久了的人，身上衣服都給需要溫暖的活人剝光。挨餓的人們擠集在路上死掉的馬和騾子旁邊，從屍體上撕取一條條赤紅的肉。有的人在荒村中斫取木料來生火取暖。有一隻瘦削的雙峯駱駝，有高傷的頭頸，頸上掛着紅色的絛。慢慢穿過人群的行列。夜間，狼沿着公路在無人居住的村落中跳躍着。

在這瘋狂的大敗退中，唯一步調不亂的部隊，也許要算美國情報局的一隊十五個陸軍官兵了。他們的指揮官是紅頭髮的二十五歲的少校格里遜。他們的工作是要在撤退途中破壞足資日本利用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格里遜目標單純，在鄉間作破壞工作。他徵用了一些中國苦力來幫他們的忙，沒有錢給苦力，於是他就在敵軍即將到來的鐘中放手讓他們去徵發糧食。格里遜的部隊開始長征時有三輛卡車，八輛汽車，他們揀來作為吉叻的一個中國孤兒，一個中國廚子，以及一羣隨從和食客，那些人

一路把中國軍隊慌忙逃走時放棄的腳踏車，輪胎，儀器和機器賣掉，越走越有錢。

在離重鎮貴陽一百四十哩的獨山，格里遜聽到了中國戰區內一再傳說着的一個故事。有人說，華軍曾在獨山附近的山里埋藏着大批軍火。日軍進佔離獨山二十哩之處時，格里遜決定去視察一下。他初步視察的結果是驚人的。他發現了三個大軍火庫，各有二十五至三十間庫房，每間長二百呎。中國人在此堆積軍火已有數年之久；日軍逼近時，軍火依然囤積着。公路上軍需不足的部隊已經放棄了一切可以一守的陣地，但中國的參謀本部還是以顯着的腐敗，緊握着囤積品。五千噸軍火堆在獨山毫無用處。法國的、捷克的、美國的、中國的、德國的、蘇聯的——各式軍火都有。庫里存着迫擊砲和許多迫擊砲彈，還有五尊全新的大砲，大量的砲彈。從格里遜的觀點上看來，最有用的東西是二十噸炸藥，這可以把軍火庫統統炸掉。格里遜在最後一天的上午開始他的工作。日軍可能在午飯後不久進城。他的部下在下午四點鐘做完了工作，離開獨山時炸毀了後面的幾座橋樑。

日軍就在那天進城，派了少數騎兵偵察隊探測公路。他們在獨山附近的陣地上逗留了一個星期，於是開始搜索陣綫，深入貴陽和柳州之間的河池，想在那裡過冬。關於日軍爲什麼撤退的理由，神的重慶爭辯了整整一年。美國大使赫爾利以動人的謙遜宣佈道，使中國不致完全崩潰的，是由於他的感召。一向無所不知的謠言說，蔣介石確實和日軍成立了一個秘密的契約，約中規定日軍不打重慶，而他在最後和平的時候站在日本方面作調人。

在前綫，日軍何以撤退的理由是很明顯的。日軍準備的華中之役，是要從漢口向南打出一條走廊

來，通到越南邊境。他們的任務既已完成，這次不過偶然地探測了一下重慶的虛實。他們在預料中的堅強防線前，發現除了漏洞之外什麼都沒有。有一個日本師團衝入這個缺口，深入貴州高原，並未遇到抵抗。然而有幾個因素是對中國有利的，貴州是一個荒涼而窮困的省份，並沒有像華中那樣的豐富糧食可以供養侵略者。而準備夏季作戰的日軍，還穿着夏季服裝，寒冷以殺人的強度鉗住了他們，無情地使他們像中國人一樣的挨凍。他們離開自己供應基地已二百哩，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利用華軍崩潰所呈現出來的千載良機。此外還有對日方不利的事：魏德邁將軍在十一月底準備了一個新的防禦計劃。他把美國訓練的華軍兩師，從緬北空運到作戰地區；他要求蔣介石調動北方封鎖中共的部隊六萬人作同樣的事情，這些部隊也是空運去的。這些新的因素集合起來，最後抵住了日軍太突出而疲勞的先鋒部隊。日軍把全部情況考慮週到，於是退回去保護他們的走廊了。

這樣，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日軍之入侵中國達到了最高潮，並且退潮了。對於中國政府及其軍隊而言，一九四四年是災難並未減輕的一年。中國軍隊差不多損失了五十萬人，整個沿海地區完全被割斷，和中央政府無法聯系，重慶直接控制下的八個省份和一萬萬以上的人口是被剝奪了。國民黨可以用窮困和軟弱等動聽的理由解釋它的失敗。它也可以很有理由攻擊美國，說美國在大賡乏和大痛苦的時期內忽視中國。可是他無法解釋中國另一支軍隊，共產黨的軍隊，爲什麼在華北屢戰屢勝。日軍在四月間渡黃河進攻河南；在八月間，當日軍在數百哩以外的南方湖南省勢如破竹的時候，北方的日軍却已經被迫取守勢，準備人家來反攻了。那是因爲共軍緊跟在他們後面，已經開始組織河南的農民了。

第十三章 中國共產黨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中共只不過是駐紮在陝北沙丘地帶的一個微弱的集團，在一塊三萬方哩的地區裡統治着一百五十萬人民，用來保衛他們的，也不過是一支八萬五千人的紅軍。可是當一九四四年夏天時，我們却發現，他們已經掌握着三十萬方里的中國土地，在那裡居住着九千萬人民，用來保衛他們的已經是一支擁有近百萬的正規軍，再配合這數目兩倍以上的民兵的一支強大軍隊了；他們的黨員數目亦已差不多從二十萬增加到了一百萬。（最近的數字據說已達二百二十萬——譯者）他們這樣的發展毋甯說是一種暴發。從陝北的基地，他們攀越了秦晉山脈，穿過了直隸平原，直到太平洋邊。他們的游擊隊活躍於長城一帶以及去東北的通道上。就在一九四一時，中共區的重心即已經超越了黃河流域而轉移到黃河與海洋之間的敵後去了。

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間的這一個時期，他們早期的迅速擴張受到了阻遏。一九四〇年的夏季，他們向華北日軍的鐵路交通綫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但是不適時機的反攻，那就是有名的「百團之戰」。他們摧毀了橋樑，圍困了日本的駐軍，凍結了鐵路活動達數周之久。但是，共軍那時候到底對於這樣的行動還不够成熟，他們不能够保持他們的成果；被激起來的日軍立刻對他們回敬了一連串

嚴重的反擊。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間，一面是中央政府緊密地封鎖着他們的後路，他們一面却拼命地在抗禦着日軍不斷的「掃蕩」。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中共對於華北的控制力不得不受到削弱；他們被驅回了與他們相依爲命的鞏固的基地。

但是，這樣的壓力到一九四三年時就開始解除了。這時候，日本已經把大部份力量放在南洋打美國。沒有能力向華北假想中的「征服區」再作任何的增援，而且把軍隊退回到了他們所能守衛的城市和供應綫上，同時站穩了脚步。同樣的，中共也站穩了脚步，但是却包含着不同的內容。政府的封鎖與其說是絞殺他們，毋寧說是加強了他們。因爲他們已經因此變得自信和自給自足了。他們發明了新的生產和組織方法，其結果遠超過了取消過去國民黨所施與的那份可憐的給養所蒙受的損失。一九四三年，他們再度展開了擴張的高潮。到那年年底時，他們幾乎完全泯除政府在山東的勢力；在蘇北的八路軍也空前地強大起來了。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中政府所曾企圖消滅的新四軍，這時候也顯得異常的活躍。它佔領着整個蘇中以及大部份蘇南地帶。它的部隊一直沿着長江深入到了漢口。在那個內地大都市的周圍，新四軍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根據地，覆蓋着湖北的大部份土地和豫南一帶。在華南，中共在廣州四圍發展着。另一支中共的軍隊更在伸出在越南海岸外面的海南島上單獨地進行着抗日的戰鬥。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各個部隊，都是地方政權系統中的一部份，這些地方政權的所在地中共把它叫做「解放區」。一九四四年夏季時，已經有了十八個像這樣的解放區，同時新的解放區正在日軍控制的地區裏醞釀中。

在這共軍衝鋒陷陣的後面，與其相配合的，是延安底驚人的活動。一個電台和通訊網聯繫了所有中共的根據地，從華南最南的海島直到東北滿州的外圍。他們的無線電是蹣跚的日本機器，舊貨燈泡以及一些臨時代用的材料所拼湊而成，但是他們的密碼却把國民黨和日本都騙過了。這樣的聯繫以鐵的紀律把十八個地方政權連結成了一個聯合體，而這聯合體一方面好像是一個無形的政府，另一方面却又是中國人民最有效的一個作戰機構。

百分之九十的廣大的中共控制區，在地圖上都是標幟着『日軍佔領區』的。是的，事實上，日本的駐軍和交通線簇擁着這整個地區；同樣是事實：沒有一個解放區中共掌握了一百哩以上完全沒有敵人的土地；幾乎他們的每一個政權中心都是一個流動的司令部，只要幾小時的通知隨時都準備着和軍隊共同轉移，共同戰鬥。但是每一個這樣的政權却依然能够征收賦稅，通過法令，抗擊敵人，武裝農民，並使人們對經歷了日本所有殘暴手段的領導機構忠心耿耿。

儘管他們的敵人痛斥着他們的信念，並且以所有可能想像到的侮辱加在他們身上，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否認他們造成了一個奇蹟。在六年之中，中共從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鏈環，以一個弧形的姿態，從東北一直連到了長江流域。完成這個奇蹟的是那似乎把歷史視爲工具，把農民視爲原料的人們，他們深入到每個村鎮的下層黑暗中去，用他們的意志，用他們的口號把那裏喚起了國民黨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像得到的力量。這力量來自人民——來自無數麻痺着農村的壓迫底解除，來自群眾的智慧，來自農民底大無畏而持久的英勇精神。

整個中共的政治課題可以縮簡爲這樣的一段話：假如你遇見一個一生都在被欺詐，被鞭苔和被罵馱中過日子的農民，而且他的父親已經把世世代代所積累下來的痛苦的感情都傳給了他；假如你遇見了這樣一個農民，把他當作一個個來看待，徵求他的意見，讓他投票選舉一個地方政府，讓他組織他自己的警察和憲兵，決定他自己應納的賦稅，而且讓他自己投票減租減息——假如所有有這些你都做了，這個農民就變成了一個有了奮鬥目標的人了，而且他一定會爲了保護這個目標而向任何敵人鬥爭到底，不問這敵人是日本或是中國人。如果你再以一支軍隊和一個政權來協助這個農民收莊稼，教育他讀書寫字，替他打擊曾經強姦過他妻子蹂躪過他母親的日本鬼子，他自然就會對這軍隊，這政權，以及控制這軍隊和政權的政黨，產生一種赤誠的忠心。他會擁護這個政黨，照這政黨所指示給他的路線去思索問題，並且在許多情況下，變成了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無疑問的，當殘酷成爲必要時，共產黨人是不惜殘酷的。把農民從恆久的冷漠之中動員起來轉入積極而有組織的運動，必須要有最單純和最直接的手段去打動他的感情，這簡直是患宗教狂者的工作。中國共產黨人過去和現在都是那種首先消耗或犧牲自己的人們；比較老的黨員都是把他們自己整個地獻給了運動，他們沒有黨外的生活，已經把他們自己變成了爲農民開路的火炬。把自己這樣殘酷地獻給了一個理想的人們，對於他們的敵人是同樣殘酷的，對於他們黨所認爲敵性的團體也是同樣無情的。在這次戰爭當中，中共所進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戰爭本身，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本於所有的戰爭都是全面戰爭這一原理而出發的，黨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農民和軍隊溶成一片。單是共產黨人是不够

去打一個戰爭的，必須把農民教育出來去保衛他們自己，去管理他們自己，即使因此而每一種固有傳統水準都必須放棄，亦在所不惜。十五年無情的階級戰爭中，中共已經充份實習了群眾行動的技術；在與蔣介石作戰中，他們已經懂得了怎樣在每一村鎮去運用那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使它變成爲新的力量。如今，他們爲了進行抗日的民族戰爭，正進行着這種技術的改進。

共產黨開始了教育農民自治的工作。在整個中國歷史上，農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村和縣的議會出現了，而且都賦有解決農民基本生活問題的種種權力，這些問題實際上是他們自幼即已面臨的問題。農民們第一次走進了政府機構，却發現了他們自己也賦有未被發覺的智慧和毋庸置疑的能力。沒有一個議會需要一種經典式的教育去決定爲了大眾的福利誰應該多上賦稅，誰應該少上。村子裏的人都明白，今年誰收了多少谷子和從那塊田裏來的，由他們來分配對戰爭的負擔是最適當的了。組織村自衛團完全不需要擁有大學學位的學者和官僚。爲新的任務所喚起的未成熟的智慧，在具有遠見的中共領導之下，正巧妙地發展着。

對於國民黨而言，中共的這些作爲似乎是太聰明了。中共採用了國民黨自由份子所寫下的不兌現實的法律條文，然後讓農民去應用它。一九三一年南京曾經通過了一條無結果的法律，限制地租不得超過該地收穫的百分之三十七·五。這法律却從來沒有實行過。但是現在在中共區裡，人民選的村縣議會却已經把這法律決議付諸實行了。這個表決可能是不合「法」的，但却不可能說它是不民主的。誰會投票反對把他的租率縮減一半呢？參與了這種會議並且屬於這種政府的農民懂得了，政府是一根

橫杆，可以被應用來服務於他們的利益，同樣也可能被應用來反對他們的利益。民主意味着在耕者的籃子裏多裝點米穀。在日本人所不能侵入的中共區裏，在抗戰時期，農民實際上過着一個他們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一切的改革都在上級嚴密指示下進行。在過去內戰期中，中共已經明白地主階級對於任何激烈的改革都會苦鬥不已，而在今天抗日戰爭當中，農村裏的任何分裂都是危險的；一個各階層聯合的統一戰綫才是目前最大的前提。所以地方政權都向地主們保證，雖然他們的租是被削減了，但是他們還是可以收到租的；同樣，雖然利息是被減低了，債權人還是保有貸款的完整性。「沒收充公」本來是三十年代中共的主策畧；可是現在，除了對付曾經援敵或通敵的地主而外，「沒收充公」已經變爲非法了。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華北的地主和有錢人都與農民一樣的仇恨日本。他們同樣的也犧牲了生命，遭受了痛苦，他們也同樣地具有愛國心。他們發現，改革比起敵人的侵畧來并不是那樣的痛苦，於是他們有的主動地有的被動地和中共的領導機構合作了起來，整個地被捲入了抗戰的大浪潮中。

爲了充實所有各地的政權，中共搜尋了整個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他們教育了農民領袖，使他們變成軍事指揮官，地方的代表，和行政人員。無數的知識份子和學生，爲了響應抗戰的號召，都拋棄了他們在中國大城市裏的事業，中共就把他們變成了組織工作者、教員，和政府的工作幹部。由於中共控制區的一天天擴張與深入，青年們的智能有了空前迅速發展的機會。在那幾年相持的局面中，一方面是國民黨的死不進步和官僚腐化的窟窿深重，而另一方面中共却不斷地在各地訓練新的人才。二

十五歲的青年當了管理十幾萬人口的縣長，年青的女孩組織着并不比革命輕輕的群眾運動。

中共所領導的改革運動，并不祇停留於村鎮的自治或經濟權利的平等化，雖然這些都是重要的目標。中共的目的是要動員中國社會中的每一份子。他們在延安的總部是一個理論與實際的會萃點；任何地區裏的每一個成功的實際工作都有報告給延安，延安就把實際的行動提高成爲指示的原則，然後再由黨把它傳播給解放區所有其他的地區。

合作社教給農民怎樣以簡單的工業單位大家共同地工作。「青年救國會」擔任了軍事編制中青年部份的工作；十來歲的孩子守衛着大路，偵探敵人軍情，以及担任傳遞命令的差事。「婦女救國會」成了社會中一個重要的部門，在這個會裏，共產黨的組織者教給了落後的農婦們如何紡織，製襪打鞋，以及寫字和讀書。農婦過去的生活和地位向來都是連牛馬都不如的，中共相信只有實行教育，才可能讓她變成一個積極的公民去參加地方政府的工作，而每一個這樣的份子參加，都給政府增加了不少的力量。教給她做草鞋、做襪子、和織布就無形中增加了軍用和民用所必要的被服材料，以填補日本人和國民黨所切斷了的外來供應。同時當然也就讓這個家庭婦女有了一點她自己的收入，這樣就提高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且把她從丈夫以及親戚的統治中解放了出來。

新的政權和社會改革構成了中共方針的一半，另一半呢，就是共軍的軍事領導。從一方面來看，中共的真正贏得廣大民心可以說是由於它這次抗日的戰爭。日本統治的黑暗已經成了衆人的公敵，無論貧富，無論有知或無知。日本八一開始總是施行蠻橫的手段，但是當蠻橫造成了反抗力量時，恐怖

就再也嚇不倒農民了。由於每次暴行都無效果，日軍就非得採取新的野蠻手段不可。六年來日本在華北的政治算是總破產了；到了一九四四年時，他們最後的一個口號已經簡單到乾脆「殺光！燒光！搶光！」了。整個華北，從這一頭到那一頭，農村黯黑的殘骸，證明了敵人的狂暴。在成千成萬的家庭中，爲了妻子被冷血的敵人所強姦，爲了丈夫的被虐待，爲了孩子的被屠殺，農民們孕育着復仇的狠心。

共軍與日軍之間的戰爭，幾乎把整個的土地都改變了面目。日軍沿着他們的公路和鐵路線越過山坳，經過河邊，掘成了幾百英里長的平行戰壕。沿着所有這些交通線上，都盤踞着無數的機槍陣地，經常都配置着日軍或偽軍。每一個橋樑都有一座碉堡在護衛着，當美國飛機開始破壞鐵路線時，這些碉堡就成了指路燈了。沿路的電線桿一根根都是築得結結實實的，那是爲了防止游擊隊來把它們掘去；有些地方甚至致於電線桿上還裝上電燈作進一步的保衛。日本駐軍大部份是住在大城市裏，這些城市都圍繞着重重壕塹，還裝備着各種炮塔，就好像「傑克遜劫後英雄傳」裡的情景似的。他們就從這些駐防地區間歇地出擊共軍，一次又一次地打擊山林和村鎮，一路擄掠，一路燒殺，然後又再回來擄紮起他們的傷口，準備下一次的掠奪。

要描寫中共的正規軍是很困難的。它祇有一個非常鬆散的體制，因爲它是一支游擊軍。依照它與中央政府的協議，八路只能有四萬五千人，或者說祇能有三個師；可是，後來當它人數發展到了五十萬以上時，它依然依附於陳來的三個師裡，雖然現在每一個師都甚至擁有幾十萬人之多。國共兩軍最

集中的力量都是放在西安以北的那條封鎖綫上，在那裏五萬名中共的神兵對抗着大致幾十萬的政府軍隊。越過了黃河，沿着海邊的地帶就不可能有這樣集中的共軍，也不可能甚至有甚至於遠不如這個比例的集中兵力，因為像這樣的兵力集中，就會招來日軍的正面襲擊，而在那樣的戰役中，日軍是一定可以勝利的。

共軍正規軍都是三四百人一隊地行動。每一隊都以電話或無線電與另一隊以及它的總部互相聯繫著。個別的指揮部與其說是流動性的，毋寧說它是區域性的。許多指揮部堆積起來就構成了支隊和區隊，然後由它們向原有的三個師部負責。而八路軍與新四軍的所有師部又都是向由朱德指揮的延安總部負責。各個區隊和支隊的司令官們在地圖上調動它們分散的小隊，就像是一個鐵路派車員在派特別快車似的。任何數目的小隊都可以最快地集中起來，集成一羣一萬五千人或兩萬人的隊伍去進行一次襲擊，然後又同樣迅速地分散開來各自回到他們的原地。假如一支日本部隊開向山野地帶進行掠奪糧食或是進行掃蕩行動，密探們立刻就把它們的全部行動報告給區指揮部。司令官就會研究敵人行進的路綫，考慮他自己軍隊的部署；然後用無線電，電話，或者傳令兵發佈他的命令，於是十來個遊擊小隊馬上向敵人隊形延長了的部隊進攻，從它的側翼予以痛擊，就好像是鬥牛者之於一條牛一樣。這樣的遊擊小隊是不可能一直集中起來進行大規模戰鬥的，因為他們都得靠一定地區的人民的支持；沒有糧食和軍火庫的設備，就不可能支持一個大規模的軍事運動，而糧食和軍火庫對於一個擁有戰車大炮的敵人却是太大的誘惑。每一個小隊都由其所在的村縣裡取得給養，而不是取給於一個總的供應機

構。共軍的分散就是他們最大的力量，但同時也正是他們的最大弱點。日本人不可能一次就抓住他們大部隊予以損傷，遊擊隊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個工業或軍事基地其陷落足以損傷他們全體。但是，同樣的，他們却不可能向任何重要的日軍駐軍防地，或是由堡壘和重武器所護衛的日軍鐵路線作有效的挑戰。儘管他們能夠挫折日軍的鋒刃，或者把它打到旁邊去，却不能正面擊退它。

這支軍隊不懂得怎樣使用大砲，也不懂得怎樣使用一個空軍軍團；它對現代化的通訊兵工作，機械化及醫藥事務所知甚少。祇有一種因素使它成爲偉大的力量，那就是它的戰鬥精神。它是一支遊擊軍，它依靠着人民的援助而戰鬥。它的後備力量遍及全國，那就是「民兵」——武裝的民衆自衛隊。差不多所有健全的農民都屬於「民兵」，他們都是地方上的自衛團。團員既耕地又打仗。中共聲稱大約有二百萬農民分佈在所有與八路軍新四軍合作的土地上。幾十年來的內爭無形中把這些人都武裝起來了，有的有烏鎗，有的有前膛鎗——舊日軍時代留下來產業；有的帶着鐵叉，有的帶着刀子。正規軍也偶然地移交一些日本式的步槍給地方的民兵，因爲他們不可能俘獲足夠的軍火使自己成爲有效的力量。民兵單獨地作戰，或是在正規軍的支持之下作戰，這得決定於日軍的行動。他們的領袖都是由他們自己隊伍裏選拔出來的；他們對於他們自己地區裏地形的熟習，其作用差不多抵得上敵人的炮台。

中共用所有最基本的戰術教育和訓練着這些軍隊，並且一直苦心經營着一個統一的地下防禦戰。一九四二年時，他們對於地雷特別發生了興趣；兩年後農民們幾乎已經純熟到把地雷戰當成地方上的

遊戲了。農民們都曉得把廟裏的鑪鼎和一切的破銅爛鐵送到當地軍隊的修械廠去，又從那裡換來同等重量的空地雷殼，用黑色火藥，或者當地政府生產的難得的無烟火藥把一個個空殼裝滿；然後自己再把它裝上信管。缺乏金屬時，他們就用木頭，瓷器或石頭來做地雷。農民們種下了死亡的種籽，他們圍繞着敵人的駐防地和碉堡一個個地埋下了地雷，這樣，敵人一出來走動就自取滅亡了。農民們在他們自己村子周圍也種下地雷。夜晚時，他們沿着入村的幾條路上埋下了地雷，祇留下一條完全沒有地雷的太平路。這條每夜都在變更的太平路，祇有當地軍隊指揮官和村裏公安委員會主席才曉得是在那裏。村子的人都積累着他們的地雷，來對付日本人的進攻。當日軍每一次間歇性的出擊開始時，他們就搬出了他們的法寶四處埋下——小河間的橋樑上，小溪水中的踏腳石下，和四鄉小路底下。他們還把地雷埋在進門的圍牆邊，各個聯絡的站口，以及中心的廣場裏——一切日本人可能聚集的地方。中共的報紙用盡一切可以想見的宣傳手法鼓勵着村民的機敏，就像美國運動專欄作家選運動大王似的，他們不斷地宣揚着『地雷英雄』。

無論正規的八路軍，民兵，和地雷陣地，都受着當地的情報機構的輔助，這個機構供給中共對付敵人的行動的全部消息。他們建立了一個路條制度，即是說未得遊擊戰正式負責人簽發路條，任何人都不得自由旅行。童子軍擔任檢查路條，同時又在山頂上觀察敵人的行動。他們對於每一個行動中的日本人和每一架敵人的卡車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一些山上樹立了長竹桿，頂上網上了草，像一個簾把似的老遠都看得見。當放哨的看見敵人在開始行進時，他們立刻把竹桿放了下來，居於低地的農

民們就曉得日本鬼要來了。於是村裡動員委員會就立刻準備着緊急的行動，婦女和孩子們都躲進了山裏或地道裏，每一家都把牲口趕去藏起，把米糧藏起，把貴重什物都埋在土裏；自衛團也立刻武裝了起來，並且在路上鋪滿了地雷。在河北廣大的平原上，山林的掩護是迅速的，戰爭就進入了地底鬥爭的狀況。農民最初在個別的村子挖掘地道，後來一個村子又與另一村打通了。到戰爭的末期，這些地下的穴洞，幾英里長地一個接着一個，旋轉曲折，就像老鼠竄迷宮似的，只有當地的人才曉得如何走法；而在這些洞裡的拿着步槍的農民，就可以在對等的條件下和日軍作戰了。

兩三萬共軍遊擊隊和同等甚至較大數量的民兵配合起來抵抗一個日軍攻勢的這種大規模戰鬥，是祇有特殊情況下才會有的。只有當他們抓住了來襲敵人一個小隊人馬的機會，同時還能俘獲比他們化在這次戰鬥裏更多的槍枝時，共軍才會出擊。從一九四一年以來，共軍的武裝差不多完全靠從敵軍那兒擄來，所以戰鬥時，可能的收獲能不能抵償可能的損耗，是必須先計算清楚的。在鄉村的最大弱點到來時——收成的季節——他們總是進行着戰鬥來保護鄉村；因為這正是敵人進襲的大好機會，一次成功的襲擊不僅可以把他們的糧庫裝得滿滿，同時也就可以使農民們幾個月沒飯吃。爲了防止這種擄掠，共軍就是在不利的情況下也同樣地英勇作戰，以保護正在收割的農民。還有，當他們的某一主要行政中心受到威脅時，他們也不辭一戰；在解放區裏，每一區的核心地帶總有好些土地是五六年來遊擊戰中都爲中共掌握，始終未被侵犯過的，而他們就在這些土地上建立着他們最長久的行政機構。

這種軍事形勢是多少隨地區而異的。關於中共作戰的情報，大部份來訪問過華北八路軍地區的

美國軍事觀察們的報告。中共的宣傳，說明了同樣形式的戰鬥也在新四軍所在的華中進行着，祇是規模比較小，比較不完整而已。這樣的戰鬥實在是一個歷史性的動盪，可是爲國共雙方的宣傳所蒙蔽了。國民黨的宣傳死守着官方制定的定理，總是說中共根本就不抗戰，說他們積極於與日本人勾結，他們只是一個恐怖份子的組織，用武力統治着鄉村。這樣的說法簡直是不正確到成了荒誕。差不多所有的美國觀察家都接受了中共對他們自己戰鬥的看法，這一事實很簡單地就証明了國民黨的說法完全是造謠。從各方面來看，中共的這一看法是正確的，但也同樣的被過於渲染的宣傳所損害了。比如說，中共說他們抗擊了日本在華軍隊的大部，他們擔負了抗戰的主要担子；這是不真實的。在日軍活動的極盛時期，日本在華駐軍大約有百分之四十在和共軍作戰或在對付中共地區。但是在多次主要的戰役中，却是中央政府的士兵遭到了衝鋒突擊，被敵人打得落花流水，以致於死而後已。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戰役中，或者在一九四四年湘桂戰役中，日軍百分之七十以上力量都是集中在對付蔣介石及其軍閥友軍的部隊。

中共對於敵人損失的估計，完全不能與中央政府那種誇大同日而語，但也不能被認爲就是準確的估計。中共聲稱他們已經消滅日軍五十萬人；但是，當閩村事次在投降以後對盟國所作的報告裏，却估計日軍損失於遊擊隊之手的不到五萬人。大概真正的數字可能在兩個估計之間。中共的宣傳中令人失望的另一點，就是他們對於他們軍隊政府軍隊之間不斷磨擦的報導。中共是生存而且戰鬥於一個活潑的政治哲學裏；他們整個的力量是奠基於把尚未組織起來的人組織起來。他們的擴張與改革，時常

地就和國民黨在日本進攻時留下來的少數殘餘份子發生了磨擦。在這樣的磨擦裏，得到人民擁護的中共一向是勝利的。誰打擊誰，從來就沒有弄清楚過，但是從無變更地，每一邊都說他們是被攻擊者。每一次磨擦時，中共都大聲疾呼：「狼來了！狼來了！」。他們的這種激烈的情緒，你只要回頭看一看一九四一年政府對於新四軍的大屠殺，就很容易了解了。可是認為他們這樣都對也是不可以的。比如，一九四五年春季時，共軍向南方海岸線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攻勢，他們經常地和政府軍發生着衝突。共軍的攻勢大部份是對付日本人的，但是必要時，他們也對政府軍隊作戰；然而當他們說他們在日軍後方的廣大區域內遭受政府軍攻擊時，就彷彿是一個人說別人的眼睛打了他的拳頭。

許多這類磨擦所表現的，是普遍的政治不滿超過了軍事上的敵愾。中國根本沒有一個公開討論問題的機會，在重慶也沒有方法能用和平商談來解決糾纏不清的政治問題。近代的中國，從來沒過一次政治上的決策是沒有用過武裝力量或武裝威脅的。子彈就是中國政府中的選票。除了中共而外，中國從來沒有過一個集團敢於武裝人民，因為這就等於使得農民能夠解決他們自身的痛苦。僞民眾專權擁護的中共，能夠武裝成千成萬的人民，而且知道這些武裝是不會掉轉頭來反對它的。在這一點上，中國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歷次偉大的農民革命的一個延續，在中國歷史上，武裝人民向來都是掀翻舊朝代的一個先決條件。

在中共活動革命綱領的壓力之下，陳腐的鄉村制度和官僚主義開始破碎了。當地方上的舊勢力把對於敵後的國民黨殘餘部隊招來支持他們的威權時，他們面對着的却是武裝的群眾力量。共產黨不僅

鼓勵對日本作戰，而且還鼓勵對整個舊東西作戰。這當中的磨擦不可能用一般的戰爭規律來加以評斷。堅硬而互相憎恨着的人在相互進行着內戰。有時法律可能站在這一邊，有時可能站另一邊，但在一個內戰裏，所有的法律都是令人懷疑的。

一九四四年夏季時，中共達到了一個新的決定性的成熟階段。從一九四一年新四軍事變，到一九四四年湘桂戰役完全暴露了政府弱點之間的這一段時期，中共對蔣介石政府的態度由害怕轉變成了蔑視。中共親眼看見了國民黨軍隊，在大量美國槍炮，汽油，和戰車的援助之下，却在日軍的攻勢前面像稻草人似的潰不成軍。疲憊了的國民黨隊伍似乎變成了他們可憐的對象，而不是仇恨的對象了。河南農民自發的反政府暴動更使得中共相信，重慶政府已經成了一座快傾頹的建築，它的日子沒有幾天了。

中央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談判在一九四四年春天又重現於世。這一次中共代表在重慶已不再像求乞者了，倒像一個強大武裝運動派來的高傲的使者。他們的傲慢使政府的談判代表大為驚奇，他們以為幾年來的封鎖應當早已把中共困死了。政府滿以為中共代表們應該是一些和氣而值得尊敬的人，是對重慶可以給他們的殘羹冷飯感激不止的人；對於中共所提作為談判基礎的條件，國民黨的代表都為之大驚失色。政府有一個發言人很悲歎地說：「他們好像簡直就忘了，無論如何我們是政府呀！」

一九四四年夏季中共的要求是具有遠見的。其中有以下幾點：

一、政府應承認并供應戰地的共軍十六個師。

二、政府應釋放所有政治犯。

三、中共以及其他小黨派均應享有合法地位，過去把他們歸入非法的法令應即取消。

四、成立包括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

五、政府應承認所有解放區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

無黨無派的意見都認為，除了最後一項而外，（註）中共所有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分佈於整個黃河盆地和整個長江下游，從上海通過南京直到廣州。承認這些政府就將在這一地帶把國民黨降入次要的地位。這也就是說，當和平到來時，中共將控制最富有，最高度發展的沿海一帶，而國民黨將依然被封鎖於內地。

但是，很可能中共之提出最後一項要求不過是故意抬高價錢，爲了達成他們更迫切的願望，他們準備着折衷的讓步。是的事實上過了一年他們的膽放棄了對於長江流域的要求。一九四四年五月開始的談判，在仲夏時節就宣告破裂了。那時候，很明顯的，中國內部問題的任何解決必須等待中美之間的關係得到一個解決——當時中美關係正爲史迪威問題而緊張着。

（註）對於國共的辯論，無論中外，無黨無派的意見往往是同情中共的。其理由很簡單，中央政府直到一九四四年都禁止任何新聞記者或觀察家到中共地區旅行；并且堅持要大家完全接受它自己對中

共問題的一切看法。它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言辭來斥責中共。對於政府的這些說法，中共的答復是邀請所有的新聞記者訪問參觀他們的地區，親眼去觀察，看看政府的這些說法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在爭論中，一面不許對它的說法進行不偏不倚的調查，而另一面却邀請人們去親自調查，社會的輿論差不多就一致地站在邀請調查的這一面來了。

第十四章 史迪威事件內幕

一九四四年仲夏，中國內部的危機緊緊地壓抑着美國的政策。中國的事情是這樣的複雜，而且又與美國的大戰畧計劃這樣的分不開來，於是就成爲美國政策中一個需要特別考慮的問題了。一九四四年在中國代表美國的兩個人，是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兩個人都曾經把他們一生中最主要的時期化在中國，而且都是自一九四一年以來就已對中國的時事有着密切的接觸。到一九四四年夏天時，兩個人都對於中國的局勢具體地得出了共同的結論。

他們的結論是：戰場上的危機不可能由美國的援助來單獨解決，雖然援助是需要的。在他們看來，軍事上的危機，祇不過重慶政府底主義，行政、和政策整個破產的後果。既然美國在大量地援助中國政府，美國人的生命也與此利害攸關，而且中國任何復興都是以美國的不斷援助支持爲條件的；因此，高斯和史迪威都感到，爲了并肩進行抗日的戰爭，美國要中國實行劇烈的改革是完全合理的。爲了使美國正在給予和可能給予的援助得到有效的用途，中國政府必須有某些最低限度的效率和清廉。

蔣介石祇能部份地同意美國的這個結論。他非需要美國的援助不可，在紙面上他願意對美國的特殊指責，或者美國對行政上的某種要求予以讓步。但是，照美國的建議來實行改革，就等於說，他的

政府必須從人民中，從共產黨，國民黨，和無黨無派人士中得到支持；也就是說：政府要刷新自己，就必須肅清貪官污吏和腐化地主，而這些人都是私自支持蔣的，儘管他們都具整個民族力量中的一個累贅，蔣希望美國與他之間的關係維持着一個不賠本的買賣——有多少望彌就作多少讓步，零零碎碎的援助就只能有零零碎碎的改良。像這樣的合作關係存在了兩年。現在，美國要求停止這種糾纏不清的討價還價了，它要求來一個澈底的改革，好使中國政府轉變成爲一個有用的盟邦。

經歷了幾年來與中國參謀部令人失望與頭痛的合作以後，史迪威最後得出了他自己的一個信念。美國方面每一個要求，都是遲緩而艱難地從中國政府的深重忌恨中逼迫着實行。這樣不情不願的合作大大妨礙了事情的進展。史迪威腦袋裏裝的是如何對日本作全面的戰爭；何應欽腦袋裏裝的却祇是要美國如何援助和保衛國民黨政權。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史迪威提出要派遣共軍參加緬甸作戰時，史迪威一點沒有覺得有什麼不調和的地方；然而在何應欽和中國政府看來，讓共軍穿越全國豈不等於打開了「惡魔箱」，那還得了！所以，如果沒有考慮到軍隊和政府裏糾纏不清的政爭，就不可能作任何決策。不可能調動軍隊，不可能通過官兵的升遷，同時也不可能分派給養。

史迪威要求把這種自私，無能，和腐敗從指揮部裏清除出去，讓一九四四年的中國軍隊——一支如此貧病與飢餓的，在駭人聽聞的領導和野獸般的虐待之下的軍隊去打日本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緬甸，史迪威撿起了一九四二年戰役後的中國殘餘部隊，把他們從渣滓鍛成了戰爭中的鋼鐵；他所用的方法其實是驚人的簡單，但是却無可詭辯的成功。他給他們給養，給他們衣服，訓練他們，武

變他們；於是緬北這支軍隊的中國軍官們開始懂得了個現代移動制度的用途，也學會了領導進攻的技巧。史迪威曾經帶領着這些軍隊深入叢林地區，讓他們個別去領導，信任他們，加強他們勝利的信心。兩年來，他曾企圖把中國國內更廣大的軍隊也變成像他在緬甸所創造的精兵。但是他每一步都得去爭取紙上的協議；就是後來紙上答應了，實際上還是毫無結果。

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中國就答應過讓美國人用現代方法和技術來替中國訓練一支三十師的大軍；可是當協議成立以後八個月裏，他們却都不在紙面上把師名指定。他們答應了史迪威，給他頭等體格的士兵好進行緬甸的攻勢；可是送到美軍軍營去的，淒慘的，殘廢的，和營養不足的壯丁當中，百分之五十都不得不在第一次體格檢查時就退回了。雖然中國曾經答應過一定保持史迪威幾個進攻師的人數充足，可是當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時，他在緬甸的軍隊就有幾千個缺額，滇西怒江區的幾師更有上萬的缺額。一九四二年時，史迪威曾經要求過，至少要給在前綫上的中國軍隊充分的飲食；可是十八個月以後，由於他的催促，也不過祇是在中國軍隊的鹽泡飯的伙食上每月加上了一磅肉和幾磅豆而已；而且就是這樣的所謂改進，也祇限於少數在怒江的精銳師。

美國要求蔣介石允許他們派遣一個軍事情報隊到延安去，因為中共的軍事情報對於全面抗日戰爭是十分重要的。中共控制着九千萬人民，他們的情報滲入到東北門戶以內，而且他們對於日軍的部署和行動所有的知識，對於我們的軍事安全都是極有價值的。可是足足經過了一整年的功夫，直到一九四四年的夏季，國民黨才最後同意了美國在延安設立一個軍事觀察團。

所有這些以及無數的小事，構成了中美之間惱怒不休和無可忍耐的曲折交涉的內容。一九四四年的夏天，軍事上的危機已經到了最高峯；很明顯的，通過日常交涉與讓步的方式，對於這日益嚴重的局勢已經不可能尋得一個解決了。中國必須有迅速的決策，而史迪威深信，祇要他能對中國國內軍隊有同樣的努力，像他在緬甸叢林所握有的並且成功地使用了的權力一樣，那麼他是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的。

當史迪威從他與中國軍事當局相處所得的經驗中得出他的結論時，高斯大使也從他與中國政治相接觸的經驗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高斯和史迪威在許多方面是很相似的。他是一個毫不圓滑而心直口快的人；他藐視一切虛偽做作；他底顯著的嚴苛掩蓋了他內在的和解。這樣的性格似乎是不幸運的；因為中國祇想從美國尋求慰藉和溫暖。他們認為，這位大使應當像一個帶着水菓和同情來探問病人的人；他們希望得到撫愛和支持，因為他們還在苦難之中。可是，相反的，高斯給他們的却是一個仔細的外科醫生所常給予的冰冷但是高明的援助，他知道祇有開了刀以後，身體的復原才能開始。

高斯大使開始着手時的政治形勢，正是政府與中共之間陷于完全僵持的局面。左右蔣主席的都是些以反共起家的狂人。一面史迪威主張多派點軍隊去打日本，一面政府的政治却把二十師最優秀的軍隊呆滯在北方法去封鎖中共邊區。黑暗不堪的新聞檢查制度壓制了一切對政府的批評，特務箝止了反對的呼聲。檢查制度的帳幕後面隱藏着陳立夫、何應欽、孔祥熙的三頭政治，他們不容許任何的攻擊。敢於主張撤換他們三人的任何人，都被誣蔑為共產黨或者日本宣傳的工具。同時，政府機關裡的誠

實的公務員們一天天爲通貨的膨脹所吞噬着，薪水却固定不變。在重慶的流亡者發現他們自己陷入了飛漲的物價與半靜止的薪水之間的深淵。物價爬到了戰前水準的五百倍，而且還在繼續高漲。飛機不斷飛越駝峯載來一捆捆的在美國印製的鈔票，政府以一口法幣五十億元的比例向市面傾瀉着新的鈔票。所有這些，都影响到美國的政策。一年之內，當物價又漲了三倍時，政府的生產機構的預算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於是中國軍需部發現從飛越駝峯而來的美國租借物資中去取得黃銅，遠遠比從近在眼前的政府工廠去買便宜得多和便當得多。政府的鍊鋼廠祇做着它百分之二十的能量，因爲兵工廠都沒有能力來買這煉好的鋼去改造槍械。

整個一九四四年的夏天，美國大使館不斷地在促進變換無可辯論的事情，那是一個清廉有效的行政系統，全國的團結，和激頭激尾的改革。美國大使館已經預見到即將在次年構成全面內戰的苦難。所以它催促着蔣成立一個有代表性的政府，好反映所有集團和所有黨派的意志，讓一黨專政的狹隘氣氛裏也吹進點新鮮空氣。高斯一方面也考慮到了美國本身的利益，所以他建議蔣和蘇聯達成某種友好的協議，好讓中國不致於在未來可能的美蘇敵對形勢下成爲一塊互相爭奪的骨頭。可是，高斯和史迪威的這番忠言都被置若罔聞。

一九四四年八月，羅斯福總統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裝進了一隻清潔的口袋，然後親手交給了有名的赫爾利——納爾遜代表團。這個代表團祇有總統最高的權威來考慮中國目前危機的每一細節。兩個

都是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納爾遜之來，是爲了給胡蘿蔔與蟲子吃，好讓它開步走，而赫爾利之來，却爲了要從它的背後把它推向前去。納爾遜是一個「個人慰勞團」，他爲中國的將來，作了一個和天堂相距不過一步的計劃。他的來華，是爲了觀察中國的戰時工業以及中國的經濟結構，設法增加生產，尋出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美國援助，決定美國怎樣的技術專家能夠得到最好的使用，還有就是考察一下戰後貿易和投資的可能性。担任這個任務，他是再合適沒有了。赫爾利是奧克拉荷馬的一個律師，他却賦有遠較艱鉅的任務，這任務是調和蔣主席與史迪威之間的關係，促成任命史迪威爲全中國陸軍總司令，調解共產黨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僵局；這是一個異常巨大的使命。

兩個人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抵達重慶，歡迎他們的只是很簡單的儀式。兩個人都爲從美國飛來的，這長途旅行弄得疲乏萬分，一車就把他們送到了特地爲他們而設的一座新穎而奢華的房子，在那裡已經有過去上海最上等飯店的名廚在等着侍候他們。當晚，史迪威、高斯、赫爾利、和納爾遜舉行了一個半鐘頭的會談，由高斯對中國複雜的局勢作了一個分析，並且決定第二天由高斯陪同赫爾利與納爾遜對蔣主席作首次訪問。這一次的訪問得到了驚人的成功。赫爾利告訴蔣說，美國政府一直是站在蔣個人背後的，而且這次之派代表團來，單純地是爲了援助他和中國。蔣大爲高興，立刻就對赫爾利有了好感，他們之間的友誼於是誕生了。

湘桂一帶的不斷失利，無形中增加了美國代表所提要求的迫切性。蔣拼命地要求供應和援助。納爾遜與赫爾利都向他保證，美國的援助即將空前大規模地源源而來；他們所要求的只是希望蔣承認某

些新的方式。半個月之內，蔣答應了史迪威担任全中國陸軍總司令，并且把他的允諾鄭重其事地寫了一封正式函件給史迪威。史迪威所受的權是夠大的；他有權升貶、獎懲、調動和改組所有的軍隊，祇要他認為該做的，他都有權處理。蔣委員長選擇解釋說，從今後，作為全中國陸軍總司令，史迪威的工作將是百分之六十軍事，百分之四十政治。似乎終於所有的中國軍隊、國民黨的和共產黨的，軍閥和游擊隊，都將統一起來歸於一個共同的指揮了。

這次的授權是在九月中。正當桂林以北告急的那一個星期，史迪威立刻飛到了桂林視察。他決定全部加以破壞，祇在桂林留下桂林的空軍基地，維持最後的一條轟炸機跑道直到最後一刻，以便空運救濟正在準備作背城之戰的駐軍。對於賦有新權威的史迪威，這地區好像載着希望。他和桂林區的戰區司令張發奎將軍舉行了會談。張將軍同意最後動員全部力量進行一次反攻，俾能於敵人最後進襲桂林以前先把敵人擾亂，但是祇有一個條件。這條件就是史迪威必須回到戰地裏去，親自監督，好讓那些悲慘的中國軍隊看看，感召他們，使他們來一次最大的努力。史迪威同意了這個條件之後，立刻回到重慶，希望在直接參與這個戰鬥以前能與中國最高指揮部有所磋商。

在飛行途中，史迪威思考着這次戰役的問題，同時起草了一個總的備忘錄，列舉了不僅是針對眼前桂林的危機，而且是為整個中國軍隊改組問題的種種方案。這個備忘錄並不是一種外交性的，而是一個軍事性的文件，帶着一個嚴重戰役的緊急性，并且意在立即付諸執行。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表現了一個美國指揮官的特色。對於祇希望指揮問題採取外交和漸進方式的中國方面，史迪威的措辭使他們

大爲震驚。於是他們心目中感覺受了冒犯的意識，就阻礙了他們對於這方案本身價值的認識。第二天以後，當中國當局還在考慮史迪威的這些孤急的建議時，忽然從華盛頓來了一封由羅斯福署名的信件，要史迪威當面把這信件遞交蔣主席。

那天晚上，蔣主席正在他郊外的別墅歡宴赫爾利和納爾遜。史迪威被引見後即告訴蔣主席說有一封羅斯福總統的來函。接着赫爾利、史迪威和蔣主席都退入了另一間屋子。沒有半字的解釋，史迪威把羅斯福信件的中文譯文遞給了蔣。據說那恐怕是三年盟邦以來蔣所收到最利害的一個文件，裏面包括一項不客氣的要求，那就是立即而且澈底地實行改革和行動，以度過軍事上的危機。蔣一聲不響地讀着信件，兩隻膝頭緊張地戰慄。接着是一陣閒雜的談話，史迪威圍繞着這封信上的重量補充了某些細節。不一會，史迪威在這冷淡虛偽的氣氛中離去，而蔣却私自地陷入了極大的盛怒狀態之中。他對親近的人說，他并不需要美國；必要時，沒有美國的援助，他自己照樣可以單獨幹。他的惱怒可以說達到了白熱的頂點。

其後幾天，一切的談話都擱淺了。日本人一天天迫近桂林。怒江和緬北的戰爭陷在膠着狀態中，一切都期待着重慶的決定。在蔣介石腦子裏打轉的是最深刻的投機。他討厭史迪威已經好幾年了，他眼看着史迪威在緬甸建立了一支新的中國軍隊，同時樹立起一個足以威脅他的統治的制度。史迪威之主持租借物資也觸怒了他；在蔣看來，租借物資是送給他的禮物，他才有處理物資的全權，但史迪威堅持以租借物資及其部下的美國空軍爲資本，從中國參謀部中絞出儘可能多多的讓步。在蔣的眼裏，

美國是一個慷慨的同志國，羅斯福是友好的；蔣夫人曾經從華盛頓勝利歸來；赫爾利和陳納德都是他的知己。那末，中美關係上的一個主要的陰影，在蔣看來，一定是史迪威這個人的性格。

蔣完全清楚史迪威不僅受自由主義份子歡迎，而且在中共方面他的威望也高。史迪威的再三促請起用共軍并取消封鎖，在蔣看來，似乎祇是以削弱他的政權的政治陰謀的一部份。他已經給了史迪威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而現在史迪威首先給他的是一個苛刻的文件，要求全部覆查他的軍事組織，接着又給了他一個華盛頓來的似乎近於荒謬的信件。在蔣心目中，羅斯福所簽署的這個信中，簡直就像是出自史迪威自己的手筆，揮刀作最後示威。很顯然的，由史迪威來指揮，不僅是意味着一個新的軍隊，而且意味着一個新的中國。蔣已經作過幾年的空頭諾言，可是現在這些諾言一個個都得咽入自己的喉嚨。是的，才不過是幾天之前，他曾經同意過史迪威出任總司令；可是，現在，在他內心裏，他發現他不能這樣做了。他自己說過的諾言勢必得自己把它賴掉。

當蔣委員長的回信送來時，經由赫爾利轉呈給美國政府。回信的措辭是尖銳而單刀直入的。在這信裏，他不僅取消了史迪威出任總司令的事情，而且結束了他一切在華的差事。蔣主席說，原來的協議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當時他以爲美國的提議是要史迪威在他自己——國家的元首——下面担任指揮。『可是當我已經明白，史迪威將軍并無與我合作的意願，而且實質上他以為他是受命在我之上指揮，』這信上說，『一切都宣告結束了。』這是他以國家元首資格所說的話，話是太凶了。這封信使得美國的代表們都感到張皇失措。史迪威還是急迫地希望解決一些較小的問題，因為他知道美軍預定

在一個月之內將在菲律賓登陸，這一高級戰畧需要中國從大陸上對敵施以最大的壓力，才能減輕麥克阿瑟行將遭遇的壓力。史迪威要求行動，他主張把中共問題整個拋開不談，中美雙方集中精力把西南的政府軍造成一支能打仗的力量。然而，蔣却硬如堅石；他不願變更他那撤換史迪威的請求。

正當此時，一個完全意外的曲折滲入了整個談判。當時，孔祥熙正在美國。帶着他那一幅好人面孔和他那笨拙的行政天才，孔跨進了當前的危機。在一次宴會上，他遇見了霍浦金斯；他問起究竟羅斯福打算對史迪威怎樣。不管霍浦金斯的話是怎樣說的，孔覺得他的回答是，如果蔣一定堅持，羅斯福總統是會撤換史迪威的。孔抓住了這個絕妙的消息，立刻用電報以最快的速度打回了重慶。當時中美之間的交涉在重慶一直是嚴守着秘密的，其致國民黨最高級人士也并不知道僵局已經發展到了如何嚴重的程度。但是，現在蔣主席覺得他已經勝利了；於是召集了一次國民黨的中常會，吐露了他的心曲。他告訴他們說，他已經同意在中國由一個美國人來担任總司令，因為中國可以信賴美國；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允許由史迪威將軍出任總司令；假如美國一定堅持的話，他將自己幹自己的，甚至在日本軍來時，他可以帶領着他的忠心部隊撤退到山裏去。

這個中常會是經常在每星期一下午舉行着秘密的會議。往往都是它在某地開會以後三天至一星期才會洩漏出來；但是，這一次蔣主席表示爲史迪威問題不惜與美國分裂的消息，却像電流似的空前迅速地立刻傳遍了全城。當天傍晚，美國大使館——在高斯主持之下，它的消息向來是靈通而且特別準確的——就聽到了這事，而且通知了美國的談判代表們。這的確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爲假如蔣主

席已經對他的內層幕僚宣告了不可變更的意旨，除非不惜大大犧牲他的威信，他就不可能收回前言了。美國大使館慌張地打了電報給華盛頓，要求證實或否認霍爾金斯的談話。霍浦金斯回電說，他的話被誤引了；他只告訴過孔氏。羅斯福在沒有對史迪威採取任何行動以前一定會與馬歇爾將軍仔細商量的。但是這已經來不及挽回了；中國政府裏已經有太多的人知道蔣主席對史迪威事情已經下了決心，誰也無法再能變更他的意志。

羅斯福曾經試圖和解這事。他撤消了美國對於任命史迪威擔任總司令一職的要求，祇要求給予史迪威爲重開滇緬路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同時不把史迪威調離中國。赫爾利把這文件交去了，蔣依然不爲所動。他有兩點意思：第一，既然他是這個國家的元首，他毫無問題地有權利從中國撤換任何軍官；第二，他不再信賴史迪威的軍事判斷。在蔣看來，史迪威，爲了他的怒江和緬甸的戰役，已經把中國的人力和物資吸乾了，而使湘桂空懸無援；史迪威遠離中國已經太久，懈怠了他作爲參謀長的職守。後來赫爾利對作者之一追述過蔣的這些批評，似乎他也相信這是對的。史迪威對蔣這批評的辯護可惜不能公開發表，但是它是無可詰難的。

第一，是的，任命一個外國人來擔任中國軍隊的總司令是對中國主權有損。但是蔣最初並沒有反對過這主權的損害，因爲他覺得這樣做其結果是加強自己在中國的地位；他後來之反對，祇是當他看出了，他底軍隊的美國化就等於說取消了一向統治着軍隊的官僚腐化制度。沒有最後地刷新中國的政治，就不可能刷新中國的軍隊。而蔣本人是不够偉大到擔任這件工作，他也不够偉大到允許別人來担

任這件工作。

第二，史迪威集中了很大的一批力量在進行怒江與緬甸的戰爭，這是事實。但是，在中國，當時祇有兩個戰略性的人力大集中地點可以提供足夠的力量去牽制或阻遏日軍在湘桂的攻勢。一支軍隊派在怒江區域對抗日本人；另一支是派在北方封鎖共產黨。兩者都是受中央政府的指揮，然而維持對共產黨的封鎖却遠比打通滇緬路更切合蔣的意願。在史迪威眼裡，似乎找不出任何的理由應當停止抗日的軍隊正在節節勝利的怒江戰役，也沒有理由應當讓蔣把一支龐大的力量放在北方不動，以發洩他對共產黨的憎恨。把封鎖共產黨放在比打日本更重要的地位，簡直是一種背理的作法，其結果祇可能是災難重重——事實上正是這樣。

這些還都是史迪威事件的一些內幕辯論。但到十月中，問題僵到羅斯福已經不可能有任何選擇了；已經變成了有蔣無史，有史無蔣的局面。很勉強地，他決定讓史迪威走了。十月十六日，星期一，來了一封預先關照的信件，告訴史迪威說，總統大政將被迫把他免職。星期三，十八日，史迪威和蔣主席都得到了通知說：史迪威被免職并立即返美，今後將不以美人担任華軍總司令一職，同時中緬印戰場從此取消。自斯以後，中國戰場與印緬戰場將成爲兩不相關的地區，中國戰場美軍司令一職，由魏德邁將軍繼任，同時魏德邁將軍亦將繼任蔣委員長的參謀長。

星期五的下午，蔣委員長派人告訴史迪威將軍，將以中國最高的軍事勳章贈給他；史迪威率直地拒絕了。蔣主席以茶會邀請他，他接受了。兩個人偏促不安地對坐了好一陣子，蔣主席低聲地客套一

番，史迪威也以同樣的語調給他最簡單的回答。第二天的早晨是寒冷而可怖的。在重慶祇有五六個美國人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也祇有他們知道史迪威是一去不復返了。史迪威收拾了他的口袋，他的日本武士劍。和他的公文包，機場上，赫爾利將軍和宋子文站立在一輛泥濘的車子旁邊等候着給他送行。一輛中國旅行車穿過跑道而來，何應欽將軍跳下來了。；他行了一個軍禮，史迪威也回了他一個軍禮。宋氏和赫爾利對他作了簡短的話別；當他們的車子濺着濘泥駛去的時候，飛機的機器也發動了。史迪威踏上了飛機，眺望着一片灰暗的天空。『我們還等什麼呢？』他說着；同時，門就砰的一聲關上了。

飛機走完了黏滑的路基，到了跑道的盡頭，在那裏停留了幾分鐘的時間。機場是一片空地，濃密的烟雲懸掛在山頭上。一個穿着美軍制服的高個子在跑道的盡頭對着飛機揮手。飛機師加足了馬力，飛機向前奔去；到跑道的末端，飛機騰空了；它輕輕地濺過揚子江水，圍着燈塔繞了一週，然後就消失在霧層裡了。當晚停在怒江邊的機場，第二天一早又餓去了。

史迪威離開了中國。不久，高斯大使也接蹙而去。

這之後戰時的日子裏，美國對於中國所關切的是政治，不是戰爭了。而在中國，政治很簡單地就是如何去與延安的領袖們增進了解與合作的問題。

第十五章 延安的政治

經歷了無盡長的沒有峯巒的黃土山崗，被風雨侵蝕了的波浪地影裝飾着秀麗的田野，越過中國北部的凌空，你就從空中到達了延安。在這單調的乾燥山地裏，一條條細流與溪谷瘋狂地奔向天邊；三條峽谷會集在一長列綠色的平地上。從天空中看下去，就像是一個遊俠出沒的淵藪，隱蔽在這山凹裡，一座唐代的寶塔不調和地聳立在一個矮山巔上，襯在蔚藍的天空裏，真是黃得難以置信的可愛。假如你是通過封鎖線從陸路上去的，坐汽車要兩天，騎馬得要五天；這地方與華北其他縣份似乎並沒有什麼兩樣，除了那地方特別清潔一些，和那裏的人都充滿着罕有的活潑與朝氣。那裏的景物是人們所熟悉的——一群群頭上帶着朱紅垂花的動物，從沙漠裏來的駱駝，穿着厚重衣衫的人們在那北方的濃密而窒息的飛塵中徒步地走着。那裏的空氣和重慶不同，夏天乾燥而燦發，冬天嚴寒而愉快。

延安是一個混雜的地方。三萬下層的人民是當地土生的；他們的祖先不知若干世紀以前即已定居在這裏。他們和所有中國的北方人吃着同樣的食物，說着同類的方言，穿着同類的衣服。當晨光曦微的時候，尖銳的號角聲迴旋在山間，配合人們的歡欣與鼓舞。這樣的混雜是可以得到解釋的，那祇有當你認定延安不是一個政治首都，不是一個政治上的實驗站，也不是一個中國一般的縣份，而是一個

軍營，一個戰區司令部，一個臨時的指揮站，隨時準備着遭受攻擊，隨時準備着明天就要轉移。這個軍營是以兩個主要建築爲中心——中國共產黨的總部和中共軍隊的總部。黨的總部是擠疊在山下的兩座灰磚房子；除毛澤東以外，黨的高級人員和家庭都住在附近潔白的窯裏。軍隊的總部設置在一所舊柵柵裡，四圍有清澈美麗的花園，離延河不過幾百碼的距離。這兩個總部就是整個中共活動的指揮中樞。從他們那裏發出了指示，鼓舞着、訓練着、並且塑造着一萬二千多個居住和工作在窯裡的黨員，無數的窯洞散佈在這城圍繞哩長的山坡上。也就是從這些總部裏發出了命令和指示，傳達各地，從東北到廣州，從漢口到上海，動員着構成整個運動底基礎的幾百萬農民。

中共黨的領袖們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團體。單從外表看去不可能了解他們，因爲他們內部會議的一切都是絕對秘密的。他們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他們團結的意識。他們都共同地作過二十年來的鬥爭，對付國民黨，後來又對付日本人；他們的家庭被嚴刑拷打了，被暗殺了，以致失蹤了。他們一直受到警察的一切檢查和壓迫。弱者已經倒下了，動搖的已經投降了，那些還留下的就都是一個個韌如皮革，堅如鋼鐵。他們互相親信着，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沒有一點宗派主義的裂縫。如果他們有所爭論，都一定緊鎖在他們自己圈裏；甚至大多數的黨員們也不會知道，在最高權構政治局裡是誰反對誰。

這些領袖們都有着中堅人物的性格；他們驕傲，有的甚至於藐視一切。在他們肩上海沒有壓着使重慶官員們煩惱的勾心鬥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和他們談話可以坐下來不慌不忙而且愉快地漫談；他們往往不惜用冗長的時間來反映他們的政策；訪問他們時，他們可以對他們認爲重要的某一點理論滔滔

不絕地言之不休。他們不受那種紙上文章的無謂糾纏，他們一切都從遠大處着眼，而由所信賴的幹部們去執行他們的決定。這些領袖們從沒有重慶的高級官員們的奢華生活，雖然他們住的是比下級人員較為清潔和良好的房子。他們並不迷信所謂的平等主義。在這裡看不到像重慶的部長老爺與他的戰慄而襤褸的書記之間那種鴻溝；然而，安適與便利上的自然區分是被認為合理的。

雖然這些領袖們都被認是中堅的人物，他們依然驕傲於他們的民主，他們並且為他們自己立下一種模範的規則來配合他們的職位。黨的政策在國民黨一九四一實行封鎖以來即已展開了一個生產運動，要使延安邊區達到自足的境地。所有的農民都被鼓勵於擴展他們的播種和收割。所有的政府官員和黨員都得耕地，這樣來生產他們自己的糧食，同時也就減除了當地農民身上的負擔。這次的生產運動獲得了最大的成功；黨和黨的工作人員們賴以為生的不是稅收，而是他們自己額頭上的汗水。毛澤東管理着一塊煙田，在戰前，他抽着便宜的中國香煙，可是現在，為了使他自己能有煙抽，他辛勤地耕耘着他的烟田，結果他所生產的烟叶足夠所有黨的總部的消耗。總司令朱德種的是白菜。大多數的領袖們都驕傲於他們的易於接近。是的，毛澤東是居住在驢城巖里的郊外，而且受到比一般人較高的尊敬。但是，其他的領袖們對於所有的來賓都是非常殷勤的。在共軍總部每星期經常舉行的週末晚舞會裏，伴奏着號筒，笙管和本地弦樂的雜湊的音樂，朱德沉着地和小女孩子們跳着華爾滋舞；魁偉的參謀長葉劍英愉快地接受着任何勇氣十足的女孩的邀請，輕鬆地跳着雙步快舞。

這一群單純而忠厚的人，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他們對於重慶和世界安全有什麼了不起的威脅。可

是，當你考察一下他們的思想，聽聽他們的談話，你會發現一種倔強而難以克復的現實主義。第一格使你覺察到的事情就是他們對中國的知識；他們澈底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國家，並且了解農村。他們可以說是社會關係的工程師，他們完全懂得農民的疾苦是些什麼，而且完全懂得這些疾苦怎麼樣能轉化為行動。他們以農民為他們基本的力量；不管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是如何的散漫或理論化，他們總是能夠在最後得出某些基本的結論，而這些結論成了主意以後，最無知的農民都能懂得而且都會引為他們自己的主意。

他們對於外界世界知識的缺乏有時候是相當驚人的。他們對於高度的財政條約的議定，或者西方國家的行政系統知道得很少；對於工業，西方的機械工程，和國際貿易，他們的了解是敷衍的。他們對於西方歷史的認識都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解釋。比如，他們當中之，當他追尋中美兩國之間的類似之點時，他問我美國在獨立革命時是否即已有了電燈。但是，對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壓迫，他們却連最細微的地方都弄得非常清楚，同時他們也非常懂得怎樣利用西方的力量和方法去增進農民的福利。

他們這些人實在是够頑強的。當一九四一年實行封鎖時，重慶方面以為這下他們可要完蛋了；然而，相反的，他們却依然存在，而且當我一九四四年訪問延安時，他們實際上比重慶的領袖們無論在體質上或思想上都要堅實得多。他們個個都是這樣徹底的堅信他們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他們覺得很難脫重慶方面的官員和軍隊有什麼阻礙和能力。他們充滿着自信；在他們的講演裏，永遠帶着些微

的神聖氣氛，有時候會讓你回想起那些宗教性的夏令營來，在那裏人們來向地相互拍着肩膀，表示一種神聖的虔誠。

毛澤東的人格支配着整個延安。毛是一個矮而壯的湖南人，一張圓臉，沒有一根皺紋，奇特地爽朗；比起蔣介石的那幅道貌岸然的樣子，他的臉是活潑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毛總是用一種對話式的語氣——問問題，說雙關的諺語，做種種的手勢，來抓住他的聽眾。在共產黨裏，他們沒有正式的階級區分，可是毛澤東却是受着最高的愛戴和尊敬。他對於黨的無可置辯的支配力，比起蔣介石對他的左右的支配力來，是更為密切，也更難以形容。這一部份是由於一種真實的愛戴，一部份由於他的無可匹比的知識上的傑出。他已經領導了中國共產黨將近二十年的功夫，一九三五年和長征的英雄們共同地從華南長途跋涉而來，並且曾經和黨共同度過飢餓的日子。和蔣一樣，毛多少像一個傳教師似的，黨把他看做是一個聖者。由於他的領導，黨從一個貧乏的地下狀態變成了在這次戰爭與國際事務中一支強大的力量。他的領導是理論化的，但是理論一經他的解釋和運用就成了有用的東西，而且在實地工作裏得到了成就。

在延安有一種說法，認為毛祇是他同志中的一個長者，平等身份中的第一個人；他的話在會議中之所以有份量，祇是因為他的話往往是最聰明的。然而，實際上，毛却是一個為人愛戴的一個象徵，他的意志在共產黨裡的支配力量或許比蔣在國民黨裏還要大些。在公開的集會裡，人們不難看見政治局的其他份子——他們本身也居於很高的地位——反復地引用着毛的演辭，就好像在吮吸着知識的源

衆。在黨裏居於第二位的是朱德，紅軍的總司令。毛和朱有着幾十年的友誼和共同的鬥爭；在共產黨裏，毛居於第一位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共產黨，像國民黨似的，也有一個和蘇聯共產黨相類似的組織形式，兩黨都是以聯共的組織爲模型的。理論上，黨的最高組織是全國代表大會，由大會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然後再由執委會選出一個政治局，實際上這就是最高的會議機構。自從一九二八以來，中共就沒有舉行過全國代表大會。從那時起，中共就一直受着國民黨和日本人的驅逐和打擊，因此不可能舉行任何的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很難得開會，所以實際上黨的方向就決定於政治局。這個局受着毛澤東人格的支配；在這個局裡有陸軍總司令朱德；英明卓越的革命家和中共駐重慶的大使周恩來；和一個不大爲外界熟悉的劉少奇，他是黨的總書記，一個機敏而辛勤的行政工作者。還有其他的思想家和實際工作者也在這延安的高級政治會議裏。在延安政策與行政之間的區分是遠比重慶的來得顯著。政治局制定重要的決策，支配着整個經濟政策，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以及對外政策等等；然後由與其相配合的黨的組織和軍隊毫無問題地加以執行。延安真是一所巨型的實驗室，在這所實驗室裏，所有熱情澎湃的學生獻出了他們思想的精華；就在這些山邊的無數密洞裏，黨把這些精華溶化成了全國性的政策，把這此智慧鑄成實際組織的能力，然後又把這些人員和他們腦袋裏的成熟思想一鼓腦地重新塗回到各個地區。據估計，一九四四年，中共在延安訓練出差不多四千個青年男女。

延安方面認爲這是一種有效的民主。在行政方面，批評和討論的自由的确是毫無限制的，對於一

備方針的執行不當，對於無論文武當局之失錯，任何人都可以予以抨擊。事實上，共產黨人經常地在進行着自我檢討的整風工作，他們總是用一面放大鏡在那裡檢驗着他們自己的過失。他們痛擊着自己的胸膛以保證自我的改進，他們爲自己的失錯而悲哀和懺悔。在各地，這種行政上的批評自由形成了中國農民所從未有過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地方上的會議可以接受他們的控訴和滿足他們的需求，可以說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們成了這個社會裏的平等公民。但是，中共最高決策却是採取另一種形式。政治局把經過了上層領袖討論的最高決策往下級傳達，延安方面不作什麼批評。在延安，對於政策的同意是全體一致的——這恰好和重慶成了一個對比，在重慶，中共的報紙有力地批評政府，無黨無派的報紙也以能漏過檢查老爺的網爲一大快事。在延安祇有一張報紙，沒有人大聲囑囑政府應該或是不應該做些什麼（至少外國人看來是這樣）。這張報紙經常地把它篇幅公開給黨員們對黨底政策與執行底缺點作嚴厲的剖拆，但是這裡却沒有重慶那種緊張的空氣；在重慶，專以譏諷爲能的國民黨官僚們，整天在嚶嚶吱吱，經常地勾心鬥角互相嘲罵。

至於延安的一致精神，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加以評斷。有一種解釋說，延安着重的是行動，而不是政治；人們都忙於他們的工作，他們實在沒有時間去作政治爭論。同情共產黨的說，這種一致性是源於全部的協議；但是恐怕很少有這樣完善的政治制度，自然地就會得到一致的協議。政爭執是政治當中重要的一部份，如果缺少了它，某種自由的氣氛也就短少了。國民黨說，延安的團結是一種極權性的，延安是靠特務，靠集中營，以及靠其他各種國民黨所有的然而它却不承認的方式，來統

治一切。但是，我在延安却找不出這種壓制性機構的任何跡象；我在那裡祇有短短的幾個星期，但是其他留在那兒幾個月之久的美國人也同樣找不出中共有任何像重慶那種獨裁專制性的機構。在各個地方，的確有一些中共對付大富大地主的殘暴事實；在淪陷區裏，也確有許多中共砲手在做地下工作，過去也會經盛傳一時，中共的恐怖份子曾打擊并殺戮國民黨間諜和共黨的叛徒。但是，所有這些都祇是戰爭的一部份。

重慶方面辯護說，中央政府准許一張共黨報紙在它首都出版，雖然在嚴厲的檢查制度之下；然而在延安却沒有一張反對派報紙准許出版啊。對於這一點，中共有一個非常適當的答覆，很難子把它駁倒。他們現在出版他們這張報紙的印刷機器過去都是從一個日軍佔領下的城市裏偷運出來的，他們所用的紙張也是在日本人的炮火下從淪陷區裡運來的。他們公開地說，假如國民黨願意在延安出版報紙，那就讓國民黨自己運來一部印刷機和足夠的紙張，這樣的話，他們是樂於准許它印行的。中共保證過，在戰爭結束以後，所有團體都得完全自由地出版他們自己的報紙。他們指出，外國記者從延安發出的電稿，從來沒有被檢查過。關於這一點，我曾經向他們的最上層領袖之一尖銳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說話，不管他說的是什麼，就像在美國一樣？」「是的，」他回答說，「祇要他們不與人民為敵，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說話。」至於誰來決定怎樣是與人民為敵以及應該用什麼樣標準來作評斷，他却沒有加以解釋。

美國人的生活似乎是不民主的，因為他們那裏沒有一個有組織的反對派政黨；這是從來就如此

的。中共把他們自己最完善地同時最堅強地組織了起來，他們所在的地方是叢山峻嶺的地區，是日本不能竄入的無路可通的平原。這些地方，因為它的落後，在戰前的確是最沒有政治積極性的地方。中共所佔領的這些古老村鎮裡，過去從來也沒有組織過什麼政黨，除了莊稼生意而外，誰也不想什麼別的。在這些村子裏建立他們的黨，在戰爭時期把黨員數字從二十萬發展到一百萬，中國共產黨人的確是在處女地上工作，並且在他們的機構當中最積極地起了個人的作用。他們知道，沒有反對派是不民主的，所以他們制定了一種三三制；依照這個制度，任何城鎮或區域的參議會當選代表不得有超過三分之一為中共黨員。至少，三分之一必須是國民黨員（儘管國民黨說，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的叛徒），其餘三分之二屬於無黨無派。實行的時候，這個制度并不完全這樣死板，不過中共總是把他們自己的比例做到不超過三分之一。事實上，中共之多於或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在每個地區政府裏，他們都是唯一與整個政策相連繫的團體。他們是軍隊的領導人，他們又是農民的保護人。他們制定策畧，無論從那方面說，農民都把共產黨人看做是他們自己的領導人，看做是他們自己意志的代言人。

中國共產黨人斷然地否認許多美國朋友的說法，這些美國人認為中共祇是農業改良者，根本不是什麼共產主義者。他們堅持說他們是徹底的共產主義者，而且他們以此為榮。他們說，共產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應用到一個變動社會中的問題上去，這些原則是永恆的，無論你應用在俄國，美國，或是中國。然而因為每一個社會都是不同的，同一原則的應用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實際上，中

國共產黨屬於世界上最偉大經驗家之列，是錯誤與考驗過程中出類拔萃的藝術家。他們的原則領導着他們經歷了二十年的過程，在這當中，黨的路綫是變動着的；在每一個一定時期中，每一個路綫都是作爲一個基本而無疑問的真理而提出。許多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往往處於不負責的理論反對派地位，而中國共產黨治理着千百萬同胞却已經有二十年功夫了。他們的討論是實際的；一個基本的問題永遠是：「這樣行得通嗎？」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中的應用是奠基於毛澤東的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出版的一本書——論新民主主義。這本書至今還是整個運動的聖經。這本書是在德蘇互不侵犯協定那個時期中寫成的，假如是晚一點寫的話，其中許多地方大概會不同一點。這本書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爲它表現了當時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這本書整個忽視了美國在太平洋所起的作用，比如，它說：「沒有蘇聯的協助，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本書之值得重視，因爲它代表着從三十年代的激烈革命原則以來黨路綫的基本轉變，同時因爲它是在美國戰爭的重擊加諸日本頭上以前寫的。共產黨人都是不流於空論的人們，他們不斷地在增加實力。毛的這本書是精明的，而且在許多地方是傑出的，是無所不包黨能夠賴以在任何情況下引導自己的一個行動綱領。

早期，在華南一帶時，中共所主張的是實行中國土地蘇維埃化的綱領——主張徵收土地，群眾暴動，嚴懲地主；那時，他們曾經認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破壞人民的一種可恥手段。當他們被迫遷到北方時，他們採用了一個號召抗日統一戰線的新路綫。他們這個政策的決定是爲了停止內戰和防止

日本的侵入。就國際形勢言，它是吻合共產國際的大原則的，當時共產國際的政策已變更爲在每一個地方號召組織統一戰線。根據一九三七年他們和國民黨所成立的協議，中共接受三民主義，並放棄他們土地沒收和蘇維埃化的政策。他們毫不苟且遵守着這個協議，到一九四一年時，他們這種新策略已經超過一切想像地得到了成就。毛的這本書就是一個政策的正式文件，幾年來都是在順利的執行中。其中基本的目標依然是社會主義，舊的制度最後必須廢除的。然而，在封建與半殖民地災難中的今日中國，與那沒有階級區分沒有鬥爭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未來世界之間，「新民主」的時代自然地插足進來。至於這個階段將有多長或多短，毛澤東並沒有加以說明。他祇是說，中國今天這個時候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所以農民和工人必須在他們反封建的鬥爭中尋求盟友；這些盟友包括民族資產階級，進步的城市份子，知識份子，和開明的中產階級，他們都和工農一樣受着土地枷鎖的壓迫。祇有大家團結起來，才有可能改變中國，創造民主，從而奠定走向社會主義的基礎。

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術名詞。雖然毛澤東並沒有「布洛克」這個名詞，他爲這過渡時期所設計的機構却很明顯的是一個農民，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布洛克」。一個「布洛克」并不一定是說參與團體在選舉表決時將有組織地彼此抗衡；毛也並沒有提到選舉這回事。他的主張是要代表諸協調階級的兩個集體的結合體，共同掌握權力，共同享用權力。這兩個友好的集團，與其分別地求靠於選民，毋寧採用討論和仲裁的方式來解決彼此間的紛歧。同樣的情形也會在美國出現，假如美國的民主黨代表着全體人民的話；南方和北方的民主黨員之間的紛歧就合自己解決，而以一

個共同得出來的方案呈現於全體人民面前靜候他們的批准。這樣一種結合體制是中共在戰時發明出來的，他們把地方上最進步和最積極的人都吸收到了他們政權裏來，這些人不必要是共產黨員，然而他與共產黨密切地合作以抗擊共同的敵人，以實現造福大眾的目標。在實踐時，這種政策就是三三制，中共方面覺得，他們在農村裡和中產階級協調合作的政策實在是驚人的成功。由於這個團結的政策，於是在每一個文化和民主活動的圈子裡都成長着對中共的熱愛。這個政策一直是推行得如此的成功，因而使人充分相信，在未來十年或幾十年中，中共一定將繼續和下層中產階級融洽地協調。除非在極端銳利的刺戟之下，現在還看不出來他們會再回到在農村中實行殘暴的沒收土地和恐怖政策。

毛的「論新民主主義」留下了幾個問題沒有解答。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新民主的階段究竟會有多長？和其他集團的結合是暫時的呢還是永久的？共產黨人是不是最後會分手開來獨自地實行社會主義？抑或是去說服其他的集團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也是他們的社會？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權利和少數權利的問題，究竟那一個是美國式的民主觀念的基礎？戰時，中共說，在中國社會兩面都要的；他們攻擊國民黨的獨裁專政，而在這門爭當中同時也就是爲着所有其他團體的自由權利而戰鬥。但是，一直到現在，中共還是處於反對一個統治機構的地位，他們的基地也是在那些根本不存在反對派的落後農村裡。對於大城市裏有組織的反對派，他們將怎樣應付呢？而在這些大城裏，國民黨的中產階級是有基礎的，而且利用金錢和勢力它可以指揮提出另一種主張的報紙。假如讓中共統治大型而且復什的城市，他們會不會允許反對派報紙存在呢？他們允不允許人們來向他

們作意識上的挑戰呢？他們說他們會允許，因為他們相信，在任何「民投票的誠實的競賽裡，人民都會擁護他們和他們的友軍所結成的大多數，而反對那地主階級和有錢人的少數。但是，假如這些共產黨人的估計是錯誤的而且票數被人超過了，他們不是干願屈服於一個和平的選舉呢？他們是不是還像今天這樣熱心地擁護民主權利呢？這是一個不能解答的問題，除非我們能有機會看到一個過渡的聯合政府怎樣在和平的實踐中行進。

美國人還有第三個而且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要問中共。在「論新民主主義」裡，毛澤東列下了在過渡期中聯合中產階級的三個基本條件。其中的兩個是無可指摘的：與共產黨實行合作和保護農工的利益。第三個條件，毛把它列為第一，是要所有的團體都贊成中國與蘇聯之間結為同盟。這個中蘇之間的同盟是怎樣的，却并未加以說明。如果是一個排外性的同盟，把中國不可變更地緊鎖在一個假想的，反對所有其他國家的蘇聯世界戰線裏，那就是太危險了。如果祇是中國與各國所建立的聯盟之一，那就可以說是一個很進步的要求。不知道中國共產黨人看清楚了沒有，一個革命的中國是只要一個盟友呢？還是要許多個盟友？

在許多地方，我們都似乎可以肯定，「論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對外在世界的看法的最後總結。他的看法在後來的幾年中不斷在生長和發展，而且反映在黨的整個態度上。中共對於國外的看法的轉變表現得最戲劇性的是對蘇聯和美國的態度。簡單地說就是，自從珍珠港事件以後對於中國共產黨，美國一天天重要起來，而蘇聯反倒變得日益疏遠。

過去，早在廿年代時，中國共產黨曾經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局，受莫斯科的控制，如黨內的論爭，理論上的宗派主義，以及蘇聯黨的專斷性指令所震盪不定。一九二七年它和國民黨分裂中所造成的失敗，反映了一部份是它本身的不够成熟，一部份也是蘇聯的建議缺乏根據，當然大部份是由於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支持。在華南蘇區那個時代，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中共和西方世界整個地隔離了開來；他們在地方上無情地實行最極端的革命政策，那時候還是受着共產國際顧問的指揮。許多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直到今天還把他們在華南的失敗還罪於他們自己甘心聽從失策的外國顧問。

十萬里長征標誌着一個轉捩點。中國共產黨在它自己的領導之下在延安重新安定下來。毛澤東——黨內無可動搖的支配精神——是一個從沒有到過外國的中國人，他的天才不僅表現在他頭腦傑出的清激，而且在他對中國農民問題想像不到的深刻認識。黨內的極左派是以幾個從莫斯科回來的黨員為首，他們並沒有被清除也沒有被趕走，不過他們已降低為一個微弱的力量，如果把毛底無可詭難的優越解釋為中共的一種反蘇改良，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蘇聯依然還是世界革命的母國，聖者和護衛。這種新的作法祇是很簡單地由於中國共產黨比任何一個外國黨都更懂得什麼才是中國的福利。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次演講中，毛氏極力強調，他相信中國的實踐，而不是什麼外國的學說，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人唯一的考慮方針。他說：

「我們有許多同志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是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許多人因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的故事……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

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祇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這時候，蘇聯的外交和政策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早在三十年代時，蘇聯發現它自己受着東方德國和日本的威脅，於是它就尋求與國來對付這種威脅。在歐洲，蘇聯企圖與法國和捷克以神聖的條約方式結爲反希特勒的同盟。在東方，唯一可以用來反對日本侵略的最大力量就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於是蘇聯非但不以內在的不寧來削弱它，而且反以物質的援助來加強它。當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蘇聯是大國中第一個起而援華的。當時一方面是美國運輸鐵礦和石油給日本，另一方面却是蘇聯運送汽油和飛機給中國。自一九三七至三九之間，蘇聯對中國政府的援助，單是一支蔣介石在華中作戰的空軍就已達二億五千萬美元的價值，而當時美國對華的援助總數僅及這個數字的五分之一。

蘇聯當時小心翼翼地推行着一種正確的政策。它不僅承認蔣介石是一個元首，而且當一位親共的新疆主席主張將新省併入蘇聯時，蘇聯拒絕了這個建議。在西安事變時，這同一人物曾經建議蘇聯與中共聯合向南京蔣政策發動一個全面的進攻，但他被拒絕了。蘇聯最需要的是個強大的中國來和日本抗衡，就是國民黨也覺得蘇聯的態度是無可非議的。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他們大規模抗擊日本的戰爭中是絕對缺乏軍火和給養的，他們不可能從蘇聯的這種正確政策得到什麼撫慰。在整個戰爭的過程中，他們就沒有直接從蘇聯得過一架飛機，一噸汽油，或者一箱彈藥。所有從蘇聯來的援助都給了蔣介石，而在這當中，據說中央政府祇曾經在抗戰初

期給了中共四技舊槍。中國共產黨是完全自食其力地在打仗。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的幾年當中，聯飛機飛到延安去過的總共不超過五架，而且每一架都經過中央政府的批准，去的時候每次都帶着一個中央政府的監督員，所有摺帶的東西也都是經過澈底檢查的。一九四四年時，兩位塔斯社記者和一位蘇聯醫生來了延安，他們算是蘇聯在延安的僅有人物，而他們之來都會經中央政府的許可。美國在延安所設的軍事觀察團却有五倍於他們的人數。

到一九四四年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了根，把自己中國化了，民族化了。領導方針亦已完全符合中國的需求和中國的利益。同時，中共對美國亦開始重新予以估價。過去在中共的腦子裡，美國一直是一個專以掠奪為事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貪婪的帝國主義者深入到中國土地裏來掘發利潤，並且培養出了一個落後的國民黨來達成他們自己的利益。到一九四四年，和在華美國人有了直接接觸，而且這些美國人所受的領導方針是以史迪威為象徵的，於是給了中共一幅美國政策新圖畫。通過史迪威和高斯，美國當時所要求的是每一個誠實中國人都一致要求的某些基本改革。一九四四年夏季，美國之激烈要求國民黨實行改革，使得中共相信美國人所說的「民主」也和華北解放區所說的「民主」大致是一個東西。美國當時已經不是改革與變遷的敵人，反倒變成他們的同道者了。

在這幅新圖畫中又插入了另一個因素。不錯，應當讚揚蘇聯對德國的偉大勝利，也應當轉載塔斯社關於東線勝利的種種消息；然而中共自己是在抗擊日本呀，而在抗日的戰爭中，祇有美國才是最有力的。在中共所治理的山地農村裏，最初大家感到最後勝利好像是一面遙遠的幻象，是從絕望中誕生

出來的蜃樓仙景。但是，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的消息却帶來了一個希望，勝利可以成爲一個事實，鼓勵着每一個戰壕裏的士兵。他們曉得了，遠在太平洋上的某個地方，有着一個比日本更強，有更多坦克、飛機、大砲、海軍的盟邦，而且那個盟邦現在正一天天向中國海岸走來，爲了支援當地對侵略者的無抵抗。這種雙重盟友的感覺——同時反對國內與國外的敵人——隨着中共與延安美國軍事觀察團的接觸而日益加強。一九四四年夏在延安成立的美國軍事觀察團是受着美國最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巴瑞特上校（Colavid Barrett）的領導。巴瑞特可以說是正規陸軍上校的一個模範，他這個人的性格裏充滿着溫暖的人性，而且有一種豐富而染人的幽默感。他自己誇說他是一個堅決的共和黨員，又是一個「黑心腸的反動份子」。中國共產黨人都很歡喜他。他以純正流利的中文說出的種種笑話，打破了許多中共對美國帝國主義所假想的圖畫。巴瑞特關於中共的報告都是忠實而無可指摘的評價。因爲他自己是一個軍人，他認識到共軍都是能打仗的戰鬥員，都是打倒共同敵人的有力盟友。中共見到他對他們尊敬，他們也對他尊敬。對於中共而言，史迪威，巴瑞特，以及來來往往的熱情的美國記者們，都代表着美國的友情。

一九四四年的秋給美國帶來了一個大好的機會。在一個短時期內，事實可以向中國的革命份子證明，美國是贊成進步的。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共的巨大活動和會會信念都是緊鎖在一個祇求蘇聯支持的拘謹公式裏。現在，正是向蘇聯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證明的時候，證明美國并非出於什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是出於一種良知，在世界各地追求自由與民主。

然而，我們却放過了這個機會。在往後的六個月當中，我們却向中國共產黨證實了另一點，那就是無論他們對我們怎樣友好，我們將在任何情況下支持蔣介石的政府來反對他們。我們向中共証實了，的確他們唯一的友人是蘇聯，我們迫着他們重新與蘇聯結為盟友，而且是自長征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那樣無問題地結為盟友。我們這種做法正造成了我們所最恐懼的事情——廣大有組織的亞洲農民因而相信美國是他們的敵人，蘇聯才是唯一的朋友。這并不是史迪威的救濟政策造成了這個，中共認為還是美國的無知所產生的一個小悲劇。一九四五年整個美國外交政策，終於使中國共產黨深信美國實在是一個敵對性的列強。

第十六章 身如鎗銃的赫爾利大使

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將軍離去以後，中美關係的史頁掀開了新的一章；赫爾利就是被挑選來寫這一章底序頁的人物。

一百年來——自從顧興（Caleb Cushing）（顧興為當時美駐華公使，與滿清簽訂一八四四年望廈條約——譯者）在一八四四年的條約裏從滿清帝國手裏為美國強索到貿易特權以後——美國對它駐華使節的指示，只是為了一種利益，那就是貿易，也就是保衛美國經濟的擴張特權。可是，到一九四四年的時候，遠東外交已經不再僅僅是關稅，條約權利，借款，和貿易權之類的問題了。那時候美國的外交負有建立和平的任務，而中國正是和平可以成立也可以消失的地方之一。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担起了評斷紛爭與促進和平繁榮的莊嚴職務。中國需要槍枝，飛機，錢，現代器械，和國際威望；所有這些都可以從那俯瞰着揚子江水的白色平台源源而來。（按當時美國大使館在重慶南岸揚子江畔——譯者）

高斯是眼看着這個變遷的到來而且和它並進的。服務於國務院以來，他已經從三十五年前的副領事擢升到了特任全權大使的要職。當一九四四年夏天時，高斯感覺到，有一種新的力量壓迫着他對美

國大使職務採取新的觀點。和史迪威一樣，高斯看到了中國國內的和平是美蘇之間融洽的前提，而有賴於這個融洽，一個沒有戰爭的新世界才有希望。也和史迪威一樣，高斯因為努力於促成這個和平的誕生而被免職了。

舉世著名的史迪威被召回國與高斯辭職事件，立刻把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新大使的身上。重慶美國大使館就成了我們全球三大前哨之一，和倫敦莫斯科有着同樣的外交地位。而它的任務，比起與其為伴的另兩個前哨來，甚至更為困難與複雜。它的作用是塑造一種與一個不可控制的革命相關聯着的美國政策。處身於一個破碎文明的混亂當中，它的任務是在於從這騷擾裏尋出最主要的力量，然後鼓勵這些力量創造一個新穎而穩定的中國社會。更重要的，它的責任，是要不管中國變到那裏去，還可以維持一個友好的基礎，在這基礎上美國能建立持久的和平。

美國第一次在中國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敵對的雙方都明白，只要美國站在他們這一面，中國就是他們的；如果美國是站在敵對的一面，勝利就變得遙遠。同時雙方都信賴美國擔任他們糾紛的調人的忠誠。於是美國大使館就變成了東方命運的十字路。

所有這些碩大無朋的負擔都全部放在新大使的肩上，赫爾利原是以羅斯福的私人特別代表身份來到中國的。赫爾利確也是特別的，他一表堂堂，有着一簇堅硬的鬍鬚，一叢鬚垂白髮，一個挺直如鐘錶的身軀。穿起軍裝，佩帶上所有的勳章，他簡直就是一個現代少將的範型。他是一個長於詞令的人，對於粗俗的語彙有着特別的愛好。無論在體格和儀表上，在人格和氣量上，他都超越了中國人所

曾打過交道的任何一個使者，他們謹慎小心地接待着他，期盼着摸到他性格的端倪。

赫爾利在美國的生涯，追述起來就像是在讀荷瑞亞·愛爾迦（Horatio Alger）的作品。他生長在奧克拉荷馬，是一個孤兒。他永遠懷念着奧克拉荷馬。他曾經在煤礦裏做過工，當過兵，也做過放牛的，還學會了說巧克甸印第安人的語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軍官，他會告訴你漫長的故事，關於他怎樣發明了一種迅速而又不會洩露的電碼；在軍中電話的兩端安置好他的印第安朋友，然後讓他們用巧克甸語互相傳達命令。後來他曾經做過大律師，成爲一個富翁，還當過陸軍部長。在陸軍部長任內，他曾認可過對罷工者的「戰爭」。在墨西哥政府與當地美國油商的談判中，他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在這次戰爭的初期，他曾負責派遣救濟船隻到封鎖中的菲律賓。他並且曾經作爲一個外交事務上的「困難射擊手」而環遊世界。

赫爾利曾經一再地說過他是不會被任命爲大使的，他不需要這個職務，他也不會加以接受。他并且解釋說，他曾經被提名出任駐蘇的大使，這是一個更爲重要的差事，可是他拒絕了。在他來華的初期，他曾經誤解過高斯大使對於華盛頓接連派來「特使」干擾大使職務的不耐。赫爾利說過他曾經怎樣以一個奧克拉荷馬的老故事來使高斯大使安心。他說，他曾經以他孩提時在美國西部所見的一個故事，講給高斯聽。當時有一家熱鬧的酒吧間，後面附設了一間理髮店。在一個特別陰黯的傍晚，來了一個顧客，當他躺在椅子上修面的時候，開始响起了往返不斷的槍聲。這位顧客掙扎着要坐起來，那理髮師却漫不經意地用手臂把他推了下去，一面說：「躺下去吧，朋友，沒有人在射擊你！」赫爾利

說他會把這故事告訴高斯，勸告這位大使說，躺下去吧，朋友，沒有人在射擊他。赫爾利反復地說，他曾經屢次告訴高斯他並無出任大使的意思。

當他一九四四下半年終於出任大使時，美國大使館正在郊外陡峭的小丘上，俯視着震顛於政治爆炸的都城。重慶是一個沸騰着人物與政治的都市，重慶能解剖着這偉大戲劇中的每一個角色，探索出一切事態發展的纜索。美國大使館當時成了這城市中最重要之勢力中心；而在不到幾個月之內，抑壓着的「爆炸」，由重重圍牆裡終於奔騰起來，鼓舞了同時也震動了群眾。

中國人往往把人與事混爲一談，把一個代表和他所代表的國家混爲一談。赫爾利是美國的代表，所以，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赫爾利就是美國。中國人發現高斯冷若冰霜，他的新英格蘭氣派更是高深莫測，他們就給他取了一個綽號「誠實的菩薩」。赫爾利是個好群喜樂，有說有笑的人，在跳舞會和慶祝會中，他總顯得愉快無比。在重慶，沒有所謂「私人生活」之類的東西，政府官員和外國人生活於同一個狹隘緊密的社會裡，互相拜訪，喝酒和邀宴。這個小圈子裏的每一份子都相當準確地知道大多數其他份子的個人習慣、偏見、脾氣、癖好等等。重慶很快的就聽到赫爾利是怎樣生活的，接見了什麼人，說了些什麼。他的最細小動作，在其他場合下是毫不足重視的，在重慶却總被認爲是天大的事情。

當重慶看到這位新大使在一次大使館的舞會裏，跳了一個印第安戰爭舞，又在另一次聽到他作令人驚心的巧克爾啤叫之後，他們就賜給了他不少的渾名。共產黨立刻叫他做「小鬍子」。赫爾利對於

中文的處理是十分滑稽的；他把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讀作「摩斯東」。也許赫爾利以爲毛澤東就姓粟呢；他在抵華幾個月後，每當提到蔣介石的時候，還總是稱他爲「石先生」。許多美國人則稱赫爾利爲「紙老虎」。但是在所有加之於這位美國使者的渾名裏，最痛快伶俐的一個還是他的一些國民黨朋友所贈給他的：「第二大風」。

赫爾利的個性本身，是既無趣味又乏意義的，但是作爲世界第一強國的大使，他的個性就賦有隨官職而來的的重要性了。人人都知道赫爾利來到中國，是懷了極大熱誠，希圖竭盡所能實現華盛頓的指令的。但是許多深知他的人們，當時已經見到了他這一幕掙扎於他能力範圍以外的問題中的悲劇。

當赫爾利在中國正式接任時，他已經不是一個年輕人了，他易於疲乏，他的眼睛常常困擾着他，他不喜歡閱讀長篇文件或書籍。他少於上大使館去，而那裡却正保有關於中國所有錯綜複雜問題的編目摺卷。任何一個想了解中國的人，必須要把爛的歷史，土地問題，社會結構，背叛反亂，和政治運動等等作一個有系統的研究。然而赫爾利却不然，雖然他的記憶力並不是可靠的——有時候他連會話都會忘記——他却寧願從他親信和喜歡的極少數人們那裏用聽覺來吸取知識。他的僚屬常常到他的寓所來向他高聲朗誦函電和公文。

一個人外表的莊嚴，也時常會爲脾氣的爆發和鄙俗的言行所破壞。在他到達以後幾個月之內，全重慶都知道了他曾經當着許多中國官員的面，把士子又駭得下不了台。幾個不識趣的美國記者，也曾經給這位大使當面咒罵。在重慶的一次盛大鷄尾酒會裡，魏德邁的忠實的參謀長麥克魯少將觸怒了

他，他竟當眾大發其脾氣。

就是魏德邁將軍，在華美軍的總司令，也還是不倖能免赫爾利的脾氣。在當特使的時候，赫爾利和魏德邁住在一起；當他變成大使之後，照理他應該搬到大使館去的。但是他不喜歡那所房子，於是下令把那幢房子全部重新油漆過，買新的地氈，新的家具——在重慶幾乎是找不到的東西。大使館的屋子修葺完畢了幾個星期之後，赫爾利依然還是住在魏德邁那裡。後來，突然的他和魏德邁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辯，有好幾天，他們彼此間都不說話，赫爾利就決定遷移出去。於是他給了那些向來居住於使館的隨員們一個通知，要他們在幾小時內在人滿爲患的重慶另找居處。然後，他就孤零零地搬進了這所屋子，與他共享這份寂寞的，祇有他的上十衛兵和中國僕人。

赫爾利所承繼下來的這個大使館，可以說是一架非常精巧的機器。日常的字面工作都是順利而敏捷地通過工作人員的桌子，不必要大使來操心。政治方面人員都是一些精明的青年職業外交家，他們都受過訓練，按能力而被挑選來負責報導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負責制定並應用基本的美國政策的大使，得隨時把他們爲他搜集到的重要政治情報，敏捷地應用到手邊所處理的問題上去。

高斯是一個峻嚴却又公正的工頭；他謹慎而好探索究竟；但是對於他所運用的機構有極大的信心，他堅持他的大使館必須做到是中國消息最靈通的所在，事實上的確如此。他手下的人在困難的條件下也在中國各地作最廣泛的旅行，探索關於這些地方的大量有用的情報。使館裡大多數職員都已在中國有過幾年以上的訓練，有廣濶的交遊，而且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赫爾利却把這一批優秀的

助手看作是前任留下來不友善的冗員。他們都非常熟悉於中國政治的複雜性，然而他都覺得祇有兩個爭執不已的政黨。大使館職員裡，凡是不同意於他的說法的（當時使館裏的每一個政治報導員實在都是這樣的人），都被列為「赤色份子」。當他們指出隱藏於談判幕後的中國現實政情的時候，他就指斥他們對他的政策實行怠工。

國務院的一個優良傳統，是要其職員以其所目睹實情報告於美國政府，決不為討好上司的成見而沖淡其報告的真實性。赫爾利却駁斥了一切批評蔣政府的報告。那就是說，一切關於中國的人民，報章，政治，一般的輿論，中共問題，或者軍事背景問題，根本就不能提。當政府軍與共軍的衝突變得更加激烈的時候，赫爾利的一個職員對這事件作了一份備忘錄報告國務院，他並且參閱對照過美軍情報處的情報。可是在一次會議上，赫爾利却指斥這報告為無事實根據，並且違反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有幾個月的光景，華盛頓應該早已獲得一切的情報，可是它從重慶大使館所得到的沒有不是帶着偏見的情報。赫爾利寄出的是關於他的如何成就的簡短報告，然而中國的政局卻沒有顧到美國大使館的意向而一天天走向內戰。大使館的生活，隨着大使每一次新的詛咒而愈益狹隘了，館員們也變得沉默和畏懼，而且以歡欣來迎接由於大使的「清共」而加於他們的調職。

重慶的生活很快就消融了赫爾利初期的愉快，而當他把他的僚屬們愈驅愈遠時，他也變得更加痛苦而孤立了。在他到任三個月之內，他就成了美國居民中的一個尊嚴被凌辱了的孤島。在其他美國人的紛歧意見中，他見到了一種經常毀傷他的計謀，他對新聞報導的畏懼也日益增強。於是他召來了

兩個私人的新聞隨員，並且邀請了來華訪問的記者們和他住在一起。大使館密切地注意着一切發回美國的電訊，以根究對大使評論的來源。中國政府對他真是關切備至，衛護着他，使他不受美國報紙的抨擊。一位主要的新聞檢查官曾經正式地對一個美國記者表示：「中國的新聞檢查決不容許任何足以爲害兩國政府（美國和中國）間友好關係的消息洩漏出去。赫爾利大使是代表美國總統和美國政府的，所以任何美國人在中國境內對他的攻擊都決不容許洩漏出去。」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也覺得保護大使免其遭受記者們的批評是明智之舉，雖然他私下也承認有許多批評是完全對的。因此，一群外籍記者們祇能在沉默與失望中憤怒，他們相信這種形勢總有一天要爆發爲一連串的災禍。

當赫爾利把注意力轉向當時中國國內劇烈的政治鬥爭時，他的任務已經有了許多失敗了。他曾受命爲美國獲取中國軍隊的控制權。他失敗了。他又會受命使史迪威和蔣介石的關係趨於協調，在這一點上，他又失敗了。然而與其第三個任務——完成國共之間的和平——比較起來，這兩件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這需要無限大的耐性，一種近乎聖者的受難精神，幹練有力的行政能力，以及對於中國深切的了解。赫爾利以一種愉快的情緒去接近這一工作，他相信機敏的討價還價就可以解決革命中的亞洲的基本社會問題。在共產黨問題上的成就，遠足以補償在他處的失敗而有餘，同時一個「赫爾利協定」將在中國的歷史上永遠刻着美國外交的光輝。

在史迪威被召回以前，赫爾利曾經對本書作者之一明白表示過他已經與蔣介石及兩位中共領袖進

行過談判。這是一個驚人的消息，這意味着美國第一次爲免除中國內戰採取了積極的步驟。作者向赫爾利追問，赫爾利却說不出這兩位共黨人士的名字來，他細聽了作者對於中共諸代表的容貌身材的描述之後承認說某兩位是他曾經談判過的。他並且對於圓滿解決抱有希望。因此，我們二人立刻跑到共黨方面去，以求証實此項消息，並且想探聽他們對於解決問題的可能性的意見，以及他們對於赫爾利的看法如何。共黨人士却直率地否認他們曾與赫爾利碰過面，並且說他們曾經邀請過他吃飯，可是他卻從未答覆。同時他們對於什麼時候才能被邀請去開始談判也摸不着頭腦。於是記者們又回到赫爾利那裏，告訴他中共方面的說法，并要求說明真相究竟怎麼回事，但是這位大使除了反覆聲言他曾主持談判之外，並不能清釋我們的疑慮。

這兩位被大使認爲是中共使者的人始終沒有被肯定地證實是誰。赫爾利曾經在一次例行公事的會議席上遇見過他們，事情也只如此而已。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他們并非延安政府的正式代表。

赫爾利大胆的開始推行他的任務。他聽到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文告；二者在他們對於民主團結與和平的熱中所求裏，引用了同樣的信條，有時甚至用同樣的語句。祇有對於中國有深切了解的人，才說得出這二位領袖的真意是什麼，誰是反動的，和誰是革命的。赫爾利却以爲這兩種文告足以證明兩黨之間協議的距離近如咫尺。只是程序上的相異阻止他們互相擁抱起來。他以為只有少數陰謀份子在阻撓他的和平努力，而在這些陰謀份子之中。他相信有他的同國之人。他認爲蔣介石是對的；中共在無

端挑釁。因此，任何人如果以為蔣不是潔白無瑕的，就被他懷疑為共產黨。

在技術上，這位新大使陷入政府與軍隊兩大難分難解的問題中，而對於二者的背景均無澈底的了解。雙方的軍隊都是黨軍。中央政府的軍隊是澈頭澈尾的國民黨軍，它的軍官是國民黨員，每一單位均有國民黨的政治指導員，它更是公開正式地接受國民黨的指揮。然而國民黨却定要把它叫做政府軍。中共軍却直言不諱它是一個黨軍，坦白地向黨負責而並不對國家負責。只要對方一日握有武力，另一方面就一日不放棄軍隊。

自從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分裂以後，就積累了無數的猜疑、詐欺、迫害和剿滅。蔣介石可能暗盡一切神咒說只要中共放下武器，他決不會消滅他們；可是共產黨知道如果他們放棄了軍隊，蔣的秘密警察就在全中國到處活躍；中共軍就會四分五裂，然後像新四軍一樣遭受宰割。他們更記得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大屠殺，他們拒絕信任蔣的空話。一位中共將領說：「我們將向他伸出一隻友誼之手來，但是我們的另一隻手却必須緊握住我們的槍桿。」祇有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而且中共也參加在內的政府成立了，他們才會放棄他們防禦的手段。這裏面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成份。

個個實例都使毛澤東認定國民黨是不可能信任的。國民黨應為其前妻之被謀殺而負全責，他的兄弟一九四二年在新疆竟被絞死。許多中共要人的親屬也被殺戮。共產黨視其軍隊為其安全的唯一保障。

赫爾利所提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他說：「放下你的槍桿吧，舉起雙手走出來，蔣說他是不會打你們的。」無論什麼法律問題也是毫無要領，國民黨說一個集權化的現代國家必須祇擁有一個軍隊，

一個總帥部、赫爾利同意這個意見，但是他却忘了國民黨并不就是中國，而不過只是中國的一個政黨，一個有着一黨獨裁政權和一支黨軍的政黨。

聯合政府是更其複雜困難的問題。蔣拒絕考慮一切其他集團有權過問他的決策的聯合政府；他說，訓政時期是國民黨的法律上的責任。他所唯一願意接受的聯合政府，其含義祇能是給予共產黨少數不關緊要的名義，一切命令由他發佈，而共產黨必須服從。共產黨拒絕對聯合政府加上任何的特殊限制，他們不願說出他們要佔多少席位，他們應得怎樣的代表比例，或者應設什麼樣的機構使他們成爲政府的一份子。根據重慶一般的流言，所謂聯合政府就是說由共產黨參加軍事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及行政院。實際上，少數不關緊要的席位是不能滿足共產黨的。他們所要求的是一個改變了的政府，能真正解決國內的一切社會問題的政府。足以激動他們的是改革的行政問題，征實征糧問題，教育問題，人身自由和政治，以及對堅決抗戰等等問題。一個誠心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政府，即使祇給予共黨表面上的代表權，還是可能贏得他們的支持的。如果是一個照樣保持檢查制度，特務活動，獨裁制度，以及恐怖統治的政府，就得給予共黨足以摧毀它的權力。共產黨說他們需要主權交還人民，他們確切感到他們擁有人民的支持。

當赫爾利進入談判時，他手上握有全部王牌。在史迪威事件裏，蔣是勝利了，但是那是一個得不償失的勝利。許多美國的軍官們都感到十分不滿。美國報紙衝破了新聞檢查，爆發出一連串對蔣政府猛烈的抨擊。在中國國內對於他的政策的批評也達到了高潮。他那時候較前更迫切地需要美國的援助

和支持；他的軍隊簡直像一個破籬箕，日本軍隊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突擊通過。所以讓步的應該是。至於共產黨呢，雖然他們因史迪威的被召回而表示惱怒，他們對於美國是友善的，信賴的。熟練的美國譏人早應該坐上了御者的地位。

赫爾利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飛赴延安訪晤中共領袖。他事前並未通知而出人意外地降落在這一寒冷而荒涼的山谷機場上，他的軍服閃着耀目的光彩，胸前掛着欣悅的緞帶。毛澤東和其他的中共領袖們是在他着陸以後才接到電話通知的。中共總部的人們立刻集合起來，擠進了毛澤東所慣用的那輛轎車爭攔傷了的救護車，在亂石路上向機場疾馳而去，他們又急忙忙的奔上跑道去迎接赫爾利。大使也熱情地招呼他們，發出一聲印安人的吼叫，爬進了那輛救護車。一路上是够歡欣的，在滾滾泥塵中顛簸前進時，他們立刻都成了老朋友。當他們遇到牧童趕着一羣牛羊路過時，毛說他原來也是一個牧童；於是赫爾利也說他少年時也是一個放牛孩。他們經過淺淺的延河時，毛澤東說明這條河是冬天水漲而夏天水涸的；這就使赫爾利憶起奧克拉荷瑪的河流來，在夏天是那樣乾枯，簡直可由一陣激起的飛揚泥塵而知道是一群人游水過去。巴勒特上校把赫爾利的這個笑話譯成了中文。當救護車到達郊外美軍聯絡處時，他們遇到了大隊歡迎的群眾。當晚共產黨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宴會以慶祝蘇聯的十一月革命，赫爾利就成了上賓，雖然他的偶發的吼叫「嘎哇！」使得中共人士深覺奇怪。

赫爾利與中共間的實際談判，開場就很壞。赫爾利帶來了蔣委員長建議，就是給予中共合法黨地位，共享由租借法案而來的國外物資，並在國防最高委員會裏佔有一席；而交換條件是蔣要求中

共將其軍隊及其全部地區交由他指揮支配。毛澤東不願以他的軍隊和人民交給這樣一個政府，在這政府裏他們將是個乞食的客人。接着毛澤東便對國民黨大肆批評和指責。赫爾利不禁大怒，他說毛氏是在重複中國的敵人的宣傳。毛氏則堅持他能說的祇是大多數有識見的中國之友所早已知道了的。赫爾利極力為國民黨辯護，於是第一天就在失敗中結束。

當晚和次晨赫爾利草擬了一個他滿以為真正足以解決僵局的方案。這方案建議成立一個共產黨可以參加的真正聯合政府，中共軍隊則交由中央政府節制。在這兩點之外，赫爾利又漫不經心地列出了一張自由權利的總帳單——出版自由，言論自由，行動自由，集會自由等。這的確是一個動人的文件，至今還是一個為「團結」的卓越綱領——但是更充分說明了赫爾利對他的老朋友蔣介石的了解是極膚淺。共產黨感到了極端的興奮，這個文件的內容竟已超過了他們原來的期望。他們同意於把他們的軍隊交給一個真正的聯合政府。赫爾利又謹慎地說明他不能代表蔣介石說話，這祇是他一個人的看法，而他可以促其實現。爲了表示誠信起見，他願意在這文件上簽字。文件是一式二份，一份交中共保存，另一份由美方保存，二者都由赫爾利簽名其上。基于這份文件和赫爾利的支持，中共派周恩來爲代表飛往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討論。

當飛機飛回去的時候，蔣恰巧在病中，於是周就等着，鵠候傳見，一面就和次要的代表們以赫爾利草案爲基礎進行談判。當這份文件作爲美方與中共之間所能完成的最好成果而呈到蔣主席面前時，蔣斷然地加以拒絕。他依然堅持他原來的價錢，即給共產黨以國防最高委員會一席的席位，而以交出

其軍隊爲條件。周氏祇見到了一次蔣委員長——那時候他受到如此輕侮藐視的待遇，以致他立誓不願再回重慶。

赫爾利開始另作努力以促使共黨進入協議。他要求周接受蔣的價錢，因爲，這是先行跨進大門的基礎，以後可能有更大的讓步。周恩來當時感到非常痛苦，他認爲赫爾利出賣了中共。他說他不能以蔣委員長的一句空話爲基礎而交出百萬共軍，換來一個國防委會的席位。後來周氏被邀往美軍總部，魏德邁又重複了一遍赫爾利的要求，然後周恩來飛回了延安。

當時另外還有一個過遲了的嘗試，企圖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建議的主要提供人是兩個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份子——宋子文和王世杰。他們的意見頗類似於早先孫科向蔣所曾指出而遭到拒絕的建議。宋王建議讓共黨參加一個戰時的政治委員會。該委會具有廣大的行政決定權力，但須隸屬於蔣氏有最後決定權的國防最高委員會。一年以前，像這樣一個建議是可能接受的，因爲那時候好像是國民黨從來最願意與人民分享權力的時候。然而這個建議却在這冬末才提供出來，而共產黨已經開始其爭取華東控制權的行動。他們決不願意在他們以及全中國屈居於蔣委員長的否決權下的條件下解決任何問題。

當二月商談瓦解的時候，兩黨之間的爭端已經簡化爲極其清晰的一點問題——蔣介石的地位。共產黨不願意接受一種使全中國受治於一個人的意志的解決辦法；而蔣則不願接受一種威脅他的權威的解決辦法。他說他的統治中國是孫中山的神聖的付托，而這種付托是不能由他人分擔的責任。而當中共廣播罵得愈益兇狠時，蔣氏的頭頸亦愈益僵硬。共產黨從封鎖線後用了一切惡劣的字眼向他大聲

謂罵，於是更加深了他的仇恨。他們稱他爲瘋子，稱他的左右黨羽爲惡棍，他們宣稱如果容許蔣氏留在中國必然將實現的聯合政府中的話，他首先得補贖過去的罪惡。在共產黨的詈罵愈益激烈的時候，對國民黨又有了同情的可能。國民黨的外表大體上是完善的，它唯一的錯誤只是它的領袖是腐敗，它的特務橫行霸道，它的諾言是謊話，它每天以全中國人民的血與淚爲滋養。

到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中國在美國的戰界上已經變到了次要的地位。美國早已決定對日的主力襲擊將繞過中國而直搗日本本土。史達威與高斯曾經企圖改組政府以避免軍事上的崩潰，如今，中國的政治已不再含有任何急迫的軍事意義，所以赫爾利也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解釋他所得到的含糊的指令。在新的政策中，中國和蔣介石簡直是同一事物。但蔣氏本人，他的政府，他的黨就從來沒有爲人民公開選舉過。在中國有着兩大武裝的政黨，他們曾經携手合作以掃除軍閥，他們都在抗擊日本，雙方都有千百萬人民的支持；他們之間唯一的區別是：國民黨獲有國際上的承認，而中共沒有。國民黨爲列強所承認，因而獲有物資，援助，和榮譽。在共產黨方面，他們不甘人家不承認其存在；如果他們不能由談判而獲得美國的承認，他們是要以武力來贏得承認。因此，就在當年的春天，他們展開了新的行動。

第十七章 一九四五——「諾言」的年代

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這不談判決裂後就奔向各自的道路，而都以爭取美國的支持爲目的。國民黨所走的路子是宣傳和諾言，他們既已藉此爭取到了美國大使，就想以美妙的變護來鞏固他們已得的勝利。在這方面，共產黨是會失敗的，他們所走的是粗獷而直接的一切看抗日戰場的進路。他們似乎覺得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爭取那大量流入國民黨之手的援助，那就是進行一個軍事上的反攻，以取得美國的承認和隨着美國承認而來的軍火與物資。共產黨認爲美國對蔣介石的承認並不是以民主政治爲基礎，因爲他們顯然知道美國明白蔣政府是如何腐敗。那末，美國與蔣的關係就必須是建立於現實的需要上；美國需要他的協助以抗擊日本，所以給了他資助。於是共產黨就開始以事實來證明，在抗擊敵人一事上，他們比蔣更有效。

他們相信美國在進攻日本本土以前，勢必會在華北登陸。於是他們決定要控制中國全部的海岸綫，上海北達天津。這樣，任何一個在中國海岸登陸的美軍司令都會受到共軍的歡迎，並且立刻可以得從他所需的一切協助以抗擊日軍，在敵後的共軍游擊隊隨時準備當美軍建立登陸據點時，進行掘斷鐵道，破壞橋樑，以切斷日軍的交通綫。而在登陸部隊鞏固其據點時，游擊隊還可以阻擾日軍的增援。

共產黨認為，任何一個美軍司令在接受到這樣的協助時，決不會再問什麼政治信仰的問題。他必要與任何可以幫助他殺敵的人進行合作，而由這樣一個戰鬥中的合作，可能產生美國對共產黨的承認。

因此，共產黨就開始了一個新的擴張計劃。他們早已控制了自長江流域通達延安以及長城的交通綫。他們派遣了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作戰司令之一的王震——一個紅光滿面的將軍，北方封鎖綫上的保衛者——向南部推進。王震的目標是克復并重新組織湖南的日軍佔領區。三月底，他已經克復了離長沙僅三十哩地的平江，并且開始在那裏建立起一個民主政權。湘北原是一九三〇年左右中共的老根據地，農民們依然還記得他們，并且立刻和他們結合起來了。王震的成功引起了國民黨的反攻，而就在四月時，內戰已在整個兩湖區廣泛地展開。

在同一個時候，一個規模更為廣大的行動也在沿海一帶進行。成千的共軍在江南地區從南京附近向杭州灣推進。他們希望在長江與杭州之間建立起一道不可突破的防綫，以切斷國民黨和上海的聯絡。他們一度獲得了成功，但國民黨却作頑強的抵抗。顧祝同——一個狂人，也是一個何應欽的老同道——是負責華東區指揮以保衛該區國民黨利益的，他突破了共軍防綫，重建起國民黨與上海區的聯絡綫。雙方都認為控制了上海就是控制了美軍登陸區，同時在戰鬥中誰得了土地就是誰的。

爭奪的中心是在上海本身。上海以北的海岸是漁民，小村子，船夫們的集中區，都在共軍的控制之下。在市內的中共份子開始加強他們在學生，碼頭工人和產業工人羣中的勢力。但是上海究竟是國民黨以及中國中產階級的精神與財政的堡壘。蔣在上海也有他自己的地下人員，而且人數不少，技巧

也相當高明。當發國難財者和漢奸傀儡們在狂歌酣舞而飢民輾轉溝壑時，日軍正追逐着國共雙方的秘密工作者，而他們自己之間也正互相搜索，互相打擊不已。

但是，上海當時是還落在深嚴的檢查制度的鐵牆之後，關於這些鬥爭的消息很少有透露到重慶的，重慶那時候也正陶醉於春天和勝利中。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時，湘桂日軍被扼阻住了，史迪威在印度所訓練的幾師中國軍隊，也正通過重重封鎖向祖國前進。打通緬甸的攻勢，一年中取得了五萬方英哩的叢林地區。盟軍掌握了一條四百七十英哩長的路綫，從印度的鐵路綫直到中緬一帶的平原區，同時一條公路也追蹤而成。擔任這個任務的是一班雜色的隊伍，有英國人和美國人，也有卡欽族人和印度人，但是其中的英雄要算是中國人。人人都知道史迪威這幾師人是利害而精銳的。他們都腕如鐵錘，肌肉飽滿。他們手握現代美式武器的運用自如。他們不止於有充分自信，而且甚至於藐視一切。當美國人，英國人，緬甸人，以及任何一個人冒犯了他們時，他們總是予以重擊。他們以一枝步槍就可以繳一群人的械。他們的膽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最優良的軍隊，當他們前進到隔離他們祖國最後的一個目標時，他們真是得意洋洋。

依然在阻塞這條大道的日軍最後一個據點，是一個叫平海的村子。一月廿七日那天，最後的進攻展開了。美式坦克在這日軍控制的村區裏來去的馳騁。它們的七五砲吞沒了所有的香蕉樹；他們的機關槍檢查了每一個可疑的叢林。以營爲單位的中國步兵，在一個美國將軍的指揮之下，散佈在村子四週的田地裡；當坦克停止了以後，這位將軍下令以戰鬥隊形向前推進。於是他們以鱗伏式的疾步前進

着，并且在村邊無聲的林子裏埋伏了下來。一切都毫無動靜。沒有叫聲，也沒有槍聲——只是一片沉寂。在村子裏有幾個中國兵坐着，在啃甘蔗，日本鬼子早在這進攻開始以前兩小時跑掉了，中國方面打出去的部隊早到了數小時。

穿着卡噠制服的中國兵繼續向大路上推進。當他們接近一個十字路口時，這些曾經在緬北掃蕩過日軍的十分驕傲的士兵們，看到了在一個交叉的路口上有長串穿藍灰色制服的人們。他們斷定這是敵人，於是立刻散開來要與槍射擊。但是一個美國的準將斯立奈突然躍出，站在一根槍口的前面，命令他們不許射擊。然後他疾步向前走去；當他漸漸走近的時候，那些穿藍灰色制服的人們——從封鎖綫那一邊出來的中國軍隊——認出了他的制服，立刻奔向前來，大聲的歡呼，熱烈地和他握手，緊拉着他不放。

美式坦克馳進了路口。中國人都狂笑着，喧嚷着，對每一個美軍高呼着「頂好！」。從中國方面來的軍隊都是骯髒不潔拖泥帶水的，一個個的眼睛都盯在他們的在印度受過訓練的同胞身上——穿着整齊的卡噠制服和皮靴，背着閃光的槍桿的人們身上。這些滇西來的大兵們，開始以農民的眼光注視那怪物似的美國坦克；其中有一兩個站了出來用手摸摸。一群飢餓的東方人都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五輛坦克所代表的美國的力量。滇緬公路於是重開了。

這條封鎖線已被打通，的確是曾經使重慶大為鼓舞的內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一個因素，却是中

國戰區來了一位新的司令魏德邁中將。魏德邁來的時候，抱了堅決不沾政治的決心。他認為過去的一切都已告結束。所有有關史迪威事件的文件，電報，和備忘錄之類都被密封在一個註明「奧克拉荷馬」字樣的袋子裡而藏在司令部的保險箱裡了；而且魏德邁拒絕打開這個袋子。他要忘去史迪威時的一切痛苦和潛伏着的困難，他要與各方面為友，取得人人的歡心，這樣才好進行他的單純技術上的工作。所得的指令是特別的——是要創造，訓練、和裝備一個第一等的中國的戰鬥機構。這個機構作何用途，誰去指揮它，往什麼方向去，這些都不是魏德邁的事情。三十年來武力左右着中國的政治。而當魏德邁開始督率中國空前最優秀的軍隊時，他却堅持說他是站在政治以外，政治是赫爾利的範圍。同時如果赫爾利要把美國捲入中國的內戰的話，魏德邁認為他自己是不得不追隨而行的。

赫爾利是在中國的第一號美國人物。而作為第二號美國人物的魏德邁，常因感惱怒於赫爾利的暴躁和嘵嘵不休；但事情一過，他也就算了。赫爾利批評了魏德邁的政治助手，魏德邁隨着就把他們解職。魏德邁知道中國內部的不團結對於軍事上有嚴重的影響，因為他有足夠的情報使他能充分了解實際的情況，可是他却保持着緘默。對於這種不聞不問政治的態度，中國政府方面是極其歡迎的。他們已經趕走了史迪威；如果他們再造成第二名將軍的丟職的話，他們曉得這可能造成美國的援助與合作的完全中斷。他們迫切地需要與魏德邁為友，而魏德邁所持的態度，更使得這種友誼的發展容易進行。

魏德邁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完善無缺的參謀人才；專家們稱他為美國最精明的戰畧家之一。在作為

華盛頓的設計部門的一個低級軍官時，他協助草擬了一九四〇年動員的初步預算。他以成爲馬歇爾手下幾個傑出的年青軍官之一而著聞，他參與了每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直到開羅會議爲止。此後，他被任命爲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的參謀長。他的升任陸軍中將以及中國戰區總司令，使他立刻成了美軍中最年輕的中將和最年輕的戰區總司令。許多人覺得美國未來的參謀總長就在這裏呢。

在重慶，魏德邁召集了一批最傑出的年輕軍官，以構成一個集團來協助他的行政工作。他和中國的參謀人員開始了一個一星期三次的參謀會議，由這會議形成了相互間的信任，並且廣泛的交換情報。他又在各戰線上建立起中美合作的機構。他並且召來了許多食物專家來研究中國士兵的營養需要，並設計中國的農業如何來適應這種要求。魏德邁計劃的中心目標是創建新軍，是史迪威計劃的擴大；史迪威計劃是要從一群中國的古老軍隊中訓練並裝備出幾師的示範的勁旅。當時中國軍隊約有三百二十個師，但却是聲名狼藉，身體衰敗的；魏德邁想把這些大而無當實力不足的軍隊裁減至一定的數字，同時他又開始致力於建立精兵三十九個師的工作。

前綫上是沉寂的，由疲惫了的士兵守衛着，他們依舊挨着飢餓，依然在塵埃中蹣跚行軍，依然是配備惡劣，給養不足。而在遙遠的西南大後方，新軍在開始集中整訓。他們將超過剛從緬甸打回來的史迪威師以及參加怒江之戰訓練不足的部隊。中國其他最優秀的部隊都被挑選了來完成這個建軍計劃。他們的裝備是通過駝峯及重開後的滇緬路運來的，同時改組後的中國後勤部也開始供應較多的給養了。漸漸地這些美化師的士兵們開始長起了肌肉；他們以美國的槍械操練實習，他們的軍事技能也

隨着體力的進展而漸次提高。日軍向他們的西南基地只突擊過一次，但當場被擊退了。

暮春時，魏德邁開始爲他的新軍計劃第一次的反攻。在他看來這支新軍祇是單純的抗日工具。而蔣介石對他們的看法却遠甚於此；在戰爭結束以後，這支軍隊將可以無與匹敵的力量用來加強政府的意志。共產黨是强有力的，而且實力在日益增漲中；現在已經證明他們較國民黨所想像的要强悍得多。他們正在華東一帶以燎原之勢蔓延發展；而且似乎很可能，蔣將在對日本戰爭中成爲勝利者，而在共產黨手裏成爲敗兵之將。現在美國在新軍中所創建起來的武力，將是他唯一保障。蔣介石的希望是和魏德邁的希望一致的，兩個人都希望這支軍隊迅速而完善的建造完成。這大概是魏德邁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同一個地方，史迪威遭受到嚴峻的拒絕，魏德邁却得到了充分合作，只要他有什麼要求，國民黨無不立刻伸耳聽從。

貴州的緊急，以及隨之而來的中美雙方的不斷的批評和指責，使蔣氏深感到爲了自保安全增進效率，政府裏必須來一次刷新。他解除了何應欽一個極其重要的職務。何應欽繼續擔任參謀總長和統率新軍，而軍政部長一職却給了素得美方讚譽的陳誠。陳誠是信任美國人的，他贊成他們所企圖推行的改革，他自己也盡量清除他所繼承下來的機構中的一切腐化因素。陳誠做了軍政部長，魏德邁也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保證。

在蔣的對美國的追求之中，他并不僅止於軍事上的合作，他更開始把他的政府重加裝飾，使其適

美惡國的口味。他任命王世杰爲宣傳部長，王氏是誠實而能幹的，美國人以及中國的進步人士都信任他，尊重他。他認真地執行着蔣委員長放的寬檢查尺度的諾言，而且試圖把政府的言論由一味粉飾轉變爲說明和解釋。

最重要的，是蔣以宋子文來担任全國第二把交椅相當於宰相的工作——行政院院長。宋的出任是必要的，因爲當時只有他是能够廓清政府，建立效率基礎的最能幹的人才。同時，更需要他來滿足美國的要求。只有他才能建立起美國式的行政機構。

宋子文之出長政院，是他十年來的第一次重登權位。他的輝煌的事業被擺佈於像蔣介石這樣一個如此複雜而相反的性格之下，這是他個人的悲劇。蔣氏的怪戾的政治思想，他的合縱連橫玩弄政治的巧妙，使得他與宋氏隔絕。兩個人都是高傲自負和暴躁衝動的；而且兩人都愛權力。宋氏是政府中唯一可以站起來與蔣介石辯爭的人，他們之間的水火不容，是這宮廷政治中的重要事實之一。

宋子文在歐美的廣泛經驗，使得他也許比較任何其他中國人士更爲注意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他是愛國而且具有遠見的，他的野心限於國內。他不樂於立於權勢之外，握了權力，他才是個偉人。他的勃勃野心是一種冷酷而衝擊的情緒，幾乎是殘忍而不人道的。但是他要想得勢就向來必須依賴蔣介石。儘管他對蔣氏的方法是毫不掩飾的懷疑和厭憎，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宋氏總是和蔣氏站在一起的。他是蔣家陣營中的一個俘虜，是蔣只有在極端需要的重壓之下才啓用的一個工具，因爲在這種時候，某種國家民族的需要似乎蓋過了分配他們的私人仇恨。

宋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怪物，不屬於任何的派系，但是誰也不敢忽視他。他是一個鹵莽，活動，咄咄逼人的角色，他在黨內同時受到敬重與憎恨。無論敬重他的或是憎恨他的，都是由於他的特別講究西式的效率。他是哈佛大學的產品，他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為一般中國人所重視的客氣寒暄常常使他感到不耐。他是一個幹練的行政長官，也是政府中僅有的幾個懂得如何立下施政大要，分派責任，同時要求效率的幹員之一。他做事是鹵莽而帶決定性的，而這種性格在國民黨內虛有其表的人物看來，簡直是駭人聽聞。他對缺乏效率的藐視和憤怒，他對任何形態的散漫很少掩飾的開火，常常達於殘酷的境地。

許多中國人簡直把宋子文看做是一個外國人。他們往往以他的英文名字 T. V. 稱呼他，而不說他的中國名字。他們錯誤地相信他連讀或寫他自己的祖國語言文字都有困難，一九四四年時，當他們聽說他在被迫退休中曾經細讀古典的中國歷史時，他們都深以為喜；可是，幸好他們還沒有知道，就在他出任宰相的那一星期，他正在捧着一本美國小說『永久的琥珀』消遣呢，而且他非常欣賞它。（『永久的琥珀』(Forever Amber)是美國女小說家嘉芙蓮溫莎所作之歷史性感小說——譯者)宋氏是兩個極端隔離的集團——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與西化的實業家——的一個希望的象徵。在他們看來，他就代表着效率，那是封建社會裡頭等的德性。商人都還記得，在戰前，他曾經主張要有一個平衡的預算，一個穩固的稅收制度，並且要取消專制的征斂。當他於一九三四年為內戰事和蔣大吵大鬧時，他認為繼續向共軍進攻將損傷整個國家，枯竭國庫，並且阻擾一切的進步；他主張蔣應當以團結為重，使

中共回到和平政治的領域裏來。在戰時的幾年中，他往往爲軍隊裏的醫藥問題和士兵的訓練問題嘔心不休，時加嘲罵。對於孔祥熙及其主持的政府的一團糟，他有一種無止境的鄙蔑，甚至他難得客客氣氣的述說他的這位姐夫。他的反對者驅使他走向同爲追求民主的自由主義份子中。

在他那段長時間脫離政治的賦閒期中，宋氏使用了他在生意經上的技能和狼勁，變成了狂富。外間流傳着許多關於他私生活的奢華的流言，實際上他也不過是過着西式生活而已，他對於華麗的建築有一種特別的愛好。重慶最華麗的房子中有三幢是先後屬於他的；當他離去的時候，政府征用了初期的兩幢供給美國軍官使用，而宋本人却孤獨地住在那所離城六七英里可以俯瞰嘉陵江的第三幢房子裡。他時時因腹痛而痛苦萬分，常常整夜失眠，在房裏踱步直到天明。苦力們說他的煩惱和疾病是起因於這所新建的房子。故事是這樣的，因爲當建築這所摩登大廈的大門時，兩個墓墳被掘掉了；土工們把兩口棺材移到了鄰近的山邱上，然後繼續他們的建築。但是這樣就大大地觸怒了這被掘的死者，於是死者的靈魂每天夜晚都出來漂泊於這所新居的山頭，向房子裡居住的人作祟。

宋子文之重掌行政，就如同杜果(Fr. Gaub)之進入法國波邦土朝時代頑固守舊的貴族政府。他向整個機構鞭策，要求按時得到決定，更要求人人履行他的約言。他宣佈一切公文——一種例行的核准，往往要經過幾百人之手——只要簽字就行，勿庸再蓋官印；單此一項就節省了許多時間。美國式的行政方式很快地傳到了適當的機關裡。但是他只是活動於行政機構中許多階層裏的一層而已，在他上面，蔣委員長作了所有的最後決定，發佈了所有的重要委任令。在他下面，糧食部，兵役部，以及整

個廣泛的地方政府，都還是一成不變保持舊態。他發佈了明晰的指令，但是他的改革的唯一機構，還是那些貪得無厭的收稅員，以及中飽自肥的保甲長之流，而這一般人都是他所不能接觸到的。但是，美國人所見到的是宋子文，而並沒有看到中國的農民，所以有一陣子改革很有點突飛猛進的樣子。

歐洲的勝利來臨了，重慶以溫和的愉快來迎接它。歐洲的戰爭是一種遙遠的瘋狂，是以坦克、戰車，飛機，雷達以及天曉得的那些神奇古怪的東西來作戰的一種高級的屠殺。中國的戰爭是對抗日本的戰爭，而歐洲的勝利，中國聽來就像是被困於重圍中的戰卒聽到了微風吹來了援軍的號角聲。五六年來積壓起來的懷戀病，就像一塊鋼鐵似的壓在重慶流亡者的精神上。春天，帶來了勝利的和風，吹散了烏雲，路旁小販的攤棚上也插上了鄉下來的香花。山巔穿過灰白的晨霧，面臨着耀眼的陽光；黑夜裡，微弱的街燈就像是圍繞山脊的金項圈。重慶意識到這將是一個戰時最後的夏季。「當和平到來時，」一個家庭婦女說，「我要買一隻鷄，為孩子們燉湯吃」。「當和平到來時，」一個女孩子說，「我要買一套紅衣服穿着去跳舞」。「當和平到來時，」每個人都這麼說，「我們就可以回家了」。空氣裏盪漾着春天的瘋狂。政府在炸燬了的城區所栽種的樹木，第一次掛上了綠葉，來紀念這重慶的有疑問的光榮的最後一年。

報紙則對監獄的污穢環境大肆抨擊。警察負責推行一個「減風運動」，每一個囚犯每天得繳出二十隻虱來，否則就要挨手板。這樣，虱子是減少了，打手心的次數於是增加了。囚犯們於是就私下進

行一個『養魂運動』來解決這個難題。因此虱子數目爲之激增。每個囚犯每天都能激出二十隻來；打手心也就停止了。獄卒們大爲滿意，而監獄裏的虱子比以前更多了，然而皆大歡喜。

美國人當時揭穿了重慶的虛飾。美軍總部附近的一家黑店裡出售着摻雜的威士忌和摻雜的淫婦。「吉普女郎」陪伴着美軍軍人到處橫衝直闖，肆無忌憚地招搖過市。有一家報紙爲她們保護，說應當授與吉普女郎以勳章，因爲她們賺來美金，充實了中國空虛的外匯。市政府草擬着設立特許的娼妓區的計劃，但毫無結果，而三家舞廳却開了起來，而且生意非常興隆。小孩子們，以歡呼來迎接美國兵，攙起他們的大拇指喊着：「頂好！」。一個小女孩以她僅有的英文「Hi, Uncle.」（喂，阿叔！）招呼着每一個過境的美國兵。

眼看着久旱要成災了，熱心的本地居民們組織了『求雨龍團』，坦胸裸腿，身着短褲，頭繫綠枝，打鼓吹號地滿街遊行。重慶的報紙對此發出狂怒，它們認爲這種古老的迷信必須剷除，如此無意識的舉動勢將使盟友留下不良的印象——但是第二天，老天却竟下起雨來了。重慶正爲和平及美國人而處處加以裝飾，政府頒佈了一道通告，人力車及馬車等均須重新油漆制新，警察局計劃在所有公共空地上建立起花園來，並且不許在市內有拉圾堆存在。

這是一個改革的時代，一個『偉大諾言』的季節。就像狂歡節時所投擲的彩色小紙片似的，諾言一個接着一個地從國民黨黨要以及蔣介石的嘴邊送了出來。國民黨當時開了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這是十年來第一次全會。它的決議案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新世界的導言。其中最引起輿論界外交界的注意

的，是它決定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開制憲會議的諾言。這個制憲會議，就是政府所謂的國民大會，將成爲給予人民的最後一件大禮物，無論人民要或不要，政府是決心把它從喉管裏吐出來，因爲，無論如何，美國是需要它的！蔣主席用良好的意向克制了自己，他并不要求人民等待和平以後再行民主，甚致連等到十一月都不要。他要在與人民最接近的基層裏立刻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軍隊中的黨部在八月一號以前都要撤消，所有學校裏的黨務機構在十一月以前都必須廢除。給予人民以真正的民主基礎，也被允諾，人民將有權以普選選舉地方及省級參議會，而這些參議會更將握有真實的鞏固的權力，甚至還有權制訂預算。所有登記過的黨派都能參加競選，而且所有男人都有權選舉，不問其財產教育程度等等。

國民黨的決議案，就像閃爍的瀑布一樣，從代表大會中流了出來。說是政府將鼓勵兒童的優生，將改進性的教育，并且中國將有八小時的工作制，工人將一律組織起來，參加職工會，每年還享有照拿工資的假期。對農民的各種強征剝削都將停止，高利貸也要廢除。這是多麼千載難逢的幸事啊！照理，重慶應當早已爲此而狂號歡呼了，但是，重慶的人們祇是聰明地點了點頭，根本就不敢相信，沒有一個中國人認真地注意這些決議。這種高調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唱了二十年了，而且其中不少已經都成了束之高閣的法令中白紙上的黑字。但是今年這種丰裕而漂亮的諾言，却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爲所有的都是爲了適合美國的輿論。美國曾經迫着中國改革，這就是作爲償付「承認」及「一支新軍」的代價的改革。祇要美國及其代表一日滿足於紙上吹談，中國政府總是隨時準備履行他們的義務的。

第十八章 花言巧語的實質

在所有這一連串漂亮的諾言背後，却是猙獰的現實政治。國民黨的這次代表大會只證明了一個真理：該黨還是照舊掌握在那鉗制了中國七年之久的反動集團手裏。黨內的自由主義份子曾企圖有所作為，他們草擬了一個烏托邦的綱領。可是，最後進行着的爭奪黨權的鬥爭却旋轉於兩個委員會的選舉上，這兩個委員會可以執行或破壞這一綱領，因為它們決定着政府要職的任命，國家整個政策，以及對其他各黨的關係等等。

國民黨代表大會開幕前的一個星期，在緊張熱烈殘酷猙獰的空氣中，代表們進行着拉攏這個和打擊那個的活動，互相交換選票，舉行盛大宴會，或者在煙霧迷漫的密室裏竊竊私議，一方面要求改革的份子——政學系，朱家驊及其追隨者，若干黃埔系份子，以及孫科的一派；在另一方面就是CC系和何應欽的軍人代表。當會議達到最高峰時，爭奪亦愈形緊張。包括自由主義份子在內的七百人的——張候選人單提出來了，大會從這七百人中選出三百六十人來組織這兩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主張改革的那批人雖然不能希望獲得大多數，但是他們却有足夠動搖反動集團的掌握的力量。

在選舉的那一天，蔣委員長出現在會場上。他說他並不是來左右這次集會，而是有一個意見要提出：候選人的名單是太長了，爲了代表們的便利，他另擬了一個名單，就叫做候選名單「乙」，在這張名單中，他親自選擇了他認爲適於擔任中央委員會職務的代表；他並不是要獨裁，代表們還是能作自由的民主的選擇，因爲在他所提出的名單上，他還留給了代表們自由選擇的餘地，以使代表們剔除他們所不要的人，當然誰要是願意用原先那張候選名單，也是悉聽尊便的。說完之後，大會主席將此次建議提付起立表決，看看有多少人贊成。在八百個代表裏大約祇有二百人站起來了表示贊成，這一次大逆不道的情形，引起了一陣的騷動。蔣委員長馬上就提出說也許是因爲他沒有把話說清楚，所以他要再解釋一遍，等他解釋完畢，再度舉行表決，這一次以大多數通過了委員長的建議。

蔣委員長已經獨斷地把委員名額增加爲四百六十名。而他的候選名單上祇有四百八十人，這樣的選舉根本不是一個普遍性的競爭，因爲參與選舉者只有二十個人的選擇的餘地。爲了使得控制更爲確實一點起見，又規定每一個投票人必須在選票上簽名蓋章。結果，大約有一百人拒絕投票；另外一百多人堅持要引用原先的候選名單；可是其餘的人却接受了蔣委員長的名單，於是他的囊中人物也就完全入選了。

委員長無異於宣佈了一切改革希望的死亡。他的名單說明了CC集團的全面勝利。他這名單的提出，簡直是爲了諷刺黨內的自由主義份子，於是自由主義份子只能毫無進展地保持着原先的地位，依然是一個寂寂的睡聲，是起不了作用的少數派，這就是委員長的意志和他的民主觀念。國民黨將繼續

爲一班曾經與中國走向毀滅邊緣，曾經抗拒一切民主或團結的舊人所控制。倘若一旦蔣本人有何變故，他的繼承人將由這一個一直執行着他底意志的集團所選出。政府中固然有了一個所謂改良的行政機構，但那只是蔣委員長所一手按排下的；無論何時當他決定予以變更時，它也得被取消，因爲它沒有自身的集團爲它而鬥爭。

國民黨會宣佈於八月以前解散其軍隊黨部。八月來了又去了，國民黨的工作依然還在軍隊中繼續進行。十一月來了又去了，學校中的黨團依然存在。和平來了，內戰降臨，又繼之以停戰協定，但是原來宣佈在春季即將舉行的大選始終沒有成爲事實。對於國民黨，這一切都是無所謂的。一切的諾言和決議，都已傳到了美國而且都爲美國所讚揚，這才是最重要的。

祇有一項諾言的改變是使民主份子感到愉快的，那就是，因爲不堪於戰後羣衆壓力的洶湧浪潮，蔣委員長把國民大會的召開作無限期的展緩。而根本不明瞭這個憲法會議將是怎樣回事的美國人，對於民主份子的反對即時召開國大，抱着厭煩鄙夷的看法。事實上，很久以前，早在一九三六年時，就已經寫下了一個憲草，確定了制憲會議的召開，同時代表也已「選」出來了。當時，全中國沒有一處曾經舉行過公開的選舉。誠然，在上海，市商會曾被准推出幾個商人來作代表，但是在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國民黨所一手包辦的。一九三六年的國民黨是極端反動的，共產黨是處於非法的地位，其他的自由民主黨派也是如此。於是只有清一色中的最清一色者才被選拔出來承當這份榮譽，一千四百四十名

代表中，有九百五十名都是在抗日戰爭迫使國民大會取消以前所選出的。現在，九個年頭過去了，蔣却主張把這批一九三六年名單上所留下的老人馬召集起來，爲一個新的國家制定一個新的憲法。儘管其中若干國民黨的右翼份子曾投入日本懷抱者將被取消，但所有其餘陳魯的代表仍將可制定整個中國底永久性的政綱，同時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均將參加大會，這簡直是絲毫不顧到戰爭已使許多情況改變，新的一代已經成熟，舊代表除了代表老國民黨中最不民主的一部份而外，根本全無意義，也絲毫不顧到，反動集團不可能創立一個贏得人民的國家。

蔣的改良政府毫無結果可言。陳誠爲改良軍隊草擬了種種計劃，結果却發現他的『軍政部長』的頭銜毫無意義，何應欽依然控制着軍隊。宋子文去到華盛頓，去到舊金山，去到倫敦，在廣大的集會中爲中國宣傳，但是回來以後，却發現只有很少的改變。

嚴冬時，通貨膨脹已達驚人高峯。公務員的全月薪水買不到燒飯或取暖所需的煤炭。鷄買到四五百元一磅，魚七百元一磅；花生米賣到一塊錢一粒；戰前只得幾分錢的雞蛋現在却賣到了五十元一隻；一般的物價已經漲到了戰前的兩千多倍。市政府想把每月的房租限制爲建築費的百分之二十。酒精製造商控訴說，他們每造一加倫酒精就要虧蝕七百元，因爲政府強制他們限定售價，却不限制原料的售價。平價委員會想提高洗澡，皮革，理髮，洗衣，和印刷等業的法定價格，但是當決定宣佈時，市面上的價格却已經超過了新訂價格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還有就是大批大批工廠的倒閉。鹽產減低了五分之一；成千的棉織廠關門了；麵粉廠，酒精廠，以及礦場也都紛紛停業，因爲銅貨的所剩還

不够去買下月生產的原料。

人民都在饑饉中。重慶一所設備最佳的中學裏有四分之一學生患着肺病，一所遷入內地的大學的教職員中，有百分之四十三以上患着這同樣的疾病。重慶的電燈就像是鬼火，城裏每一區每星期都輪流有一個無水無電的夜晚。有電燈的晚上，燈光就像一枝腊燭，除非你自己裝上一個變壓器，但是裝個變壓器得化上二百萬。管理陰溝的機關會飽受攻擊，但是還是無效。據一位當地的社會科學家說，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其他的城市大小都被排泄物處理問題所限制。除了上海以及幾個其他沿海城市而外，城市的發展都受限制於附近農民對於城市居民糞便的消費量。重慶的人口已較前增加了五倍，而農民的肥料消費量頂多祇增加了三分之一。於是每天有五百噸以上的排泄物通過陰溝或溪河而流入揚子江——然而這揚子江却又是人民飲水的源泉——或者積聚在叢山之間的大死水池裏。真是一個奇蹟，這個城市照樣的生存着，而除了一般的霍亂，痢疾，花柳，以及皮膚病輪流不息以外，沒有其他嚴重疫癘的襲擊。

在新任宣傳部長王世杰溫和態度的影響之下，當地的新聞檢查制度被解除了。可是當報紙想試一下新尺度的限度時，他們發現他們還是不能報導前線的情況，共產黨問題、中蘇關係、或是新疆的變亂。他們不敢對於因無力扶養而在街上出賣兒女的事實作進一步的調查。他們也不敢在報面上描述那重慶業已弄得滿城風雨的關於四川軍閥底小老婆的故事；那故事是說，這位軍閥幾年來一直在前方，饒幸期間把他的小老婆送進了一所大學唸書，好讓她深造一下更能適合他的地位。可是當他回來的時

候，却大為驚奇地發現大學教育已經給她裝備了自由的思想，而她也就踪跡杳然地失蹤了。

雖然如此，重慶的報紙總算揭發了當地兩個救濟院的舞弊案，在這兩家救濟院內，一個月裡有四百個成人和一百個孤兒先後死亡，去調查的人更發現有三百具屍體未被埋葬而「到處散放着」。重慶的報紙又銜短地報導說，在蔣介石正式宣佈執行「人身保障法」四個月之後，著名的自由主義的教授費肇就被特務綁走了，從此水無下文。此外，報紙還報導過轟動一時的財政部的黃金舞弊案。其實這只是無數舞弊案中的一件小事。是幾個局中人預先知道了黃金官價即將提高，就大量購入金條以圖大利。由於美國之運黃金來華，是爲了穩定中國的幣值，而不是爲了製造中國官員的豪富，於是舞弊案的消息傳到了華盛頓而且立刻傳了回來。政府答應追查禍首，並予以懲治。結果逮捕了一次人，接着沉默就籠罩了整個事件，不久也就一切都被遺忘了。

整個中國都沸騰於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徵兵之殘暴野蠻，冷酷無情，以及貪污舞弊，在中國的最黑暗的史蹟上也算是惡劣透頂的了。由於政府的虛偽謊言便說今天一切均已改善，痛苦就變得愈益悲慘可憫。因爲許許多多的人都用金錢來避脫了兵役，保甲長之流就無法徵足額的兵。於是爲了要供應足夠的「人肉」就出現了有組織的巡邏隊，逡巡凶鄉，綁架路上行人，再把他們出售給村中大亨。軍官在他們自己範圍內也做着同樣的交易，所以對於壯丁的體質衰弱等，也沒有了怨言。在成都，一個黑市的壯丁——被這種巡邏隊綁架而去的肉票——可以賣五萬至十萬法幣，相當於買五袋白米或是三隻豬的價格。

在四川某縣裡，一個村長帶着他的武裝村兵把守在交叉路口，抓到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和他的孫兒。那孫子原本是陪着他祖父去醫院看病的，但這理由并無濟於事，村長們還是把他們抓進了壯丁營。還有另外兩個村子的村長親自帶了他的衛隊到縣埠上去抓船夫，船夫們出示證件證明他們正從事於一個重要的工作，而且都是免役的。可是結果是，兩個人被活活淹死了，一個被鞭打至死，一個的手指被砍去，十多個人被抓了去。還有一次，一個連長帶了他的士兵去大路上抓壯丁來補充他的兵額，抓到了一個便衣的路人。可是這個人却是一個比這連長位置更高一層的營長，這連長於是恐怖萬狀，當場就把這營長打死，隨後又畏罪自殺了。儘管政府的宣傳機構不斷散佈堂皇的諾言，恐怖依然籠罩着所有鄉村的道路。壯丁們都紛紛逃離家舍，在叢山中組成匪幫以待抽丁的平息。青年農人都不敢趕豬担米去城裏售賣，怕的是在路上人財兩失。

實際上，中國人并不怕爲國家出力賣命，人民的愛國心是從來沒有低減過的。祇是他們個個都深知道壯丁營是個什麼樣子。政府的規定就可以作爲最有力的反証。政府的規定是：官廳不得在壯丁食米中滲雜砂粒，不得掠奪壯丁帶來的衣着、被服、或私人物件，不得對壯丁私刑拷打或夜晚關閉牢房等，并且不得向壯丁家屬勒索壯丁制服費或給養費。戰鬥部隊的情況是夠可怕的，但是與壯丁訓練營比較起來，前者就成了天堂。壯丁吃到的比埃俄渡日的士兵還要少些，有時他們連水都喝不到。他們當中許多都被剝了衣服而睡在泥地上；他們被鞭笞；死掉的壯丁底屍體可以放在那裏幾天不管；在許多區域裏，最後能到達前線的壯丁還不及入伍總數的百分之二十。當歐洲貝爾遜和布欽華爾德集中營

的慘絕人寰的故事傳來的時候，那時正是中國這種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參加壯丁營工作的醫生們對於德國的這種恐怖手段却并不覺得什麼驚訝，他們說，一切關於納粹集中營的描寫，簡直就和他們所工作的壯丁營一色一樣。靠近成都的一個壯丁營要接受四萬個壯丁來受訓入伍，但是在來營途中有許多人就已死了，能夠活着拖到訓練終了的，結果只有八千人。據說還有一隊一千名的壯丁，由於訓練官員的失職竟死亡了八百名之多。

少數應對這些恐怖事件負責的人是被槍決了。中央社的一個電訊這樣說：

「徐正功（譯音，下同）犯有剋扣軍糧，致壯丁一百零五名死亡，謀殺連長衛飛仁，活埋壯丁戴清山等罪……中尉方震犯有毒打壯丁孫巧新，拷打其親屬，并勒索國幣一萬元等罪。上尉李伯達犯有剋扣軍糧，非刑殘害李正清及其他壯丁，勒索國幣十九萬七千元，并使壯丁曾憲方成殘廢等罪……。」

新任兵役部長（當時兵役署改了兵役部——譯者）是被挑選來繼他被槍決的前任署長，負責改善役政的。事實說明了新任部長的成續。在春季一季中，他應該徵集新兵三十六萬。可是事實上他却徵集了五十萬名。陸軍機關報說：「兵役部已將努力工作之幹部名單送呈蔣委員長，請頒獎狀。」可是正當兵役部正在四鄉竭力搜捕新兵時，軍政部長陳誠却正竭力企圖把中國陸軍從三百師以上減少到一百師，好讓留下的軍隊能夠獲得足夠的裝備和給養。

憤怒正在人民中生長與澎湃。他們看到什麼都沒有改變，而且都不會改變。政府底迷入眼睛的花言巧語掩蓋着堅決抗拒改良的決心。如果這個腐敗的政權繼續下去，那末一個包辦的國民大會和一部不民主的憲法就將使這陳腐的壓榨合法化。自農夫以致於政府官員，每一個階層都懷有深沉的不滿和憤慨。農民在徵兵征糧下呻吟，工人憤怒於通貨膨脹和貪污腐化，知識份子要求人權保障。國民黨內部的鴻溝也愈益顯著而擴大，進步份子擬定計劃以迫使共黨參加聯合政府，可是反動份子却悍然拒絕。

很少中國人敢在公開場合談論什麼。但是，政府裏的部長、銀行家、工業家、學生、作家、官員、小販、以及苦力，私下裏都不約而同地認爲必須有所作爲才行。可是他們幾乎難於有所選擇，因爲除了國民黨以外，每一個政治組織都是非法的。無疑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同意中共所擁護的暫時綱領，可是很少人要求共產主義。僅存的就祇有兩條路走：要就是國民黨本身改革，給人民與中共所曾給與的一切權利，兌現所有的諾言；然而當CC集團還掌握大權時，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是國民黨同意一個聯合政府。如果共黨參加政府，兩黨均可相互牽制，又能爭取人民的支持而競爭。同時，當所有黨派都獲得合法地位以後，民主的中間集團也許可能出現。

有一個中間集團確曾衝破了政治壓迫的窒息，那就是民主同盟。他們自己認爲是『站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左右之間，無保留地反對任何形式的獨裁政治，堅決地相信團結是勝利的先決條件。』民盟是六個政黨在一九四一年合併而成的集合體。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究竟擁有多少盟員，一個被認爲非法的

政黨是難於宣佈他們的黨員的，因為作爲這樣的黨員被認爲大逆不道。在民間裏，有教授、作家、學者、某些銀行家和工業家、還有一些軍人。他們承認在農民中他們是薄弱的，組織是十分冒險的，因爲國民黨的特務正活躍地壓迫一切的政治活動。民盟的領袖很難得被允許在城市間自由地旅行。他們都以最大的謹慎舉行會議和發表言論。他們相信他們代表着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且英勇地堅持着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領袖必須聚集起來共商國是，在戰爭未結束前即共同來爲團結與民主而奮鬥。

當勝利降臨重慶時，正是炎熱的夏天。那是在一個夜晚，重慶正進行着例行的事務，母親們已把孩子安眠在床上，河邊滿是散遊着的青年男女，市區裡的店舖爲夜市而哄鬧着，魏德邁將軍止邀請了英國大使在舉行晚宴。城裏的少數幾個無線電傳來了勝利的消息，這消息又從一個電話到另一個電話，從一個朋友到另一個朋友傳來傳去。重慶就立刻爆發爲一個歡呼和爆竹的城市，起先還是零星，四散的，但是一小時之內就成爲一個聲響與狂歡的火山了。

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像潮水似的都從家裏湧向重慶的廣場。魏德邁取消了美軍的十一點鐘的熄燈就寢令，美國兵也參加了慶祝。吉普車上堆集了二三十人在人叢中爬行，公共汽車載着變曆的客人，在街上蹣跚遊行，站在車上的人歡呼着，揮舞着旗幟，車前橫檔上以及汽缸蓋上都坐滿了人，軍用卡車也在人海中盪漾，實在趕不及出城外，中央社就在它的牆壁上張貼了巨幅手寫的佈告。成于市民聚集在美國新聞處的門前聽播音器的廣播。美國憲兵也放任了美國兵，人們拉住了他們不放，向他們歡呼，幾使他們窒息，高喊着：「美國頂好！美國頂好！」有的人搜盡了他所能知道的英文喊道：

「Thank you, Thank you!」（謝謝你，謝謝你！）或者把香烟塞給每一個他所靠近的美國人手裡。

勝利是來臨了，戰爭是過去了。天明時，重慶城又已恢復寧靜。狂歡很快地就消逝。和平是到來了，但那陳腐的政府，那由來已久的苦難，那照舊的恐懼，全都依然存在。中國並沒有較從前絲毫接近改革，他反而是離開國內的和平更遠一些了。戰爭是已經過去了，但是中國還會有長期的大流血和大鬥爭。

第十九章 勝利與內戰齊來

在勝利來臨後四十八小時之內，內戰的烽火就燃遍了中國。延安的電台立刻向他的全部部隊傳佈着中共的戰畧綱領。各地的共軍都得到朱德的第一道命令：奪取并解除所有日軍的武裝，要他們以蕩莽坦宣言的基礎而投降。第二天的特別命令更說明了中共的意圖：遊擊部隊均向北推進，越蒙古沙岡和草原地帶而進入東北，俾與由北面而下的蘇軍會師，并與蘇軍合作共同殲滅堵塞於他們之間的日軍；在黃河盆地的共軍則奉命促使迄長城爲止的日軍鐵路線立即投降，如遭拒絕，立即進襲。

重慶方面即刻對朱德就加以反攻，命令所有共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均各駐原防靜候命令，同時又下令其他軍隊立即向日軍駐區推進。延安方面當即答覆說：「我們認爲你對我們發出了一道錯誤的命令，而且這錯誤是極其嚴重的。所以我們不得不正式向你表示，我們堅決拒絕接受此種命令。」於是爭奪淪陷區控制權的競爭就開始了。

國共雙方一年來即已深知隱藏在成熟的勝利後面的將是一個全面的內戰。戰爭之突然結束使他們所久已在計劃之中的這一問題感到都無充分準備。不過他們都直覺地知道什麼樣的緊急措施必須施行。祇有美國，這希望拉攏雙方的盲目調人，依然還在鼓裏不曉得危機的真實性。美國方面的指示依

然還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矛盾公式：要支持蔣介石的政府，同時避免捲入中國內政問題。

中央政府與共產黨之間所存在的鬥爭，實質上支配着整個的中國。一直爲日本侵略所阻遏了的革命現在是不可能再被隱埋了。在共產黨方面，問題已經簡化爲，他們能保持多少他們已經改革了的土地，以及在這混亂的數星期之內，如何能夠迅速地進入東北。在國民黨方面，問題是簡單的，就是他們能夠如何飛快地在一九三七年它所控制的區域裏重建起它的舊秩序來，以及能如何迅速地進一步進入日本統治了十四年之久的東北。

五年來，中共軍一直包圍着華北鐵路線和重要的城市，同時還控制着鄉區。日軍會不會一直控制着這些鐵路與城市等待蔣介石能以其自己軍隊來佔領呢？或者日軍會不會立即心甘情願把武器交給那一直與他們戰鬥的共產黨呢？並且從而使得黃河以北地區成爲一個堅固的赤區呢？蔣還是一如往昔地堅持着「朕即中國」，堅持着日軍在法律上必須服從他的命令并以武器交給他的代理人才算合法，並且堅持着祇有當國民政府能據有貫穿共區的鐵路線以後，「法律和秩序」才能維持。共產黨的答辯是同樣的漂亮而且理由更爲簡單。他們說，五年來，爲了掃蕩這些敵人的據點和鐵路線，他們一直在戰鬥，流血，和犧牲性命，他們的軍隊已在真實的戰鬥中贏得了佔領這些敵人據點的權利。

一年來中美外交的成果顯得更明朗化了。如果中國早有了團結，就不會再有今天這問題。如果史迪威所建籌聯的合統帥部早被採納，那現在和平已經緊隨着勝利而出現了。美國，一年以前作爲一個調人是不可能完成團結并確保和平的，可是今天却祇能作爲蔣介石的一個伙伴不惜一切地來拯救他的命

運。中美合作的軍事計劃原本是基於勝利將於一九四六到來這樣一個信念而制定的，因之當勝利突然來臨的時候，魏德邁的新軍還正以戰鬥的單位姿態向華南海岸推進。一支強大的，訓練優良的中國軍隊正展開於廣州灣一帶，準備襲擊，同時一支早已在海上的美國艦隊正駛來會師。這個進攻是計劃在八月十五日開始，如護成功則將是十月裏全面反攻廣州的先聲。中國的行動更是規定好與太平洋上的行動配合一致的，當中國軍隊在十月裡克服廣州時，麥克阿瑟將在日本的九州登陸；而在次年春天，當麥克阿瑟在東京灣登陸時，大陸方面的中美軍隊已將進攻上海。依照這樣一個計劃，當勝利到來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滿佈長江沿岸，並處於穩取北方鐵路線的優勢地位，那末就可以一舉二得地一面擊潰了共軍，一面又解除了日軍的武裝。

可是，當真正的勝利突然驚人地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間出現時，人們却發現政府軍已處於異常不利的劣勢地位。它最優秀的軍隊都與華北華中的沿海城市遙隔數百英里之遠，他們不是正在向廣州灣推進，就是還散佈在遙遠的西南大後方受着訓練。在中國，最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地區却是沿海地帶，可是要把這裡政府軍隊通過殘破崎嶇的道路運送到沿海低地，這是非經數月之久莫辦的事情。在另一方面，中共軍隊則將在整個中國東部要求或迫使戰敗的日本駐軍向遊擊隊放下他們的武器。蔣介石火急地需要把軍隊立即運到華東，因為否則八年戰爭的果實將完全落入共黨手中。這樣，就祇有美國才能及時地運送他的軍隊來挽救他的命運。

美國陸軍，空軍，和海軍都動員了他們所有的力量來解救蔣介石。向廣州灣的進攻立刻被取消

了，軍隊直趨廣州，然後再由美國海軍把他們從廣州運到華北。第十四航空隊，第十航空隊以及空軍運輸司令部的大部份飛機都被組織了起來，來作這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軍隊空運。蔣底八萬最優秀的軍隊都集中起來等待着美國飛機以最高的速度把他們運走。派到南京去的是那曾在緬甸擊敗過日軍的由美國訓練美國裝備的新六軍。他們是帶着解放者和勝利者的情緒去接收他們的首都，但是他們所見到的却祇是一座冰冷的敵對的城池。南京並沒有給他們熱烈的歡迎，他們已在日軍統治之下過了長久的悲慘日子，他們不曉得國民黨政府取代汪精衛傀儡政府以後他們的命運將會怎樣，他們十分的恐懼。新六軍通過街道時，高聲地喊道：「我們是重慶的軍隊，我們回來了！」。但是，給他們的反應却是一片沉寂，沒有歡呼，也沒有笑容。於是他們就祇好靜下來等待進行那冰冷的解除日軍武裝的工作。

到上海去的是一支部份由美國訓練的九十四軍，他們所得到的却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歡迎，當瘦弱而襤褸的士兵跨出C五十四巨型機的機門時，他們見到整個機場整個跑道都擁滿了歡迎的羣衆，搖動着無數的旗幟，千萬人歡呼的聲音，配和着樂隊的鼓號以及童軍的笛聲。電影攝影機的卡車嗚叫着，到處都碰到開麥拉。農民型的士兵畏縮怯懦地走下陡峻的扶梯試着和大家答禮，可是却爲他們要求解放的這些群衆壓倒優勢的神采弄得來不知所措了。這些被解放者都身着絲綢足登革履，可是那些解放者却一雙雙草鞋泥足。

第三支軍隊則從漢口飛赴處於共軍心臟地帶的北平，想用剗刀和美國的星條旗來重奠國民黨的權威。軍隊從群山深谷中調了出來，重聚於美軍基地，他們都是五六年前撤退到山地裏去的，如今又帶

着他們苦難和疾病，長了飛速的翅膀，勝利地走上了他們潰敗時所會走過的道路。

國民黨也並不單祇依恃它的軍隊，它還有早已爲這種緊急事變準備下的政治資本。在戰時，有一個有名的污行，那就是重慶政府中的某些份子與南京北平的偽政府以及日本人間維持着親切的關係，他們的使者和代表時來時去，不斷地通過火線遞送函件，締結協約。國民黨表面上反對一切與漢奸的來往，可是暗地裏却爲了私利不知道進行了多少交易。它希望着在戰爭的最後期間偽政府會轉變過來必要時向日軍進攻——當然不論在任何情形下，都將進攻共軍。偽政府所控制着的這些倒戈軍隊爲數在五十萬至一百萬之間。日本利用他們主要地爲了守衛中共區域內的鐵路和城市。其中不少是由因深信日本必勝而背叛國民黨的將軍們所指揮。現在，在這緊急的關頭，整個的偽組織都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在華北，有六個曾經替日本打共軍的將官又被收進國民黨的羽翼，再度舉起國民黨的旗幟，並受命直接抗拒共軍向鐵道及城市的進逼，以等候政府來接收。

作爲對國民黨的反攻，中共動員了它全部的力量來作一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華北是他們的堡壘，這是他們決心要保衛的。山東、山西、河北、在中共對城市，公路，鐵道的反攻下，到處都點綴着零星的戰事。日本人，並沒有因東京的投降令而顯得狼狽，却以數年來未曾見過的緊張加以反擊。曾經與日本爲友的漢奸賣國賊一變而爲國民黨的支持者，高舉起國旗，斥責共產黨爲背信不忠。幾個星期之內，中共軍已割裂了黃河以北的全部交通綫，幾乎已使他們所有的遊擊區和政府均進攻隔絕開來。在一個多月的激烈戰事中，共軍遭受了一次打擊，同時也獲得了一次大的勝利。共軍已經佔了三

分之一的山西，而山西正是中國本土礦藏最富的省份之一。他們相信省城太原終將落入他們之手。但是那機伶的山西主席舊軍閥閻錫山——他不僅是國民黨的人而且是日本的密友——竟以日本的裝甲車調動他的軍隊，通過中共區的鐵路線，在日軍的保護之下衝進太原，控制了省城外四佈的鐵道。

但是，就共軍而言，太原的失利隨即得到了更大的補償，中共接着佔領了張家口——他們在華北所佔領的最大的一個城市。張家口的日軍早在蘇軍迫近之前倉皇逃去了，並且在他們走的時候丟下了他們的給養和武器，共軍就這樣開了進去。張家口剛好位於長城的北部，它是銜接中原和長城以北地區的一個鐵路中心，一個戰畧據點。張家口的佔領，使中共獲得了一條輸送其遊擊部隊進入東北的全道路。

在華南，中共的領導地位却是相當混亂和非決定性的。將近一年來，共軍却在竭盡一切努力於爭取控制上海地區，準備與登陸的美軍相配合。他們曾派遣了最優秀的幹部分佈於上海一帶，但其組織則尚未完全成熟。日本在八月八日宣告投降，十五日新四軍已逼近上海，上海的郊區亦已出現了他們的標語顯示着他們就要到來。城裏的黨的組織者，集中起他們的各種工會，組成了一個「總工會」包括所有重工業工人，洋車夫，以及其他勞工。像這樣的一個「總工會」，曾經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共產黨暴動的原動力。極其迅速地就有五萬工人在十多家大工廠裏展開罷工，但沒有幾天終於被日軍的槍尖所平息了。

對於共產黨，當時的情況確是不利的。美國飛機正不斷地運送國民黨的強大部隊進入這一城市，

而同時日軍也還依舊握有槍械和重砲，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懷着對共產黨的無盡仇恨，他們正準備着破壞中共的暴動，而且即使在盟軍的命令之下，他們還是和兩星期前他們自己還採取主動時一樣熱誠地去進行破壞。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是如此沉醉於勝利的狂熱中，對於任何一種暴動都是全無準備的。過去它曾經是國民黨的堡壘。雖然工人們一九二七曾在這裏發難，但是這裏的廣大中產階級還是把蔣介石視作中國民族生存的象徵。隨同勝利的來臨，一夜之間蔣底巨幅照片就又從封存了多年的角落裏找了出來，看起來驚人的年青漂亮，店員們給它裝上了花圈和紗綢，莊嚴地供奉在每一個窗櫺裏。全城都彌漫着假日的興奮氣氛，空氣就像是酒，人們都像在過節。歡樂的行列像泡沫似的在每一條街道上起伏彼此，人們向每一個穿着公務員制服的人歡呼，留戀不捨地遠巡在華麗的大飯店門口，在那裏新近來的美國人正在恣意地享受着落後的內地中印緬戰場所無法得到的一切奢侈繁華。

在這一陣困惑的迷霧中，共產黨給上海共黨份子的第一次的確切的指令，在勝利二星期後自延安抵達上海。命令當地的共產黨人不得引起流血事件，不得實行暴動。他們在郊外等待着，一面國民黨則把它的大量大批地灌進城內。幾星期後，中共軍隊開始離開了上海地區去會合他們黃河以北的弟兄。這一爭奪戰的第一回合結果算是蔣控制了長江盆地，而中共則控制了黃河以北。祇是東北還在爭執之中。

數日之後，當中共可能重奪其職畧時，事實證明了他們對於政治及軍事形勢的一種先知的估計。

共產黨之把長江流域拱手讓給蔣介石并不是徒然出於恐懼，他們之放棄上海是爲了決定以上海換取更富饒的東北。新四軍早已在九月初開始向長江東部移動，一部份的部隊進行着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戲劇性的長征，向北疾速地推進——從上海北部直到東北的瀋陽，當中有一千英里的途程，得通過國民黨軍，僞軍、日軍、和美軍的重重防線。一九四六年長春的陷入共軍之手，他們當中一定有成千成萬的參加了這個戰鬥。

戰場上的戰鬥却配合着重慶的國共談判。來自中國社會最深處的巨大壓力，正迫使着雙方都走向和平。報紙上和私人間的呼聲構成了自抗戰以來前所未有的最真實的民意。那呼聲是：「勝利已經來臨，讓它帶來和平！」

在美國政府保証其安全之下，毛澤東乘美機飛到了重慶，并且接着很快地導致了一些技術上的協議。在政治方面，國民黨答應把預定在十一月召開的國大延期召開，雖然未曾允諾代表名額的擴大；同時它又答應釋放若干拘留在集中營裡的政治犯。中共同意把他們的軍隊要求縮減到承認二十師共軍。同時又建議在次年舉行各黨派會議，雖然這會議將做些什麼却沒有確定。中共要求這會議完成全面的政治解決，國民黨却不願提出任何諾言。談判終於在相互安全這一基本問題上擱淺。美國人簡直不可能想像談判進行時的空氣，因爲，雙方都認爲自己的生命如置危舟，二十年來的恐怖，痛苦，和流血籠罩着兩黨間的每一次接觸。就是雙方代表在進行着和談的時候，成于成萬的共產黨人以及「嫌疑共產黨」却還在集中營裏熬受着苦刑和磨難。

中共方面對安全問題的方案是堅持由政府承認其於戰時在敵後建立的邊區政府底合法地位。他們取消了他們一九四四年所提的要求——承認他們在長江流域的政府；但依然要求政府對河北，山東，晉北、察哈爾以及熱河的中共控制權予以合法承認。在這一塊四省半的堅實地區裏，五年來一直在中共的控制之下，由他們征收賦稅，也由他們爲人民抵抗日軍的不斷進犯，他們說那個地區裏的政權都是由民選產生的。此外，中共更感到像北平，天津、上海這些城市都存在着大批的親共團體，政府應當任命一個共產黨的副市長。這種區域控制權的要求代表着中共安全的最起碼的保障，如果國民黨接收了這些地方政權，他們的生命就感到威脅。蔣答應了放棄恐怖手段并取消特務組織，但共產黨人却不敢在蔣介石的一紙諾言的微弱保護之下求生存。而且事實上，六個月後，蔣的特務依然還是肆無忌憚地在逮捕共產黨，依然在搞老套子的集中營。

如果接受國民黨政府完全控制爭執地區的要求，那就等於是共產黨把每一個村鎮重新交給腐化的官僚和土豪劣紳，也就等於說苛捐什稅，高利盤剝，以及橫行霸道的重行出現。在國民黨所重估的城鎮裏，國民黨的黨棍們已經充分地顯露了他們的暴虐和貪婪。不僅如此，在若干收復區內，國民黨的官僚們已開始與那些在戰時爲日本人進攻共軍的萬惡漢奸們勾通一氣。當這些問題僵持不下時，共產黨提議在爭執區裏在國民黨的監督之下，讓所有居民，甚致那些敵人時代流亡了的人們也在內，舉行一個公民投票來解決。但是國民黨連這個也拒絕了。

國民黨治下的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由中央任命每一省的主席，通過法律，管理全國路政，

教育、離婚以及社會治安等一切的事務。在這一中央集權制度之下，國民黨更控制着直到縣長的一切官吏任命權。中共却認爲中國有着如此複雜而互異的風俗習慣和方言，公路是如此之少，交通如此原始，中央集權是行不通的；因之，最合適的政權形式應當是一個聯邦的制度，像美國或蘇聯那樣。在這制度下，中央政府的職權是在於國防，外交，貿易，商業，財政及其他類似事務。而且由各黨分別掌管各省決不會削弱中國的統一，就像由共和黨及民主黨分別治理各州決不會削弱美國的統一一樣。

蔣介石徘徊於走向一個真正政治家風度的途中。他如果同意共黨的建議，和平就會馬上實現，否則，就是大流血——而最終還是一個不同意。

十月十日，特別舉行了一次爲中共代表而設的盛大宴會，一篇無意義的文告也發表了。其後不久，中共代表們就離開陪都飛返延安。談判算是失敗了。在蔣的眼裏，中共一直都是蘇聯政策在中國的一「代理人」。他認爲由於中蘇條約的簽訂，他已經以東北部份主權和外蒙的獨立爲代價從蘇聯買回在國內爲所欲爲的權利。蘇聯既已貫通，那麼他們的「代理人」——中國共產黨，勢必就將陷於無權無勇的境地，而他自己却有美國給他撐腰。赫爾利是支持蔣的，魏德邁更是隨時準備着執行任何赫爾利所認可的政策，他不顧其後果將是如何嚴重。當談判進行到第四週時，傳來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將調赴華援蔣的音息，赫氏的態度立刻就轉趨強硬。美國已經幫他保持了長江流域；現在既然又派遣了他們最優秀的戰鬥部隊去爲他們接收華北，於是他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他還要對中共讓步了。在開羅會議裏，他曾被賦予接受在華日軍投降的全權；現在，他要讓所有他的盟邦都來支持這個謬言。

戰鬥現在是圍繞着平津地區進行的。持有美國武器及供應，並有美國空軍掩護的中央軍是以壓倒的優勢在進行著內戰。共軍攻擊政府軍時猶如他們之攻日軍，運用側面抄襲，遊擊戰術，和交通破壞等等方法。整個華北戰事的關鍵是在那貫通天津北平和東北的鐵路。這些鐵路是整個政府軍的神經系統，而共軍在這些地帶是無法開展的。因為鐵路是由美國海軍陸戰隊所保護，而這是一支全亞洲最精銳的戰鬥部隊；而且單只是一面美國國旗就足以使這些鐵道及護衛者成爲不可侵犯。在政府軍走出那美國星條旗保護下的地區之外以前，共軍是不能向他們進攻的；因爲，要進攻國民黨軍隊的基地就等於進攻了美國。

美國海軍陸戰隊，國民黨軍隊，以前的偽軍，以及日軍，在一個前所未見過的最奇怪的同盟之下，協同一致地防衛着這些鐵道，以抗禦遊擊隊的襲擊。而最痛心的諷刺是：就是在這個平津地區，當局勢最險惡緊張的時候，中共遊擊隊曾經屢次出生入死地從日軍手下搶救過美國飛行員，當B——29型美機於轟炸日本歸途中被迫降落時，這些飛行員們就是當地村民安全偷運至後方的，而這些村民現在已經被看爲美軍的敵人了。在這區域裏，共軍雖向陸戰隊的列車射擊，而陸戰隊就以掃射整個村落作爲報復；我們的星條花旗飄揚在這中國內戰的鬥雞場上。

就是在這個時候，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底，赫爾利辭去了他的職務。並未事先通知總統或國務院，他在華盛頓突然地發表了一個聲明，就此宣告了他的政策的全面破產。他早在毛蔣會議之初就已離開重慶回返華府，和談的破裂證明赫爾利一年來的工作是完全落空了，中國還是沒有團結。在赫爾

利政策的邏輯之下，美國已不再是國共紛爭的調人，而是內戰中的一員伙伴了。美國的政策認為中共所佔有的華北是一個法律上的真空，而唯一法定進入這個真空的人就是蔣介石；因之，美國陸戰隊的責任，就是不惜一切地支持他。赫爾利的政策在美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一個可怕的選擇：要蔣介石，還是要共產黨？要中央政府，還是要混亂的局面？沒有人會提出一條中間路線，沒有人會問過中國人民究竟他們需要怎樣一個政府，沒有人會和他們商討過，也沒有人舉行過選舉。在華北，千百萬人民擁戴一個反對蔣介石的集團；而現在我們却用槍尖硬把蔣介石政府塞進他們的喉嚨，不問他們究竟要不要。

我們的政策同時又造成了另一惡劣的後果，使蘇聯在亞洲和美國正而為敵。當德軍直叩邊陲，蘇聯日處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它對中國的興趣已降到最低程度，它對中國共產黨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雖然它所控制的報紙曾經反覆地表示對蔣政府的充分不滿。事實上，蘇聯報刊的一切對華批評，與當時美國政策的聯合指揮者——史迪威和高斯——的意見是不謀而合的。可以說，直到一九四四年的秋天為止，美蘇的遠東政策實是在二條平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個目的，就是要建造一個團結民主的中國。一到赫爾利繼任駐華大使之後，美蘇的對華政策就開始分道揚鑣了。現在，美國已全心全力地站在國民黨的後面。我們對蔣政府無條件地支持以及在中國的插足日深，日漸被蘇聯認作是美國蓄意獨霸遠東。重慶的報紙很少透露對美國的批評，蘇聯大使館則十分敏感於中國新聞檢查當局之容許中國報紙偶然對蘇聯作漫罵式的攻訐，蘇聯深知國民黨的高級領袖們憎厭他們。國美之間的聯盟是對

蘇聯的一個直接威脅。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條約的簽訂，標幟着中美蘇三角關係上的一個中途點。這一條約的加諸中國，是由於美國和莫斯科方面施出同等的壓力所逼成的。條約中所有的要點都已在雅爾達會議中取得了協議，蘇聯所向中國取得的讓步，都是由美國作爲促使蘇聯參加對日戰爭的代價而提出的。當宋子文於雅爾達協定簽訂六個月之後，懷着談判一個完善條約的希望飛往莫斯科時，却發現到他不過來對一個早已由其他二強所預先擬定的草約表示首肯而已。

這條約中大部份內容可以視爲一個鄰國間的正常互相瞭解。外蒙古獲得了獨立，這不過是對早已存在了二十年的事實予以合法承認。因爲這條約上蘇聯獲得了對中東鐵路的聯合控制權，這控制權原是一九三一年日本進軍東北之前就存在了的，而且由於蘇聯濱海省的特殊地理結構，聯合管理大概是事實上所必需的。條約的真正要點却是在要中國放棄大連旅順兩地的主權；大連成爲一個國際自由港，蘇聯擁有特殊權利，同時蘇聯有權在旅順建立海軍港。這樣一個條約在過去是會被認爲帝國主義的，而今天却即是如此。八月間條約的簽訂，使蘇聯完成了應付兩種可能情勢的必要準備；如果要對付在遠東的一個聯合攻擊的話，它已有了妥善的防禦；如果戰後能出現一個團結的新中國，它可以據此而與之建立友好的關係。因爲，條約中保證蘇聯將全面尊重并支持中國的合法政府，換言之，就是尊重并支持蔣介石；同時，蘇聯則又因此在它側邊獲得了兩個優良的海港，或者用之於貿易，或者用之於軍事。

美國軍事力量之與國民黨直接合作以攻擊共產黨，激起了蘇聯的另一步驟。如果我們以祖護國民黨來謀取中國的穩定，那蘇聯就會以祖護中共來作爲對抗的途徑。在日軍潰敗後的數星期中，蘇聯對中共的態度是絕對正確的；一位紅軍將領曾經飛赴延安，告訴中共說，中共武裝部隊不得踏入東北。但是，現在共軍竟突然開始出現於東北各鐵路線上，顯然已得蘇軍的默許，與美國支持下的國民黨軍作戰抵抗。這似乎是中共與蘇聯之間自一九三五年來第一次的直接諒解。這，可真是美國的行動所一手造成的。

在東北站穩了腳根以後，蘇聯移去了一些東北的工業設備，這一行動是有理由解釋的，但却不能被寬恕。蘇聯因對德戰爭而飽受了蹂躪破壞，而日本在東北的工業帝國自然激起了蘇聯的情緒，他們急需機器，於是把它搬走。第二個解釋可以說是，鑒於一個敵對性的中國在南方漸漸形成，東北工業的敗壞似乎是一個初步的防禦。這兩種解釋都沒有充足的理由。東北的機器、工廠、原是中國的勞力所建造的；固然日本人管理并且使用過，却是掠奪了中國的錢財，絞盡了中國人的血汗而建造的。就主權說，和作爲日本對華賠償說，這些設備都是屬於中國的。不論控制中國的將是共產黨、國民黨、或是聯合政府，東北的工業設備都將是未來中國的奠基石；而不論蘇聯從東北收穫了多少，這行動終將在中國人民的頭腦裡留下懷疑和敵對的印象，而多年來中國政治上的右派第一次找到了一個訴諸全國人民的藉口。

這大致是高度政治發展中的一個不幸的時機巧合。正當蘇聯無所懼地在遠東開始其新政策時，美

國也正在打算回復到它舊的遠東政策。利用對赫爾利政策的否定，美國希望藉此重建起了在中國內戰中的中立地位。當馬歇爾啓程來華時，中國處於遠東全部亞洲戰爭時期更爲危險更爲艱難的局面。配合着一個過期了十二個月的政策，他受命要在一個全面內戰的困難與痛楚中塑造一個和平。

當馬歇爾來到中國時，所有正常的政治軌道都已陷於麻痺。如果期望他能像獲致戰爭的全面勝利一樣地在華任務中得到全面的成功，那是超現實的幻想。他的重要還是在於他個人對於促成停戰的堅持，不論這一停戰是怎樣的脆弱和搖幌不定，終還是出乎意外地被月復一月地支持着。

馬歇爾工作之史無前例的複雜性，部份地是起因戰後美國在太平洋的特殊地位，另一半則由於中國政治本身的原因。馬歇爾的第一項工作是重建美國外交政策的潔白無瑕，并且要使人把他看做是這糾結到無法解決的紛爭中的公正裁判者。但是，他在策劃這一套美國政策的觀念時，他所面臨着的是：在軍事上，就在他所要調處的紛爭中，美國已經是個不乾淨的伙伴；他的前任所留下的遺產是美國的武裝干涉政策，以及支持國民黨的統治；這，儘管直接違背着他所想推行的和平政策，却還不能不予以尊重。他的第二項工作是，把強大的，充滿活力的，滿懷信心的共產黨，與一個落伍的，頹廢的，和腐化的統治政黨拉到一張會議桌上來，敦促他們再度討論那談了八年還沒有絲毫解決的老問題。

當他們於一九四五年年底參與馬歇爾會談時，國共兩黨對於停戰與團結兩大問題堅持了整整一年的各種不同的態度，已經簡化爲兩大類型。共產黨方面堅持：政治協議先於行政協議。當時他們差不多控制着三分之一的中國，也管理着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因之堅持政府的廣泛改組，使他們對於未

來中國的一切基本決策，能有相當於他們在各省實力的比例的發展權。中共并堅持，在這樣一種政府未建立以前，國民黨必須同意立即中止一黨獨裁。祇有這樣，他們才能同意進行恢復交通及整編共軍爲國軍的種種談判。

在另一方面，國民黨則以注定毀滅的背城借一心理，墨守着空虛的法統。他們堅持中共必須先在軍事行政各方面就範，然後才能討論政治問題。誠然，國民黨會對所有人民保證過一切諾言：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束一黨專政，取消特務等等；但這些都是延期支票，祇有在遙遠的將來——由共產黨的「就範」而達成了統一之後才會兌現。甚致就在這些諾言傾瀉而出的時候，政府的集中營裏還拘留着無數政治犯，特務依舊在追逐着新的候補政治犯。

一月時，馬歇爾居然在兩個同時進行的協議中把雙方拉攏了，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軍事的。政治方面，經由馬歇爾的敦促，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參與會議的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的代表，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最後共同協議認爲，必須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各黨各派的臨時聯合政府，以爲戰後穩定政府的誕生作準備。在軍事方面，國共同意全國各地全面停戰，并按五與一比例整編中共軍爲國軍。

這些協議還沒有等到雙方執行看究竟怎樣，國民黨就在三月間召開了二中全會，其中反動派所構成的多數壓服了少數願意接受政協決議的溫和份子。這次中全會堅持主張：將來中國的新總統——那必然是蔣介石——將擁有近乎專制暴君的權力；否定了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原則，又削減了共黨

及其他小黨派將來參加政府的人數比例，并且擠出了「託管」的招牌，固守着那陳腐的說法，宣稱祇有國民黨單獨有權決定新中國的命運。

中共準備好了對撕毀政協的方面予以最迅速的反擊。抗戰結束後不久，他們即已深入東北。現在，他們以展開對東北鐵路線的全面攻擊來對付國民黨的撕毀政協決議，他們對東北首府長春的包圍，以及自長春以北直達邊境全部鐵路線的佔領，表現了這一行動的高潮。

馬歇爾已在初步停戰的「勝利」聲中飛回美國去了。當他在四月下旬重臨中國時，却發現一切改觀，面目全非，他的工作變成毫無成就。國民黨的威信已因中共在東北的勝利而飽受打擊；蔣却死硬地表示，在重開談判之前，他必須先以武力重建權威，或者以中共的自動就範來奠定其權威。然而較前更有自信的中共，現在已清楚地看出美國與國民黨之間有着積極的同盟關係。儘管馬歇爾個人的似乎很純潔，美國的軍艦還繼續運兵北上到東北戰場；每一個太平洋上的船隻却帶來美國的專家和技術人才，來加強國民黨的行政；美國的救濟物資，在政府的濫用之下，在沿海各地製造了大批富翁，而共產黨區內的農民却在繼續挨餓。

馬歇爾又一次地利用他個人的威望，共軍終於退出長春，國民黨不經流血地就重佔了這個東北首府。蔣自己立刻飛到北方檢閱他的勝利軍，國民黨的報紙隨即發出熱烈的凱歌聲來，讚美着他們深信一定會接着出現的全面掃蕩。國民黨繼續向松花江及哈爾濱進逼；然後，當他滿足於他自己權威及虛榮之後，蔣回來了，并且同意再度來一個停戰，和談隨之恢復。於是，北方的軍隊都等待着首都的大

定，一面爲將來可能分派給他們新任務而養精蓄銳。

第二次的停戰和第一次不同。第一次的停戰帶着微弱的希望，這希望祇是起於一種念頭，相信戰爭的前途是可怕的。而第二次的停戰，竟連這一點微弱的希望也幻滅了，它是在一種日趨高漲的恐怖空氣中產生的。正像在希臘悲劇裏，每個參與者正急速走向那命定的，不可避免的毀滅。

國民黨似乎已最後地決定：中國人民除了「中共統治」之外，就祇有接受恐怖統治而別無他途可循。在整個夏季的幾個月裏，祇要是在政府的獨裁機構權力所及的地方，自由份子與民主人士不是被殺害就是被逮捕，或者就被恐嚇不准作聲。被暗殺的不是共產人，却都是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得太自由的民主同盟人士。在昆明，教授們祇能在美國領事館的屋宇下尋求庇護。就是在蔣氏巡視東北的時候，北平有七十七種報紙和期刊被迫停刊；在廣州，也有兩家報紙被搗毀；在北平，軍隊在大街上架設着機槍陣地，以應付任何事變；在上海，警察用各種卡片登記一切知識份子和「有思想的人物」。在整個華中，國民黨在勝利前後所作的諾言，全被棄如敝屣，在華北，不可避免的和意料中的事件終於生了。目睹着幾個月來美國海軍陸戰隊與國民黨軍連防守衛鐵路線的中共游擊隊，已經顯得不能再忍受了，終於一隊游擊隊開始向來往於平津公路上的美國海軍襲擊，於是美國人與共軍相互撕殺起來。國民黨以沉着的愉快心情面對着這個事件，因爲終於挑起了共美之間的仇恨。緊接着，共方也發出了一陣斥責美國的宣傳，不顧其他一切反證地宣稱，他們的進襲美軍，祇是爲了他們是在輸送國民黨軍隊。

孟夏之時，那辛苦經營的傳機機構以及馬歇爾所企圖建立的美國的中立地位，都開始迅速地傾圮了。馬氏拉來了一位聰明而莊嚴的教會人士司徒雷登出任大使以爲他的臂助。在幾星期之內，兩個人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承認他們外交的失敗，並且表示要導致一個爲雙方能同意的和平解決幾已屬不可能之事。

馬司聲明發表以後，緊接着是蔣主席的勝利周年文告。自從史迪威事件把中國問題滯至決定關頭以來，差不多兩年已快過去了；然而，蔣這個圓狹的文告却充分表露出，他的思想和了解絕未爲所有過去的演變所改變。他依然堅持着，和平的獲致祇有共產黨先將軍隊交給政府，或者向政府投降；而這個政府將交由那在十年前經國民黨縝密挑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來作最後的決定。

炎熱而潮濕的夏天快過去了。在黃河盆地一帶，國共雙方的軍隊相對進行着小規模的戰爭。中共佔有大部份北方的土地，他們的軍隊包圍着政府控制下的僅有的幾條鐵路線。政府方面則控制着長江流域，并繼續不斷地向他們所支配着的華北鐵路線輸送更多的物資，更多的軍隊，以及更多的美國裝備。和談正向着那距離日益遙遠的政治解決的蜃樓幻景顛跛行進，每一個人都在企盼着某種奇跡的出現，以遏阻最後總攻擊的開始。一旦這個最後攻擊開始，一切那就無法挽回了。

第二十章 子夜的中國

如果期望中國在我們這一代得到穩定，那是幼稚的想法。中國必定變，要不然就會死亡。

在我們這時代，中國得把上五萬萬的人民從中世紀的世界推進到原子彈的世界。由於我們的手的工作趕過了心的工作，西洋社會會因為失調的危險而幾乎毀滅；中國的困難更大。在成堆的屬於今日的問題之外，中國人還必須解決屬於昨日的那些問題：建造鐵道和工業，提倡普遍教育，培養科學頭腦。而且時間很少，中國的根本問題，在於該國的兩大黨能否對一個變革的綱領獲得一致，而這一綱領又須是廣泛到足以迎合中國廣大人民羣的需要。如果他們能這樣，變革會和平地達到，倘若他們不能這樣，鐵騎便將縱橫國土，蹂躪百姓，並給世界各國帶來災害。

今日中國的未來課題，要比任何國家的都嚴重。在我國太平洋對岸遙遠之處，在緯度二十度至五十度間，是世界上具有同一集體歷史的最大的一批人。這批人非常之多。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對中國人口的估計，自四萬萬人起至五萬萬五千萬人止，各不相同，其差數就要比美國人口總數為多。這大批人必須給動員起來作最大的冒險。他們必須得到公平，必須學會建設和創造，必須受教育，必須在數代之內，吸收西方世界已經奮鬥了五個世紀才能達到的一切變革。

中國各方面的人仕都同意有此種動員的需要。甚至在中國的內部，強調它不團結的可怕的历史，以及再有內戰時更可怕的前途，也久已成爲習慣了。可是將來的要求如此巨大，一旦建設進行時，有的人的才能和精力，必須作充份的利用，其充份性很近於政治暴力。不管國民黨或共產黨掌握中國的命運，或兩黨共同掌握，或兩黨都不掌握，中國必須在同樣的山谷間建造同樣的鐵路，必須開發同樣的礦山，疏濬同樣的河流，建築同樣的煉鋼廠。將來的光明和戰爭的恐怖性的對照，是中國今天政治中最大的促進團結之力。

中國的復興，已經計劃了四十年了，西洋化的第一個計劃，是差不多五十年以前一群改革家呈給一個少年皇帝的。他曾經起草了必要的聖旨，以作自上而下的西洋化的改革。他的諭旨使北京宮廷裏大爲詫異，宮廷認爲他簡直發了瘋，慈禧太后發動了一次宮廷政變，把他關起來關死了。他的計劃於是被人忘記，慈禧太后掌管中國，用這樣生動而惡毒的辦法，來使中國破敗，使整個大清帝國崩潰。

接着爲了中國的前途而計劃的，是孫中山。一九二二年，他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國際開發中國』，這本書公開地呼籲英美資本投資於中國的工業化。對國民黨，孫中山此書今天依然是國家最高的計劃。有一群中國工程師在戰時曾企圖使孫氏的工業目標變成具體的計劃，蔣介石也給了這些工程師研究的費用，而且把他們研究結果放在他自己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裡。在技術專家們的審查之下，在將來智識更充份時，蔣氏的數字一定得修改，但作爲將來的指標，依然是目前很有趣的東西。歷來各種計劃開始時就有一個基本的困難，因爲關於中國的基本物質的材料實在少得太可憐。中國土地用現代

化的地質學的方法來測量的只佔三分之一，中國邊遠區域內所有的寶藏，可能比目前世界上所知道任何東西爲豐富。對於中國學者們，中國自己的人民是一個神祕，因爲學者沒有足夠的統計數字來分析其日常生活。因此，蔣介石的各種計劃，都是以對中國富源不完全的估計爲基礎。

如所週知，中國的煤藏之豐，可以保證自己的富足。中國的煤礦貯量像美國或西歐一樣多，據估計，它地下有二千四百萬噸，沒有發現的還不在其內。直到最近，人們相信中國的鐵礦不多，最樂觀的估計認爲它有地下藏量十六萬噸；但在戰時，日本人宣稱，他們在朝鮮附近的中國地方又發現了十二萬噸。假如這個說法有根據，那就是說中國已知鐵礦的富源，差不多又加了一倍。鐵和煤是最重要的礦物，但中國還有一點青色的礦物在現代冶金工業中具有異常的重要性。世界所知的鎢和鎳礦藏量以中國爲最多，這兩樣東西和錳混合起來時，是有十分神妙的價值的。據所知，鎢的藏量中國在世界上最豐富，鍊鋁所必須的鐵礬土中國也很多。以目前所知而言，中國缺乏銅，鉛和鋅，石油也是問題。在戰時，新疆省的喀什噶爾至長城終點的玉門關一帶發現了油田，這一地帶長達一千五百哩左右。這些油田加以開發，或能像加勒比海或波斯灣油田那麼大，或將證明是一個空虛的希望，誰也不知道。

中國最好的寶藏，也許就是它可以建設水力發電的許多地方。中國西部靠着西藏的高牆，而西藏的山上終年積雪。河流湍急地從這些山和高原上瀉下來，一方面蹂躪了中國的土地，另一方面却使它肥沃；在高原上衝下急流的任何地方，差不多都可以裝上水閘，加以控制，而供給無窮無盡的動

力。中國能够水力發電的地方，和它的資源分佈情形非常配合。可以用水力發電的地方大半在華西最需要動力之處，在遠離煤礦或其他礦物動力之處。要開發水力，當然需要驚人巨大的款項和材料，可是最後的結果是革命性的。中國內地的偉大省份四川，在戰時每年有二萬五千瓩的電力，自由中國全部共有六萬瓩，正在擬議中的長江三峽電廠一旦發動起來，每年就可以有一千萬瓩。

利用中國資源的第一步是發展交通。中國復活的首先和最重要的因素是運輸；在中國開始作爲一個現代化國家而生活以前，山嶺必須穿過，河流必須控制，並加以橋樑。中國有數百萬鄉村，每個鄉村被慘酷地釘在沒有公路的地圖上，除了極少的公路和鐵路以外，中國幾乎是一片叢莽；船上跳板似的狹窄的小路，依然在數百萬方哩中爲千百萬人民服務。一塊地方可以有數千人餓死，而同時隔一條山脈的另一塊地方糧食過剩。在公路達到中國鄉村之前，那些鄉村的農民是無法變成明天的一部份的。

「中國之命運」製定了一些十年計劃，要開發中國的資源和交通。按照該書所說，中國在第一個十年，需要二萬五千哩的鐵路。戰前只有一萬二千哩，戰爭結束時，通車的只有五六千哩。美國有鐵路二十三萬六千哩，中國希望最後能有十萬哩。中國還希望將來有公路一百萬哩，這數字要比戰前多十倍。爲了公路和鐵路交通，就得建造或入口火車頭二萬五千個，貨車三十五萬輛，公路上用的汽車三百萬輛；因此，也就要建立一些工廠，在十年之內，能夠每年製造新汽車五十萬輛。船隻需要極其迫切，在戰爭以前，中國沿海和內河來往船隻約一百萬五千萬噸，和平時只剩破舊船隻十萬噸。在

最近將來它至少得有戰前的數目，最後目標則爲一千五百萬噸。

重工業必需和運輸系統同時發展，在戰時，自由中國每年所產的鋼爲一萬至五萬噸。中國現在要在十年內擁有一些工廠，每年至少生產精製的鋼或鐵五百萬噸。美國每年生產九千萬噸；五百萬噸將只是中國需要的一部份，假如建設工作的速度超過計劃，那就需要從外國運入大量的粗製鋼鐵。中國鐵礦很少；以已知礦藏量爲基礎來判斷將來，它也許永遠不會成爲美國意義上的大工業國，可是各地重要的生產區域，仍將發展。重工業大約要在三個地區發展起來，那是滿洲、山西和湖南，因爲這三個區域內煤礦、鐵礦及運輸工具湊合得很均勻。此外，中國各地大約能建造一些較小的煉鋼廠，從本地的煤礦和附近市場中的鐵內每天煉鋼五十至五百噸。

中國有些人一方面承認中國很缺乏良好的鐵礦，另一方面指出這一點並不能像二十年前那樣阻礙進步，我們的時代是輕質礦物的時代，是鉛、鐵和輕質合金的時代。在輕質礦物方面，中國沒有開發的資源極其巨大，只消用電力開發就行。如果偉大的水力發電廠按照計劃建設起來，中國的電力也是極豐富的。

在其他的工業方面，中國的目標也很大。這包括一個電力廠，一半以水力發電，一半以燃料發電，每年發電二千萬瓩，每年要造一百萬幢新房子，三十二萬架織布機，一萬五千架羊毛機，以及九萬四千架絲織機。在和平之後的最初五年內，中國製造精細器件的工廠，需要九萬套工具。中國的計劃家們現在說，要應付現代化的生活，中國需要徹底裝備交通，那就需要電話八百萬具，電話綫一千

二百萬哩。但美國有些專家們認為，中國盡可以跳過電話發展的傳統階段，而直接躍入無線電時代。有了現代化的無線電裝備以及各種週波，那麼傳統的電話系統所需的十分麻煩的電纜桿、電纜以及其它設備就都可以免除了。中國地形崎嶇，道路惡劣，可能覺得無線電要比電纜交通更方便。

所有這些目標都是最低限度。這些目標達成之後，中國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開始計劃稍稍近乎西洋標準的工業生產。美國工業目前每年的生產量，二十人可有汽車一輛；中國在完成了最低限度的工業化之後，九百人可有汽車一輛。

新中國的物質建設是異常巨大的事情，但它所需要的精神建設是更大而更具有革命性的。中國政府政治機構的遲鈍和浮泛，常使旅華的美國人莫明其妙。效力的缺乏，是由於了解西洋技術的中國人為數十分有限。中國受過徹底教育的人，其總額大約還不到紐約華盛頓一地受過教育的男女中的一小部份。教育在中國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種必需的東西，其重要性不下於建設鐵路或創造一支軍隊——也許更重要。據估計，和平之後的最初十年內，中國應訓練二百五十萬人。其中一百萬人是公共衛生，看護和藥房所必需的，另外一百萬人，是工業中所必需的。土木工程師最少需要約十一萬人，機械工程師四萬一千九百人，完全合格的醫生二十三萬人，建築師二萬五千人，電機工程師一萬二千人。這任務之重大可以下列事實判斷，即中國目前所有的，大概還不到必需人員的百分之十。一個國家各大學學生人數最多時不過四萬人，怎麼能訓練這樣多的名家呢？教師從那裡來？實驗室和房屋誰供給

呢？工頭，管理員和技術工人所需更多，從那裏來呢？

要開創許許多多大學，技術學校和工程學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巨大的任務。蘇聯證明要完成這任務需要一個世代，可是在中國，智識的傳佈特別困難，因為社會的阻礙使情形變得益為複雜。從工場想升到繪圖室，從工人階級想升到中產階級，都是極難實現的野心。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界綫，是殘酷地嚴緊；職員們對於勞動大眾十二分輕視，避忌齷齪的工作，這包括面子問題在內。中國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們，通常出生於中產階級，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受過教育的，在工廠中通常都不願意穿上工衣和正式工人一起工作；美國自下而上工作的舊概念，中國大學畢業生幾乎是完全沒有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事。一般大學畢業生在工廠中開始工作時，不願意作衣服滿是油蹟的學徒，他要乾乾淨淨的差使。戰前中國的工廠，是一天工作十四小時，沒有禮拜日，很多童工的工廠。大學畢業生不願意成爲這種奴隸制度的一部份，是易於了解的；雖然，這使非常急需的訓練數十萬熟練及半熟練工作人員的任務變得複雜了。

假如上述的夢想使你得到一個印象，認爲這是有組織的，精明地考慮出來的計劃，那末這個印象是完全不對的。數字是巨大的，條理也清楚，可是，計劃這件事，也像重慶政府所做過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樣，是糊裏糊塗的。但很難把計劃惡劣的一切罪名都加在重慶身上，因爲這個政府基本上沒有計劃的能力，是由於它所處的國際環境的緣故。有三四個職權衝突的機關，都在那裡起草中央計劃，毫無配合而經常衝突，那是真的。在戰事，重點是在戰事本身，而最好的工程師們忙於生產和行政，並

沒有在紙頭上規劃將來的世界，那是真的。可是更真實的事，是由於中國被殖所處的世界情況，使中國的計劃者們無法作很好的計劃。

舉個例：此較重要的小爭端之一，是重工業計劃者和輕工業計劃者之間的不同意見，這種爭端只有這世界本身和平的時候才能夠解決。強調輕工業計劃的人們說，現在和平已經來到，中國面對着若若千迫切的問題——要爲城市工人找到工作，要應付筋疲力竭的內地對於消費品幾乎無法滿足的渴望，要生產貨品參加世界貿易，以迅速取得外匯，購買更多的機器。一個一個錢算起來，投入輕工業——例如紡織機工業——的任何資本，和投入重工業的同樣數目的資本比較起來，其所雇的工人數目要多好幾倍。還有，以人類的快樂而言，輕工業能夠減輕中國在過去十年來生長着的對日用品的急迫的渴望。提倡輕工業的人說，中國人應該得到一點快樂，他們對於新衣服，藥品，鞋子，無線電，溫暖的氈子和潔白的麵粉的需要，遠過於製造坦克，飛機或重機械的打啞的煉鋼風爐。強調重工業的其他計劃者，則考慮到這世界是個好戰的世界。他們希望中國在工業上自給自足，有力應付遠東將來的任何威脅。他們堅持政府必須有強大的工業基礎，使得復活的日本也好，其他任何強國也好，都不敢對中國挑戰。這就是說要鋼鐵，重工業建設和戰畧性的鐵路。

工業的地理分佈問題，也同樣地與和平有關。工業應該依然集中在沿海地帶呢，還是爲了防備侵略，應該分散在內地？工業應該追隨北方的礦藏路線呢，還是應該在華南和華中開發次一等的資源，以遠離或是真實或是幻想中的俄國的擴張？

討論私人企業和公共企業的分界線之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說法都是含糊的；在這一點上，兩黨的想法大致相同。他們都認為基本工業——礦山，鐵路，動力，鋼——是政府的責任。戰前中國的資本家缺乏組織十二分重要的重工業所需的勇氣，技術，遠見和款項；爲了民族的利益，政府必須接管重工業。但國共兩黨都有誠懇的相同的意見，認爲中國經濟的很大一部份應永遠作私人自由企業的天地；兩黨出發點不同，但結論是一致的。國民黨願意讓私人資本有廣大的機會，一部份由於它的基本哲學贊成私人企業，一部份也由於它得到工商業家的支持。共產黨願意讓輕工業落入私人自由企業之手，是因爲他們不信任國民黨官僚的能力。他們覺得自由工商業家，在歷史悠久的利潤動機之中，能够比別的任何入更迅速地創造農民所渴望的東西。西洋觀察家之中，大部份人認爲政府官僚中第一流的經理人才少得太可憐，以致把一切工業放在官僚控制下的企圖，即將推延工業的發展達數十年之久。在戰時，管理工廠的官僚已證明自己是非常的貪污，並在許多情形下是非常的愚蠢，以致日用品的豐饒園地，幾乎成爲不可企及的妄想。如果人民的食和衣的供給放在追求利潤的資本家的手裏，而不放在追求利祿的官僚們手裡，那末人民的衣食問題一定解決得更快。

農民是中國一切戰後計劃中的弱點。農民的生活程度如果不提高，中國的工業將沒有真正的國內市場，而被連鎖在世界貿易及戰爭威脅的無法控制的循環之中。農民如不得到援助，中國的百分之八十將一絲一毫都沒有改變。要提高農民的生活程度，必需在鄉村中開始改革，解決土地所有權、租佃和貸款的問題，引用現代化的農業方法和種子。除非改革在鄉村中樹下基礎，工業計劃是沒有什麼意

義的。對於農民，新的工業會是像一棵聖誕樹，樹上飾有外國運來的金箔，掛着許多禮物，但這些禮物是給別人的，不是給自己的。

在法令條例的書上，中國政府還有幾項世界上最優良的農業法令。中國學者們寫了成堆的專門論文，解釋農民受苦的原因，以及幫助農民所必需做的事情。可是法律也好，論文也好，都是不夠的；需要的事情是一種認為變革必須到來的確信，而在傳統的計劃者的腦筋裏，這種確信簡直是一點都沒有的。戰前中國工業並沒有解決農村問題。工業中的人力來自農民，他們在無法應付的壓迫之下，被迫離開自己的農田，走到城市裏，接受最野蠻的剝削條件下的工作。工業爲了城市生產貨品，爲了出口生產價格低廉的小巧物件，可是運給農村的東西很少。當工業把價格低廉的棉織品推到內地去的時候，就更使農民的問題複雜。以前許多農民一向是利用農閒從事手工業如織絲紡紗等，如今由於機器製造的價格低廉而質地較佳的貨物的競爭，這些行業是被消滅掉了。在許多地方，農民的收入是尖銳地減少了。

迄今爲止，政府從沒有嚴肅地考慮過利用農閒時節的過剩勞動力，由擬議中的水力發電廠發展起來的農業電氣化，也許可以供應廉價和方便的動力在鄉村中使手工業復活。有了電力和簡單的機器，農民可能生產質地較好的物品，和城市的貨物競爭。戰時建立起來的合作社，也許可以成爲這種試驗的有價值的範本；在戰時，政府把這些並不集中化的工業合作社當作社會慈善事業，而不當作對中國將來有益的事業。雖然，工業和農民的需要儘管配合得怎樣好，也還不能完全解決農村的問題。農民

依然主要地是一個農民，而他們的緊迫問題依然和土地有關。他們所最需要的是公平，在他們的不滿消解之前，在他們能開始支持並享受他們自己交納的稅款所建立起來的工業之前，他們需要公平地分享自己所種出的穀物。

共產黨和國民黨最容易分裂的地方，就是在這塊農村改革的礁石上。當新的觀念開始刻鏤到農民心中去的時候，千萬個不同的鄉村內將發生同樣的分裂。當農民激動起來，而且要求當地豪紳放棄其在鄉間的固有權力的時候，中國一個地方的變化，就會蔓延到其他各地。成千成萬的農民一旦發現可以避免苛酷的租額和利息，他們就會拒絕交納，他們就會拒絕鄉紳和民團的言等作搖尾乞憐的鞠躬。暴動和地方亂事是不能避免的，而兩大黨也就無法站在此種擾亂的旁邊。其中一黨勢必將為農民所擁護，而推動農民來獲取土地財富的較大的一份，另外一黨也就不可避免的一定往後壓，為希望維持現狀的集團說話。全中國古老的制度將搖搖欲倒，各地都有暴力的爆烈聲。各地都會有痛苦、破壞、狂怒。因此，早在這個普遍的危樁顯而易見之前，早在未來世界的美夢籠罩在田畝間之前，中國需要一個目前人人談着的新的聯合政府。

第二十一章 美國想在中國幹嗎？

在中國成立這樣一個團結而持久的政府，有多少可能呢？

團結一詞，重慶談了許多年，談得生鏽而毫無意義了。我們之中許多人認爲應該有一個詞句製造廠，像造幣廠一樣，當一個名詞像銅錢一樣地邊沿磨光，上面的字弄得模糊起來的時候，也能够兌換一個輪廓分明的新幣。「團結」就是這樣的一個名詞。團結的意義，簡單說就是要有一個中國人的國度，在一面國旗之下保衛自阿穆爾河起至安南，自帕米爾高原至黃海之間的國土，管理它的政府，則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集團能够自由說話共同參加制定政策的一個政府。

創設這樣的政府，是今天我們世界最驚人的艱險工作之一。其成功和失敗，完全要看兩套相互影響的敵對關係將來如何而定：一套是在中國內部，另一套是今天國際上美蘇兩大強國之間的關係。

中國內部的敵對關係，一般人總愛把它視爲是兩個爭權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簡單衝突。但對今天中國政治之最原始——也最真實——的說法，卻是：中國人民正在企求一個將給予他們以變革的政府。革命正在激蕩國內每一省，每一縣，每一村落。它嚴酷而直接地侵犯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而提出它的要求。革命在飢饉的難民群中，在每一兵團的宿營地中，在每一個跨越荒山涼田而直

揭災難的士兵的記憶中，展開着它的工作。

在歷史所要求於中國的變革中，一個龐大的集團必得喪失它的特權，爲了另一個——更龐大得多的——集團能有所得。幾世紀以來，中國的農民爲那些控制着土地和政府的人們充當農奴，已經把自己消蝕到絕望的境地。幾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社會的殘酷而文雅的人士享有着一切道德，法律和權力 的憑依。在擁有田產和貧無立錐者之間，以及在腦滿腸肥和忍飢受餓者間的鬥爭，也正像中國歷史那樣古老。但現在由於新的技術、新的學說、新的需要的進入，豪紳的控制却第一次遭受到威脅。

今天的中國是站在歷史危機的關口，其危險是犀利而明晰的。第一個危險是：那些統治者國民黨，頭腦封建的人物企圖把他們曠古以來便已握有的特權轉入到明日的新世界裏去，一如他們在日本的老搭檔在一世紀以前所會做過的那樣。從國民黨的盲目抗拒變革中所產生的第二種危險是：他們的政敵，可以這樣乖巧地，對這種歲積月壘的罪惡培植起一種反感，致使人民竟甘願把鬻已攫手可得的自由唾棄，但求古老的正義得予糾正。

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把鬥爭用這樣明晰的政治名詞記錄下來。那些邪惡到近於滑稽的軍閥們，已停止擾亂中國的政治局面——他們已被排擠到遼遠的亞洲內部的疆隅裡，在那裡，幾十年間，他們便將凋謝殆盡。中國政治將由三個壁壘分明的政治集團來彫塑——國民黨的右派，中間人士和共產黨。

中國和平的最大危險，來自國民黨右派所構成的統治機構。這一機構是國民黨軍事領袖，封建地主，和戰爭中坐大的官僚的政治表現。這個集團會從陳舊的生活中汲取最大的利益；爲使和平有效，這些人必須作最大的捐棄。他們控制着國民黨和「合法的」，爲華國承認的唯一政府，如果蔣介石有個三長兩短，他們便將提出他的後繼人。

國民黨右派的這些集團把法律據在自己手中；通用於中國鄉村地方的法規，是他們的祖先寫下來的，一切的是非也由他們所任命的人物來判斷。就某一意義言，這些人是值得憐惜的，因爲他們保護着中國文化，哲學和傳統的輝煌遺跡，然而並不能瞭解應如何在那裏把這些遺跡弄得能編插到現代的世界中去。在他們的監護下，中國的政治思想失去了一切富豐的內容，變爲死氣沉沉和索然無味。他們指揮戰爭的成績，是一連串的敗北；他們不能提供社會的動力，把人們集合起來向前奮鬥，因爲他們把人不當是人，而只是奴顏婢膝的農民。他們的智慧貶值爲市場上的論議，他們的堅強淪降爲匹夫的執拗。

這些人物的最大罪惡還不在於他們的貪污，小事情上的暴虐、狡詐，而在於他們對統治和領導全然無能。在戰勝日本，國民黨重返沿海一帶之後，這舊的統治集團又得到一個洗滌和清除自己的最後機會。國民黨軍隊和政府的前進單位在上海和廣州曾受到旌旗飛揚，市民結隊的歡迎，這是狂歡節般的盛況。而在六個月間，他們不但終於自絕於營養不良，無權無勢的廣大羣衆，並且還自絕於堅實積

極的工商業集團，這一集團在十年前原會是他們力量鉅大貯蓄池。

似乎是一種規律，一個統治集團沒落的最後屬性，便是它的搶掠，高壓，和治國無方的能力。國民黨之回到沿海一帶恰恰証實了這一規律。在通貨高度膨脹，道德全然破產的風氣下，重慶的這般貪財無鑿的官員們又回來洗劫被解放的城市和省份。為中國政治道德所一向容許的中飽和賄賂，便猖獗到漫無邊際了。上海的人們以難堪的感覺，坐視他們所迎迓回來的政府出售執照，出售特權，零關或外的剩餘物資，寬宥囤積居奇的事實。他們坐視印刷機滾出一捲捲的毫無價值的紙幣，而物價却攀騰直上，官僚們在夜裏總會跳舞，在華貴的旅館裏飲酒。上海的工人團體眼看著國民黨在跳舞場裡召開他們的第二屆工人團體大會。舊有的無賴，在國民黨某些最有權勢的人士領導下又拋頭露面了。上海的人民會見到一九三七年政府的撤退，流着血但帶着光榮，這政府會為日本人和偽軍漢奸所接替，而現在這同一政府又回來了，却把某些最令人憎恨的漢奸納入懷中。

表面上好像難於把國民黨機構的奢侈，放縱和蔣介石的嚴峻，清教徒式的素質結合起來。但這一機構的權力之駕御普通黨員，却是蔣自己在一九四五年黨大會上所批准的。有形的官僚制度在沿岸一帶的暴虐和勒索，原只是多少代以來便在內在農村中所存在的暴虐和勒索的縮影。農村的舊有制度是傳統做法所原有的，並有無窮的歲月予以掩飾；形成支撐國民黨的最大基礎的土豪劣紳們，蔣介石自己是首要代表人。他接受了他們的支持，而且自己也罩上了他們的道德觀，便必須幾乎違反本意的，和他們城市的伙伴們——黨棍們攜手並進，而這些人便破壞了他在大城市裏的靠山。一個賢明的

美國政治家對蔣曾經做過的評語也正是對國民黨整個機構所做的評語。他說：「蔣介石企圖用武力和思想格鬥，他既不懂得思想，又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力。」

因此，說在中國和平與戰爭的過程中最偉大的一個人物是蔣介石，這簡直是歷史的謬論。國民黨的右派除蔣以外對任何領導都不信任；如果需要規勸，約束或強迫他們採取進步措施的話，這只有蔣介石自己才可以做到。唯有他可以向他的封豕徒們保證，在一個新的國家中他們不會被完全剷除。只有他可以保證他們以前的權勢能保留一小部分。而且甚至共產黨人都承認，即使要得到最短暫的停戰，蔣的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國民黨的極右派和左翼的紀律森嚴的中國共產黨人之間，還站有一群人，他們是要尋求一條中間道路的。這包括國民黨中的溫和份子，智識份子和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民主同盟的各小集團。國民黨下層黨員的很大一部分都屬於這一集團，中國有思想能力的人民大部分也是如此。這一個包括美國最親熱朋友在內的中間集團，是在內戰中最可能被消滅掉的。如果真正的和平果能持續一代之久，這些人或終能形成新政府中的大多數；他們準將統治新聞界，文藝界和戲劇界的思想。他們是願望和平並將為之努力的集團。如果中間派集團的人果真是組織得很好，他們是能保證和平的。然而他們並不這樣。他們沒有軍隊，沒有政治機構，沒有在任何社會階層中生根。只有教育和工作的發展可以產生足夠的近代社會的人物。給他們提供寬濶的社會基礎。他們整個的前途，都寄托在停戰和中國

站在左翼有中國共產黨。共產黨握有政權，在過去他曾爲政權出擊過，也許它將企圖爲將來的整個政權而出擊。共產黨現在堅持須在華北有一個堅實的基地，以保衛自身的安全和生命。沒有人知道他們會不會利用這塊地盤作爲他們下一步統治的調兵場。只有當新的政府果眞是在朝着變革堅決前進，才可以把共產黨所宣誓的忠誠加以考驗。如果新的政府頑強地抗拒變革像舊的一樣，那便將發生不安，暴動和流血——而共產黨人便將從這機會中汲取最大的收穫。

目前的停戰將第一次判明共產黨的真正意旨。他們的領袖們會從密洞和山穴裏出發，做了二十年的鬥爭；他們和人民接近得太深了，使他們不致不知道內戰所帶來的苦難。至今爲止，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該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民脫離古老的苦難，這樣獲得了威權。訪問過中共區的人十似乎是逃脫了國民黨的壓迫，進入到光明的地區。現在共產黨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他們經受了考驗，不是相對地說，而是以他們的成就說。他們比國民黨更民主；他們現在所需證明的，是他們的民主到底是手段抑是目的。

以美國的標準來忖測中國共產黨人是愚蠢的。在過去廿年的混亂和紛擾中，他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共產黨，都更直接地和人民大眾相處。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是無限地壯大起來了，因爲他們跨在革命

的洪大浪潮上。他們無情、冷酷而果斷。他們不加遲疑的要求成千，甚至成百萬的農民做最大限度的犧牲，幾如他們之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一樣。他們是玩弄硬性政治手腕的——他們會抹煞並拋棄了許多的協議；他們對於批評極難容忍，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經常是在戰爭中。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只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裏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會對於農民們勢不可擋的企求生活受到公平待遇的渴望，給以有力的領導。因為農民們現在要求和平和食糧比一切其他更甚，共產黨也是要求和和平的。他們寧提議在相當時期內終止對不滿作強烈的聲討，而參加到一個國民黨携手的總的政府裡去，直到中國醫好了自身的創傷為止。這個提議似以國民黨承認他們目前的基本條件。如果國民黨企圖把他們趕走，他們便將動武。共產黨的政策在五年或十年之後又將如何，無人能預卜。如果國民黨和中間集團利用停戰期間向人民奉獻共產黨所奉獻的同一的東西，停戰最後或終能引伸到一個廣泛的，多黨的政府，其一切成員對基本的變革都負有約束。如果停戰被國民黨糟塌了，則當共產黨準備停當要再出擊的時候，除了美國繼續不斷，毫無限制，毫無問題的援助以外，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救國民黨的性命。

在這種局勢中，最合理的解決方案恐怕是中國中間集團所提出來的；一個聯邦式的聯盟，把地方和中央的權力嚴格劃分。照他們意見，國防軍須裁減，直到牠不能在同一時期內實質地統治著整個中國的地圖。每一省份應對自身內部的安全負責。每一省份，對教育，地方司法，土地稅則，刑法司法

等等，大約也得保有相當多的自由，如同美國之所以能成爲聯邦那樣。這樣的局勢，當然，給中國帶來不平衡的發展——有些省份會進展得快些，其他的會滾落在後面。但中國太大，交通太差，技術太原始，因此不能達成國民黨理論家在過去所尋求的徹底集中。

要這樣的聯盟能維繫在一起，便得使聯邦政府能起和美國政府同等的作用；——保證國防，反抗外來侵略，制定外交政策，對全國經濟生活起主要作用。只有在各省的集團和各黨派參加了它的工作情形下，這聯邦政府才能存在。它且須保證每一省內少數集團的權利受到尊重——一切的黨派都有組織和活動的自由，在共產黨區域國民黨黨員得有人權自由，在國民黨區域共產黨黨員得有人權自由，在各地的人民大眾也都得有人權自由。

要建立這樣的聯邦會是非凡困難的。每一黨派都蔑視對方。共產黨相信國民黨的強大只是因爲有美國；國民黨相信共產黨的強大只是因爲有蘇聯。如果沒有外來的干涉，兩方面差不多是旗鼓相當的。在內戰時，蔣靠了美國武器和裝備的遺產，將佔領公路，鐵路和城市，而共產黨靠了農民的支持，將保持着農村。內戰會曠日持久，代價奇昂。

在中國所達成的任何聯盟和任何協議，其基礎必將陷入猜忌和戒懼的泥沙中。每一黨都會料想方將背叛協議，而在若干年內彼此都好像老鷹似的互相窺伺。

這互不信任之心的最卓著的範例便是一九四六年一月馬歇爾所主持的第一次停戰的瓦解。馬歇爾策劃了最優良的對戰爭的妥協協定。政治方面，這協定要求兩黨在一個最高級的，制定新國家機構的

會議中合作；軍事方面，它給政府中共軍規定一個固定的比例，劃定他們的配置，並給國民政府以重新佔領東北的權利。

兩黨立刻便對這協定加以曲扭，看它到底能受得起多大的壓力。國民黨首先破壞這停戰。其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猛烈地破壞了和共產黨的協議。國民黨的軍隊，受了重慶的命令，在北方對共軍防線做蠶食的損毀。當共產黨起了反停戰的反應時，他們是以一種特有的頑強和勢不可當的戰畧來這樣幹的。他們在停戰成立之前便滲入了東北；一旦國民黨在政治方面的破壞判明了，他們便把在東北的攻勢加速。他們在一場以佔領東北首府長春而終結的戰役中，佔領了力之所能達的許多城市和鐵路。局勢迅即倒退到馬歇爾來華前的武裝衝突的境况，而當他第二次來華時，馬歇爾發現他得一切從頭開始，而且在更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他的工作。

如果中國是一個島國，能孤立地在經過一代的流血之後從事於變革的新的冒險，則團結與合作之能壓倒不團結和內戰，是有着一切希望的。中國人是一個明理的民族，他們要和平。中國——它的人民，牲畜，機器和國土自身——是筋疲力竭到極點了。在那裏只有很少量的耕種稻田的水牛，微不足道的餵飼飢民的食糧，房屋，衣服和溫暖。成千成萬的士兵退伍還鄉，再也不想回到行伍中去了。他們渴念寧靜甚於一切。只要別人不管它，中國人民會能及時地，並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找到和平的。

但毗連着中國的在北方有世界上最大的陸上強國，在東方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和空中強國。美蘇

的互相戒懼猜忌和傾軋，以最激烈，最危險的方式在中國相撞碰，這種外來的傾軋，居中國和平與團結之威脅的大半。

千年以來，中國便是東方最大的強國——强大到使它柔弱下來。歐洲掠劫性的國家隨後把她切爲零星碎塊的勢力範圍，並進而剝奪她的尊嚴。中國是一切人的殖民地，但又不是任何人的責任，列強的角逐，最後到世紀轉換期，才由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穩定下來。這只是說，中國的門戶是開放給任何人，而只不開放給中國人。門戶開放政策較之歐洲列強的早期帝國主義是一大進步。舊的列強曾把這肥鷄宰割，切成易於消化的碎塊，但美國堅持鷄的完整，好讓大能分享它的金蛋。從鷄的觀點說，這比切肢剖腹自要聊勝一籌，但仍然很難滿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國革命改變了遠東的整個局勢。沙俄，掠劫性列強中最野蠻的國家，倒了；德國也如此，英國削弱了，革命波動了中國。美國企圖以一系列的會議和諒解來重建門戶開放政策。但這一政策消失了活力——日本在躍進中，日本相信中國是一個力量的真空，而日本是受了神的意旨應來填充它的。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填充這真空的意圖在東方起了統治作用。

在今天，一個嶄新的方程式擺出來了，就歷史的一切目的而言，今天活動在東方的兩個最大的強國是美國和蘇聯。兩強都承認由於日本的瓦解而空餘出來的真空應由一個强大的中國政府來填充；但兩強的任何一方都堅決要這一新政府對自己友好，一如像和對方一樣。如果美國和蘇聯成爲中國兩大黨的保護人，視他們爲取得新中國友誼的唯一保證，則對於中國言，這是澈頭澈尾的悲劇。在某種意

義上，中國人民爲團結和立國所進行的這一次戰爭將變成完全浪費的戰爭了。對我們美國說，接受這樣的方式，災害也非較淺——因爲僅依其定義，我們便落在充當沒落和腐化一方的保護人的地位，而蘇聯則寧爲頑強有力一方的保護人了。

歷史是有莊嚴的節拍以及機會卓越的瞬間的。中日戰事烘托出許多這種機會的瞬間，一次再次的——在一九三八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都會有這種幸運的偉大高潮來臨，那時中國兩黨是可能取得國內和平的，受着敵人的迫害，或在人民的壓力之下，兩黨會一次再次地迫向暫時合作。每次，機會被拋置一旁了，每次，內戰更確切地封粘在國家的前途上。

在戰爭過程裡所顯現的一切機會裡——最有希望的一次是緊接着戰勝日本後的那次。那是歡騰和希望的利那，在歡騰和希望中，人民響亮如雷的呼聲，要求以和平作爲勝利的果實。人民對兩黨的壓力是一種幾乎空前的強制。糟踏這一歷史瞬間，其內在恥辱是要中國的黨派自己和美國的政策來分担的。

美國人應認識，中國政治裏許多確定不移的事實之一是：在百萬中國人民的眼中，他們的內戰是美國製造的。我們是內戰戰畧的工程師——我們把政府的軍隊飛運到共產黨的區域裏去；我們運輸並接濟國民黨的軍隊，使他們開進了共產黨的黃河盆地以及無人區的滿洲；我們頒佈命令給日本的駐軍，這才使北方的鐵路成爲內戰的角逐品。我們的海軍陸戰隊開到了華北並停留在那裏來支持蔣的政權，雖然一個接着一個的虛構的故事，以高貴的言詞，對他們的留在華北予以解釋。他們月以繼月地

留在那裏，是爲了「遣送日人離華」。但如果與中國游擊部隊簽訂合乎常識的政治協定，在所需時間的一小部分內就可以把日本人都遣去了。當日人開始遣去時，那個虛構的故事爆炸了，海軍陸戰隊繼續留在那裏，說是爲了對抗在滿州的蘇聯軍隊。當蘇軍撤出滿州時，那個虛構的故事也爆炸了，於是又宣佈，陸戰隊無限期地留在那裏，只是爲了「看守」通往海岸的煤的給養線。那此虛構的故事只可以騙騙美國人；在中國，一切人卻很清楚，美國陸戰隊的主要責任，是保全，防護和捍衛蔣介石在華北區域的政權，蔣在那裏遭到攻擊。中國的兩黨知悉這點。國民黨知道他的新式軍隊，沿海的城市以平津區域，都是美國的餽贈品，要保全這贈品，就得使美國經常恐懼中共和蘇聯結盟，他們自己總是恐懼着這一層的。共產黨也明瞭這點——若非美國的干涉，整個華北和滿州可能老早是他們的了——而他們的憤慨也便逐月增長。由於中共所特有的情感上的自我熏釀，他們的宣傳便又轉入到毫無保留地呵責美國及其成就了。

足足有一整年，蘇聯和華國政策的基本動力是戒懼和猜疑的混合物。二者都雖企圖在中國的身上，一如他們在歐洲的身上，建立一座屏障來保衛自己以及保衛他們認爲是自己利益的東西。以戒懼作爲國際外交的動機，是比貪婪更加危險的，而像蘇聯和美國這樣兩個龐大有力的國家的互相戒懼，便對中國的主權大加嘲弄。在赫爾利大使之下，我們追循了一種政策，這種政策使我們一錯再錯，最後終於參加到中國的內戰裏去。而僅在我們已經把自己牽入進去之後，我們才派了馬歇爾將軍來華，指令他要實現恢復美國清白的奇蹟。由於對美國戒懼，蘇聯從根本有問題的中國條約起一再失策，終

對滿州做了搶劫。在滿州，兩大強國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是中國人民成千的流血和死亡。

美國在中國的真正利益是簡單的。它是和我們在世界其他任何地點的利益同一個東西：這就是和平。想到和平，美國應把和平和穩定區別開來是極必要的——因為一向我們在亞洲和東歐疆界上所上下追求的只是穩定。我們一向設法盡外交之能事來儘量恢復舊有的秩序，而到處我們的同盟者都還是那些在舊秩序中獲利最多的人士。我們雖被法統、合法、以及諸如秩序之類的虛偽的名詞所陷害。在中國，我們曾在太長的一段時期內尋求一個日益消散的穩定，而中國人自己卻要變革；只要我們一天還引導自己來反對這變革，並支持反對變革的人士，我們便是在領導中國人民和世界到一個萬劫不復的境地。

亞洲今天把美國看做是反動最後碩大的堡壘——這樣一個國家，它談論自由，而到終結總是倒到舊秩序的一邊去。甚至以美國最保守的份子而言，保守的外交政策都是不現實的，而在穩定與變革間，勝利的必定是變革。美國的借款，美國的軍隊，「民主」一詞的經常念咒，可能把這個變革推進。但到最後，鼓吹變革的人士終必鑽入農民的鄉村，並講給他們聽，說還另有一種制度，這種制度，靠了它，主子們將被掃除，土地將被分配，這種制度，在它之下，村中的首腦不再支配一切，而是農民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自由是一個多面的炫目的名詞，而農民將相信對他生活的困擾予以最速解決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他將為它投票，為它奮鬥，並為它獻身。如果我們企圖扼止着這一浪潮，我們是要失敗的。那時我們盡一切力量所能做的，不過是保持短暫而有點卑鄙的孤立而已。

中國，在政治上，是亞洲的一切國家中最前進的。在亞洲其他部分明日所將發生的，正在今天中國的血泊中鑄造出來。有一世紀的光景，自種人會看不起亞洲的民族，把他們一生一世地譴貶到二等人的地位。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其一切的人民，不分貧富的歷史趨勢，都是把自種人從他們有權有勢的地位趕走。

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國裏，只有另一個鬥爭在和這自種人與從屬國人民的衝突，並行不悖。這便是富人和窮人，有田人和無田人的鬥爭。這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集團——他們想把異國人趕跑以便取其優越地位而代之——和一個落後的，不幸的集團——他們想把異國人趕跑以便把一切壓制老百姓的優越地位摧毀——之間的鬥爭。

今天中國幾乎已經達成把自己從外人的桎梏裏解放出來；它現在進入到第二階段的鬥爭，內部的鬥爭。它比亞洲的其他部分走先了一步；印度人、印度尼西亞人、安南人現在還在爭取把自己從自人手裡解放，這樣的鬥爭在中國已幾乎勝利。明天，那些國家的農民們將要反抗他們本國的主子們，要求對大家合力爭來的新自由分享一份。

既然現在中國和亞洲所進行的革命是無法抑止的，則合理的美國外交政策應以三個目標為嚮矢。

- 一、這個革命，如果勝利了，應把美國視為友好的與國。
- 二、它應以最少的暴力和流血便得完成。

三、它的內部應保證少數集團有說話，抗議、依法活動的權利，並允許廣大的外界來觀察和報導它所做的一切。

這應是我們的目標，但就目前而言，美國可能追循的政策，其抉擇是有限的。

我們可以追循在一九四五年，大部時間內所採用的政策；這政策把我們的陸戰隊引導到直接干涉中國內戰上去。這個政策是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毫無疑問地，蔣介石曾是一個有價值的同盟者。但是對於我們，中國的人民，就其整體說，要比一個單獨的個人來得更重要。他們所要求的，而不是一個人所要求的，才是重要的東西。

這個政策可能已引致，而且也許還會引致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中國的分裂：在南方有一國民黨和美國的聯盟，在北方有一個共產黨和蘇聯的聯盟。這就是說中國的任何一半都不是自由的，而磨擦將逐年轉劇。最終是一場惡戰。這政策的另一可能結果是國民黨的全部勝利。蔣介石靠了美國剩餘軍事裝備及美國戰鬥人員對其軍隊的參謀而取得優勢，可能他竟建立起對中國農村的大部，主要城市以及重要交通脈的統治。一個完全由國民黨獨裁所統治的中國——而這個，歸根結蒂，那是我們在整個一九四五年所追求的——將是歷史上的怪物。在相當時期內，會有一個昌盛的工業；鐵路會修築，工廠會昇起。然而，農村裏的農民會破落，他們受的壓力會加甚，他們的子弟會被拉到軍隊裏去。國內的緊張找不到出路，這個國家將會變成（日本便是如此）整個東方，最後是整個世界的威脅。像日本一樣，它將掌握近代科學的技巧和技術，而這些技巧將被一些思想生根在古舊封建的野蠻主義中

的人士操縱。

還有第二種政策是我們可以追循的——孤立主義的政策。我們可以聳一聳肩，說「管他媽的」。但是如果我們從中國抽身，我們的戒懼和我們過去的成功會來侵擾我們的安寧。如果共產黨將來從莫斯科得到支持，蔣主席甚至連短暫的苟延都不可能。如果我們單獨撤退了，那麼在十年間中國可能會落到共產黨的控制之下——而在屈指可數的若干年內，整個亞洲也將如此。如果我們和中國的關係要在一塊新的石板上開始，這是一個可怕的遠景。然而，這塊新的石板是沒有的，因為我們令人無法忍受的外交已經博得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嫉憤和敵視。得經過很長的時間，他們才會回到一九四四年的友誼態度上來。在這一敵意平息之前，我們可能會存在幾十年——但我們得在武裝警戒的情形下討生活。

因此，唯一實際的政策之第三者：鼓勵中國成立一個多黨政府，它將是中國所需的變革的媒介物。這是說，我們今天認為是朋友的許多國民黨人得被捨棄掉。這是說，得恢復我們不偏不倚的立場，美國的干涉必須終止，美國海軍隊必須撤退。對這樣一個多黨政府的鼓勵，首先要靠美蘇間事先諒解。只要中國的任何一黨一天還覺得可能向中國以外的一個私人法庭告狀，而這個法庭將對它做有利的裁判時，中國建設性的力量便將寸步難行。

我們必須和蘇聯取得協議，或是經過直接談判，或是舉行一個會議，並還得把中國的兩大政黨包括在我們一起談判。第一，我們得對蘇聯說清楚，在我們所要的一個中國裏，蘇聯的友人將有和美國

的友人同樣響亮和自由的發言權，而兩黨的結合是我們的目標，一如他們的目標。第二，我們必須設法使蘇聯和我們成立如這樣一個消極的協定——縱令我們對停戰作了最忠實的努力，中國的內戰仍然繼續則世界全體需要維持一個防疫帶。如果內戰繼續，蘇聯和我們必需從中國搬走槍鬥，槍床和槍銃——我們的軍隊，我們的裝備，我們的財政和技術的援助。

美蘇的互相諒解只是美國政策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有限度地利用美國的經濟力量，把和平所建立的一切，扶持壯大起來。美國的經濟援助只有在一個先決條件下才是有用的——那就是，只援助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份子都參加的政府。要持久地停止中國內戰，便得使中國的物資和經濟建設確在進行中。中國要在我們這新時代裏重建起來，是非得有我們的援助不可的。我們的資源，我們的工業技術，我們的器材，和中國的有着二十年的差別，可以使得今天原要死亡原要挨餓的幾百萬人能繼續生活下去。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知道中國多麼可怕地需要美國的援助，而他們都願意大大和緩他們的要求，以期保證這份援助。這樣經濟援助的政策並非是慈善事業。如果借款能買來和平，這價錢是便宜的。再則，借款給中國是合於美國企業生利的傳統辦法。一旦江河流域開放了，一旦交通打開，渴望獲得新物品的四萬萬到六萬萬人民的市場，一個廣闊的商品市場，便將展開在我們的工廠之前。

一旦建設的過程開始，美國和蘇聯必須彼此同意在政治上大家站在一旁。互相攻訐的鬥爭場面在中國還會繼續幾十年，當改變的政綱接觸到農民，並且改變了他們的處境時，到處會發生此起彼伏的

相信自由遭到了襲擊。只有一個四大皆空的表面的寧靜在中國才是令人着慌的，兩個政黨的叫囂和互相攻訐，使每一方面能在全國自由地表白自己，也許倒是進步的指標。

還留下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或者在撤手政策或積極合作政策上不能取得蘇聯的同意——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對蘇聯外交政策的動力以一種我們自己的同樣富有頑強性的政策來對抗。我們的政綱不能再是那過去我們追循過的，或者我們目前在東歐或近東所正在追循的那一個。我們不能在民主還不存在的地方保衛民主。我們不能在世界任何地方保衛一個壓迫的、封建和腐朽的制度，而勸告其人民說我們這樣做是在保衛他們的民主權力。沒有農民——中國的，伊朗的或印度的——會相信使他淪為身配枷鎖的奴隸並忍飢受餓的舊制度是民主和自由。

我們自己必須成為革命的贊助人。我們對亞洲的人民必須奉獻蘇聯革命所允諾給他們的同一的東西，麵包和日常生活的平等。我們甚至能奉獻他們比這更多的東西，因為我們是被一個更早的革命傳統所滋育大的——這個革命，不僅允諾世界的平等安全，並且還允諾以自由。我們能奉獻的不僅是將來有麵包和土地，而且現在就有麵包，這將來自我們剩餘的穀倉裏。我們尋求的同盟者必須是一個滿足人民需要和要求的政府；如果我們的同盟者壓抑自己人民的願望，如果我們對於千百萬人民的貧困視若無睹，則我們不能有強大的同盟者，也不能有壓力的政策。

把變革作為我們在亞洲的指標，不僅最有利於亞洲，而且也最有利於美國。朝這指標邁進，我們不會和蘇聯相碰撞。在爭取新的民族親善時，我們能和它並進並沒駕它，我們不能拿這樣的政策來威脅它，它也不能來威脅我們。朝這個指標邁進，則在亞洲正在誕生的新世界不可避免地一定是一個互相友好的世界。企圖去破壞這一個新世界的降臨，不僅是邪惡的，而且是危險的。這，說不定有一天會造成這樣憂鬱的評語：美國的世紀是這樣的一個世紀，爲了和平能夠來臨，人們送了命——然而，和平並沒有來到，威來到得太遲。

譯後記

我們經歷了八年艱苦偉大的民族戰爭，而且終於贏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是我們却到現在還沒有有一本記載這偉大歷史階段的書籍，還留下了一塊空白，這是不能不使人悵惘的。

這一本外國記者筆下的「中國暴風雨」，雖然不能說恰好填充了這空白，但是，從抗戰開始到這次內戰開始這個階段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在這本書裏都接觸到了，而且都相當全面深入地接觸到了。在一個不分嚴格的意義下，我們可以說，它是戰後第一部中國抗戰史。或者更應該說，它是一部偏重內幕性的抗戰史，因為作者利用了國民黨區「洋人第一」的奴才心理，在採訪新聞和搜集材料上的確得了許多的便利，探得許多中國記者不一定能得到的材料，特別是在中美關係的這一段裏，作者更充分地運用了他特殊有利的地位。

因為作者是進步的美國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的貪污，腐化，獨裁是特別敏感的。經過了七八年在中國黑暗區裡的耳聞目睹，作者終於不能容忍地把反動派所遮着瞞的事實真相都一一地暴露了出來，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不為當局者所喜的原故，這也就是這本書之所以有價值的地方。作者的這一重大貢獻，是我們中國人民所不應忽視的。

但是，正因為作者是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國情究竟還沒有澈頭澈尾地摸清楚，所以在這本書裏依然存在着一些不正確的地方。例如，作者對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以及以親蘇爲幌子的孫科，都相當推崇，總覺得這兩個人是與其他聲名狼藉的人物很不相同。然而，在我們中國人眼睛裡，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此外，不可否認的，因為作者在中共解放區裡停留的時間太短，同時腦子裡始終盤踞着美國人對共產黨的岐視，這本書對於中共的某些地方的認識是不够和不正確的。實際的例子，讀者自然會在書中發覺到，自然會加以判斷，這裏就不列舉了。

然而，總起來，我們必須公平地說，在這本書裏，事實真相的揭露遠超過了它的誤解，貢獻遠超過了它的缺陷。譯者以愉快的心情把這本書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端納）

